

# 北京文博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S



□ 抓奥运机遇，促文博发展

□ 历代帝王庙文物保护工程记述

□ 清代『迦陵禅师舍利塔』考

□ 醇亲王墓考

北京市文物局 主办

2008 **3**

# 文物局



鲁琪，1937年生，辽宁辽阳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研究馆员。中国考古学会、辽金史研究会、北京史学会、北京考古学会会员。1957年从解放军大连俄专分配到首都历史与建设博物馆筹备处（首都博物馆前身）工作后，又先后在市文物工作队、市文物管理处、市文物局、市文物研究所等单位工作。在四十余年的文物、考古、博物馆和研究工作中，发掘了各个时期墓葬几百座；在汉代帝王的陵寝制度、填补金代皇陵考古空白及北京城址变迁等方面均有研究。

## 一、博物馆建馆与陈列工作

鲁琪刚参加工作就参与了首都历史与建设博物馆筹备处《社会主义建设陈列大纲》的修改和文物征集工作。为庆祝建国十周年参加中国历史博物馆建馆工作。1964年，又参加首都历史与建设博物馆筹备处的古代史资料收集和陈列设计工作，并撰写了唐代部分的陈列大纲。1977年，他参加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的《北京市出土文物展览》大纲的编写，并执笔撰写《北京市出土文物展览巡礼》一文，综合论述北京市文物考古的最新成果，这对首都博物馆80年代重新恢复建馆起了积极作用。1982年，他出任北京市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建馆领导小组副组长，不仅撰写《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陈列大纲》，而且还发表了《巧妙的构思，创新的探索——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浅析》、《汉代的“地下宫殿”——我国第一座汉墓遗址博物馆》等学术文章。

## 二、文献资料整理和研究工作

上世纪60年代，他结合首都博物馆筹建和文物考古工作，积累了大量北京史料，编写出市文物工作队藏《北京地方文献目录》、《北京市城区石刻目录》等。他研究的内容涉及广泛，其中《辽代韩资道墓志考释》对辽代南京的“韩、刘、马、赵四大族”中的韩氏族谱及墓地进行了详尽考证。特别是80年

代以后，他陆续发表了《北京出土西晋王浚妻华芳墓志跋》、《唐幽州城考》、《金窝鲁欢墓志考释》、《马可波罗时代北京城》、《戚继光与北京内长城》、《明代嫔妃陵园及圻志》、《清太监恩济庄莹地》等50余篇学术论文，对北京城址在各个朝代的变迁与历史发展，都进行较详实的研究与论述。

## 三、重点发掘与科研工作

1974年发现丰台区大葆台西汉墓，他是发掘小组重要成员。主笔撰写了《大葆台西汉墓发掘简报》，通过认真研究发表了《试谈大葆台西汉墓的“梓宫”、“便房”、“黄肠题凑”》、《西汉燕王墓椁墓》、《一座规模宏大的木结构地下宫殿——大葆台汉墓》等考证性论文。并根据出土文物及研究成果，撰写了《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发掘报告》的主要章节，对汉墓葬制、结构特点、年代、墓主人等作了重点分析研究。

70年代后期，他负责主持西城、丰台、通县、门头沟、房山、延庆六个区县的考古工作，发掘各时期墓葬五十余座。他参加的重要发掘有门头沟齐家庄金代窖藏、妙峰山“金窝鲁欢墓志”及其女“妙行大师灵塔”、“金正隆二年银铤”、“金代铜则”、斋堂“辽墓壁画”以及对丰台区史思明墓地的调查等。发表了《北京门头沟辽代龙泉瓷窑》、《北京金代铜则》、《金正隆二年银铤初探》、《北京门头沟斋堂辽壁画墓发掘简报》等重要学术论文。

1986年以后，他曾担任市文物研究所房山金陵科研组组长兼金陵考古队队长，发现金世宗之父睿宗的“睿宗文武简肃皇帝之陵”汉白玉螭首陵碑及皇陵御道的汉白玉台阶和栏板等重要文物。据此，确定了金睿宗景陵的所在地及其它金代皇陵的大致位置。这一重要考古发现，填补了金朝皇陵考古的空白，为女真史、金史、北京史的研究提供了最新实物资料，并为以后的金陵考古重大发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鲁琪同志在他四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兢兢业业，孜孜以求，在文物、考古、博物馆和学术研究中，多有建树，为北京的文博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 专家榜

李铁虎，男，祖籍辽宁铁岭，1938年6月12日生于北京西城。1961年河北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河北省黄骅县当中学教员。1979年在黄骅中学被评为“先进”。教学业绩彰显，社会反响强烈。1980年考取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成为近现代史研究人员，主要从事晋察冀边区和河北省抗战史研究。参加编写《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简史》和《近代河北史要》等著作。1985年调入首都博物馆陈列部。1988年被评定为副研究馆员。1988—1994年任编研室主任，兼任馆刊副主编，负责编辑近现代史部分。1994年起任馆学术委员。1998年退休后，被本馆连续返聘到2006年。其间从事近现代史编研、展陈、文物史料征集与鉴审等工作。

他曾为河北省历史学会会员、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会员、中国现代史学会会员和北京史研究会会员。于1993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1996—2006年，连续被民革北京市委评为“先进个人”。2007年，他被聘为全国妇联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筹展专家组成员。

从事文博工作以来，主要业绩成果如下：

1. 撰写发表论文十余篇，其中不乏独到见解。《不可忘辛亥革命》一文摒弃所谓辛亥革命失败论调，称辛亥革命“已经胜利地完成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接力第一棒”，并称“整个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无疑比晚清的封建社会是历史的进步”。《民国北京政治文化地位刍议》一文认为，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北京是首都，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而民国南京政府时期，北平是北方陪都，是北方政治中心，但仍为全国文化中心。《北平外围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和政区沿革》一文，综述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平郊抗日根据地创立、发展到壮大的全过程，后被编入《北京党史专题文选(第二辑)》。

2. 考证撰述1912—1949年民国各个时期华北地区各省市区县级以上行政区划沿革系列文章十余篇，全面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敌我友三方和解放战争时期国共双方控制区域犬牙交错此消彼长的情



况，成为其中的难点和亮点，应属历史地理学科的研究成果。

3. 在教育史方面，做了大量深入研究。早已完成的市文物局科研课题成果《民国北京大中学校沿革》(约15万字)尚待出版。

4. 整理了大量重要文献史料。书就民国中央政府(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上将名录、华北伪政权“治安军”序列沿革等。

5. 在近现代地图、书刊、钱币、邮品和照片等文物方面做过大量重要的征集和鉴审工作，对北京近现代历史文物的保护和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在《中国文物报》著文批驳“近现代文物无需专家，只要短训几天就能胜任”的谬说，并提出“要有广博的知识，丰富的阅历，锐利的眼光，敏捷的头脑，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还发现过馆藏近代地图珍品。2002年2月1日，《今日北京》(英文版)以第9版整版篇幅发表题为《李铁虎眼中的老北京：古都轶事》的报道。近几年来，他参加了《中国文物地图集·北京分册》的编辑工作，负责近现代史迹部分，现已出版。

6. 参与过许多近代大中型陈列展览的内容设计。其中主持的《纪念北平和平解放50周年展览》，受到社会各界赞许。有媒体称：“细致的编辑工作体现出展览严肃的历史态度和认真负责的精神。”“表现出精心的构思和出色的编辑意识”(参见1999年2月2日《中国摄影报》头版头条《箭楼重温入城式》报道)。

总之，李铁虎先生从1985年进入北京文博行业至今的20余年中，专心致力于华北地区，尤其是北京的近现代史研究，成果卓著，并在近现代文物的征集、鉴审方面眼光独具，成为北京近现代史文物专家。

## ● 文物工作

抓奥运机遇, 促文博发展

——北京文博工作在筹备奥运宏观环境下的发展与提高…………… 孔繁峙(6)

北京旧城危旧房调研报告…………… 梁玉贵(11)

历代帝王庙文物保护工程记述…………… 许伟(17)

## ● 考古简报

丰台王佐遗迹考古发掘简报……………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24)

## ● 文物研究

大葆台西汉墓葬制成因分析…………… 靳宝(27)

辽代康文成墓志再考…………… 王玉亭(32)

珐琅器年代区分简述…………… 阎萍 尚美华(35)

唐代石景山刘总刻经考…………… 陈康(38)

通州残碑考…………… 房昊(44)

浅析北京地区明代墓葬中金银器物上的凤凰纹饰与凤文化的关系…………… 徐瑞萍(48)

从顾绣作品探索其盛衰的原因…………… 韩英(53)

清代“迦陵禅师舍利塔”考…………… 宣立品(59)

## ● 北京史地

元通惠河下游河道与河门上闸位置的选择…………… 周良 戴立军(63)

北京地区及周边清代王爷园寝地官形制管窥…………… 周莎(68)

元明清北京花乡的形成与发展…………… 范军 周峰(73)

金炉圣母铸钟娘娘庙考…………… 庾华(78)

《正阳桥疏渠记》碑与天桥地区的环境变迁…………… 陈倩(82)

醇亲王墓考 ..... 王晓军 (87)

刘多生与北京寺观 ..... 韩建识 (92)

## ● 文物保护

天坛祈谷坛坛墙青石吐水嘴修复实例

——浅析环氧树脂是否应该在石质文物保护中应用 ..... 张 涛 李卫伟 (97)

## ● 资料信息

北京市文物局 2008 年二季度文博事业大事记 ..... 杨康明 (100)

封面：明清顺天府学奎星阁

封底：明清顺天府学“敷礼明伦”殿

封二、彩插页：文物局专家榜

封三：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京部分介绍（六）

## 《北京文博》编辑委员会

顾 问：侯仁之 李学勤 吕济民

主 任：宿 白 副主任：孔繁峙 廖静文 王世仁 曹子西 齐 心 马希桂

编委会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 平 马法柱 王 丹 王丹江 王玉伟 王有泉 王 岗 王鸿年 巴爱民 卢迎红  
许 伟 刘建业 刘超英 杨 玲 李建平 吴梦麟 宋大川 张若妮 张 展 陈 平  
陈 旭 赵其昌 郝志群 姚 安 晋宏逵 高凯军 郭小凌 崔国民 葛英会 韩 永  
韩 扬 舒小峰 温桂华 谭烈飞

主 编：张 展 副主编：陈晓苏 编辑部主任：韩建识

本期责编：韩建识 陈 倩 高智伟

主办单位：北京市文物局 编辑出版：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北京文博》编辑部

北京文博网网址：<http://www.bjmuseumnet.org>

《北京文博》电子邮箱：[bjwb1995@yahoo.com.cn](mailto:bjwb1995@yahoo.com.cn)

## ● CULTURAL RELICS WORK

Grasp the Chance of Olympic Games, Promote the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 to Develop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 Work in Beijing in Macro Environment of Olympic Games Preparation ..... by Kong Fanzhi(6)

Report on Investigation of Dangerous and Old Buildings in Old City of Beijing  
..... by Liang Yugui(11)

Accounts of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Project in Temple of Ancient Monarchs  
..... by Xu Wei(17)

## ● ARCHAEOLOGICAL REPORT

Brief Report on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of Relics in Wangzuo, Fengtai District  
..... by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Research Institute(24)

## ● CULTURAL RELICS RESEARCH

Analysis of Causes of Burial System of Dabaotai Western Han Tomb ..... by Jin Bao(27)

A New Study on the Epitaph of Kang Wencheng in Liao Dynasty ..... by Wang Yuting(32)

Brief Accounts of Discrimination of Enamel Wares' Time ..... by Yan Ping, Shang Meihua(35)

Study on Liu Zong Carved Buddhist Sutras in Shijingshan in Tang Dynasty  
..... by Chen Kang(38)

Study on the Incomplete Stele in Tongzhou ..... by Fang Hao(44)

Analysis of Relations of Phoenix Decorations on the Gold and Silver Wares Unearthed from the Tombs of Ming Dynasty in Beijing Area and the Phoenix Culture ..... by Xu Ruiping(48)

Cause of Rise and Fall of Gu Embroidery from Its Works ..... by Han Ying(53)

Study on Monk Jialing Sheli Pagoda in Qing Dynasty ..... by Xuan Lipin(59)

## ●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BEIJING

River Course at Lower Reaches and Location Choice of Upper Gateway at the River Gate of Tonghui River in Yuan Dynasty ..... by Zhou Liang, Dai Lijun(63)

A Restricted View on Shapes and Structures of Underground Palace of Prince Mausoleums of Qing Dynasty in Beijing Area and Surrounding ..... by Zhou Sha(68)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uaxiang, Beijing in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 by Fan Jun, Zhou Feng(73)

Study on Jinlushengmu Bell-Founding Niangniang Temple ..... by Yu Hua(78)

#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S

NO. 3, 2008

- Stele of Zhengyangqiaoshuquji and the Changes of Environment in Tianqiao District  
..... by Chen Qian(82)
- Studies on Tomb of Prince Chun ..... by Wang Xiaojun(87)
- Liu Duosheng and the Temples in Beijing ..... by Han Jianshi(92)

## ● PROTECTION OF CULTURAL RELICS

- Restoration Case of the Sluicing Stone Trough Made of Green Stone on the Wall of Altar of Prayer for Grain in Temple of Heaven—Discussion on Whether Epoxy Resin Should Be Used in Protection of Stone Cultural Relics ..... by Zhang Tao, Li Weiwei(97)

## ● DATA AND INFORMATION

- Chronicle of Events Concerning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s of the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Bureau of Cultural Heritage (2nd Quarter of 2008)  
..... by Yang Kangming(100)

### EDITORIAL BOARD OF BEIJING WEN BO

**Advisors:** Hou Renzhi, Li Xueqin, Lv Jimin

**Chairman:** Su Bai

**Vice-chairmen:** Kong Fanzhi, Liao Jingwen, Wang Shiren, Cao Zixi, Qi Xin, Ma Xigui

**Members:** Yu Ping, Ma Fazhu, Wang Dan, Wang Danjiang, Wang Yuwei, Wang Youquan, Wang Gang, Wang Hongnian, Ba Aimin, Lu Yinghong, Xu Wei, Liu Jianye, Liu Chaoying, Yang Ling, Li Jianping, Wu Menglin, Song Dachuan, Zhang Ruoni, Zhang Zhan, Chen Ping, Chen Xu, Zhao Qichang, Xi Zhiqun, Yao An, Jin Hongkui, Gao Kaijun, Guo Xiaoling, Cui Guomin, Ge Yinghui, Han Yong, Han Yang, Shu Xiaofeng, Wen Guihua, Tan Liefei

**Editor-in-chief:** Zhang Zhan

**Vice-Editor-in-chief:** Chen Xiaosu

**Director of Editorial Department:** Han Jianshi

**Managing Editors of this issue:** Han Jianshi, Chen Qian, Gao Zhiwei

Edited and Published by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Beijing Wen Bo, Book and Data Centre,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Bureau of Cultural Heritage

**URL:** <http://www.bjmuseumnet.org>

**BEIJING WENBO E-mail:** bjwb1995@yahoo.com.cn

# 抓奥运机遇，促文博发展

## ——北京文博工作在筹备奥运宏观环境下的发展与提高

孔繁峙

北京申奥成功后，经过精心筹备并于2008年8月成功举办的奥运会，已成为世界为之瞩目的一次文化盛会，诞生于西方的奥林匹克运动，因有了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民族历史文化的参与而使其变得更富有魅力。

古都北京深厚浓郁的传统文化为本届奥运会提供了东方特有的文化环境，而筹备奥运又为首都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利用提供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在奥运精神及核心理念的引领下，古都历史文化的保护与弘扬工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与提高，在北京古都名城的历史文化环境中，使得北京奥运会既是体育运动会，又是文化展示与交流的盛会；既有奥运体育精神的传播，又有北京奥运人文精神的体现与彰显。

### 一、“人文奥运”理念凸显了首都传统文化优势，确立了文博工作在奥运活动中的定位及目标

“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三大理念，而其中的“人文奥运”又是其三大理念中的亮点与灵魂。“人文奥运”的核心内容，是紧紧依托于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化及古都北京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并在一系列的文化活动中，展示出了北京奥运会对人类奥林匹克精神价值与人文价值的贡献和发展。

北京作为具有三千年建城史和八百多年建都史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众多的古迹、完美和谐的古都城市格局，

保存完整的古建筑群，优美的古典园林，独特的民居宅院和众多的历史文化遗迹，在世界上代表了我国高度发展的民族历史文化。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一次向世界推介中国文化千载难逢的机会，古都北京成为一座展现我国古代历史文化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大舞台。通过北京奥运会，让世界各国人民感知丰富多彩、底蕴丰厚的中国文化内容，提升人文形象、增强人文奥运的感召力和辐射力，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奥运文明的交融使北京奥运会大放异彩。

由于长期形成的全市文物保护工作的历史欠账，致使全市文物建筑普遍面临急待抢修的状况；其中一半以上需要维修保护，相当数量的文物保护单位被工厂、单位、居民、学校长期占用；大批文物建筑不能对社会开放；文物利用过程中的管理不善、使用不当及建设性破坏时有发生；城市发展、市政建设、危房改造及大型现代建筑，使古都名城的历史风貌受到了极大冲击，这与首都的国际地位极不相称。北京申奥成功，为首都文物保护事业提供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为最大限度地保护好全市的历史文化遗产，全面发掘北京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在奥运期间完整而充分地展示北京历史文化与现代都市的鲜明特征，从而形成北京特有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建筑相协调的都市风貌，经市委、市政府批准实施了“3.3亿”文物抢险工程与“人文奥运”文物保护计划。八年来市政府共投入专款9.3亿元，带动社会投入的保护资金累计超过50亿元，完成了一系列文物保护项目，全面改善了北京文物建筑的保护状况，极大地推动了全市文博事业的发展与提高。



## 二、“人文奥运”计划的实施，开启了全市文博事业发展的新篇章

以“人文奥运”理念为核心内容而开展的首都文物保护工作，坚持以奥运水平为标准，以古都北京优秀的民族历史文化的保护与弘扬为目标，在北京奥运新的历史起点上解决全市文物保护的难点问题，从而保护和恢复古都历史上的辉煌与影响，推动首都的历史文物、传统文化及古都名城保护工作的全面发展，从而为北京奥运会营造一个全面展现人文精神的历史文化环境。

1. 坚持奥运带动，提升保护观念。全市文博系统紧密围绕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确立了文博工作服务奥运的发展重心，转变保护观念，明确工作方向，借势奥运建设，以科学和创新的思路，认真研究了全市文博工作长期存在的难点问题：深入分析了全市文物保护与城市发展的矛盾、文物保护与社会占用的矛盾、文物保护的公益化与使用市场化的矛盾、四合院的保护与现代生活发展的矛盾、危房改造与四合院保护的矛盾及名城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各类矛盾问题。

以科学和创新的思路，化解上述矛盾，制定科学的保护与发展的工作构想，推动文博工作的快速发展，是实现“人文奥运”理念及任务的重要保证。为在北京奥运会充分展示中国传统与文化特色、体现北京历史名城的整体文化风采，并利用北京奥运会的契机，向世界展示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多彩的内涵。自2000年以来，我市以实现“人文奥运”理念为目标，先后制定实施了“3.3亿”文物抢险工程和“人文奥运”文物保护计划，确立了奥运筹备阶段全市文博工作的目标和任务及工作思路与实施措施。七年来，文博系统始终坚持以“人文奥运”核心理念和工作标准引导和推动全市文物修缮、占用单位搬迁、安全保障、博物馆发展、社会宣传、考古发掘、文物经营等各项文博工作，并取得了历史性的发展和提高。

2. 以奥运标准提升文博工作的整体水平。现代奥运提倡的“更高、更快、更强”的运动口号，既是一种体育精神，更是一种文化精神，一种永无止境的追求与奋进精神。几年来，这种奥运精神和文博系统的奥运责任感，极大地促进了文博系统干部队伍在认识观念上、管理方式上、保护理念上和工作水平上的提高，进而实现了文博管

理工作飞跃式发展。其中最突出的是，在全市人类遗产项目的保护方式、方法上，引进和借鉴了国际遗址保护的先进理念，突出了国际公认的文化遗产保护的原真性；全市六大遗产项目全部实现了国际通行的外围缓冲区的保护方式，其中我市制定的故宫、十三陵、周口店等世界著名遗产地外围缓冲区的划定工作方案，受到国际遗产组织的好评，使我市遗产保护工作实现了同国际社会“对接”；在奥运标准和“人文奥运”理念的引导下，新首博建成开放后，在管理观念、运营方式、服务接待、展示效果和工作水平等各方面，都较老首博实现了一个飞跃，已达到和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受到世界顶尖级博物馆的肯定。早在新首博建成开放之初，即与法国、英国、美国、希腊等国家级博物馆开展了多项合作展览项目，向首都观众展示了来自国外的馆藏文物珍品，全市各类博物馆和文物开放单位，也都在奥运标准的推动下，各项开放管理工作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 三、全市文物保护取得历史性成果，为北京奥运营造了良好的传统文化环境

1. 长期占用文物的单位搬迁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市、区政府部门的努力下，全市一大批长期占用文物建筑的单位、学校、居民等得到了搬迁安置，七年来，先后完成了圆明园、故宫、颐和园、历代帝王庙、普度寺、长椿寺、中山会馆、先农坛、东岳庙东路、天坛神乐署、月坛以及明城墙遗址等70余个文物单位中的880多个占用单位、14200户居民的搬迁工作，市、区政府和社会有关部门累计投入搬迁资金达50亿元，彻底解决了一批文物建筑内长期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为文物建筑的保护维修创造了条件。

2. 全市文物建筑的保护维修工作取得显著成果。截止到2007年，全市共完成139项文物保护单位的修缮保护工作，修缮的文物建筑，涉及到北京历史名城的方方面面，代表了北京名城建筑的各项系列，其中最突出的文物类别有：

——皇宫御苑类，故宫博物院修缮了故宫的景福宫、武英殿、御花园，启动了故宫三大殿维修工程；完成了颐和园中轴建筑、北海白塔及附属建筑、天安门、景山、香山等皇家御苑的文物维修工程。

——王府宅第类，恭王府管理处修缮了恭王

府的府邸建筑及外围府墙；修缮了醇亲王府、恒亲王府、克勤郡王府、涛贝勒府等王府建筑。

——坛庙寺观类，先后修缮了历代帝王庙、白塔寺、天宁寺、大钟寺、法海寺、法源寺、牛街礼拜寺、普度寺、万寿寺、东四清真寺、长椿寺、花市火神庙、火德真君庙、大慈延福宫、大慧寺、戒台寺、承恩寺、慈善寺、宣仁庙、智化寺、灵岳寺和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等一大批寺庙文物建筑。

——教堂类，修缮了西什库教堂、东堂、永宁天主教堂等一批教堂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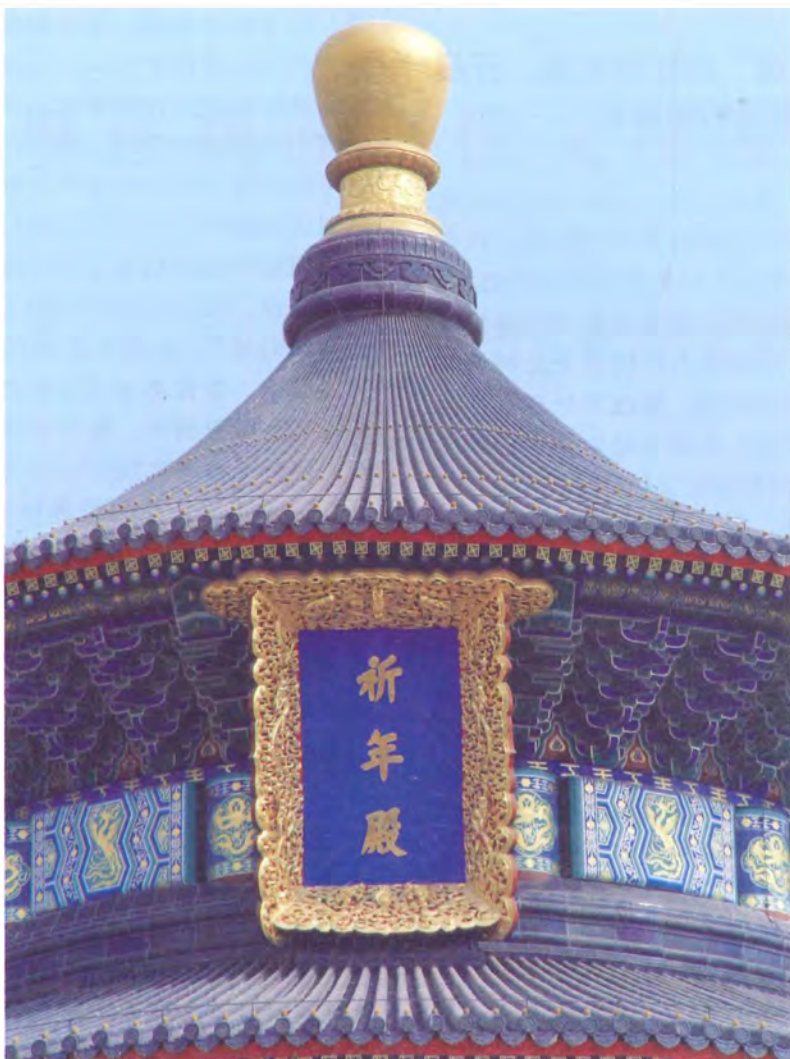
——北京名城历代遗迹类，维修了金中都城墙遗迹和水关遗址，修整了元土城遗址、明城墙遗址、皇城遗址和明代的巩华城、岔道城、张家湾城墙遗址等。

——名人故居类，修复了袁崇焕祠、于谦祠、纪晓岚故居、文天祥祠、齐白石故居、老舍故居、李大钊故居、毛主席故居（景山三眼井）等一批名人故居。

——学堂会馆类，修复了元明清三代最高学府国子监、明顺天府学和金台书院；修复了的会馆类建筑有安徽会馆、阳平会馆、湖广会馆、福建汀州会馆以及中山会馆等。

——古塔古桥类，先后维修了通州燃灯塔、万佛堂孔水洞塔、玉皇塔、照塔、应公长老寿塔、无碍禅师塔、琉璃河大桥及卢沟桥等。

——革命遗址类，修缮了长辛店“二·七”



修葺一新的天坛祈年殿（局部）

大罢工遗址、留法勤工俭学旧址、古北口抗战遗址、焦庄户地道战遗址和门头沟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旧址等一批革命遗址及纪念地。

——近现代建筑类，修复了著名的辅仁大学、协和医学院礼堂和德寿堂药店、交通银行、盐业银行、京华印书局等一批近现代建筑。

——帝王陵寝类，修复了明十三陵的德陵、庆陵、康陵、泰陵和孚郡王墓、伊桑阿墓、醇亲王墓等。

3. 为北京奥运会提供了良好的历史文化环境。随着“人文

奥运”文物保护计划的完成，使全市的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文物建筑的保护状况得到极大改善，从根本上扭转了我市文物建筑年久失修、外观残破的被动局面，大批重要的历史建筑经过维修后彻底改变了往日残破的面貌，如明十三陵的德陵、庆陵、康陵、泰陵及普度寺、宣仁庙、火德真君庙、恭王府等等，经过大规模的维修后，都恢复了文物建筑的历史景观，展示了中国历史文化的传统特色。

4. “人文奥运”文物保护计划的实施，初步恢复了北京历史名城的基本格局和传统风貌。“人文奥运”文物保护工程，围绕着保护和恢复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基本格局和传统风貌，初步实现了市委、市政府确定的“保用并举，恢复景观，成片整治，形成风貌”的工作目标，取得了明显的保护效果：

(1) 整治了“两线”环境，再现了传统景观。

古都的中轴建筑，是构成古都规划的纲要和基准，是我国古代关于帝王之都建设理念在城市规划上的体现，恢复中轴线的风貌是展示北京古都景观的核心。“人文奥运”工程，全面开展并初步完成了整治中轴线环境，重建了中轴线南端标志性建筑——永定门城楼，修复了东西两侧的天坛、先农坛的外坛墙。随着前门外大街整治工程完成，南中轴的历史景观也将得以恢复；北中轴的整治工程，已先后完成沿街店铺与景山周边的环境整治；修复了两侧的皇化门城墙、雪池冰窖和御史衙门；恢复了皇城内的区域景观；在完成对后门桥整治工作的基础上，腾退了被多年占用的火神庙并修复了全部建筑后实现了对外开放，形成以后门桥、什刹海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景观；完成了北中轴线沿街传统店铺的整治与恢复，彻底整治了中轴线北端的标志性建筑——钟鼓楼的周边环境，形成了环路，与什刹海、后门桥及两侧的传统店铺遥相呼应，形成了历史上古都城市“后市”的景观。

整治维修了朝阜沿线的重点文物建筑；治理了白塔寺周边的建筑环境，修复了白塔寺西路建筑并实现了对社会开放；维修了西什库教堂的主体建筑；全面恢复了历代帝王庙完整的历史格局并实现了对社会开放。

(2) 治理了重点区域，改善了“五区”传统风貌。整治了什刹海传统景区；着重开展并完成了著名的恭王府邸的腾退，在开展了大规模的修复后于今年7月实现对社会开放；修复了醇亲王府的历史建筑；维修了涛贝勒府的原有建筑；修复和开放了贤良祠等文物建筑，同时对什刹海沿岸环境进行全面整治，重现了当年“荷花极盛，沿堤植柳，自夏及秋，堤通设茶肆、间陈百戏”的风貌。

恢复了国子监街区历史景观：在拆除违章、整治环境、修复街区牌楼的基础上，初步恢复了历史上传统街区风貌；修复国子监与孔庙的历史建筑，建设成一处展示我国古代教育的博物馆；维修了柏林寺的历史建筑；搬迁了地坛内居民、修复了坛墙并整治了外坛环境。

治理了琉璃厂传统文化商业区：通过对整体区域环境、道路的整治，再现了清末至民国时期的街区建筑风格，从而恢复了京城历史上的图书文玩市场和“博戏聚焉”的传统文化特色。

整治了明清皇城景区：结合危改整治了皇城内及周边建筑环境，集中保护了这一区域中最具特色的四合院街区。完成了南池子历史街区的整修，

整治修复开放了普度寺的历史建筑，初步完成了对皇城沿街建筑风貌全面的整治。

治理了古城垣景区环境：完成了元大都土城遗迹、明北京城墙遗迹保护范围内的居民、单位的搬迁，整治了遗址及周边环境，再现了古城残墙的历史神韵。

“人文奥运”文物保护计划的完成，为北京奥运营造了人文内涵丰富的历史文化环境。

经过七年的修缮，全市139项文物保护单位中，有78项文物保护单位经过修缮后，都不同程度的扩大了对社会开放的内容和范围，为广大游人和奥运来宾增添新的参观内容。如颐和园经过搬迁占用单位和修复后扩大开放占地20公顷的清乾隆时期著名的耕织图景区；天坛公园经修缮工程后首次对社会开放了著名建筑群——神乐署；八达岭扩大开放了“残长城”和岔道城；圆明园扩大开放了九洲清晏等一批重要遗址，此外，孔庙国子监、月坛、法海寺都经过修缮后扩大了开放区域和内容。

“人文奥运”文物保护计划的实施，使我市28处著名的文物建筑首次实现对社会游人及奥运来宾开放，如著名的历代帝王庙、普度寺、恭王府、天宁寺、长椿寺、承恩寺、火德真君庙、纪晓岚故居、袁崇焕祠和李大钊故居等等。这些在奥运会前对社会开放的文物景区，极大地丰富了首都传统的人文环境，为奥运会期间的古都城市增添了炫丽的文化色彩，同时北京浓厚的历史文化，不但增强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形成巨大的民族凝聚力，而且将使遍布世界的华人爱国情怀在北京奥运期间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

#### 四、“人文奥运”的实践，促进了首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新突破

博物馆是构成国家首都文化中心的重要内容，代表了一个国家或城市文化建设发展的水平。“人文奥运”的实践，有力地推动了北京地区博物馆的建设和发展。自奥运筹备工作以来，首都各级政府部门把博物馆的建设作为推动地区或部门行业文化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不断加大建设工作力度。七年来，北京地区的博物馆建设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从而形成了建国以来北京地区第二次博物馆建设发展的高潮期，为奥运来宾提供了一批展示中华文化成就的艺术殿堂。

截止到2008年6月,北京地区博物馆总数已由2000年的112座发展为144座,七年多的奥运筹备期,全市新增32座博物馆,其中大部分是专题性博物馆,有的在全国都具有很大影响。如2005年建成并开放的中国电影博物馆、中国印钞造币博物馆、中国铁道博物馆、首都博物馆新馆、居庸关长城博物馆等。此外还有一批具有北京民俗特色的博物馆,如:北京金台艺术博物馆、北京百工博物馆、北京宣南文化博物馆、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等等。除上述新建的博物馆外,这期间还扩建了一批博物馆,如在原址大规模扩建的北京天文馆、中国科技馆、中国地质博物馆、中国农业博物馆、北京自然博物馆和中国国家博物馆,包括部分社会投资建设的私人博物馆,使北京地区博物馆的种类得到进一步丰富和扩展。目前,北京地区博物馆的总面积已达到230余万平方米。

奥运会期间,北京地区博物馆开展了“双两百”活动,为迎奥运来宾,各博物馆共推出500余项展览陈列。其中首都博物馆新推出了“北京文物精品展”、“长江文明展”等五项有影响的展览,其中的“中华瑰宝展”是汇集了全国26个省市博物馆的部分精品,联合举办的一项精品文物展览,使广大游人和奥运来宾通过博物馆的视野,来深刻感受我国现代建设成就和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传统文化。

## 五、配合奥运建设工程的考古研究工作取得了重要成果

北京作为历史悠久的古都城市,保存有丰富的地下文化遗存,在大规模的奥运场馆建设和首都城市设施建设工程中,圆满完成地下文物考古发掘工作,是落实“人文奥运”理念,保护文化遗存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在奥运场馆建设初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组织考古人员集中开展并完成了全市18个奥运场馆建设工地的考古清理工作,完成考古勘探面积158万平方米,考古发掘面积9787平方米,共发掘清理两汉、唐、辽、金、元、明、清各时代各类墓葬700余座,出土各类文物1538件。

奥运场馆的考古研究工作也取得了可喜成果,部分场馆的考古发掘报告和专题研究报告已陆续出版。

配合奥运场馆建设的考古工作的圆满完成,是我们在奥运建设中落实“人文奥运”理念的突出体现,既保护了地下文物遗存,又保证了奥运

场馆建设工程的顺利进行。

## 六、“人文奥运”理念促进了首都文物流通领域的迅猛发展

民间传世文物的收藏与流通,是古都北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民间千百年的文物传承,使得文物的收藏、鉴赏与流通具有传统文化价值与人文价值,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在广大民众中盛行不衰的文物收藏、鉴赏与交流,是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与传承,在文物流通、经营中的文物预展活动,也是传统文化的展示与宣传。自奥运筹备以来,在国家经济发展与“人文奥运”理念的推动下,七年来,全市的文物流通、经营行业取得了历史上最好的成绩,其中北京文物拍卖业发展异常迅猛,成为全国文物拍卖活动的中心,受到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关注。

截止到2007年,全市具有文物拍卖资质的经营公司已由2000年的20余家、全年上拍文物2万余件、年度拍卖总额4.38亿元,发展为2007年度的80余家文物拍卖公司、全年上拍文物11万余件、年度拍卖总额104.39亿元,2007年的文物上拍量是2000年的5倍;拍卖金额是2000年的25倍,全市的文物收藏及文物爱好者扩展到数十万人。历史文物及传统工艺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及文化价值已被广大民众所认同,已成为民族历史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形式。

近年来,文物拍卖业的发展带动了中国历史文物价值的大幅提升,价格连创新高,使中国文物的价格与欧洲国家的差距在急剧缩小,由于国内文物价格的攀升,早年流失海外文物的“回流”正逐步形成高潮,在每年上拍的文物中,海外“回流”文物超过万件并逐年递增,初步改写了中国文物长期以来流失海外的历史,充分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经久不息的凝聚力与影响力。

“人文奥运”文物保护计划的实施和如期完成,是市委、市政府保护文物和历史名城的一项重大举措,使我市的文化遗产保护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促进和提高了北京历史文化发展的整体水平,将使北京以皇城为核心的历史文化名城的传统格局更加完善,全面展示着北京古都历史风貌与传统文化的魅力,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增添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并最终为保护和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为全人类文明的繁荣进步做出我们的贡献。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局长)

# 北京旧城危旧房调研报告

梁玉贵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北京市旧城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工程开始展开。分布于北京旧城区的东城、西城、宣武、崇文四个城区数量最大的四合院建筑群,由于年久失修、结构老化、市政设施严重滞后等多方面的原因,已开始大面积演变为危房、破房和旧房,造成传统的四合院区域生活环境普遍恶化。有相当数量的危险房屋给市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带来了不安全的隐患和严重威胁,同时也给北京的城市景观,特别是北京申奥成功后现代都市形象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为配合城区危旧房改造工程,从 2002 年开始,

到 2005 年的几年间,北京市文物局抽调专业人员,对全市所有划定危房改造区域内的旧宅院建筑群进行全方位调研,将符合保留标准的院落进行登记整理,同时进行文字、标图和照片等现状记录工作,为北京城旧宅院建筑的保护和北京古城发展与延续的研究提供了详实的基础资料。

## 一、调查范围

2002 年,北京市危旧房改造工程共划定 132



东城区炒豆胡同 69 号大门挂牌院落

项需要大面积改造的区域,几乎涵盖城四区各大居民稠密区。大部分改造的区域较为集中,属于成规模的改造,也有一些分散于居民区中,较为零散。由于地域的不同,各区的数量和规模差别很大。总体来看,旧城区项目较多,外城数量较少。最后统计改造区域是东城区 42 项,西城区 56 项,宣武区 17 项,崇文区 17 项。

2002 年度调查工作是一项带有抢救性的工作,因为当时的危房改造工作进展很快,有些危改区域的旧宅院调查工作刚完成,拆迁工作就开始了,还有的地区是我们的调查工作与拆迁工作同时进行。

### 1. 四合院勘查保留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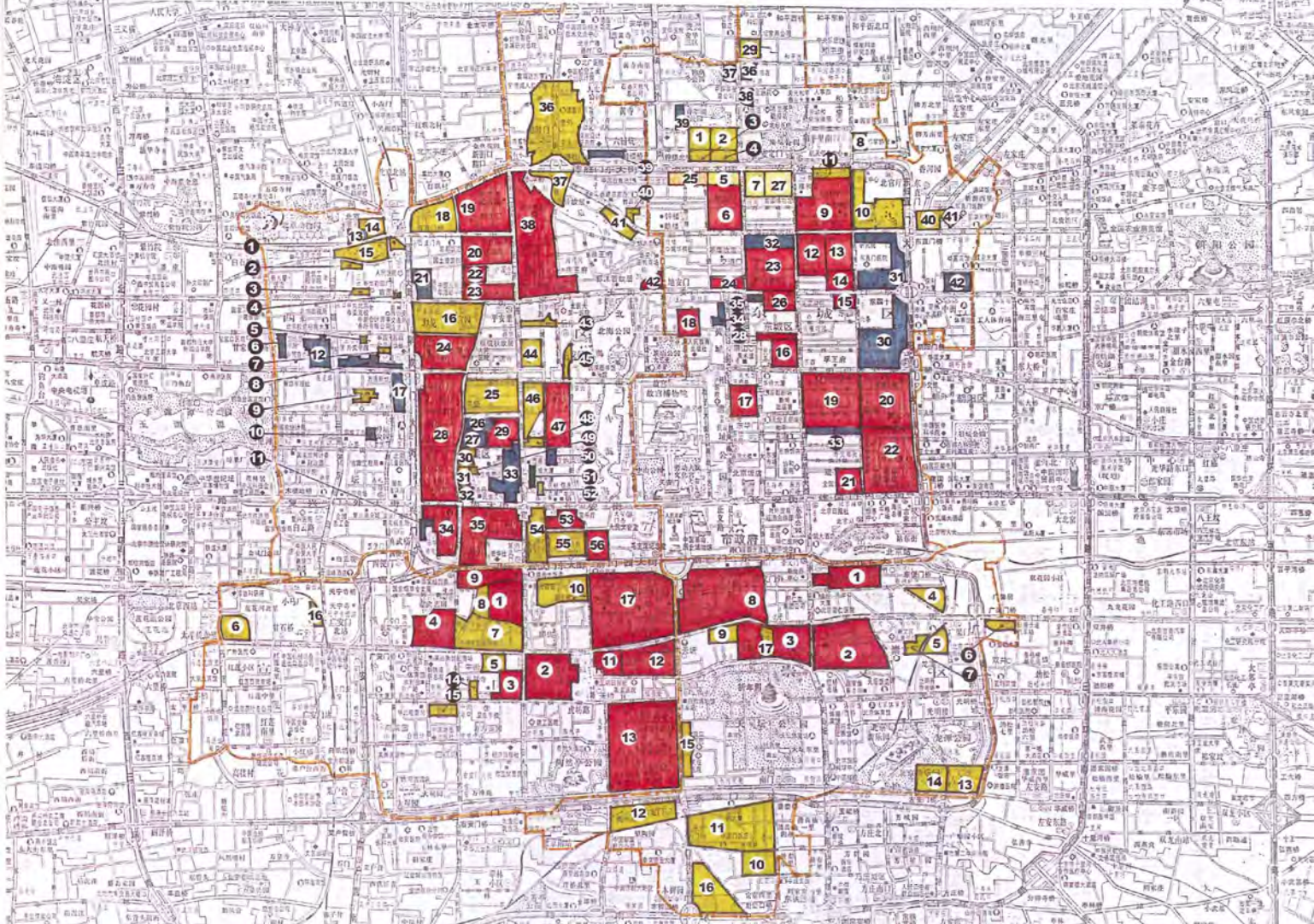
为切实地将列为危房改造区域内保存较好的、有历史、文化、艺术价值,有代表性,有纪念性的四合院建筑进行登记注册,并加以重点维护和保存,也为便于区别一般化的四合院建筑和确属于列入危房范畴的建筑群体,更准确地加以界定,因此,在调查工作开始之初,有目的、有针对性的对四合院的调查工作制定了相应的规范化的留存实施标准:

① 凡原有建筑保存尚好的院落保留。

# 北京市城四区危改范围示意图

(2002年6月)

(四合院及传统建筑调查)



## 崇文危改 (1~2期)

1. 东花市三期
2. 崇外6号地
3. 崇外3号地
4. 角湾
5. 夕照寺三期
6. 广外南街
7. 安化南里
8. 前门地区
9. 金鱼池西
10. 聚泰西里
11. 望坛
12. 松林里
13. 左安东里
14. 左安西里
15. 天坛西里
16. 宝华里
17. 祈年园

## 宣武危改 (1~3期)

1. 宣西片
2. 大吉片
3. 法源寺二期
4. 报国寺片
5. 菜市口西
6. 三通碑
7. 广安片
8. 康乐里
9. 上斜街北
10. 庄胜二期
11. 腊竹
12. 留学危改
13. 先农坛
14. 春风园
15. 樱桃园
16. 小马厂北片
17. 大栅栏

## 东城危改 (1~7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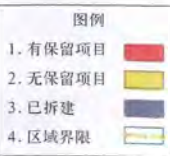
1. 西营房
2. 安外5号地
3. 地兴居
4. 西河沿
5. 灵光小区
6. 分司厅小区
7. 官书院
8. 二三九厂
9. 后永康小区
10. 南馆
11. 青龙小区
12. 新太仓二期
13. 新太仓一期
14. 东四十二条
15. 东四八条—十条
16. 隆福寺小区
17. 黄土岗
18. 三眼井
19. 东四南片
20. 朝内
21. 春雨

22. 建内
23. 南剪子巷
24. 南锣鼓巷
25. 美伦小区
26. 张自忠路南侧
27. 五道营
28. 育群片
29. 甘水桥
30. 海运仓危改
31. 东四危改片
32. 交东南侧危改
33. 金宝街危改区
34. 北河沿危改
35. 东平园小区
36. 小黄庄南里
37. 安外7号地
38. 安外3号地
39. 青年湖西里危改
40. 香河园危改
41. 东湖别墅扩建
42. 新中街——四条危改

## 西城危改 (1~5期)

1. 北礼士路
2. 德宝榆树馆4~10巷
3. 车公庄北里
4. 车公庄北里1号院
5. 北营房西里4~6巷
6. 黄瓜园
7. 北营房东里
8. 阜外大街(东段)
9. 南营房
10. 月坛四道口
11. 宗帽
12. 露园
13. 德宝一期
14. 德宝二期(北片)
15. 德宝三期(南片)
16. 官园
17. 万明园
18. 桃园一期
19. 桃园二期
20. 东冠英
21. 国英一期

22. 大乘巷
23. 平安里西大街北侧
24. 白塔寺及庆丰小区
25. 丰盛北
26. 北丰
27. 南丰
28. 金融街
29. 宏庙
30. 二龙路二期
31. 太平桥
32. 北闹
33. 西西工程
34. 南闹一期
35. 南闹二期
36. 德外
37. 西北北沿
38. 德内大街
39. 德外小市口
40. 前马厂
41. 鸦儿胡同
42. 白米斜街



②凡原有建筑保存一般，但原有建筑格局保存完整的院落保留。

③凡名人故居或旧居保留。

④凡首长级别住宅保留。

⑤凡具有历史、文化、艺术方面价值的院落保留。

另外，对调查范围内若干院落或若干胡同建筑普遍保存较好者，可作为风貌街区作整体重点保留。

## 2. 保留项目

通过对全市 132 个危改区域全部旧宅院实地调查，达到或者基本达到预定标准重点保留的院落总共 655 项。

2002 年四合院、街区保留项目统计表

	东城区	西城区	宣武区	崇文区	总计
四合院	423	61	58	113	655
街区	1	2	1		4

北京城旧城持续开展的危旧房改造工程以及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在营建新北京的同时，改造工程也带来了许多不和谐的因素。有些项目对北京的传统建筑以及北京城市改造和发展造成了很坏的负面影响和巨大的冲击。因此，2003 年北京市文物局对旧城城四区旧宅院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细致调查，本次调查是在 2002 年四合院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的，除复查 2002 年的调查范围和调查成果，还增加了新的调查区域。由于受大环境、新形势的影响，本次的旧宅院调查留存标准仍然参照了 2002 年的执行标准，但从原则上到执行工作中，宽度和广度有了重大的变化，扩大了旧宅四合院留存的范围，通过细密的筛选，2003 年全市新增旧宅院保留项目 746 处。

2003 年四合院、街区保留项目统计表

	东城区	西城区	宣武区	崇文区	总计
四合院	312	272	84	78	746
街区	1	5	4		10

经过 2002 年度和 2003 年度两次调查，全市共保留保存现状较好的四合院 1401 处。

2002—2003 年四合院保留项目统计表

	东城区	西城区	宣武区	崇文区	合计
2002 年	423	61	58	113	655
2003 年	312	272	84	78	746
总计	735	333	142	191	1401

2003 年度调查中，保留了数百座四合院建筑群，但重要的是在调查中注意做到规模性、集中性和整体性保护，有目的地将整条胡同乃至整个区域尽可能的完整留存下来。例如东城的东四南地区、西城的新文化街以及宣武的虎坊桥附近地区等，力图保留老北京原汁原味的东西，待今后有条件的情况下，再进行合理化的调整，避免再现北京城墙的悲剧。

通过调查梳理，北京旧城 132 个危改区域内全部千余项四合院的保留项目和各区保留的普查项目，符合四合院保护、保留标准和基本符合标准的旧宅院约为 900 座。在这些保留的项目中，地域特征明显。东西城院落格局比较规范完整，建筑规模较大，符合北京旧城“东富西贵”的文化特点。宣武和崇文区保留院落有相当数量的建筑群原为会馆、旅店、商店等具有社会性和商业性性质的建筑，因此，建筑格局和建筑形式与标准的四合式建筑形式有所区别，具有典型的南城地域特色。这种地域上的差别，是古代北京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集中反映，是老北京市井生活的真实写照。

## 二、旧城改造区域中旧宅的建筑现状

北京旧城现存的旧宅院建筑大多建造于清末和民国时期，一般都有七、八十年以上的历史，有不少大中型的院落其建造年代都在百年以上。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家房屋政策的缘故，加之体制和资金等多方面的原因，造成大量的旧宅院年久失修、破损严重，使这些古老的建筑逐渐失去了原有的格局和风貌，变成了危旧房。从调查情况看，北京旧城现存的四合院大体上可以分为较好、一般、较差三类：

原有建筑保存较好的院落是指原有的建筑格局保存较为完整，基础平整，建筑主体外观、建筑装修保护较好，院内违章建筑较少或没有，明亮宽敞，环境较好，属保存状况较好的院落。这些院落多数有专人管理，生活配套设施比较齐全，

人口密度很低，因此，人为的破坏和改造原有建筑的现象很少或者基本没有。

保存一般的院落是指原有的建筑格局基本保存，建筑主体外观半数建筑仍保存原有的建筑形式，但屋面翻改比较普遍，建筑装修普遍后改，院内违章建房比较严重，人口密度较大，生活配套设施短缺，居住环境较差。

原有建筑保存较差的院落是指原有的建筑格局部分保存或者荡然无存，房屋主体翻建或者屋面翻建普遍，原有的附属建筑和配套建筑全部拆除，人口密度很大，违章建筑十分严重，通行空间极度狭窄，环境脏乱。

### 三、城市建设与传统建筑保护的矛盾

#### 1. 旧城保护与改造

旧城保护是利用行政和技术手段保证城市原有的建筑格局和建筑风格不受外界因素的影响和破坏，旧城保护与改造都是时代进步的需要。

北京旧城和四合院是中国传统民居建筑的代表，建筑风格独特。完整的建筑围合，优雅的生活氛围，受到众多中外人群的青睐和喜爱。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形成了完善的建筑体系。伴随着北京社会经济发展，加上生活理念的改变，原有四合院良好的居住功能逐步丧失、使用功能滞后等诸多因素制约了传统建筑的发展。上个世纪80—90年代，北京掀起了城市改造高潮，由于当时人们对旧城保护的观念欠缺，旧城改造又实施了危房改造与房地产开发结合的原则，导致有些开发商为追求经济利益而损害古都的风貌，出现了大规模“推光头”式的做法，对传统四合院建筑的保护构成了较大的威胁，旧城的整体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因此引发了人们对古都风貌保护的议论和思考。对此，政府部门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先后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对旧城的改造、建设和发展的规划，如《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和《北京市区建设高度的控制方案》以及国务院《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的文件等，对城市改造和城市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性作用。

#### 2. 四合院迁建与原地保护

在北京旧城开发建设中，涉及规划建设中保护较好的保留四合院项目，迁建与原地保护是旧城保护中的焦点。这种需要保护的院落，原有建筑格局一般较为完整，建筑形式和建筑装修保存较好，因此认为原地保护最好。首先，可以更好、

更加完整的保护好这些古老建筑群体，保护古城的风貌。其次，传统建筑以木结构为主，有部分建筑外观形式看上去很完整，但其内部构架已经有程度不等的坏损，如果原地保留和加以修缮还可以继续使用若干年，移动或异地重建，其原有的建筑构件（例如屋面瓦件、椽木、望板和梁柱等）由于拆卸的缘故将会有部分或大部分毁坏而需要更新。实际上，迁移重建的建筑不过是在新址上建造的新房，这种做法其实是一种权宜之计。遇此情况，还是以修改原来的规划设计为宜。但是，也有一些零散的小四合院，从单纯的建筑角度讲，建筑形式还是不错的，但从保护角度和利用价值方面衡量，意义不大，原址保留也是不切实际的。因此，保留项目的解决方式，应以保护旧城为主导，酌情考虑实际需要，不能一概而论。

### 四、建立旧城建筑体系保护机制

#### 1. 统一标准，规范旧城改造和城市建设

北京旧城区的胡同、四合院建筑群，是北京最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之一，最大限度的保护这些古老的传统文化建筑，规范旧城改造和城市建设，制定统一标准，是北京旧城保护的重要工作。

保留民族文化建筑、保留老北京的历史脉络，成为当前北京最严峻的课题。对此，市政府加大了对旧城保护的力度和保护措施，先后公布了30片历史文化保护街区，用行政手段强化了对旧城集中性、规模性保护，同时针对保护街区的划定，制定并公布了街区的保护范围和保护规定措施，从多方面、多角度的对保护街区进行系统的、全方位的有效管理。另外，对旧城改造区域采取多留少拆甚至更改建设方案的政策，有效的保证了旧城原有格局。对保护街区之外，保留较好、规模较大、保护价值较高的院落采取了挂牌保护措施，全部登记在册。为保护旧城，国务院于2005年1月出台了关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提出了构建“两轴、两带和多中心”的新思想，为城市的空间结构调整和新旧建筑的关系制定了明确的原则和措施，并纳入到历史文化名城永久保护的范畴。

#### 2. 更新保护观念，正确处理四合院的保护和利用关系

对京城旧宅院从所在区域、建筑格局、保护状况等多方面着手，正确处理胡同、旧宅院的保护和利用的关系，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提出不同的保护标准。



首先,要将保护街区与非保护街区的旧宅院加以区别。从整体看,保护街区的四合院建筑的现状普遍保护较好,其保护的原则,是对这些建筑群原格局、原形制以及装修和功能等多方面加以保护,没有特殊情况,不能改变原来的格局和形制。而非保护街区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保护的原则,是对这些地区传统建筑特色和风貌加以重点保护。对于这些地域内的非传统建筑和已经完全改动的建筑则没有统一的规定。其次,保护旧宅院建筑传统外观与现代装饰装修相结合,提高人民居住水平。四合院建筑的保护与文物建筑的保护有很大的区别,文物建筑强调原真性,而四合院建筑则要保护和使用相融合。实践证明,在不改变原有外观前提下,对建筑内部进行现代化的装饰装修,增加或改善必要的生活设施,提高居住的舒适性,是旧城保护和利用的重要手段。

### 3. 降低人口密度,逐步改善居民住房条件

北京旧城区传统建筑的保护和延续,与居民的生活环境改善有着重要的关联,有计划的逐步改善居民住房条件,对旧城保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北京的旧宅院原本是按照一家一户居住,或者是一个家族成员共同居住的建筑布局建造的。但是,目前旧城居住环境恶劣。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人口密度过大是其主要的原因。唯有降低人口密度,才能逐步改善居民住房条件。首先,采取人口外迁的方式。政府的财政预算中要设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项资金,对列入保护的街区,按照北京历史上的城市肌理,对居住人口较密的院落,将采用降低人口密度,缓解住房的紧张和压力。政府和有关部门应采取相应措施,鼓励住户外迁,还原旧的风貌。其次,将空出的旧宅院进行全面整修,拆除违章建筑,恢复原状,然后有条件、有计划的修缮原有建筑,另作它用。第三,对于居住环境尚可的院落,可在不破坏院落的整体格局和不影响街区风貌的前提下,按照传统建筑形式修缮的适当给予资助,引入多种市政管线和设施,逐步改善居民住房条件,使之逐步达到适应现代化的生活水准。

### 4. 拓展渠道,筹集社会资金,将修缮和保护有机结合

北京旧城和旧宅院的改造和保护是一项艰巨和耗资巨大的工程,只有拓展渠道,筹集社会各方资金,积极落实和推进平房房改政策,实现旧城区内的危旧房改造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将修缮和保护有机结合,才能有计划、有目的对现有的

旧宅院精心修缮和修复。

首先,动员社会多方力量和私有资产,投资京城旧宅院的保护事业,可根据财力,购买单个院落或者群体院落,并按照四合院保护区的相关规定,搬迁其中的住户,恢复修缮院落原有的建筑格局和建筑形式,还原旧时的建筑风格。其次,是逐渐推进宅院私有化,促进旧宅院良性发展。调查中发现,京城中保存较好的旧宅院建筑,除机关宿舍或首长住宅外,就属私人住宅的建筑保存得最好了,不论建筑的规模大小,从建筑的格局到形式方面,都是一般院落无法相比的。这些宅院的主人,都对祖辈留下的祖产有着很深的情感,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愿意离开属于自己的固定资产,更不愿意祖产毁灭,愿意自己出资维修维护宅院建筑,只要不拆就行。凡是地区改造规划明确,私房主以及有意购买平房的人,参与平房修缮和改造的热情就高。因此,将旧宅院逐渐私有化,是促进旧城保护的要素之一。第三,由政府或房管部门出资,有目的、有针对性的修复地域型、规模型的旧宅院,然后推向市场,再用回收的资金去修复更多的建筑,形成良性循环,这样既规划和保护了传统建筑,保存了古都北京,也将这些宅院有偿的利用起来,促进了京城房地产业广度和深度的发展,达到了双赢。

### 5. 以街巷为保护中心,保护延续原有的历史脉络

北京旧宅院是根据北京城的街巷胡同为基准形成的建筑群,北京的胡同和旧宅院是构成北京旧城风貌的基本元素,保护好胡同和院落,就能够延续北京城原有的历史脉络,并使之发扬光大。

胡同是北京旧城的肌理,是编织城市经纬的要素。北京旧城区有名的街巷、胡同共有六千余条,这些胡同集中在皇城和城区的范围内,从整体看,皇城区和内城范围内的胡同排列整齐,胡同的尺度正规,规划水平较高。位于京城南侧的外城,由于受地域、地理影响和历史背景的缘故,街巷排列密集,缺乏合理的规划,尺度宽窄不一,悬殊较大。但是,无论地域等方面的差别,这些街巷胡同都从多方面反映了北京城的历史沿革、社会风情和城市建设的发展。北京的胡同之多是其它地方所不具备的,它是北京旧城的特有产物,是中国北方的代表性特色。在北京旧城,每条胡同中都流传着不同的故事、轶事、趣闻等,形成了北京城特有的胡同文化。保护这些胡同,就是保护依附于这些胡同之中的旧宅院,就是保护了北京城,也就是延续了古老北京城的文化。

## 6. 挂牌院落要给与重点保护

为旧城保留的四合院挂牌是北京城城市改造中的一项重要举措,这项措施可以保证在京城危旧房屋改造区域四合院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是保护古都北京旧城风貌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在京城各个危旧房屋改造区域中,有相当数量的旧宅院总体上保存相对完整。这些院落建筑布局、建筑形制、建筑装修等方面保存相对较好,理应得到重点保护。这种现象在旧城区房屋改造区域中较为普遍。经过调查,这种类型的建筑以东城、西城数量最多,建筑质量也好于外城同类建筑。这些院落是北京旧城保留旧宅院项目中的重点部分和精华所在。为了严格保护这些院落,不受外界的影响,市政府亲自挂帅,并监督有关部门实施,先后三次对旧城危旧房屋改造区域中部分现状较好的四合院采取了挂牌保护措施,此举得到了京城大多数市民的支持。经过多方配合努力,全市共有658个四合院钉上了四合院保护牌,其中东城区挂牌333项、西城区挂牌154项、宣武区挂牌91项、崇文区挂牌80项。由于此项工作意义重大,颇受关注,两年来,这些挂牌的院落得到了妥善的保护,达到了原来预想的要求,成为北京旧城旧宅院保护工作的一次成功的尝试。

四城区四合院挂牌数目统计表

	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三批	小计
东城区	81	187	65	333
西城区	55	70	29	154
宣武区	35	42	14	91
崇文区	30	40	10	80
总计	201	339	118	658

## 结 语

北京是闻名于世的历史文化名城,悠久的都城发展史创造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历史文化传统建筑体系。在京城众多的文物古迹中,遍布城区大街两侧的胡同和整齐排列于胡同左右的四合院建筑群,以它质朴的建筑风格,有序的院落布局,缔造了古老北京城的主体形象,形成了北京城特有的、具有浓郁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建筑文化。四合院的建筑格局、建筑形式、建筑构造、建筑装饰,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观赏价值,而且还具有十分丰富的文化蕴涵,是人类居住体系

中最为规范化的代表形式。四合院已成为探索、研究北京城市发展的重要实物资料,成为记述北京数百年营建发展史的重要篇章。

北京的胡同和旧宅院是构成古都北京风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成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成中国古代北方建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建筑的住宅典型和精华,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

胡同和旧宅院文化是北京城特有的地域风格古都文化,内容丰富,包含了封建等级色彩的传统礼仪文化、封建等级严格的官位文化、传统民俗和地域文化、传统的商业文化、传统的科考文化、地域建筑艺术文化以及民族大融合的文化等。这些内容有着浓厚的文化底蕴,对研究北京的历史、建筑、风俗、艺术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要从宏观上着手,要根据旧城不同的特点采取不同的方式,对于能够代表城市传统风貌的地段或区域,就要进行全方位的保护,要保存历史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要延续古城的文化脉络。

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不仅要保护旧城改造区域中的胡同和四合院,还要对皇城区和内、外城区的传统建筑进行集中保护,以点带面,以线带片,最终将老北京的原有格局,原有的历史风貌,完整的保存下来。

保护古老的北京城是一项全民参与的全社会行动,要靠全社会的力量,要教育、引导北京的市民爱北京,保护北京城、保护古城风貌,同时,切实地、认真地解决人民生活中的住房困难。实践证明,只有全面的逐步提高全社会的知识水平、居住水平,改善人民的生活环境,才能调动人民的积极性,才能使人民懂得保护古都北京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才能延续北京的历史,才能推动北京的发展。

历史终归是历史,时代在前进。新陈代谢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数百年来,北京城的历史发展,正是遵循了这个规律,在继承、发展、创新的历史客观规律中延续下来的。北京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也具有蓬勃发展的新北京城活力。应该看到,北京旧城区的胡同和四合院是构成北京城的基本元素,是中国传统文化建筑的集中体现,保护四合院,保护胡同,就是保护北京城,保护人类的建筑文明。

(作者为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文物建筑历史研究室主任)

# 历代帝王庙文物保护工程记述

许伟

2000年底至2004年春天，北京市西城区政府主持实施了历代帝王庙文物保护工程，包括搬迁159中学、修缮庙宇建筑、复原大殿陈设、举办专题展览，实现对外开放。该工程是当时北京“3.3亿工程”中最大的一个文物保护项目，得到了北京市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国家、市文物局给予了悉心指导，各相关部门、专家学者和工程技术人员为之付出了极大努力。作为这一工程的组织者和亲历者，有责任把工程的研究基础、背景情况和主要成果记述下来以为纪念，并希望对今后历代帝王庙的保护工作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 一、历代帝王庙的年代性质和价值特点

### 1、年代性质

历代帝王庙始建于明代嘉靖十年（1531年），清代继续沿用，距今已有470多年历史。它是我国现存唯一祭祀三皇五帝、历代帝王及功臣名将的皇家庙宇，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2、价值特点

从建筑本体看，历代帝王庙修建于明代，提升于清代，集明清两代建筑艺术精华于一身，为皇家庙宇建筑的经典之作。从文化内涵看，历代帝王庙以三皇五帝为祭祀中心，是我国历史上唯一集中祭祀三皇五帝的皇家庙宇。其祭祀体系从三皇五帝到夏、商、周、汉、唐、宋、元、明等历代帝王，人祀人物纵贯中华一脉，突出的是历朝历代的连续性，体现了我国“中华统绪不绝如线”的重大历史特点，是一处象征中华文明五千年一脉相承的优秀文化遗产。

对以上价值特点的认识是我们实施历代帝王庙文物保护工程的研究基础，分别体现在修缮庙宇建筑、复原大殿祭祀陈设和举办专题展览之中。

## 二、修缮庙宇 搬迁学校

### 1、庙宇建筑

历代帝王庙位于阜成门内大街北侧，占地面积21500平方米，古建筑面积6000平方米，共由30多座单体建筑组成。门前区为庙门、东西侧

历代帝王庙全景





修缮前东配殿及碑亭

门、石桥、影壁、东西下马碑、东西景德街牌楼。庙内分前后两进院落，前院为景德门、东西掖门、东侧院门及钟楼、神库、神厨、宰牲亭、井亭、西侧院门及关帝庙、小祭器库、遣官房、斋宿房、典守房、乐舞执事房。后院为景德崇圣大殿、东西配殿、四座御碑亭、大祭器库、东西燎炉。景德崇圣大殿是庙宇的主体建筑，奉祀三皇五帝和历代帝王，巍峨雄伟，庄严肃穆，祭祀历代功臣名将的东、西配殿和其它建筑一起，烘托主体大殿，高低错落有致，前后层次分明，整座庙宇豪华凝重，气势恢宏，一派皇家风范。

历代帝王庙至今仍保持着明代格局，且主要建筑都是明代原构。景德崇圣大殿的规模形制与故宫乾清宫基本相同，只因为是庙宇性质，屋面使用的是黑色琉璃瓦绿剪边。大殿为四面坡双重檐的庑殿顶，面阔九间 51 米，进深五间 28 米。建筑面积 1417 平方米，含月台基座通高 22 米。其特别珍贵之处是 60 根柱子全部为金丝楠木材质，这在明代就很稀少，今天已是绝世之作了。

清代雍正、乾隆皇帝非常重视历代帝王庙，先后进行过两次大修，全面提高了庙宇的等级规格。乾隆认为，景德崇圣大殿奉祀的是三皇五帝和历代帝王，他们生为圣贤，居天子位，奉祀他们的大殿不必局限于庙制，也应享用当今的王者之制。故把大殿屋面改成了最高等级的黄琉璃瓦，大殿内外新做了“金龙合玺”和“金坐龙”彩画，达到了与故宫乾清宫完全相同。历代帝王庙以前没有皇帝的御碑，雍正、乾隆多次为历代帝王庙题写碑文，在大殿两侧修建了四座雍正、乾隆的御碑亭，极大提高了庙宇地位。清代还把具服殿改建成了关帝庙，让关公独享奉祀并由其护卫这座神圣庙宇，还在庙门前树立起了由汉、满、蒙、藏、阿拉伯、托忒等六种文字书写的“官员人等到此下马”碑，显示着皇家庙宇的尊严。

历代帝王庙修建于明代，提升于清代，集明清两代建筑艺术精华于一身，为皇家庙宇的经典之作，是我国古代人民智慧、才能与血汗的结晶，见证着中国建筑文化的历史辉煌。

## 2、百年沧桑

清朝末年历代帝王庙祭典废除。在此后的近百年间，历代帝王庙先后由中华教育改进社、国民党北平第三区党部、讨逆军第五路军总指挥部卫队营、河北省国术馆、中华博物学会、北平幼稚师范学校、女三中和 159 中学使用。这期间部分古建筑被拆除，民国年间拆除了庙内的大祭器库和关帝庙，1953 年拓宽阜成门内大街时，拆除了庙门前的石桥和景德街牌楼，1958 年大炼钢铁时拆除了燎炉，“文革”时期砸毁了下马碑等。庙



修缮后东配殿及碑亭

宇年久失修，积患深重。大殿的屋面上草木丛生，碗口粗几米高的树就长了 20 多棵，草木的千根万系扎入灰背之中，造成瓦面普遍松动严重漏雨，大木结构岌岌可危，多处檐口椽头已经坍塌。外檐彩画失去挑檐的保护，任凭日晒雨淋变得模糊不清，有的已经大片大片脱落。其它古建筑的损坏情况更为严重，建筑的油饰层普遍脱落，木构件多处开裂或糟朽，东配殿的檐角下沉摇摇欲坠，西配殿严重倾斜，多处墙体外闪，随时有倒塌可能。到这次大修之前庙宇已是千疮百孔、满目苍痍、破败不堪。

159 中在历代帝王庙办学非常艰难。学校没有正规操场，主要活动空间只有大殿前的一个篮球场。大殿兼做风雨操场、会场和库房使用。学校房子不够用，凡能盖房的地方都建满了平房、楼房，还把景德门、御碑亭封砌起来当办公室使用。古建内通风采光很差，夏天闷热难耐，冬天靠煤炉取暖，上课办公非常艰苦。有的古建筑还当校办工厂使用。院内电线密布，普遍老化，杂乱穿梭在古建内外。消防设施缺乏，水源压力不足，消

防栓形同虚设。那时的文物安全、校园安全、师生安全牵动着很多人的心，所幸几次大的塌檐都发生在夜里，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历代帝王庙虽然被先后列为市级、国家级文物，但文物保护难、学校办学难的“两难”问题一直非常突出。为此，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曾多次呼吁解决。尽管几届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也投入了一些资金，采取了一些措施，但也只是杯水车薪。1996年西城区委、区政府果断决策，下决心搬迁学校，腾退文物，彻底改善159中办学条件，保护好历代帝王庙。鉴于此举投资巨大、涉及面广、综合性强，经过一段时间的积极筹备，集市区各方之力，于2000年12月正式启动了历代帝王庙文物保护工程。

### 3、修缮工程

历代帝王庙是当时北京最大的文物修缮项目。经国家、市文物局批准，历代帝王庙的全部建筑都得到了彻底修缮，还复建了部分早年被毁建筑，恢复了庙内的完整格局。因涉及道路交通问题，庙外只修复了下马碑，石桥和景德街牌楼没能原址复建。后来在新首都博物馆大厅中复建了一座景德街牌楼，作为首博的标志性景观文物展现在了世人面前。

历代帝王庙修缮工程十分艰巨。一是文物级别高、工程量大、质量要求严，设计施工有相当难度。二是文物修缮与新学校的征地建设要同步进行，统筹协调工作繁重。三是工程期间经历了“非典”疫情，帝王庙与老人民医院仅一墙之隔，因防疫形势严峻曾一度停工。北京市、西城区主要领导高度重视此项工程，他们多次深入施工现场，协调解决了许多重大难题。西城区委、区政府更是全力以赴，党政一把手总牵头，几位副区长分工推进各项工作，确保了文物修缮与新校建设的圆满完成。

修缮工程具体由西城区阜景文化旅游街管委会办公室、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北京历代帝王庙管理处负责组织，北京华融综合投资公司、北京富景文化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工程管理，设计单位为北京古代建筑设计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施工单位为北京怀建集团有限公司，监理单位为北京方亨工程监理有限公司，质量监督单位为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总站文物工程质量监督站。各单位都调集了精兵强将，以高度的责任心，使命感，全力投入，密切合作，为工程作出了杰出贡献。

修缮工程严格依法进行。主要做法是把握一



景德崇圣殿西侧保留旧有彩画与修缮后彩画对比

个前提，运用三种手法，坚持三大原则。即在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前提下，从古建筑的损坏程度出发，合理运用修旧如旧（如大殿内檐彩画）、修旧如初（如大殿外檐彩画）和局部复建（如关帝庙）三种手法进行全面修缮。在修缮工作中，首先是坚持安全原则，以确保庙宇的百年安全为目标，彻底消除古建筑的內伤外患，不留死角盲区。二是坚持质量原则，突出监督制衡机制，要求工程管理、设计、施工、监理、质监等单位都要恪尽职守，既相互制约又精诚合作，不放过每个质量环节。三是坚持程序原则，对施工中暴露出来的隐蔽问题，都要制定专项设计施工方案，重大问题必须经过专家会商，严格履行报批程序，确保工程决策的严谨规范。由于我们把这些要求贯彻落实到了工程的所有环节和全部过程，从而出色完成了修缮工作。修缮工程中，还全面加强了历代帝王庙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彻底更新了上下水与污水管道系统、消防井栓供水系统、电力电器线路系统、技防监控安全报警系统、通讯广播照明系统、强弱电杆线入地系统及供采暖系统等。这些综合配套工程，为历代帝王庙的安全使用创造了良好条件。

### 4、搬迁学校

在修缮历代帝王庙的同时，建设新159中学的工程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西城区教委、159中学、区规划局、建委、北京华融综合投资公司和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在学校腾退周转、用地拆迁和建设施工过程中，克服了重重困难，付出了极大努力，仅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建成了规模大、质量高、设施设备一流的新学校，2003年初159中学迁入了新校址。

经过三年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历代帝王庙终

于拂去了昔日尘埃，医治了岁月创伤，再现了历史风采，重光于当今的文化盛世。

### 三、复原大殿的祭祀陈设

景德崇圣大殿是奉祀三皇五帝和历代帝王的最高殿堂，但大殿的祭祀陈设早已毁坏殆尽，缺失了形象载体，影响了文物价值的完整性与可视性，很有必要进行复原。我们按照“忠实历史、恢复原状”的原则，多方查找证据，精心设计实施，科学复原了大殿的祭祀陈设。复原工作以区文委为主，中国文物研究所负责方案设计，北京怀建公司负责施工，一批资深专家参与了论证把关，故宫博物院、孔庙管理处给予了大力支持。

#### 1. 确定复原年代

历代帝王庙从明代到清代经历了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祭祀体系不断完善，入祀人物不断增加，到清乾隆时达到了极致，大殿供奉三皇五帝和历代帝王多达188人，东、西配殿供奉历代功臣名将多达79人，乾隆之后基本无变化。因此，我们把复原年代确定为清乾隆时期。

#### 2. 查找复原证据。

一是文献记载。《清实录》、《大清会典》等文献中明确记载了大殿祭祀陈设的主要内容，如大殿祭祀龛位的数量，每个龛位内供奉人物的朝代与名单，人物牌位的摆放顺序与尺寸颜色，每个龛位前摆放的案桌位置与数量，每个案桌上的祭器种类、名称与数量，每种祭器的质地、用途等，有的还画有图形。此外还记载了乾隆亲书的匾额、楹联内容。这些记载为我们总体把握大殿的祭祀陈设提供了依据。

二是1925年的老照片和现场遗迹。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不久曾在大殿内举行过悼念活动，那时大殿内还完整保存着全部龛位和部分人物牌位，当时拍摄了一批现场照片，现全部珍藏在中国文物研究所。从照片上可以清晰看到，在大殿的第三排金柱之间共有七座形状相同的龛位横向排列。每个龛位的上部都是木雕龙纹毗卢帽，中间是木质卷草花纹垂板，最下面是石质须弥座。结合照片，我们在第三排金柱上找到了龛位的高度痕迹，在这排金柱的北侧地面上发现了龛位进深的地基痕迹。这些照片、遗迹为复原龛位的形状大小提供了证据。此外，根据照片与文献记载复原了祭祀人物的牌位。

三是有孔庙大成殿的祭器作参照物。按照当时严格规范的祭祀制度，历代帝王庙与孔庙的祭

祀属于同一等级的“中祀”，使用的祭器完全相同。虽然历代帝王庙的祭器已不复存在，但孔庙大成殿的祭器却完整保留到了今天，故以孔庙为依据来复原历代帝王庙的祭器陈设是合理可行的。为了保持祭器年代的一致性，我们复制的均为孔庙乾隆时期的成套祭器。

四是有故宫乾隆皇帝匾额、楹联作参照物。我们根据当年悬挂乾隆匾额、楹联留下来的挂钩位置，确定了它们的大小，又根据故宫现存乾隆匾额、楹联的造型特点确定了它们的样式，还请故宫专家用集乾隆字的办法复原了匾额、楹联上的文字。

#### 3. 复原结果

经过复原大殿祭祀陈设的主要特点是：

在大殿第三排金柱之间，横向一字排列着七座形制相同的金龙纹龛位，七座龛位内分别供奉着三皇五帝和180位历代帝王的牌位。

借用《周礼》“先王居中、左昭右穆”的庙祭制度，安排入祀人物的牌位。“先王居中、左昭右穆”的原义是指在同一家族中，老祖先的地位最高，他的牌位要居中供奉，后世子孙的牌位要根据早晚辈份，按照先左侧后右侧的顺序反复左右排列，一直排列到最晚的一辈。历代帝王庙借用这种制度安排三皇五帝和历代帝王的牌位，创造性的解决了七座龛位之间和每座龛位之内的人物关系和朝代关系。

七座龛位中最中心龛位的地位最高，供奉三皇，以三皇为中心，左侧第一龛为次中心地位，供奉五帝。接下来的历代帝王按照朝代的早晚分龛供奉，右一龛为夏、商40位帝王，左二龛为周代32位帝王，右二龛为两汉、三国、东晋、南北朝40位帝王，左三龛为唐、五代、辽、宋38位帝王，右三龛为金、元、明30位帝王。

每座龛位之内的关系是，三皇龛位内伏羲居中、左炎帝、右黄帝，五帝龛位内少昊居中、左颛顼、右帝喾，左唐尧、右虞舜，各帝王龛位内首先按朝代分室（组），同一朝代的开国帝王居中，后继帝王依辈份早晚，按先左后右的顺序排列。

七座龛位的前面都设有成套相同的祭器案、俎案和香案。祭器案上摆放青铜爵、登、豆、簋、簠、钶和竹筴、篚等祭器，俎案上摆放牛、羊、猪太牢祭牲，香案上摆放青铜香炉、烛台等。

大殿中心间高悬乾隆皇帝的“报功观德”匾额，左楹联为“治统溯钦承法戒兼资洵哉古可为鉴”，右楹联为“政经崇秩祀实枚式焕穆矣神其孔安”。

这里需要说明两点，一是当年每座龛位前的

祭器案、俎案和香案，或设一套或设几套不等，这与龛位内供奉人物、朝代的多少有关。我们此次复原时都简化为了一套祭器案、俎案和香案。二是人物牌位的形状尺寸和油饰颜色是按照文献记载参考老照片制作的，但人名字体难以考证，就统一使用了现代标准的楷书字体。

#### 4、复原意义

第一、中华祖先三皇五帝是历代帝王庙的祭祀中心。

历代帝王庙祭祀的三皇五帝，都是我国传说时代杰出的部族首领，一直被后世传颂、史家追记。千百年来，尊奉三皇五帝为远古圣贤、华夏始祖、中华祖先的血亲观念和认同情感世代积淀，深入人心，颇具民族凝聚力、感召力和亲和力，成为我国祖先崇拜的主流传统。时至今日，“华夏儿女”、“炎黄子孙”几乎成了所有中国人、全世界华人的代名词。

我国对三皇五帝的祭祀大体经历了地方祭祀到国都祭祀、民间祭祀到皇家祭祀、分庙祭祀到一庙祭祀的发展进程，历代帝王庙就是这一发展进程的集大成者。

最初对三皇五帝的祭祀是在各传说纪念地为他们建庙宇、修陵墓，如甘肃天水的伏羲庙、河南淮阳的太昊陵、陕西宝鸡的神农祠、湖南炎陵县的炎帝陵、河南灵宝的黄帝庙、陕西黄陵县的黄帝陵、山西临汾的尧庙、湖南九嶷山的舜帝陵等。这些地方的祭祀传统，深植在当地的草根文化中，形成了深厚的社会民间基础。

历代有识君王对此十分重视，他们顺势而为，或拨款修缮陵庙、或御题颂词、或亲书祭文、或令地方官员代祭、甚至千里迢迢亲临祭拜，直到把祭祀三皇五帝的礼制提高到了国家层面，开始在国都修建庙宇祭祀三皇五帝。目前所知最早是唐代天宝七年（747年），唐玄宗在长安为三皇五帝“每人各置一庙”祭祀他们。明清时代出现的历代帝王庙，进一步发展为“一庙祭祀”，成为我国历史上唯一集中祭祀三皇五帝的皇家庙宇。

三皇五帝是历代帝王庙的祭祀中心。在高大雄伟、

庄严肃穆的景德崇圣大殿里，七座金龙龛位豪华凝重、蔚为壮观，最中心龛位供奉着伏羲、炎、黄的三皇牌位，左侧的次中心龛位供奉着五帝牌位。在三皇五帝两侧的五座龛位中，分列着180位历代帝王的牌位从祀。这种祭祀陈设，突出了三皇五帝崇高地位，营造了历代帝王共尊三皇五帝的宏大场面和浓重氛围。每年春秋两季都要在这里举行隆重的祭祀大典，明清两朝共举行过662次，其中明清皇帝亲临祭祀17次，突出祭拜三皇五帝。如明嘉靖帝在首次开庙祭祀大典时就规定，凡皇帝亲祭只在伏羲、炎、黄三皇位前祭拜，其他牌位前则委派王公大臣行礼。这个礼制一直延续到清代，且祭拜规格不断提高。如顺治帝祭拜时一上香，康熙帝祭拜时行两跪六叩之礼，雍正帝祭拜时行三跪九叩大礼。乾隆帝祭拜时还专门赋诗一首，第一句便是“三皇五帝道功崇，历代君王懋建中”，意思是三皇五帝的思想功德是崇高伟大的，历代君王以三皇五帝为榜样，勉励自己像他们一样建功立业。既表达了他对三皇五帝的无限景仰，也说到三皇五帝的楷模作用，还诠释了为什么在大殿的祭祀陈设中一定要突出三皇五帝的道理。今天这座御诗碑仍然矗立在大殿的西南之侧，读乾隆诗文，观大殿陈设，可以领悟到当年崇祀三皇五帝的神圣感和真实感。

第二、从三皇五帝到历代帝王的祭祀体系，体现了我国“中华统绪（序）不绝如线”的重大历史特点。



景德崇圣殿

我国早期对三皇五帝和历代帝王的祭祀特别看重个人功德。如《礼记·祭法》中就提到了五条标准，即只有“法施于民者、以死勤事者、以劳定国者、能御大灾者、能捍大患者”才值得祭祀，并列举了伏羲、炎帝、黄帝、唐尧、虞舜、夏禹王、商汤王、周文王、周武王就是这种值得祭祀的人。历代帝王庙一方面继承了这种功德崇拜的传统，隆重祭祀三皇五帝，另一方面又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角度，对入祀帝王不完全看重个人功德，而是重“历代”二字，强调历朝历代的传承性和连续性，祭祀的是“依朝代系列，不论地域，不分民族，不求姓氏，唯以史纪因袭为宗”的历代帝王系列。当然这个帝王祭祀系列也有一个底线标准，那就是亡国之君、暴戾之王不予设位享祀。

历代帝王庙创建了从三皇五帝到夏、商、周、汉、唐、宋、元、明等历代帝王的祭祀体系，入祀人物纵贯中华一脉，他们的承前启后、世代传继、一脉相承，用乾隆皇帝的话说就是“中华统绪不绝如线”，意思是中华的治统序列从一开始就像一条线，连绵不绝，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乾隆的这个表述十分精辟，一语道出了我国一个重大的历史特点，即中华文明五千年治统、政权与主权的一脉相承。历代帝王庙把这个历史特点进行了人物化、庙宇化的表现，在大殿的祭祀陈设中展示了从三皇五帝到历代帝王传承有序的人物体系。祭祀这个人物体系，就是创新了一种中华大历史祭祀观，颂扬的是中华祖先的创世功德，彰显的是中华统绪的一脉相承，祈佑的是中华基业的万世永昌，颇具中华五千年泱泱大国的风格特色和非凡气派，堪称“一庙五千年”。这是我国历史发展到明清时代，在拥有了数千年的政治文化积淀后，于乾隆盛世呈现出的光辉一幕，值得我们今天倍加珍重。

#### 四、举办《历代帝王庙历史沿革展》

大殿祭祀陈设再现了清乾隆极盛时期的特点，实际上历代帝王庙从创建到发展的演变过程也极具重要价值。为阐释这个演进过程，我们在东配殿举办了《历代帝王庙历史沿革展》。展览是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由区文委与国家博物馆合作完成的。

历代帝王庙出现在明清时期，那时中国已经拥有了数千年的历史积淀，这是可能产生历代帝王庙的巨大历史背景和前提条件。然而是什么原因引发了它的诞生，又推动了它的发展呢？

这就必须从明清六位皇帝与历代帝王庙的关系说起，展览就是沿着这条主线展开的。

##### 1、明太祖朱元璋与历代帝王庙

历代帝王庙最早是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六年（1373年）在金陵（南京）创建的。朱元璋为什么要在建国初期修建历代帝王庙呢？最直接的原因是民族问题。元末明初时，汉蒙民族矛盾错综复杂，朱元璋能够推翻蒙元统治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利用了当时的汉蒙民族矛盾，号召民众“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建立明朝后，朱元璋特别需要在“恢复中华”上大做文章，下力气强化中华意识和中华地位，于是他选择了一个切入点，就是高调弘扬中华历史文化，主要是隆重祭祀三皇五帝和历代开国帝王。他不仅要求恢复全国各地的祭祀活动，而且决定在国都修建一座历代帝王庙，作为国家祭祀大典，集中祭祀三皇五帝和历代开国帝王。在庙堂之上，祭祀人物皆有塑像，三皇五帝居于最崇高的中心地位，历代开国帝王夏禹王、商汤王、周武王、汉高祖、汉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宋太祖等分列在三皇五帝的左右从祀，极大彰显了几千年来华夏——汉民族的历史主体地位。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朱元璋也同时入祀了元世祖忽必烈，把蒙元王朝列入了中华政统序列。此外，他还推行了一系列民族安抚政策，昭告天下“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仪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这些举措与他当年“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战争口号相比看似矛盾，实乃缓解当时民族矛盾和稳定国家大局的政治需要，被朝野誉为“神谋睿断”。这是朱元璋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明智之举。朱元璋创建历代帝王庙，先以强化民族性为初衷，后以包容民族性而告成，为历代帝王庙奠定了统一多民族的帝王祭祀体系。

##### 2、明嘉靖皇帝与历代帝王庙

明朝迁都北京后，对历代帝王的祭祀或在南京旧庙、或在北京郊坛、或在故宫文华殿举行。嘉靖皇帝建成北京历代帝王庙后，南京旧庙废弃不存，北京历代帝王庙成为全国唯一，与南京旧庙不同之处是设主（牌位）不设像。北京历代帝王庙建成之初，由朱元璋确立的帝王祭祀体系被完整继承，但后因汉蒙民族矛盾的激化而发生了改变。元朝灭亡蒙古贵族退回漠北草原后，明朝的汉蒙民族冲突不断，到嘉靖帝时，蒙古鞑靼强烈要求与明朝进行贸易往来，以求自己的生存发展。但嘉靖帝没有顺势抓住化干戈为玉帛的机遇，汉蒙间再次饱受战争苦难。“庚戌之变”后，嘉



靖帝断然停止了历代帝王庙对元世祖忽必烈的祭祀，直到明朝末年。

### 3、清顺治皇帝与历代帝王庙

顺治皇帝入主北京后，首先把朱元璋等明朝的帝王牌位从太庙移入历代帝王庙奉祀，其后便纠正明嘉靖帝的做法，恢复了历代帝王庙对元世祖忽必烈的祭祀，并新入祀了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金太祖完颜阿骨打、金世祖完颜雍和元太祖成吉思汗。由于同是北方民族的缘故，顺治皇帝特别看重对辽契丹族、金女真族、元蒙古族帝王的人祀。

### 4、清康熙皇帝与历代帝王庙

康熙皇帝是把清王朝带入鼎盛的一代明君，一生的帝王经历使他深感治国安邦的艰辛和不易。康熙酷爱研读历史，他每每读史时都很注意深究前代帝王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全面客观地评价他们的功过得失。面对什么人资格入祀历代帝王庙的争论，他很反感书生们对前代帝王的一味抨击和刻意指责，而是持比较平实包容的态度。晚年的康熙时常思考入祀历代帝王庙的资格问题，他经过较长时间的深思熟虑后，在临终前颁布了“凡曾在位，除无道被弑亡国之主外，应尽宜入庙崇祀”的谕旨。这道谕旨不仅为人祀帝王划定了一个底线标准，避免了许多纷争，更重要的是给历代帝王庙确立了一种中华大历史帝王祭祀观，为后来雍正、乾隆皇帝进一步完善其祭祀人物体系开辟了空间。

### 5、清雍正皇帝与历代帝王庙

雍正皇帝是一位上承康熙大业，下启乾隆盛世的守业明君，他从自身经历中深感创业难，守业更难，认为没有守业之功，就没有太平盛世。因此，雍正皇帝在落实康熙遗旨时不是简单的增加人数，而是赋予了更加深刻的思想内涵。雍正认为历代帝王庙过去只入祀少数开国帝王是远远不够的，那些“英君哲后”，或“继世而生”，或“间世而出”的历代守业帝王们也完全应该入祀历代帝王庙。于是雍正增加了一大批历代守业帝王入祀，使历代帝王庙入祀帝王的数量从原有的20余位增加到了164位。

### 6、清乾隆皇帝与历代帝王庙

乾隆皇帝与历代帝王庙的关系最为密切，他10多次颁布谕旨，撰写碑文、诗文，题写匾额、楹联等，对历代帝王庙研究的最深入，分析的最精辟，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点：

一是，要“大公至正”，增加哪些帝王入祀，不能有民族、地区的偏见。他认为，朱元璋虽然

没有人祀辽、金帝王，但入祀了元世祖忽必烈，“犹有一统帝系之公”。明嘉靖帝带着偏见罢祀元世祖忽必烈，是“置一统帝系于不问矣”。他甚至婉转批评了顺治皇帝，说他只增加辽、金帝王入祀，没增加其它“偏安之国”的帝王入祀，“未免有左袒（北方民族）之意”。

二是，增加哪些帝王入祀，要体现“中华统绪不绝如线”这个历史特点。他认为，中华的治统序列从一开始就像一条线，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因此，上自三皇五帝下至历代帝王都要供奉，开国与守业的帝王都要祭祀，南方、北方“偏安之国”的帝王也要同等对待，这才称得上是历代帝王庙。为此他又增加了东、西晋，北魏、五代等帝王入祀，使人祀人物最终达到了188位。

三是，增加哪些帝王入祀，不必过于谨慎，否则除了三皇五帝之外还有几个人能入庙享祀呢？他也很直言自己的看法，认为在这些入祀的帝王人物中，“法者实稀戒实多”，即值得效法的少，引以为戒的多，但他们都是历史的一面镜子，可以留给后人去效法、去戒鉴、去警惕。他说：“历代帝王胥（全）祀于景德之殿，其有德无德，若南若北，曰中曰外，是一家非一家，章章如，昭昭如，孰可以为法，孰可以为鉴，万世之后，入庙而祀者，孰不憬然而思，惕然而惧耶！”

综上所述，乾隆皇帝把历代帝王庙的祭祀体系完善到了当时可能达到的最高程度，把对历代帝王庙的认识提升到了当时可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为历代帝王庙划上了一个相对圆满的历史句号。

《历代帝王庙历史沿革展》揭示了历代帝王庙纵贯中华一脉的祭祀体系的初创和完善过程，对于深入认识历代帝王庙的价值特点很有必要。此外，我们在工程期间还举办了《历代帝王庙主要祭祀人物展》，并筹备了《关羽身首魂尊展》、《三皇五帝与百家姓》等展览，这些展览也都各具特色，深受欢迎。

2000年底至2004年春天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岁月，许多人的理想追求、学识智慧和技术才能被紧紧凝聚在一起，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出色的完成了历代帝王庙文物保护工程。我们相信随着时代的进步发展，人们一定会更加尊重自己国家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历代帝王庙必将作为一处体现中华文明五千年一脉相承的优秀文化遗产，自立于世界多元文化之林，被保护传承下去。

（作者为原吉林大学考古系主任、副教授，曾任北京西城区副区长，现任西城区政协副主席）

# 丰台王佐遗迹考古发掘简报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王佐遗迹考古发掘区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南部，东邻东王佐村，西接牯牛河，南连大灰厂路，北为中国航空气动力技术研究所。为配合银河星座居住小区住宅工程建设，做好工程区地下文物的保护工作，2007年11月22日至12月18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此区域遗迹进行发掘保护，取得了重要的考古成果。

此次发掘根据遗迹的分布情况将发掘区分为三个区，编号为Ⅰ—Ⅲ。发掘的总面积为2600平方米。共清理汉、隋唐、辽金、明清等各时期墓葬80座，窑址8座。出土的随葬器物有陶器、瓷器、金器、银器、铜器、玉器、骨器、石器，共计350余件（所出铜钱按1件计）。

汉代墓葬37座，分为竖穴土坑墓和砖室墓两大类，其中竖穴土坑墓10座，砖室墓27座，均为南北向。墓葬由墓道、墓门、甬道、墓室等几个主要部分组成。依墓葬形制可分为单室墓、双室墓和多室墓。双室墓分为前室、后室；多室墓分为前室、后室、耳室等。部分墓葬现存有券顶和器物台。葬具和人骨保存较差，大部分已不存。出土的器物以陶器为主，有陶罐、壶、仓、盆、盒、灶、奩、灯、井、房、耳杯、俑等；铜器有铜镜、铜饰和铜钱。M23位于发掘Ⅱ区的西部，“甲”字形竖穴砖室墓，南北向，方向185°。墓口距地表深1.13米，基底距墓口深2.93米，南北长7.2米。由墓道、甬道和墓室组成。墓道位于墓室的南部，呈



M23 陶器出土状况



M76: 2 金簪



M39: 5 金镯



M39: 4、10 玉镯



M39: 6、14 玉环



M52: 1 鼻烟壶



M50: 1 鼻烟壶

长方形竖穴土圻斜坡状，南北长3.6米，宽0.86—1米，南窄北宽，内填花土，土质稍硬。甬道位于墓道和墓室之间，南北长0.76米，东西宽0.9米，残高0.34米，上部已被破坏，内用4层平砖砌封。墓室位于墓道的北部，平面近正方形，大部分已被破坏，外土圻边长3.48米，内圻边长2.8米；砖墙厚0.3米，残高0.06—1.4米，用两平砖一竖砖错缝砌成，底部用细绳纹青砖呈“人”字形铺筑。在甬道对面墓底还铺有两行共11块方形花纹红砖，砖长0.37、宽0.36、厚0.06米。出土随葬品有陶奩、陶壶、陶灯、喇叭形陶器、耳杯、陶俑、陶灶、陶狗、陶鸡、铜钱等。

唐代墓葬1座(M13)，近“甲”字形竖穴砖室墓，南北向，方向170°。墓口距地表深0.7米，墓底距墓口深1米，总长5.3米。由墓道、墓门、墓室三部分组成。墓道位于墓室的南部，呈长方形斜坡状，长2.08米，宽0.7—0.98米，底坡长2.22米，深0.2—1米。墓门位于墓道和墓室之间，

由于破坏严重顶部已塌，仅留东、西两壁，残高0.6—0.84米，用六平一竖的青砖错缝砌制。墓门宽0.7米，进深0.52米，内有两层封门砖，呈“人”字形砌制，残高0.63米。墓室位于墓道的北部，外围土圻呈长方形，东西长3米，南北宽2.9米。由于破坏严重，顶部及周壁已被破坏，仅存东、南两壁少段残墙，残高0.12—0.6米。从残存部分看，墓室内壁应为圆形，直径2.54米；中部有一个“7”字形棺床，已被破坏，仅残留棺床外底部一层青砖，残高0.1米。墓内未发现人骨架和随葬品。

辽金时期墓葬1座(M68)，长方形竖穴砖室墓，南北向，方向5°。墓口距地表深1米，墓底距地表深1.4米，墓口长2.68米，宽1—1.2米。内填花土，土质较硬。用青砖平砌砖棺，南窄北宽，棺底用青砖和红砖混合错缝平铺，内葬单棺，棺长2.02米，宽0.22—0.44米，残高0.4米。棺内骨架已经严重腐朽，仅发现一残头骨和少量肢骨，头北足南，面向上，仰身直肢。未发现随葬品。

明清时期墓葬41座，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大部分为东西向，南北向较少，葬具为木棺。有1墓1棺、1墓2棺、1墓3棺三种形制。部分有迁葬习俗。随葬器物有陶罐、瓷罐、瓷碗、金手镯、金耳环、银簪、银耳环、银锭、铜簪、铜饰、铜钱、玉镯、玉指环、料饰等。

窑址8座，均为半地穴式，平面近椭圆形，南北向或东西向。由操作坑、火门、通风口、火膛、窑室、窑床、烟道等部分组成。部分窑内留有红烧土、青结块及残砖块等物，底部出有绳纹残砖。其中Y3和Y4共用一个操作间，Y7为一窑室带有两个火膛，在本地区较为少见。根据窑的开口层位、形制结构及窑内包含物，窑址年代推断为汉代、隋唐、明清三个时期。

从王佐遗迹清理的墓葬和窑址来看，时间跨度大，内涵较为丰富，说明了该地区在古代居民活动中的重要地位。该批遗迹的发掘清理，对了解本地区古代历史及其社会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研究北京地区汉、隋唐、辽金、明清等时期墓葬的形制、葬俗及窑址的结构、烧陶工艺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张智勇 郭京宁 韩鸿业执笔)



Y7



Y3、Y4

# 大葆台西汉墓葬制成因分析

靳宝

目前已发掘六十多座西汉诸侯王陵墓<sup>①</sup>，其中11座西汉诸侯王墓使用了“黄肠题凑”这种葬制<sup>②</sup>。而真正享有“天子葬制”规格的“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外藏椁”，则为数不多。其中，北京市大葆台西汉墓就很有代表性。从葬制规模、形制、材质、工艺上看，大葆台西汉墓“这具宏大的题凑，在结构上更具独立性，可视为黄肠题凑的成熟形态”<sup>③</sup>。大葆台西汉墓墓主人为何能享受如此高规格的葬制，值得思考。

除了墓葬本身的演进轨迹外，可能还有这么几个因素与享有这种葬制息息相关：一、汉代皇统宗亲的尊亲孝忠观念；二、汉代尊君一统的君主论和国家观；三、西汉中后期的政治制度及其统治策略；四、西汉燕蓟地区本身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

五、西汉厚葬之风的盛行。对此加以认真总结和分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西汉诸侯王葬制及其形成过程。

## 一、皇统宗亲的尊亲孝忠观

汉代是一个皇权高度集中的大一统社会，又是一个以孝治天下的朝代，极为推崇忠孝观念。从天子到诸侯，都要实践孝道思想，“故号为天子者，宜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号为诸侯者，宜谨视所侯，奏之天子也”<sup>④</sup>。汉代以孝作为自己治民安国的主要理论基础，孝的思想渗透到汉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可以说，汉代建立了以孝为核心的社会统治秩序，强调忠孝一体。特



清理完的墓坑及墓室全景（东南—西北）

别是西汉中后期，随着谶纬迷信的盛行，孝道思想的神秘化更加突出，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作用也更加明显。

最高统治者的以身作则、孝道观念的提倡、政策上的支持和奖惩、社会教化等，都是汉代以孝治天下的具体措施，也是孝道理论政治化的实践。颜师古曰：“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汉家之谥，自惠帝以下皆称孝也。”<sup>⑤</sup>汉宣帝就提出：“导民以孝，则天下顺。”<sup>⑥</sup>封建统治者以孝道治天下，顺天下，目的当然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秩序，防止“乱”和“逆”，真正达到“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sup>⑦</sup>。

汉代统治者对忠孝的实践，表现为奖以实利与诱以高官。再加上“视死如生”的生死观影响，丧赠就成为体现孝道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为了体现帝王彰显中兴之德与追存贤圣的传统和政治法则，帝王也会进行所谓的丧赠。《汉书·外戚恩泽侯表·序》曰：“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必兴灭继绝，修废举逸，然后天下归仁，四方之政行焉。传称武王克殷，追存贤圣，至乎不及下车。世代虽殊，其揆一也。”当然这种丧赠，其实质在于维护统治阶级的特权地位，在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政治需要，同样也为了维护大一统的社会秩序。如辅政功臣霍光死后，宣帝赐予他“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和外藏椁十五具”这样高规格的葬制。这样的孝道，也体现在帝王对一些诸侯王的丧赠。大葆台西汉墓墓主人享受“梓宫、便房、黄肠题凑”这样尊贵的葬制，就是一个典型。

关于大葆台西汉墓墓主何人的问题，虽仍有新的认识，但目前来说基本还是以广阳顷王刘建为该墓墓主人，笔者也倾向于此。刘建父亲刘旦乃汉武帝长子，而元帝为武帝玄孙，这样刘建为元帝的从祖父。在当时诸侯王中，广阳顷王刘建是元帝最亲的长辈，“故刘建在元帝初元四年（前45年）死后，享用诸侯王葬是很自然的”<sup>⑧</sup>。这是从皇统尊亲而言的，不过单靠这一层关系，并不一定能享有像黄肠题凑这样高规格的葬制。只有把这种皇统尊亲与汉代特有的以孝治天下联系起来，才能对此做出一些解释。如果我们对武帝等帝王对待刘旦及其后代的态度和做法稍作分析，就不难发现这一点。

当卫太子败亡，齐怀王又去世，刘旦自以为该他当立太子，于是上书要求进京。武帝很是愤怒，“下其使狱”，后加上其他罪名，刘旦所在封国被削去三县，但最终也只是“武帝由是恶旦，后遂立少子为太子”，并没有对他加以深究。昭帝即位

后，刘旦不仅没有收敛登王的野心，反而更加狂狷，“请立庙郡国”。而秉政大臣霍光，“褒赐燕王钱三千万，益封万三千户”。刘旦并不满足，于是与中山哀王子刘长、齐孝王孙刘泽等结谋，诈言以武帝时受诏，“我亲武帝长子，反不得立”。后被发觉，刘泽等被诛杀，而对于燕王刘旦，只是“有诏弗治”。但刘旦的这些行为已经违背了当时的忠孝一体的以孝治天下这一政治伦理原则，从昭帝的赐书中就很明显看到这一点。昭帝赐书曰：“今王骨肉至亲，敌吾一体，乃与他姓异族谋害社稷，亲其所疏，疏其所亲，有逆悖之心，无忠爱之义。”既违背了皇统宗亲之孝，也没有表达臣对君之忠爱之义，忠孝两失。故刘旦看后，“即以绶自绞”。而帝王为了体现所谓的天子之孝道，于是“天子加恩，赦王太子建为庶人，赐旦谥曰刺王”。后宣帝即位，“封旦两子，庆为新昌侯，贤为安定侯，又立故太子建，是为广阳顷王”<sup>⑨</sup>。这才是皇统尊亲与汉代以孝治天下的政治伦理法则紧密联系的体现。

因此，虽然目前无法从文献来明确说明广阳顷王刘建的墓葬为帝王所赐，但自武帝时期崇尚儒家思想，使得儒家的尊亲与孝道思想更加突出与坚实，这不能不对诸侯王葬制的规格和形制产生影响。如果说诸侯王在汉初时“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sup>⑩</sup>，诸侯国礼仪官制皆取法中央政权，诸侯王陵墓制度也不例外，在很大程度上应与汉王朝天子的陵墓制度一致<sup>⑪</sup>；那么随着景帝削藩、武帝推恩令的实施，诸侯王“惟衣食租税而已”，其它相应的“权利”也就会遭到削弱或消除。但由于皇统尊亲与以孝治天下的孝道思想之结合，这种陵墓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仍得以继续展现。大葆台西汉墓的黄肠题凑葬制，就是这方面的很好说明。

## 二、尊君一统的君主论和国家观

两汉时期，尊君一统是君主论和国家观的根本要求。“为人臣者，助君理之”<sup>⑫</sup>，“君为元首，臣为股肱”<sup>⑬</sup>，这些都说明君主既是政治轴心，又是统一的思想标志。汉代突出宣扬“一统尊君”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就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大一统社会秩序。虽然出现了封建制与郡县制“兼而用之”，但实际上仍以郡县制为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著名史学家周谷城曾言：“自是以后，专制一尊成了政治之常规；他若封建余波，郡县制封建并行，封建势力之反动等等，皆为变相。”<sup>⑭</sup>

而“黄肠题凑”，不仅有着“题凑”所原有的“为固”之功能，更象征着尊贵、君臣一统与君主独尊的国家观与君主论。《说文》云：“凑，水上人所会也。”唐代学者陆德明《经典释文》言：“凑，聚也。”《淮南子·主术训》就曾云：“人主者，……百官修同，群臣辐凑……。”高诱注曰：“群臣归君，若辐之凑毂，故曰辐凑。”又《淮南子·主术训》言：“兼包万国，一齐殊俗，并覆百姓，若合一族，是非辐凑而为之毂……。”高诱注曰：“毂，以喻王。”《史记·太史公自序》也载：“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对“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有不同解释。宋裴骃《史记集解》案：“《汉书音义》曰：‘象黄帝以下三十世家，《老子》言车三十辐，运行无穷，以象王者如此也。’”而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案：“颜云：‘此说非也。言众星共绕北辰，诸辐咸归车，群臣尊辅天子也。’”这些解释，基本围绕君臣尊辅天子而成一统来展开。这似乎与黄肠题凑有共同之处，都象征着尊君一统的文化内涵。虽说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题凑”出现。但就目前考古发掘情况来看，至少是在汉代才真正产生“黄肠题凑”。如果只是以往单一的“题凑”而言，可能指的是一种承重墙或建筑构造；但演进为“黄肠题凑”后，就远远不止这些基本内容，带有诸多政治内涵和文化内涵。霍光死后，汉宣帝赐予其黄肠题凑葬制，就已使这一葬制带有了某些政治色彩。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黄肠题凑’是个针对性极强的特殊名词，它专指以黄色木芯为特色的由柏木枋堆累而成的木椁层。不是由柏木枋垒成的题凑，是绝不可称为‘黄肠题凑’的，而只能称之为‘题凑’。……有关专家所谓‘黄肠题凑’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叫法，不管它的用材是否柏木，这种设在棺椁外的木结构均可称为‘黄肠题凑’的说法，显然是不够严谨和客观的。……‘题凑’是一种政治待遇、身份地位的体现，‘黄肠题凑’则更是如此。黄肠题凑本为天子之葬制，经特许后诸王、重臣也可使用，未经特许的诸侯王便不能使用，而只能使用其它木材制成的一般性‘题凑’。”<sup>②</sup>

这种葬制在西汉广阳王自顷王刘建始，一直沿袭到西汉末年。从文献对其记载甚略，或基本没有，也可以看出他们是比较安稳的。这说明，他们安分守己，默默遵守着尊君一统的君臣观和国家观。因此，死后享有黄肠题凑这样高规格葬制是合理的，也是合法的。而江苏高邮天山汉墓

则并非如此。据有些学者考证，其墓主人可能为广陵王刘胥。刘胥为诸侯王时，多次进行“谋反”或“诅咒”，事发后被迫自杀。尽管其死后所享受的墓葬及其形制极尽奢华，但这一墓葬之题凑木却为楠木。为了显示其高贵的身份和地位，只是在题凑木芯外涂上一层黄颜色，来模仿“黄肠题凑”。可以看出，他对于黄心柏木构成的“天子之制”是很向往的。但因其没有遵守尊君一统的君主论和国家观，故无法享受真正的“黄肠题凑”。从这两个实例来看，汉代尊君一统的君主论和国家观对汉代墓葬制度是有一定影响的。

### 三、霸王道杂之的统治策略

汉初刘邦听从陆贾的建议，及时地实施了“攻守转换”之道，认识到“以马上得之，不可以马上守之”的道理。这样，社会休养生息，为“文景之治”奠定了坚实基础。后遂形成了汉代霸王道杂之的治国总方针，对两汉及其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汉书·元帝纪》载宣帝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这是当朝皇帝对治理国家的精辟概括，更能反映历史的真实。东汉末年，思想家崔寔对此做了进一步阐释，他说：“量力度德，《春秋》之义。今既不能纯法八代，故宜参以霸政，则宜重赏深罚以御之，明著法术以检之。”后世的政治家、统治者对此的认识也是一致的，如唐高宗李治曾问令狐德棻曰：“何者为王道、霸道？又孰为先后？”令狐德棻对曰：“王道任德，霸道任刑。自三王已上，皆行王道，唯秦任霸术，汉则杂而行之；魏、晋以下，王霸俱失。”<sup>③</sup>

这一治国总方针，必然对诸侯王国产生影响。一方面汉王朝帝王统治者给予各诸侯王及其列侯分封和赐爵，另一方面则密切监视或设法限制各诸侯王国实力和地域等方面的扩展。

对于广阳国而言，真正改变其政治命运的是汉宣帝。昭帝时期，刘建因其父刘旦“谋反”之罪名，被贬为庶人，燕国也“降”为汉郡。而宣帝即位，立马恢复刘建太子身份，并任其为广阳顷王。虽然相比以往的燕国，在地域上缩小了很多，但却又重新确立广阳国这一诸侯王国之政治地位。从此，刘建及其后代沿袭广阳王，直到王莽篡汉而结束。这在当时诸侯王的政治生涯中，并不多见。汉宣帝的这一做法，明显是其霸王道杂之这一治国总方针的实施与体现。



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内景

如对霍光及其家族的做法，也反映了这一点。在西汉昭宣中兴中，霍光的政治作用非常突出，也很关键。因此，宣帝多次赏赐这位国家功臣。但同时对其也密切注意，时刻告诫他不要傲慢自大。当霍光死后，其家族横行奢华时，宣帝毫不手软，依法办事。最后，霍光后世的命运竟是这样：“云、山、明友自杀，显、禹、广汉等捕得。禹要斩，显及诸女昆弟皆弃市。唯独霍后废处昭台宫，与霍氏相连坐诛灭者数千家。”

再如对原来的昌邑王刘贺，虽然刘贺因淫乱而被废，但宣帝仍对其不放心，派人暗中监察，直到对皇权并无威胁时，才封其为海昏侯，“宣帝即位，心内忌贺。元康二年，遣使者赐山阳太守张敞玺书曰：‘制诏山阳太守，其谨备盗贼，察往来过客。毋下所赐书。’敞于是条奏贺居处，着其废亡之效，曰：‘察故王衣服言语跪起，清狂不惠。……其天资喜由乱亡，终不见仁义如此。’上由此知贺不足忌。其明年春，乃下诏曰：‘盖闻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亲，析而不殊。其封故昌邑王贺为海昏侯，食邑四千户。’”<sup>⑩</sup>

由此看来，西汉广阳王的政治命运，正是汉代“霸王道杂之”在诸侯王身上的一个体现。黄肠题凑葬制的享受，其实并不神秘，只是汉代政治实践的一个缩影而已。

#### 四、独特险要的战略位置

刘建所封之广阳国，乃当时北方一重镇也，

是中央政权的边防重地，也是汉文化向北方地区传播的重要通道。既有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又起重要的经济支柱作用。这一自然因素，对他享有高规格的葬制不无影响。

广阳国之都城所在地为蓟，“蓟，南通齐、赵，勃、碣之间一都会也。”<sup>⑪</sup>《战国策》卷二十九《燕一》说战国时期燕国：“民不田作，枣栗之实足食于民。”《史记·货殖列传》更载曰：“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悍少虑，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馀，东结秽貉、朝鲜、真番之利。……燕、代

田畜而事蚕。……燕、秦千树栗。”《盐铁论》也载曰：“燕之涿、蓟，富冠海内，为天下名都。”北京北郊清河镇的汉城遗址中发现的多种铸铁模具，说明蓟城一带冶铁业的发达。

尽管燕国在西汉时的建置发生了诸多变动，但蓟城始终为国或郡之都城。武帝封刘旦为燕王时，曾赐策曰：“呜呼！小子旦，受兹玄社，建尔国家，封于北土，世为汉藩辅。呜呼！薰鬻氏虐老兽心，以奸巧边眚。朕命将率，但征厥罪。万夫长，千夫长，三十有二师，降旗奔师。薰鬻徙域，北州以妥。悉尔心，毋作怨，毋作桀德，毋乃废备。非教士不得从征。王其戒之！”<sup>⑫</sup>这非常明确地道出了以蓟城为中心的燕国之战略位置，是中央政权抵御北方少数民族南进的前哨阵地，同时又是中原皇朝与北方少数民族进行交往、融合的重要区域，成为北方边贸中心。因此，它起着维护西汉皇朝边疆稳定、民族交流与融合的重要作用。明代学者刘侗比较洛阳、长安与北京三处地理方位后认为：“中宅天下，不若虎视天下，虎视天下，不若挈天下为瓶，而身抵其口。雒（洛）不如关，关不如蓟，守雒（洛）以天下，守关以关，守天下必以蓟。”<sup>⑬</sup>这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古代蓟城的重要战略地位及其意义。

既然以蓟城为中心的燕国或广阳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传播等方面有如此重大意义和作用，那么帝王不能不重视对广阳国诸侯王的统治和管理。而刘建享受这样高的葬制，与其所在



地域的地位是统一的，是合乎情理的。同时，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使其能承受这种葬制的消费。

## 五、崇尚盛行的厚葬之风

中国古代对于丧葬很重视，是孝文化的一大内容。《孟子·离娄下》云：“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但厚葬现象出现还应在秦汉时期，特别是武帝之后。

西汉初年，当残破的社会经济尚未得到恢复时，客观上不可能盛行厚葬。“送死”奢僭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也和“养生”奢僭一样，是在汉武帝以后才形成的。因为只有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之后，才为这种奢侈的消费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中国古代是一个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很自然形成一种观念：对父母的孝敬不仅要表现在“养生”上，也要表现在“送死”上。<sup>①</sup>封建国家统治者为了体现君主的权威和荣誉，赠赐大臣和宗亲以豪奢的葬制和葬品，这使得厚葬之风愈加盛行。反过来，厚葬之风为诸如黄肠题凑这样高级葬制的盛行提供了催化剂。

汉代的一些文献对此做了记载，如《汉书·严安传》载曰：“今天下人民用财侈靡，车马衣裳宫室皆竞修饰，调五声使有节族，杂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于前，以观欲天下。”《盐铁论·散不足》载曰：“富者绣墙题凑，中者梓榭柳。”《盐铁论·国疾》云：“葬死殓家，遣女满车，富者欲过，贫者欲及。”《盐铁论·散不足》云：“今生不能致其爱敬，死以奢侈相高，虽无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币者，则称之为孝，显名立于世，光荣著于俗。”

正如林甘泉先生所言，“汉代墓葬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少墓葬力求复制和表现死者生前的生活样式。特别是一些富贵人家，不但墓葬的形制和布局要模仿地面上的居住建筑，而且死者的饮食、衣服、车马以及各种日常生活用品等等都要纳入墓中随葬。这种葬俗表明，在人们的观念中，‘送死’是‘养生’的延长。……对于富贵人家来说，‘送死’不仅是‘养生’的延长，而且是夸饰社会地位和财力的一种标志。”<sup>②</sup>这或许能说明刘建墓葬为何享有这么高规格、耗材一万五千多根柏木而提供一些线索。

可以说，“从西汉到东汉，丧赠的发展始终受着厚葬之风的影响。但丧赠发展的同时，也对厚葬之风的盛行起着助长作用。厚葬与丧赠之间就是这样存在着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发展进程”。<sup>③</sup>

①关于目前西汉诸侯王墓发掘数量，有这么几种说法：一种认为，目前考古发掘认定的西汉诸侯王陵墓总数达18国64座，空间的分布也相当的广泛，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南、河北、山东、湖南、北京等地区。（刘涛：《西汉诸侯王陵墓形制的演变》，载《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06年）；另一种则认为，据初步统计，现在我们已发现西汉时期诸侯王陵墓16国66座左右，分布于河北、河南、江苏、湖南、山东、北京等省市。（刘瑞：《西汉诸侯王陵墓制度三题》，载《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06年）

②孙波：《西汉诸侯王墓的发现和和研究》，载《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06年。

③李如森：《汉代丧葬制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85页。

④《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华书局，1992年校注本。

⑤《汉书》卷二《惠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

⑥《汉书》卷八《宣帝纪》。

⑦《新语·至德》，中华书局，1986年校注本。

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北京大葆台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97页。

⑨⑩《汉书》卷六十三《武五子传》。

⑪《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序》。

⑫刘瑞：《西汉诸侯王陵墓制度三题》，载于《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06年。

⑬《新书·大政上》，中华书局，2000年校注本。

⑭《汉书》卷六十四下《王褒传》。

⑮周谷城：《中国社会之结构》，新生命书局，1930年版，第45页。

⑯陈平：《“黄肠题凑”与“题凑”略论》，《中国文物报》2000年6月21日。

⑰《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中华书局，1975年。

⑱《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下》。

⑲刘侗：《帝京景物略·序》，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12月。

⑳林甘泉《“养生”与“送死”：汉代家庭的生活消费》，原载《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会议论文集，1997年7月；又收入《林甘泉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

㉑齐书深：《汉代丧赠刍议》，《求是学刊》1995年第2期。

（作者为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业务技术人员）

# 辽代康文成墓志再考

王玉亭

2002年3月13日,在北京海淀区增光路中国工运学院发现一砖室墓,经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清理,确定为辽墓,墓主为辽代官吏康文成。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海淀中国工运学院辽墓及其墓志》一文发表,执笔人为朱志刚先生。笔者所见《海淀中国工运学院辽墓及其墓志》(以下简称“海文”)载于《北京辽金文物研究》<sup>①</sup>,此文曾发于《北京文物与考古》第6辑(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海文”对康文成墓志进行了详细的考释,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信息,但对于康文成的职官、火葬等问题的分析与史实有一定的偏差,尚有商榷之必要。笔者不揣浅陋,试就此墓志的某些方面再作一番探讨,有不当处,恳请方家指教。

本文针对“海文”要论说的主要有两点,一是对康文成职官认识的问题;一是康文成死后在中京火葬是否为辽代“遗礼”的问题。

## 一、康文成职官的实职与虚衔问题分析

### 1、有关康文成的阶、散官问题的探讨

康文成墓志载其职官结衔为“如京使、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兼殿中侍御史、骁骑尉、东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依据相关专家、学者对辽朝官制的研究成果,可以明确康文成的这些结衔实际内涵,即:银青崇禄大夫是其阶,检校尚书右仆射是其散官,兼殿中侍御史是其兼官,骁骑尉是其勋,东平县开国男是其爵,食邑三百户是其食封。只有如京使才是其实授官,实在地说,康文成只是一个低级武官。“海文”在分析康文成职官时错将“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视为实授,并断言康文成为“相当于副宰相”一类的高官,显然是不合史实的,而且也无助于正确的认识辽朝职官制度。

关于辽朝职官的实授与虚衔,王曾瑜先生在他的《辽朝官员的实职与虚衔初探》<sup>②</sup>中论述得较为系统,详细,足为后学者借鉴。辽袭唐制,在官制上尤其如此。辽朝在官制上(南面系统)对于中原官制的借鉴是明显的,沿袭是有序的。依据王先生的分析,可以判定,辽朝将唐的散官作为“阶”来设置,将唐的检校官作为“散官”来设置。从众多史料来看,这种分析是合理的。

以往,关于散官、检校官的缘起和变革,专家、学者的论述很多,为论说方便,笔者在此只作一脉络式的叙说。

唐“安史之乱”后天下板荡,制度败坏,官制随之扰乱。“是时府库无蓄积,朝廷专以官爵赏功,诸将出征,皆给空名告身,自开府、特进、列卿、大将军,下至中郎、郎将,听临事注名。其后又听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异姓王者。……及清渠之败,复以官爵收散卒。

由是官爵轻而货重，大将军告身一通，才易一醉。凡应募入军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童仆衣金紫，称大官，而执贱役者。名器之滥，至是而极焉。”<sup>②</sup>可见职官滥授由乱而生。

散官、检校官的设置大概到了唐中期就已经很完备了。唐德宗兴元元年，适德宗播越，时陆贽有疏云：“……故国家命秩之制，有职事官，有散官，有勋官，有爵号，然掌务而授俸者，唯系职事之一官也，此所谓施实利而寓虚名者也。其勋、散、爵号三者所系，大抵止于服色、资荫而已……”。<sup>③</sup>“唐建中赦许带宪衔，遇赦加恩，踵为故事，有积阶至司徒、司空、仆射、太保者，甚为乡里之荣”<sup>④</sup>。北宋前期至元丰新制，官衔滥授仍然存在，所以《云麓漫钞》记云：“湖州有胡夫人墓志，载其夫履历，细考之，方知为衙前。今台州凡吏人妻必自称夫人，盖亦沿袭也。初遇赦，即带银、酒、监、武，银谓银青光禄大夫，酒谓检校国子祭酒，监谓监察御史，武谓武骑尉也。”（绍兴年间）“衡州人诉其乡人胡厚昌称官户，索出告命，乃其高祖再迁于乾德四年为衡州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监武如式。省部契勘云。元丰五年以前，官制未行时，衙校各带宪衔，止是吏职，不合理为官户，始立法云。”<sup>⑤</sup>

按照瞿蜕园先生的论说，光禄大夫（辽避讳称崇禄大夫）在汉“与谏大夫、太中大夫等同为掌论议之官，唐宋以后，始用作阶官之号”。在唐代，散官本是定班位的，“但至唐末已极‘贱滥’，高级之散官常为低级武人所得，与原意迥不相符。”<sup>⑥</sup>具体到辽康文成的“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就是这种“踵为故事”所致。

按目前发现的碑刻来观察，相对于唐末、五代、北宋，辽对于官员的阶、散官的滥授更甚。低级官吏获得极高结衔的现象比比皆是，甚至一些捐粟得官者、匠人都可以得到高的阶与散官。如辽张世卿“大安中，民谷不登……公进粟二千五百斛……皇上喜其忠赤，特授右班殿直，累覃至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国子监祭酒、兼监察御史、云骑尉。”<sup>⑦</sup>再如，《悯忠寺石函题名》中康日永的结衔为“右承制，银青崇禄大夫、兼监察御史、武骑尉”。其身份却是“故盖阁都作头”。其侄康敏的结衔亦为“右承制，银青崇禄大夫、兼监察御史、武骑尉”<sup>⑧</sup>，身份为“盖殿宝塔都作头”。即使如捐粟者、工作都作头都能有如此高的结衔，那康文成有“银青崇禄大夫”的高阶就不足为奇了。至于康文成的“检校尚书右仆射”，那只是散官。按照王曾瑜先生的分析，“检校尚书右仆射”为辽

朝十八种散官中的一种<sup>⑨</sup>。

正如张希清先生所说：唐代文武散官，仅表示一定的品级而无实际意义，其作用在于门荫、赎罪，开府仪同三司、特进有一定的俸禄，其他则无。“宋初承唐制，仍设文武散官，但连上述那点作用也没有了，只是决定服色。”<sup>⑩</sup>辽朝所设文武散官，其作用不会与北宋初有多大出入。

总之，辽朝的官制是极其复杂而诡秘的，在沿袭唐制的同时，对北宋的官制也有相当程度的借鉴，研究者尤其要注意。至于散官、阶、兼、勋中的“银酒监武”，都应视为虚衔，而不能当成实授。辽朝官员的散官、阶绝大多数不能对应实职，即散官、阶的高低与实职并不成正比。对于某位官吏众多的结衔，除了无实授（类似宋朝的无差遣）的“寄居官”和累授者外，一般只能确定一种为实授。康文成的实授为如京使。

## 2、关于职官“如京使”的分析

如京使，作为职官，唐代即有。《资治通鉴·唐纪六十三·唐文宗开成三年》<sup>⑪</sup>记有“如京使王少华”，胡注云：“唐置如京使，以武臣为之，内职也，未知所职何事。”《五代会要》记为“五坊如京使”<sup>⑫</sup>。《职官分纪》载有“如京使、副使”，且云：“五代有如京使，国朝因之。”<sup>⑬</sup>从其记述上看，宋初始擢文士任此职。《简明古代职官辞典》对其解释为：如京使一职，唐代“唐玄宗以御史充任太仓出纳使。五代取《诗·小雅·甫田》‘如砥如京’之意，改为‘如京使’。职务相当于仓监督。宋沿用为武臣例转之官。”<sup>⑭</sup>对此职，《宋史·职官志》缺少相关的详细记述，只是在合班、转迁中一现。在“武臣三班借职至节度使叙迁之制”里有记云：“如京使转庄宅使。有战功转东作坊使。”<sup>⑮</sup>政和二年，其阶易为武略大夫<sup>⑯</sup>。龚延明先生在其《宋代官制辞典》中对如京使的解释为：“北宋前期为诸司正使阶之一，位次于洛苑使，元丰新制，《元祐令》为正七品。”<sup>⑰</sup>

辽朝的如京使应是沿用唐、五代制度而来的，《辽史》虽无记载，但碑刻上时有出现。如《萧相公墓志》（重熙十三年前）中记萧相公之长子萧慎徽曾任职如京使。<sup>⑱</sup>从现有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如京使这一职官，辽宋虽同承唐制，但其区别却是明显的，大略如下：

(1) 宋的如京使为虚衔，元丰改制后为武官转资。而辽的如京使为实职，即为仓监官，推测其职掌同唐。

(2) 辽的如京使不只设置于一京。皇都重地仓廩众多（如赡国仓、省司二仓），应当有此官。

康文成所任为中京之如京使。其他三京很有可能亦有如京使设置。

如京使的品级在宋为“正七品”，辽之如京使应与宋略同，大约也在七品上下。

“海文”对如京使的理解存在着如下的偏差：

未将“如京使”当作职官来理解，而把“如京使”理解为“入京师做官”。且武断地认为“如京使”是错别字，甚至于认为这些错别字是“辽金胡地学习汉文化过程中产生并流行的一种半夹生的富于地域和民族特色的文辞用法。”

这种考证存在的缺欠有二：

一是没有充分考量到康文成本人及其家族为燕京汉人。能在契丹腹地担任七品上下官职的人，其文化修养定然是较高的。其文化修养从哪里来？合理的推断当然就是家教了。从康文成的家族墓地规模来看，这一家族是大族，在众多的族人中不会缺少识文断字者，哪能容许家人墓志里充斥着“辽金胡地”半夹生语呢？另外，燕京本来就是文风浓郁之地，对于家族人墓志历来重视，或请家人、好友懂文辞的撰写，或延学养高者操刀，在重要词句上不会出现大错。

二是忽视了辽末契丹腹地儒教风行、汉文化昌炽的历史事实。康文成故于辽咸雍七年，即公元1072年，此时的辽朝为道宗时期，已属辽末。大家都知道，儒家文化作为辽的统治思想而大行其道，至道宗时期尤甚，府学、州学、县学遍地皆是，即使是在辽东的医巫闾山发现文采飞扬的墓志铭也是数不胜数的。那种“辽金胡地”本来就应该出现“半夹生语”的认识是偏激的。

## 二、对于康文成的火葬问题的分析

康文成墓志记述云：其于“咸雍七年岁次辛亥当四月丙辰朔八日癸亥逝，往中京大定府镇国寺北街出廓火葬讫，迁神枢来于先祖坟茔……”这里对康文成的死时、火化地点以及埋葬地交代得很清楚。即：康死后，运往中京大定府镇国寺北街出廓火化，接着，选择适当的时间迁“神枢”（骨灰）往其燕京的祖坟左近埋葬。但“海文”在说及此事时却作出了一奇怪的判断，认为“辽之汉族高官卒于南京而须移梓辽中京大定府火葬，这是本墓志文告诉我们的一条辽代遗礼。”这种判断显然是有悖常理的。

辽朝的崇佛史有明载，佛教文化深入到社会的许多方面。受佛教火葬遗俗的影响，辽地上至高官，下至平民，亡后火化而葬已成习尚。辽朝

官员死后火葬的事例比比皆是，康文成死后火葬就是当时这种习尚的反映。当时，每一地人死后有依佛礼火葬者，就近举行仪式火化，这应当是常理。没有记载表明卒于南京的汉族高官死后均需“移梓辽中京大定府火葬”。辽地虽云崇佛，也绝不会有此“遗礼”。“海文”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判断，究其因，就是缘于对康文成“为官地”出现了判误。实际上康文成是在辽中京担当了中京的“如京使”。

至此，康文成的为官、死后处理等情况就已经很清楚了，现小结如下：

康文成本燕京宛平人，辗转至辽中京为官，官至七品上下的中京“如京使”，咸雍七年四月初八卒于中京，终年六十有二。死后就地在中京大定府镇国寺北街出廓火葬，火葬毕，将骨灰运往燕京祖茔安葬。康文成为某长兄，其有第三弟名“三哥”。

①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编《北京辽金文物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3月第一版

②⑩王曾瑜：《辽朝官员的实职与虚衔初探》，《文史》1992年第34辑。

③④⑫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6月第一版，第7023—7024页，第7418页、7935页。

⑤⑥宋·赵彦卫：《云麓漫钞》，中华书局1996年8月第一版，第38页，第38—39页。

⑦清·黄本骥《历代职官表》中瞿蜕园先生之《历代职官简释》，世纪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第51页。

⑧⑨⑪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4月第一版，第655页、463页、231页。

⑫张希清：《宋朝典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12月第一版，第73页。

⑬宋·王溥：《五代会要》，中华书局1998年11月第一版，第296页。

⑭宋·孙逢吉：《职官分纪》，中华书局1988年2月第一版，第820页。

⑮孙永都、孟昭星：《简明古代职官辞典》，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5月第一版，第128页。

⑯⑰元·脱脱：《宋史·职官九》，中华书局1977年11月第一版，第4026页、4056页。

⑱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中华书局，1997年4月第一版，第585页。

（作者为内蒙古赤峰巴林左旗政协文史委主任）



烧蓝珐琅器

# 珐琅器年代区分简述

阎萍 尚美华

珐琅器制作最早从阿拉伯传入我国。迄今所知，我国最早的一件器物应是目前藏于日本正仓院的唐代银胎掐丝珐琅镜。就我们目前能见到的、由我国自己制造的、具有本民族风格题材的珐琅制品，从元代开始。

## 一、珐琅器的种类及制作

珐琅器的制作是集冶金、铸造、绘画、窑业、雕、鏊、锤等多种工艺为一体的复合性工艺过程。珐琅釉料的主要原料是石英、长石、瓷土等，以纯碱、硼砂为助溶剂，用氧化钛、氧化锑、氟化物为乳化剂，以金属氧化物为着色剂，经过粉碎、混合、熔融、冷却后，再经过细磨制成珐琅粉。珐琅属硅酸盐类物质，烧结温度在800—1000℃左右。

珐琅器的品种是按照制作工艺来分的。主要有：

1、鏊胎珐琅。鏊是一种金属装饰工艺，多用于金器和银器的装饰。将这种工艺用于珐琅制作，更丰富了珐琅器的装饰。鏊胎珐琅是在金属胎上按图案设计要求描绘纹样轮廓线，然后运用雕鏊技术在轮廓线以外的空白处进行雕鏊减地，这样使纹样轮廓凸起。再在地子上点蓝焙烧，经过磨光镀金而成。鏊胎珐琅的特点是使主题纹饰更加突出。

2、锤胎珐琅。锤也是金属装饰方法，是从背面锤出起线、纹饰、图案，然后将凸出部分施珐琅釉料，下凹部分镀金。锤胎珐琅的特点是用珐琅釉料的颜色突出主题纹饰。

3、掐丝珐琅。掐丝珐琅又称“景泰蓝”。首先将铜板按图纸要求剪出各种不同形状，用铁锤敲打成各种形状的铜胎，再将各部位衔接处上好焊药，经高温焊接完成造型。然后掐丝。按照图样设计的要求，用片状铜丝按图样折曲掐掰成各种精美的图案花纹，再用白芨粘贴在器物上并焊

接，之后经酸洗、整丝做好上釉的准备。点蓝是制作过程最长的工序。用粗铁丝砸平尖端制成小铲，将各种釉料粉分别放入小碟中加水浸泡，用小铲盛起，以金属线条为界，在不同的部位填不同的釉料，再拿到窑内烧熔，如此反复三、四次施釉焙烧，将釉的厚度与花丝的宽度相一致，器身上只能见到美丽的釉色和精细的花丝图案了。接下来再用粗砂石、黄石、木炭分三次将凹凸不平的器表磨平，再补釉焙烧磨平，最后将花丝、器口线、器足线抛光磨净镀金，漂亮的珐琅器就完成了。古代珐琅器的制作工艺以手工为主，工序复杂，技术要求高；现代珐琅制作，制胎、打磨等工序使用机械，为降低成本使用的铜板也更加轻薄，镀金的金水也掺入了更多的非金金属，以至成为区别新老珐琅器的重要标志。

4、画珐琅器。画珐琅是先在红铜胎上施白色珐琅釉，入窑烧结，使器物表面平滑。然后以各种颜色的釉料绘饰图案，再经烧结而成。画珐琅器富有绘画的趣味，因此俗称“画珐琅”，因其技法传于海外，有区别于传统的中国瓷器，又称其为“洋瓷”。画珐琅的釉料颜色丰富多彩，色彩在绘画时控制准确，画面富有立体感，由于具有不掐丝的特点，可以随心所欲地表现中国画的内容题材，深受康、雍两代皇帝喜爱，故画珐琅器也以康雍时期最为精湛。

5、七宝烧。七宝烧是日本传统工艺，以金属为胎，外表施以石英为主体的各色釉料，再经烧制而成。七宝烧胎体轻薄，珐琅釉料细腻，光泽清亮，颜色艳丽，是世界珐琅器工艺种类中优秀的品种。

6、烧蓝。烧蓝是一种透明珐琅器。以银胎为主，俗称“银烧蓝”，少量铜胎。先在银胎上用篆刻和锤打出浅浮雕纹饰，再罩一层透明或半透明的珐琅釉，烧成后显露出胎体上的粗细纹饰，



掐丝珐琅器局部



画珐琅器碗

与蓝色为主的釉上下辉映，精致美丽。银烧蓝器物多为小件胭脂盒、粉盒、头簪等。

## 二、珐琅器的年代区分

鉴别珐琅器的年代，主要从观察颜色变化、同时期其它器物纹饰题材表现特点及造型特点入手。

1、元代珐琅器。目前所见的元代珐琅器为数不多。从造型上看，元代珐琅器的造型风格与同时代瓷器造型风格相同。如掐丝珐琅凤耳三环尊，器身中间的主体部分为元代掐丝珐琅罐，器物的

口、颈、耳、环、足均为后配。这种组配现象，在元、明两代器物上表现较多。尤其是元代器物，各部位原配的器物较少，基本上都出于后代风俗的要求而装配上其他零件。元代珐琅器在制作工艺上是单线掐丝，即只以一条铜线表现图案的轮廓，不像清代以后的双线掐丝。在纹饰题材的表现上，元代器物具有当时的时代风格特点。如缠枝莲的图案、花卉的叶子、花蕊、扁菊花、器物主体肩部的垂云装饰等等，都与元代瓷器上的绘画风格相一致。在有的颜色上，元代珐琅器也有着自己的特点。如紫色和墨绿色是透明色，这

是由于原料进口的缘故。这两种颜色在清代的珐琅器上是不透明的，正是这一点，明显地显示出同一器物上各部位的不同制作年代。元代的黄色为杏黄色，红色像鸡血一样浓艳，白色纯净鲜明洁白，蓝色湛蓝，器物中还使用了藕荷色，这种颜色在清代以后不再使用。珐琅器的颜色特征与当时使用的釉料有关，元代与清代相比差别较大，据此鉴别组合器各部位的年代也比较明朗。另外，元代珐琅器的花丝比较粗，是因为掐丝用的铜片厚；釉面出现较多的孔洞，是工艺制作上填料不实造成的缺陷，也成为鉴别元代掐丝珐琅的要点。元代珐琅器与元代瓷器一样，不写款识。

2、明代珐琅器。明代珐琅器有掐丝和鑲胎两种。据古文献记载，最早珐琅器多为宫廷妇女赏玩，以后受到皇家重视才逐渐登上大雅之堂。珐琅器的制作早年也只是由皇宫御用监负责管理烧造。现存的器物造型主要有炉、盏、瓶、盒、轴头、蜡台、尊等，用途比较广泛。

宣德时期的掐丝珐琅器，整体看上去图案纹饰比较活，做花丝用的铜片薄了一些，这使得掐丝较前朝的细，弯曲回折不拘一格。除具有本朝瓷器造型的风格外，釉料的颜色也有特性。这时的颜色，红、白、蓝色与前朝区别不大，



元代珐琅器

但黄色不如前朝鲜艳而变得发灰暗一些了。器物上的纹饰与边饰，与本朝瓷器的画法一样，具有宣德时期的一般特征。

具有景泰款识的掐丝珐琅器，其真正的年代确认目前尚不能十分明确，因为有许多器物上的款识是后加上去的，款与器物不同期，同为景泰款识的器物，其造型、釉色、图案风格各异，因此这类器物不能够作为标准物。

嘉靖年间的掐丝珐琅器，釉色对比强烈，图案风格粗犷豪放，与嘉靖时期的瓷器、漆器风格一致。但到目前为止，仅有一件民间征集的龙凤盘，盘底鎏金，盘正中镌刻“大明嘉靖年制”六字两行款，器物藏于故宫博物院。其它器物仅参照本朝瓷器、漆器分析鉴定。

万历年间的掐丝珐琅器，风格和特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器物的颜色除了继续以蓝色为地以外，还出现了以白色、绿色、赭色为地，或者两种颜色、三种颜色为地的现象。这时的珐琅色彩偏淡，流行使用大面积的暖色或中间色，这时的制作工艺，以双线掐丝技法的使用比较普遍，图案题材丰富，并且常有将“大明万历年造”款挖掉，换成“大明景泰年制”六字两行款，但挖改的痕迹比较明显。

区分明代珐琅器除上述几方面特点外，还可根据花卉、图案的画法、龙的画法来加以区别，这方面更多的可以参照同时期瓷器图案的画法及风格来认定。另外，凡后仿器物中的黄色釉料很难成功，鉴定时多对比原器的黄色，找出差别，这一点往往是鉴定时的重要观察点。明代器物胎体较清代厚重，造型仿古多，总体颜色深沉，掐丝粗，镀金厚，彩釉上大多有砂眼，看上去华贵中显现着粗犷，与清代的雍容精美有截然不同的风格。

3、清代珐琅器。与明代珐琅器宫中制作不同，清代珐琅器虽为皇家所用，但制作地点分为三处，即北京、广东、扬州。器物的种类和工艺都有了很大发展。由于工艺的提高，清代珐琅器胎薄、掐丝细，彩釉也比明代更加鲜艳，但不再有透明釉的出现，这一点也是我们鉴别清代与清以前器物的要点之一。清代珐琅器无砂眼，或者很小而且很少，花纹图案繁复多样，但表现不如明代生动活泼，图案格式化感很强。器物镀金部分的金水较明代薄，金色很漂亮。造型品种也更加多样，有典章用具，如屏风、宝座、角端、香筒、太平有象；取暖用品，如地炉、熏炉、手炉；宗教用具，如佛塔、坛城、宝相楼、梵华楼；生活用品，如壶、碗、盘、

筷子等；文房用具，如笔架、笔洗、水呈等；陵寝祭祀用品等，生前身后，无所不及。清代珐琅器，主要有几个时期特点明显。

康熙时期。此时的珐琅器中铸胎的器物分量很重，龙的样子接近万历风格，正面龙，面目苍老。釉色有的颜色较成熟，但有的蓝色发灰，不够鲜艳，重要的是，其中的紫色、绿色已经非常明显的不透明了，而且也不漂亮。

雍正时期。这时期的掐丝珐琅器数量不多，目前流传下来的器物，只有一件有款识的珐琅豆，在台湾收藏。雍正帝喜欢用墨色绘画，这与当时瓷器风格一样，在珐琅器的装饰艺术上喜欢采用画珐琅。在画珐琅中，带有黑色的画珐琅器尤其珍贵，雍正画珐琅器使用的黑色与瓷器一样不是纯黑色，而是黑中发褐色。

乾隆年间的珐琅器数量很多。以仿古造型的器物比较常见。这时的珐琅釉颜色中出现了一种粉色，这种粉色在瓷器装饰上也很流行，尤其在为国外订烧的瓷器上，经常出现。器物上的金色可谓灿烂辉煌。在掐丝工艺上，普遍采用双线掐丝法，并且出现了掐丝绘画相结合的装饰方法。在器型方面，与瓷器器型的时代风格相同，多见藏草壶、七珍八宝，还出现了一些珐琅与别类材质的组合器，如盆景、挂屏、桌面、插屏等。乾隆时期也有一部分画珐琅，尤其是西洋人物题材的多见，这种装饰方法常表现在粉盒、烟壶等之上。

嘉庆及其以后，由于政治经济多种原因，珐琅器的烧造呈萎缩局面。虽说少，质量还是比较精细的。

清末光绪民国时期，流传下来一些珐琅器。其特点是掐丝精细，釉面光滑，棕眼少，胎薄体轻。大型器物数量渐少，器物造型不拘一格，有的也与同时期的瓷器造型一致，如温酒器、长方盒、圆形粉盒、笔洗、碗、盘等。镀金也很亮，但金水比前期更加薄。民国制作珐琅器的作坊，以老天利、德兴成的质量上乘，器型工整，多仿古器造型或乾隆精品造型，款识多刻款。

珐琅器的制作工艺，从传入到现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成熟和创新过程，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的特种工艺。现代珐琅器颜色丰富，造型多样，精美但不古朴，表现了绚丽多彩的现代时尚。这种工艺品被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由于生产工艺复杂，材料的不可替代性，使得其价值较高，是收藏、馈赠的珍贵艺术品。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公司助理馆员)



# 唐代石景山刘总刻经考

陈 康

## 一、“燕都第一仙山”——石景山

石景山区得名是因为区境内西部有一座名为“石景”的山，本区界内的地形是西北高，东南低，它正好位于永定河冲击扇的轴心位置上。古时滔滔的河水自西夺口而出，一泄千里，势不可挡，但它流到石景山下时，因山的阻挡，只能绕山而行，千万年来河水的冲击，造成了石景山西崖壁立千仞的奇特景象。自永定河流过石景山之后，都是阡陌千里的平原了，再也没有大山的阻挡。

石景山的名字很多，又各有各的来历。有石经山、石井山、湿经山、石景山、石径山、骆驼山、“燕都第一仙山”、“小石经山”等等。其中以石经山名最为贴切，也最有来历。这是因为山之南麓凿有许多藏经的石洞而得名。《日下旧闻考》：“山有石经台、普观洞、普安洞、还原洞、孔雀洞……其地当石经台之阴，殆即藏经处也。”之后其音转为石景山：“出阜城门而西二十五里，曰石景山，山故石耳，无景也。”<sup>①</sup>又“小石经山”：在房山云居寺有辽刻石经《佛说菩萨本行经》，在经末题记：“《大方便佛报恩经》七卷，此三卷，共十卷，同佚，马鞍山洞已有镌刻，京西三十里小石经山

亦有，是卢沟河东垠上。”

“石经山”的名字，不仅因为山上如今还存有 不少藏经洞，而且山之西的南崖壁上还有古时镌刻的字，虽今已脱落，但隐约还可见“石经山”三字的痕迹。因此石经山的名字由来一定很久，而且是作为一个正式的名字使用了很长时间，甚至到了明代中期，此山还被称作石经山。1986年在石景山附近的黑头山出土了葬于明弘治元年（1488年）的新宁伯谭祐及其夫人柳氏的墓志，都有“葬于宛平县石经山先茔”的记载。

石经山之名源于唐代藏经，久而久之，“石经”音转为“石景”了，想来这种说法是比较可靠的。

## 二、诸洞之胜孔雀洞

石景山诸洞中以孔雀洞最大，也最为有名，孔雀洞在石景山上西侧绝顶凌空的“石经台”之下偏东位置，分为上下两洞，下洞在前，为一广2米，进深2米，高约2.5米的石洞，洞门迎面摩崖雕有一尊立佛，高约1米，面容圆润，丰满端丽，肉髻，螺发，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施与愿印，衣



纹皱褶线条流畅，极具唐代的风格，石室顶部中央凿有一凹进去的菱形天花，也具有唐代石窟的特点，立佛前左右两侧有二条弯曲的石阶直通上洞，上洞在后，基本呈长方形，广4.5米，深2米，高度在2~3米，洞顶是一整块布满凿印的岩石。洞门两侧的石柱，今已风化严重，字迹已不可辨。按《日下旧闻考》：“孔雀洞左右门上截题识曰：《佛本行集经》卷第三十一，幽州卢龙两节度使刘相公敬造，元和十四年（819年）四月八日建，下截刊佛经语。其地当石经台之阳（原文为‘阴’，当误。因孔雀洞在山之南），殆即藏经处也。”<sup>②</sup>洞中南壁上凿有三个并排的佛龛，作壶门状，中间一龛略大，龛中三佛早已遗失了，孔雀洞洞顶崖上草丛中还雕有一只逼水兽，面目狰狞，兽嘴大张，看来这是工匠们在当年开洞时为了解决下雨时藏经洞渗水而开凿的一条排水道，巧妙地利用山石雕成了一只猛兽的模样，当大雨来时水可从逼水兽口中喷出，蔚为壮观。

从《日下旧闻考》的记载看，至少有五点说得十分明确。

(1) 洞名为“孔雀”。“孔雀”之名在佛教用词中常能见到，梵文名“摩由罗”(mayura)，《涅槃经》三十四曰：“自有众生，非因父母而得生长，譬如孔雀闻雷震声而便得身。”以“孔雀”为洞名源起古印度孔雀王朝孔雀王，意为孔雀王保存的藏经万代永存。

(2) 孔雀洞确为贮经之用。洞中贮藏的是什么经呢？洞门题记是《佛本行集经》卷第三十一，但所刻经版是否就刊刻了第三十一卷呢？题记说得非常含混，没有交待清楚。

(3) 刻经人为幽州卢龙两节度使刘相公。刘相公，按题记所刻年代“元和十四年”当是于唐宪宗元和五年至穆宗长庆元年（810—821年）幽州卢龙节度使刘总在任时，因此题记所说的刘相公乃是刘总。

(4) 时间明确，为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四月八日，元和十四年乃公元819年，距今已有1189年了，农历四月初八日正是佛祖释迦牟尼诞生之日，佛教所立的浴佛节。刘总在佛诞日刻经不是偶然的，而是精心挑选的时间。

(5) 位置明确。孔雀洞在石经山的下方偏西。至今上下两洞仍保存十分完好。

### 三、孔雀洞藏的《佛本行集经》

《佛本行集经》是在本缘部佛经内，《大正藏》

中共收录了167部佛经，都是讲佛本生、佛本行和因缘譬喻的故事，佛说形式源自古印度诗人马鸣，他以诗歌、故事的形式讲解佛陀一生的事迹，巧妙地把释迦牟尼生平传说和佛教教理结合在一起，一般称为“八相成道”，语言深入浅出，对佛教的传播和普及有着很大的影响。汉译本有两种：

(1)（北凉）昙无讖译本，有五卷本。

(2)（南朝·宋）宝云《佛本行赞传》七卷本。

主要有《修行本起经》、《太子瑞应本起经》、《普曜经》、《过去现在因果经》、《众许摩合帝经》等。

《佛本行集经》的梵文名曰 abhini shramanasutra，共60卷，由六十品组成，为隋代时僧人阇那崛多译经。这是一部通过神话传说来叙述佛陀及其主要弟子前生、今生、传道三期的活动传记，此经“详悉佛一代化迹之本纪也”，经末记，或问曰：“当何名此经，答曰：摩诃僧祇师，名为大事；萨婆多师，名此经为大庄严；迦叶维师，名为佛生因缘；昙无德师，名为释迦牟尼佛本行；弥沙塞师，名为尼藏根本。”

“佛本行”意为：佛一生的行事，因为本生、因缘故事与本行故事这两者是有区别的，本生写佛的前生，属赞佛的文学题材，而本行则是写今世，讲佛传（佛经中专门讲解迦牟尼一生经历故事的，称为佛传）的文学，也就是本行，故曰《佛本行集经》。

### 四、唐代的刻经始自石景山

北京的史学界一般认为佛教传入幽州始自西晋，石景山上最早的寺庙乃金阁寺，即建于西晋。但幽州佛教的鼎盛期是在隋唐时出现的，开始了大兴寺院和大规模的刻经活动。

幽州地区大规模的刻经发起人是静琬（？—639年），关于静琬的相关资料非常缺乏。他是天台宗三祖慧思的徒弟，隋时幽州智泉寺僧人。静琬是何时来到幽州的？入智泉寺之前在何处活动？又是何时入智泉寺为僧？这一切时至今日我们仍不清楚。唐高宗永徽年间（650—655年）吏部尚书唐临云：“幽州沙门释智苑（即静琬）精练有学识，隋大业中发心造石经藏之，以备法灭，既而于幽州北山凿岩为石室，即磨四壁而以写经，又取方石别更磨写，藏诸室内，每一室满，即以石塞门，用铁锢之……”<sup>③</sup>静琬当时是受到了唐邕刻经的影响，但唐邕刻经是因为“缣细有坏，简策非久，金牒难求，皮纸易灭”，故刻石经。而静琬创碑版刻经，却是意在“此经为未来佛法难时，拟充经本，



孔雀洞

世若有经，愿勿辄开”。可见云居寺石经山雷音洞门左壁的静琬题记，按刘侗的另一种说法：“北齐南岳慧思大师，虑东土藏教有毁灭时，发愿刻石藏，闕封岩壑中，以度人劫。岳坐下静琬法师，承师付嘱，自隋大业，迄唐贞观，《大涅槃经》成。”<sup>④</sup> 近来有人指出：隋大业初静琬刻经最初是从石景山发轫的，他在幽州云游时发现京西的这座小山山形特立，有一种灵气，且山上有先人所凿石室，故萌生了在此刻经的想法。这个提法得到了证实，2006年首钢公司在清理古时坍塌的山石时，在孔雀洞的东南下方又发现了一个“本来洞”。此洞无载，洞中有一尊明代的造像，但近日笔者与吴梦麟先生发现在本来洞佛龕的上方有一段被明代人开凿时破坏的题记，题记上有“神□□年”的年款。历史上北魏有孝明帝神龟（518—520年）、唐代有武则天神功（697年）、中宗神龙（705—707年）的年号。说明石景山上很可能在唐以前就凿有石室。隋《图经》：“智泉寺僧静琬见白带山有石室，遂发心书经十二部刊石为碑。”其景与此如出一辙。

但静琬在刻经中发现：石景山的山体体量不大，而且是由易于风化的石灰岩构成。刻经、藏经的条件都不理想。此后才转到云居寺白带山继



孔雀洞唐代石佛

续刻经。静琬对刻经并没有一个总体的构想，既没有预先编排刻经的目次，也没有从经卷入手，按计划开刻，而是从卷帙浩繁的经卷中选出他认为重要的经典刊刻。云居寺石经有贞观二年（626年）的题刻：“静琬为护正[法]，率己门徒知识及好[施檀]越，就此山顶刊《华严[经]等]一十二部”<sup>⑤</sup>，在白带山刻经的计划是12部，但自隋大业至唐贞观（605—649年）三、四十年间他主持刻经也仅刻了《华严经》、《法华经》、《佛遗教经》、《无量寿经》、《弥勒上生经》等几部，便过世了。静琬之后刻经活动仍然继续不辍，“（静琬）以贞观十三年（639年）奄化归真，门人（玄）导公继焉，导公没，有（僧）仪公继焉，仪公没，有（惠）暹公继焉，暹公没，有（玄）法公继焉，自琬至法，凡五代焉，不绝其志”。<sup>⑥</sup>

幽州唐代刻经首要目的还不是以藏为主，按佛教的经典经、律、论来说，刻经内容是以“经”为主，律、论两方面多未涉及，因为经是佛说，为了普及佛教，所以首先刻的是“经”。笔者认为房山唐代刻经应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僧人从石景山到白带山遍寻刻经场所，最终选定了白带山，而后白带山、石景山、

马鞍山成为幽州三个主要藏经之地。

第二个时期最初是静琬,其后在慧暹、玄导时,幽州刻经之举传到长安,使玄宗第八妹金仙公主大为感动,房山云居寺石经山第七洞上山顶有金仙公主塔,塔背记开元十八年(730年)公主特将御赐新旧译经四千余卷,封长安崇福寺沙门,《开元释教录》的作者智升为送经使,专程护送到幽州,作为幽州刻经的底本。<sup>①</sup>大大激发了僧人刻经的热情,但这样大规模的刻经如果没有幽州政府支持是不可能进行的。

第三个时期是幽州地方政府全面主持刻经。刘济在贞元二年(782年)任幽州卢龙节度使后,促进了幽州文化的大发展。他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在幽州设置州学,发展儒学教育,还舍宅建寺,<sup>②</sup>今宣武区白纸坊的崇效寺乃是他当年的旧邸。刘济在任期间亲自主持了房山云居寺刻经,这期间他刻了《法华经》及一部分《大般若经》,元和四年(809年)在他撰的《涿鹿山石经堂记》中云:“济遂以俸钱,奉为圣上(唐宪宗),刊造《大般若经》,以今年四月功就,亲自率励,与道俗齐会于石经峰下……万人齐力,岩壑动,鸾凤翔,或推之、或挽之,以跻于上方,緘于石室。”此碑久已佚,不知去向,石景山上旧有唐元和四年碑,是否与此碑有关呢?

## 五、刘总与幽州刻经

刘总与幽州刻经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刘总要刻《佛本行集经》呢?有唐一代,历任幽州卢龙两节度使的有36位,其中刘姓的是6人,只有刘怱、刘济、刘总三人为祖、父、子三代关系,他们三人从唐德宗贞元二年至唐穆宗长庆元年(786—821年)统治幽州长达36年,其中,刘怱任节度使仅三月而亡,以刘济统治幽州时间最长,但他在任时与《佛本行集经》的题记“元和十四年”的时间不符。“宪宗元和五年(810年)秋七月乙卯,幽州节度使刘济为其子总鸩死”<sup>③</sup>其子即刘总,此事发生在元和五年七月,刘济奉诏讨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使长子“緄假为副使,领留务。时总为瀛州刺史,济署为行营都兵马使,屯军饶阳,师久无功,总潜伺其隙,与判官张、孔目官成国宝及帐内小将为谋,使诈自京至,曰:‘朝廷以相公逗留不进,除副大使为节度使矣。’明日,又使人曰:‘副大使旌节已到太原。’又使人走而呼曰:‘旌节过代州。’举军惊恐。济惊惶愤怒,不知所为,因杀主兵大将数十人及与緄素厚者,乃追緄,以

张玘兄皋代知留务。济自朝至日晷不食,渴索饮,总因置毒而进之,济死,緄行至涿州,总矫以父命杖杀之,总遂领军务。”<sup>④</sup>“元和五年九月壬戌以瀛州刺史刘总起复受幽州长史,充幽州卢龙节度使。”<sup>⑤</sup>

刘总是“长庆元年二月己卯幽州节度使刘总奏请去位落发为僧”的,他在穆宗长庆元年(821年)舍宅,上表请辞官出家,穆宗“遣中使赐寺额曰:报恩……赐号‘大觉’”<sup>⑥</sup>赐僧腊五十。从刘总在任的时间看,前期他鸩父弑兄夺位,与朝廷对抗,统治幽州9年,几成分裂,后期于元和十三年(818年)刘总归顺朝廷,翌年在石景山上刻经,两年后他辞官出家,这是他一生经历的重大转折。

刘总与唐代幽州刻经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在房山云居寺找到了答案:

(1)《白带山志》卷四“碑碣”:刘总造《佛本行集经》并题名。存。正书。元和十四年在小西天。

(2)严可均撰《铁桥金石跋》卷三:《佛本行集经》元和十四年四月八日。碑额题幽州卢龙两节度使刘相公者刘总也,总弑父兄,晚年父兄为祟,乃削发为僧,其刻《佛本行集经》当有数十石,今仅存卷三十一之一石,已断为三。

(3)据赵之谦撰《补寰宇访碑录》卷三:孔雀洞《佛本行集经》并题名。正书。刘总造。元和十四年。直隶房山。



石景山上金阁寺碑亭

(4) 卢汉、刘声木撰《续补寰宇访碑录》卷十三：孔雀洞《佛本行集经》碑阴。正书。刘总造。元和十四年四月八日，碑阴已见赵录，直隶宛平。

有人说刘总刻经与灭佛有关，历史上确有“三武一宗灭佛”之事，其中唐代灭佛是在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发生的，此次灭佛虽然时间不长，仅一年，但影响极大，当年武宗下旨在全国废除佛教，并省天下佛寺4600所，蓝若4万，勒令僧尼还俗达26万众。会昌灭佛使几百年来流传的佛教经籍焚毁，佛教受到了极大的抑制。但刘总刻经的时间是在元和十四年，早于会昌灭佛26年，他刻经的初衷应该说与灭佛无关，而且在会昌灭佛之前。唐代的佛教盛行，太宗朝(596—664年)玄奘西行求法，使佛教风靡两京，武则天执政后更把佛教地位提升到道教之上，甚至把自己面容在洛阳龙门雕作“卢舍那”佛的形象，她之后的历代皇帝都大力提倡佛教，直到武宗会昌灭佛止。

## 六、从白带山刻经到石景山藏经

隋唐在白带山刻了多少部经呢？房山云居寺的唐代刻经藏于白带山各洞，上下有九个藏经洞，辽圣宗太平七年(1027年)涿州知州韩绍芳按藏经洞唐代所存经版验名清点，计有《正法念经》一部、《大涅槃经》一部、《大法华经》一部和《大般若经》一部，共计四部，距静琬发愿刻十二部经相差很多，按记载其中应有孔雀洞，却不知洞在何处，也未见《佛本行集经》刻石。但在距石经山数十里外的石景山上却有刘总藏经的孔雀洞，似乎已经回答了云居寺藏经之谜和刘总与幽州刻经活动的关系了。

隋唐在白带山刻了多少部经呢？我理解隋唐时白带山是幽州刻经之所在，整个唐代房山的刻经一直没有中断，“安史之乱”时幽州是主要的战乱之地，但在《大般若经》第一九五至二一四卷的题记中有安禄山的“圣武”、史思明的“顺天”、史朝义的“显圣”、朱泚的“应天”等年号，说明房山刻经即使在如此战乱的时期，也并没有停止，后期总领幽州整个地区的刻经事业的历任幽州卢龙节度使都大力支持，出现了一个新的小高潮。房山刻经事业贯穿了整个隋唐300余年。开元之后一直由幽州政府大力支持，有几个理由：

(1) 在唐代白带山刻经、藏经与石景山藏经有一定的关系。在云居寺辽刻《佛说菩萨本行经》三卷“欲帙经末题记：《大方便佛报恩经》七卷，此三卷，共十卷，同帙，马鞍山洞里已有鐫刻，

京西三十里小石经山亦有，是卢沟河东垠上”。很可能石景山上的孔雀洞实乃云居寺所说的孔雀洞，此洞今宛在。

(2) 白带山刻经与石景山藏经应视为一个整体。从刘济在任和继任刘总大力支持刻经，到刘总之后，有史料证明幽州历任节度使仍对刻经采取的是积极支持的态度，即使在武宗灭佛之后，幽州的节度使仍“不毁拆佛寺，不条疏僧尼，佛法之事一切不动之”。

幽州刻经是有计划、有统一的安排，石经是在白带山上刻的，分贮于白带山、马鞍山和石景山。静琬仅是幽州刻经的发起人，而刘济、刘总则是唐代幽州整个刻经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之一，其中《佛本行集经》为刘总所刻。

近来有人提出按孔雀洞中立佛手印所指，有可能经版仍藏于洞中的地下<sup>③</sup>。我看此论未必恰当，因为刘总刻经与静琬刻经的时代不同、环境不同，他们的地位不同，静琬仅是一个僧人，他刻经完全是出于自发，而刘总是幽州卢龙的节度使，地方军政长官，刻经受到官方的保护。更重要的是心态不同，静琬刻经是在北周武帝灭佛后不久，他为保佛经无虞，而发心刻经，刘总刻经却是在武宗灭佛之前。翟连学先生从刘总对鸩死其父的禽兽行径反躬自省入手，认为刘总刻经是一种内心忏悔的表现。实际上如果刻经是幽州政府统一组织的，那么他刻经应该和内心斗争无关，但他精心挑选刻的是一部《佛本行集经》，倒是可以表其心迹的。也可能这是他思想转变的一个转折点。

## 七、云居寺失经与石经山刻经流失

遗憾的是今日石景山上已看不到一块经版了，这与云居寺藏经相比是不能并提的，现在石景山上仅有一些藏经洞存在，加上近年在石景山整治过程中又有新的发现，洞数在不断增加，但石景山上在唐代究竟有多少藏经，这些经版又是如何被毁、何时流失的，现还查无实证，联系到千余年来房山云居寺失经情况，两者之间是否有共同之处，云居寺失经我们能查到的有：

(1) 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云居寺主持擅达曾掘开压经塔，盗卖石经。

(2) 从目前海外收藏家所藏石经来看，建国之前确有些刻经流失于海内外，日本的松本文三郎就藏有唐刻《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四七五卷的残石一方。

(3) 辽宁旅顺博物馆藏有云居寺残经石12块。

在这些流失的刻经中，最重要的是藏于旅顺博物馆中唐贞观八年(634年)静琬刻经题记的下半截：“此经为未来佛难时，拟充经本，世若有经，愿勿辄开。”静琬的题记说得非常明确，房山刻经是为了将来如果再有法难时，可以启洞，将经版作为再刻经本的根据，但如果世上还有经存在的话，希望不要随便打开。巧的是20世纪50年代云居寺在整理石经时，于石经山上发现了静琬刻经题记的上半截，才得以合为一个整体。

(4)清代金石大家叶昌炽著《语石》中有“厂肆往拓者，日携一、二残石至都，视之皆隋唐经也，恐损失者已不少矣”。这里叶昌炽提供了这样一个信息，在清末民初时北京的社会上已经在流传着一些来路不明的唐代刻经残石，可想而知当时无论是在云居寺还是在石景山都可能有一部分石经残石流散到社会上一些不法分子的手中。叶昌炽当时已怀疑到北京隋唐刻经流失的严重性，“厂肆往拓者”一定是往来很频繁的，可见这些人也不在少数，流失的隋唐刻经更是不在少数。我们并不是说这些流失的石经都是云居寺的，从历史的记载来看，石景山上唐代刻经很早就已流失了，那么在这些失经中哪些是云居寺的，哪些又是石景山的，现在还不好说，好在云居寺的刻经都已记载在案，总数有多少，缺失有多少，还是可以查出来的。但石景山上究竟有过多少刻经，刻经毁于何时，以及有多少流失了，流失的原因何在，流失的去向是哪里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的。

所以唐代时所刻的《佛本行集经》，当时应是藏于孔雀洞中的，孔雀洞在石景山，而不在白带山。刘总刻的《佛本行集经》有60卷，大约要刻百余石，随着岁月的流逝，又遇到会昌法难，经版也屡经劫难，大量遗失和人为砸碎。事实证明早在明代以前经版已不存了，石景山上明代许用宾撰《重修净土寺添置田亩碑记》：“金阁寺自晋唐以来所藏石经碎而言断，岩穴鲜有存焉。”晋唐的石经日久破碎，到严可均作《铁桥金石跋》时，他所见到的仅是剩余的卷三十一之一石，而且此石也已断为三截了，再后清乾隆时赵怀玉《游西山记》一书中记载：“石景山西岩有残石经数版，嵌崖间，其可辨识者《佛本行集经》卷第三十一。”可见晚至明清时在山上尤可见到石经残石，但大多已模糊不清了。且刻经也早已不在孔雀洞了。

赵怀玉的这段短文有三点值得注意：

(1)山之西崖上镶嵌着数块残损的经版，可见石经早已遗失或被人挪作他用，而将残损的经版

遗弃了，更有有心之人在收拾后将残石嵌在山崖间，以防再失。

(2)这些经版在赵怀玉见到时，也因已年代久远了，字迹模糊，其中还能辨识的只有《佛本行集经》的第三十一卷的一石了。

(3)可见在石景山上诸洞藏经还有多种，不止《佛本行集经》一部。

## 后 记

石景山上藏经之事，历来为史学家所重视，但苦于资料不足，还有诸多疑问。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探讨石景山上唐代刻经，其起点要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

(1)石景山的刻经应与白带山刻经统一研究。

(2)刘总所刻的《佛本行集经》应是全部，就是说有60卷，刻石在百方之数。

(3)孔雀洞所藏《佛本行集经》应在刘总在任时，而遗石刻经之卷三十一及题记的刻石石柱都可能是后人所为。

(4)石景山刻经藏经应始于隋而终于唐代，唐代以后房山白带山的刻经已与石景山无关了。

以上的想法还不成熟，还望方家指正。

①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之六“西山上”，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12月，第280页。

②于敏中、英廉：《日下旧闻考》卷一百四“郊坰”引“燕山记游”，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5月，第1726—1727页。

③唐临：《冥报记》。

④《帝京景物略》卷之八“畿辅名迹”，第348页。

⑤《贞观二年静琬题刻》，载《房山石经题记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8月，第1页。

⑥(辽)赵遵仁：《续铸成就四大部经成就碑记》，现藏云居寺。

⑦《山顶石浮图后记》，载《房山石经题记汇编》，第11—12页。

⑧《元一统志》卷一“崇孝寺”。

⑨《旧唐书·宪宗纪上》，中华书局，1975年5月，第431页。

⑩《旧唐书·刘总传》，第3902页。

⑪《旧唐书·宪宗纪上》，第432页。

⑫《旧唐书·穆宗纪》，第488页。

⑬金宝岩：《石景山藏经洞寻踪》，石景山区文委《石景山文物》1辑。

(作者为石景山区文管所干部)

# 通州残碑考

房昊

2006年7月，笔者随辽金城垣博物馆元代遗址遗迹调查小组出外调研，在通州区博物馆门前发现了一块名为《通州创建更漏记》的残碑。在结合碑文查阅有关历史文献资料后，谨将考察和阅读所得撰写此文，求教于方家。

## 一、残碑形制及年代考订

此碑为汉白玉质。碑已残，残高80厘米，宽80厘米，厚14厘米。碑阳正文楷体16行，320字。碑额“更漏记”，碑首题“通州创建更漏记”。碑阴正文17行，立石年款字迹已模糊不清。

碑文如下  
(碑阳)

### 通州创建更漏记

明时刻以定晨昏正钟鼓以警视听此为政之当□  
邑犹然况通州处水陆之要津为京师之东□者□  
早晚击柝者乱其节次朝列大夫永平张侯时中来□  
有持是器来通州者右铜精制侯乃与僚佐定议□  
□互考定数月而成至元丙子暮春十有九日置□  
四曰天池次曰平次曰准置于木架架下设小铜□  
准也最下一壶曰水海漏筹着于中影仪立其下□  
之增减正其序也较之影仪若合符节明漏者以之□  
藉补尉吏以候骏春秋朝暮岂有毫厘之悖哉谨其□  
政周官设挈壶氏之职后汉洛下关等经庆之而□  
几百四十兮书夜凡百刻以置于更筹之上实右今□  
□行然非张侯之用心僚佐之协替则何以创建更□  
□所举可谓知大体矣昔苏轼为钱塘守有天使自□  
□惟许州守令心颇奇之轼曰何也使者曰□头□  
□张侯其有见积业乎既□州之耆老留德记□  
(碑阴)

兼 鲁

通州事

尉 大都路同知通州语  
校尉大都路通州 钟  
吏相 世英  
敦武

仕郎 都 达鲁花赤  
进义副尉大都路潞县

将仕  
更漏一应  
天池

壶一  
水 一十

盛水桶  
倒水槛  
影仪



《通州创建更漏记》碑文拓片

在碑刻阴面主要列出了地方官员的职务与姓名，虽然只有寥寥数字，依然揭示了此碑应立于元代。主要理由有二：

一是职官名称中有“大都路同知通州”。

《大元一统志》辑本卷一中称：“至元四年建大都城。”而“路”是元代在中书省和行省以下的行政区划，路下为府（院）、州、县。关于大都路的建置沿革，《元史》载：“大都路，唐幽州范阳郡。辽改燕京。金迁都，为大兴府。元太祖十年，克燕，初为燕京路，总管大兴府。太宗七年，置版籍。世祖至元元年，中书省臣言：‘开平府阙庭所在，加号上都，燕京分立省部，亦乞正名。’遂改中都，其大兴府仍旧。四年，始于中都之东北置今城而迁都焉。九年，改大都。十九年，置留守司。二十一年，置大都路总管府。户一十四万七千五百九十，口四十万一千三百五十。（用至元七年抄籍数。）领院二、县六、州十。州领十六县。”<sup>①</sup>

可见，“大都”之名始于元世祖至元九年，而通州为大都路所辖十州之一。通州在唐代称潞县，

金时改通州，取漕运通济之意，下辖潞县、三河两县。

至于“同知”，在元代是常见的职官：“……路设总管府，有达鲁花赤、总管，是为长官；有同知、治中、判官、推官，是为正官；还有总领六曹、职掌案牍的首领官。府有达鲁花赤、知府或府尹；有同知、判官、推官；有知事等。有的府隶诸路，也有的直接隶于行省；有的统州县，也有的不统州县。州有达鲁花赤、州尹或知州，以及同知、判官等官。有的州直隶于路或行省，有的州不统县。”<sup>②</sup>碑文中“大都路同知通州”之名，与上述文献相符。

第二个显著标志是元代特有官职“达鲁花赤”的出现。

达鲁花赤，蒙古和元朝的官名，为所在地方、军队和官衙的最大监治长官。蒙古语 daruqachi（镇守者）的音译，相当于突厥语的巴思哈（basqaq）。早在成吉思汗时期，蒙古就设有这一官职。蒙古贵族征服许多其他民族和国家，无力单独进行统治，便委付当地统治阶级人物治理，派出达鲁花赤监临，位于当地官员之上，掌握最后裁定的权力，以保障蒙古大汗和贵族的统治。

入元以后，路、府、州、县和录事司等各级地方政府，都设置达鲁花赤，虽然品秩与路总管、府州县令尹相同，但实权大于这些官员。

至元二年（1265年），元廷正式规定，各路达鲁花赤由蒙古人充任，总管由汉人、同知由回回人充当。之后，汉人作达鲁花赤的，便解除官职。在缺少蒙古人时，允许由“有根脚”（门第高贵）的色目人充任。

碑中提到的达鲁花赤应该是州一级的地方官员，与通州潞县同知应属上下级关系。

基于以上两点，立碑者的身份可以被确定为元代官吏，则此碑的建立时间应为元代无疑。至于此碑具体在何时创建，通过进一步考订碑文，笔者认为，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是比较可靠的立碑时间。

由于碑中关于立碑确切年份部分的字迹已经风化，辨别不清，只能从碑文中残存的文字中寻找答案。残碑阳面中提到的“至元丙子暮春十有九日置”，提供了重要的信息。若更漏的创建时间是至元丙子年的暮春时分，那么立碑理应也在此时或稍晚。这里的元代年号“至元”相当关键，只要查看“丙子”对应的年份就不难推出其年代了。

巧合的是，在元代年表中“至元丙子”出现了两次，前后相差了60年。一次是在元世祖忽必烈的至元十三年（1276年），另一次是在元惠宗（顺帝）妥懽帖睦尔的至元二年（1336年），究竟是

哪一个至元丙子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该明确学术界关于至元年号的叙述方式。这两个至元年号因为间隔较长而少有并提，即使偶然出现，《元史》、《析津志》等古代史籍中记叙沿革、变迁时，采用的是自前而后顺序叙述的方式，孰先孰后一目了然，不必特别界定；而现当代的学者们，不仅可以在年号前加庙号，采用“世祖至元”、“惠宗（顺帝）至元”的方式来区分，更有公元纪年的辅助标注，可以做到准确无误。

但这些方法并不适合来考订残碑中所提到的“至元”。此碑为志事类，记载的是更漏创建一事，是个短暂的过程，无渊源可溯，无后续可查；当时的人们，当然也不可能知道公元纪年的方法。

幸而尚有其它元碑遗存的纪年方式可为参照。元世祖的至元在其时是独一无二的，自然不会想到区分的问题。而元惠宗年间的至元碑刻，理应与之前的年号分别开来。

现存于密云碑林的《重修夫子庙》碑，因为是“重建”，在追叙既往时如此行文：“……孔子庙毁于金季兵。至元廿八年，知州杨琏等，割俸缙即□□东市民宅为堂三楹两庑四楹以栖圣贤，□今五十载，□以隳圯椽。至元元年，……巡院使仁王延圣营缮司今……慨然以修□自□退而谋诸路州。”这里的“金季、至元廿八年、五十载、至元元年”是个完整的时间链条，说明夫子庙的重建是在惠宗至元无疑。其立碑时间为“至元四年后戊寅十月”，其中的“后”字耐人寻味。惠宗至元四年与“戊寅”是相对应的，并无歧义，倘若不是特意用来与前一个至元年号区别，很难找到贴切的解释。

无独有偶，现存于昌平八角公园内的《创建石桥之记》碑在内容当中采取了“至元后丙子十有一月”的说法，明确提出了“后丙子”。考虑到确实存在两个“至元丙子”——这正是所要考证的内容，这个“后”字的意义就更加明晰了。此碑立于至元四年，其中所录官员多为大都路所属，诚如前文所述，“大都”之名始于世祖至元九年，这有效地界定了立碑的至元四年是惠宗至元，也就是后至元。

由此，笔者认为，在元代碑刻中，存在着“后至元”自觉区分于“前至元”的默契。而且并不拘定于碑的正文还是文尾落款，当容易发生混淆时，便会加诸“后”字，以定名分。通州残碑仅叙一事，丙子年又是前后至元所共有，如果是后至元，理应在“至元”年号前加一“后”字，既无，便基本排

除了后至元丙子的可能性。据此推断,《通州创建更漏记》碑极有可能立于前至元十三年(1276年)。

## 二、残碑内容考订

从碑文上看,残碑主要记载了通州当时地方官在城中鼓楼上修建更漏的事迹。碑中所述关于当时制作更漏所用材料的文字十分特别,现据文字记载和实物遗存,对更漏的基本形制、原理和发展脉络作一简要介绍。

“更漏”就是铜壶滴漏,亦称“漏壶”、“刻漏”、“滴漏”等,即是中国古代发明的最为常见和重要的记时水钟之一。

### 1、基本原理

铜壶滴漏主要是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漏壶,二是漏刻。漏壶滴水计算时间,漏刻将时间显示在浮箭刻度上。其计时方法也很科学,通常是采用“百刻计时制”,也就是说,在浮箭上刻了100个刻度,将一天划分为100刻。采用平均分配的方法。将100刻先分配给12个时辰,每一个时辰可得8大刻,12个时辰共96刻。再把余下的4刻按每刻平均分成6小刻,共24小刻,再把这24小刻平均分配到12个时辰中,每个时辰就得到了8大刻2小刻。这样,不但使各个时辰所包含的刻度相同,而且使12个时辰的总刻度又恰好等于100刻,使刻漏方法和时辰的方法融合在一起了。

### 2、历史发展及形制变化

根据史书记载,周代时已有漏壶,到春秋时期,漏壶的使用已相当普遍。在《隋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早在昔黄帝创观漏水,制器取则,以分昼夜。其后因以命官,《周礼》挈壶氏则其职也。”<sup>③</sup>这里的“挈壶氏”就是掌管漏壶的官员,漏壶在当时白天作为军中的炊具,夜中击壶代柝,又有“孔壶为漏”的说法,说明当时的漏壶具有多种功用。

初期的漏壶只有一只壶,人们在壶中装上一枝有刻度的木箭。当水从壶底的小孔漏出时,壶中水位下降,木箭会随之下沉,观测刻箭上的水位,便知道是什么时间了。显而易见,单只泄水型或受水型漏壶结构简单,使用方便。但水流速度与壶中水的多少有关,随着壶中水的减少,流水速度也在变慢,直接影响到计时的稳定性和精确度。后来人们在漏水壶上另加一只漏水壶,用上面流出的水

来补充下面壶的水量,就可以提高下面壶流水的稳定性,这就是补给壶。在补给壶之上再加补给壶,形成了多级漏壶的计时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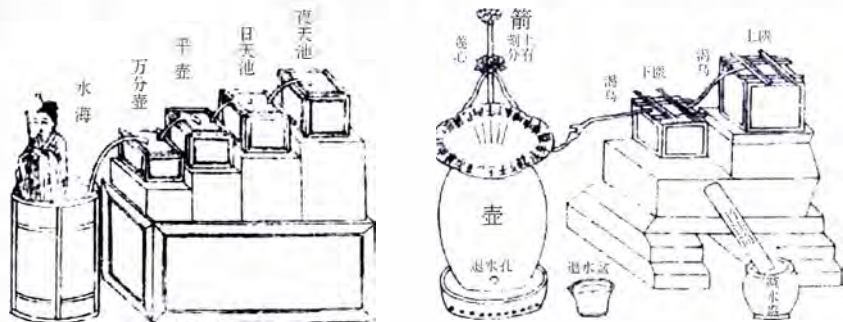
多级漏壶的构造是用两个以上漏壶,自上而下放置,使最上一个壶中的水流入第二壶,再由第二壶流入第三壶……,由最后一壶(称泄水壶)流入箭壶,箭壶中的水连同浮舟慢慢升起。由于得到上面几级漏壶的补给,最后一级壶中的水位可大体保持稳定不变。公元665年,唐代吕才制造的漏壶,它从上至下分四个水框,依次为“一夜天池,二日天池,三平壶,四万分壶”,其间以水管相连,水管采用“渴乌”(虹吸)原理,便于调整和修理。最下为水海(受水壶),其中有铜人执浮箭。水从夜天池依次注入日天池、平壶、万分壶,最后到水海,水海中的浮箭“而上每以箭浮为刻分也”。<sup>④</sup>正是这种四级补给系统的采用,使最后泄水壶的水位尽量保持稳定,进一步提高了漏壶的精确度。

从碑文中显示,通州所造的这套多级漏壶应由四只漏壶组成,其中的“天池”、“平次”从功能上应为泄水壶,也是有虹吸管连接。而“水海”则属于受水壶,主要起到显示时间的作用。这与唐代的吕才壶十分相似。

但是,漏壶的数量不能无限地增加,水位也不是完全稳定,需要继续改进以获得更为精确的计时方法。北宋燕肃发明创造的莲花漏不仅解决了这个难题,而且为后来的改进和完善打下了基础。

相比吕才壶而言,莲花漏中增加了分水壶,就是使水位保持平衡的壶。原理很简单:在一套漏壶的最下一级壶上再开一漏孔,但此孔开在壶上沿,只要从上面壶里漏下的水量比这一壶的漏量稍大,则总会有水从上孔中泄出,从而保持最下一壶的水位总在上沿漏孔的地方,这就达到目的了。

莲花漏中的“减水壶”其实就是碑中所记的“倒水槛”,盛水桶则主要用于换水。而影仪则是配合铜壶滴漏使用的“日钟”,起到校准时间的作



吕才漏壶与莲花漏壶



用。通州的这套元代铜壶滴漏吸取了前代的优点，采用了多壶分流的设计，在当时是十分先进的。

从古代计时技术的发展史来看，元朝应该是漏壶技术发展的鼎盛时期，郭守敬作为元代著名的科学家、发明家，他在计时领域的发明创造也是十分丰富和重要的。《元史·天文志》记载了郭守敬所发明的宝山漏、大明殿灯漏等诸多计时仪器，也都是和通州漏壶同一时期所创造出来的。此外，延祐三年（1316年），杜子威、洗运行制广州铜壶滴漏，是我国现存最大和最完整的古代计时器。

可以说，上古的漏壶到了元代已经演化为精密的水力机械记时仪器了，而通州的这套元代铜壶滴漏正是其技术发达的产物和表现。

### 三、残碑发现的重要意义

通过残碑的碑文记载，结合现有的文献记载，我们已经可以确定通州更漏的创建年代为至元十三年（1276年），而这恰好为我们推测通州的钟鼓楼创建时间提供了有利的佐证。

首先，其漏名“更漏”，也就是用以报更的铜漏，这说明它理应是官方使用的计时器。碑文中明确提出了“击柝者”这一名词，“柝”的本意是巡夜敲击的木梆或军中用来报更的刁斗，但古人也经常击鼓报更，滴漏计时，夜间凭漏刻传更。尽管在我国古代，除刻漏外，还存在着日晷、机械计时器和木漏、轮漏等计时体系<sup>①</sup>，但在明末钟表传入之前，刻漏作为当时发展最为完善、技术最为先进、应用最为广泛的计时仪器，它的报时作用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正是出于这样的因素，创建更漏一事才值得时人隆重地立碑以志之。

其次，虽然在残碑文中并未提及此铜壶滴漏的放置地点，但是它显然应该是置于一处具有公众性的官方建筑中。而刻漏与钟鼓楼之间又存在着天然的联系，可参照文献中对京城钟鼓楼的记载：“鼓楼在金台坊，旧名齐正。上置铜刻漏，制极精妙，故老相传，以为先宋故物。其制为铜漏壶四，上曰天池，此曰平水，又次曰万分，下曰收水。中安铙神，设机械，时至，则每刻击铙者八，以壶水满为度。涸则随时增添，冬则用温水云。”（《图经志书》）“都城刻漏，旧以木为之，其形如碑，故名碑漏，内设曲筒，铸铜为丸，自碑首转行而下，鸣铙以为节，其漏经久废坏，晨昏失度。中书俾履谦视之，因见刻漏旁有宋旧铜壶四，于是按图考定莲花、宝山等漏制，命工改作，又请重建鼓楼，增置更鼓并守漏卒，当时遵用之。”（《元史·齐吕

谦传》）

可见，钟鼓楼与铜壶滴漏在极大程度上是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如果没有滴漏，钟鼓楼的钟鼓无法依时传递，就会失去意义；而没有钟鼓楼这样处于城市中心、有完备报时手段的场所，滴漏的计时价值也无从体现。“明时刻以定晨昏，正钟鼓以警视听，此为政之当要也。”<sup>②</sup>碑文中也将正钟鼓与定晨昏并提，作为更漏创建的意义所在。

那么，对于如此重要的通州钟鼓楼，古籍中是怎样描述的呢？记载如下：“钟鼓楼在州城内北门街中，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毁，二十七年（1548年）重建。额曰：先声四达，翰林侍读郭朴撰碑记，载文艺志。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修，国朝顺治四年（1647年）兵备道李公廷梅重修，康熙十八年（1679年）地震尽圮，四十四年（1705年）通永道李公锡东路同知李公光宗知州许敏芳重建，雍正元年（1723年）知州黄成章劝捐修葺楼中书先声四达旧额，楼北额曰：暮鼓晨钟，钟楼南额曰：声闻九天。嘉庆年间州绅等重建，道光己丑（1829年）州绅等重修，同治辛未（1871年）知州庄允端偕州绅劝捐重修。（《通州志》）“嘉靖十七年大火，鼓楼被焚，二十七年重建钟鼓楼”。（《通县编纂省志材料》第二册）

资料中对钟鼓楼的描述仅为“明嘉靖十七年毁，二十七年重建”，其中并无建楼确切年代的记录，原因在于元朝并未修《通州志》，所以也就更谈不上记载当时通州鼓楼的情况了。而残碑的发现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根据更漏的创建年代来推断，那么通州钟鼓楼的修建年代应在至元十三年（1276年）前后，也就是说在元朝初期，通州极有可能已经建立了钟鼓楼。

综上所述，根据通州《创建更漏记》残碑碑文和相关文字记载，笔者对残碑的创建时间及其内容进行了考订，为通州在元代就有了钟鼓楼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纰缪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① 《元史》卷五十八《志第十》。

② 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02页。

③ 《隋书》卷一十九《志第十四·天文上》。

④ 《古今图书集成·历法典》卷九十九《漏刻部》。

⑤ 李迪、邓可卉：《关于中国古代计时器分类系统的探讨》，《内蒙古师大学报》，1997年第4期。

⑥ 《通州创建更漏记》。

（作者为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助理馆员）

# 浅析北京地区明代墓葬中金银器物上的

## 凤凰纹饰与凤文化的关系



凤型头饰纹

中国的传统纹饰千姿百态，不论是沿袭性极强的传统纹饰，还是创新性较强的当朝变化纹饰。都在传达一样的美好意愿：祈祝吉祥。凤凰纹饰即是其中的一种。凤凰是中国先人的艺术创造，是人们心目中纳福迎祥的吉瑞之鸟。所谓“羽虫三百六十而凤凰为之长”，“凤为羽族之美”。在凤凰的身上，体现了先人们的自然崇拜、宗教信仰、审美情趣和艺术魅力。

在中国几千年的物质文明进程中，华丽流畅、装饰性很强的凤纹被广泛用于织物、石刻、壁画、铜镜、漆器、陶瓷器、金银器上。尤其是以金银为材质所反映的凤纹，其造型和画面图案，都完美地将凤凰的姿态予以淋漓尽致的表现，给人以灿烂夺目的感觉，令人久久不能忘怀。本文将以北地区明代墓葬中出土的金银器物上的凤凰纹饰为例，简述凤纹饰的发展概况，并对中国凤文化现象做一粗浅分析。

### 一、北京地区出土的明代金银器物及其凤凰纹饰

明代金银器在北京地区出土极为丰富，其数量之多，工艺之精美，都达到令人赞叹的地步。除十三陵定陵外，明代妃嫔、外戚墓葬中也出土了一批甚为精美的金银文物及其它珍贵文物。如海淀区青龙桥董四墓村的明代妃嫔墓，东郊平安侯方锐墓，右安门外都指挥使万贵墓、万通墓，西郊武清侯李伟墓，南苑荣禄大夫柱国庆阳伯夏儒墓等，为我们全面了解明代宫廷金银器制作工艺提供了翔实的资料。这一时期的器物，风格一改唐宋以来的丰满矫健、清秀典雅，而越来越趋于浓艳华丽，宫廷气息愈来愈浓厚。具有种类繁多，工艺精湛，造型奇巧，装饰繁缛的特色。尤其那满目皆是的龙凤图案，充分显示出皇家至高无上的权贵和尊崇身份。

根据礼制，明代制定出只有皇家使用龙凤形象或图案的规定，其他臣民不得逾制。除非是受到恩宠，得到赏赐。在

徐瑞萍

明代除对建功立业者予以重赏，帝后也会把金银制品特赐身边的百官宠臣。这点从出土的金银器中得到印证。在这批器物中，有许多上面刻有铭文，内容有器物制作年代、机构、名称、重量、金属成色等。纹饰以吉祥图案为主，工艺精湛，造型精美。

如明代外戚墓葬中，万贵墓、万通墓等家族墓是最显赫的。他们是成化皇帝——明宪宗朱见深（1465—1487年）的宠妃万贵妃的父兄。可谓地位显赫，在万贵、万通的墓葬中，出土大批陪葬品，金银器数量众多且规格极高。如墓中出土一对凤钗（图1），造型精巧，秀美，飞凤双翅展开，站在祥云之上，长长的凤尾向后高扬，上面篆刻细密麦穗纹，钗柄上刻“银作局永乐贰拾贰年（1424年）拾月内成造玖成色金壹两贰钱伍分外焊伍厘”款。



图1 金凤钗

镂空花金佩饰，上端为镂空荷叶形钮，钮下系七条金



图2 金粉盒上的凤纹

链，每链下系一物，分别为剪、剑、罐、瓶、觥、香囊、粉盒。每件器物均小巧玲珑，纹饰布满器身。其中金粉盒（图2）直径3.6厘米，两面篆刻团凤纹，一对凤凰首尾相交，围绕中间牡丹花，组成凤戏牡丹吉祥图案，整个佩饰富丽堂皇，是集实用、美观为一体的艺术佳品。这些原本是后妃用品，现在却成为万贵妃之父死后的葬品。

在京西董四墓村的明代妃嫔墓中出土的金尊（图3）器型仿同期瓷器，稳重大方，上面篆刻

“厘”款。

明代嫔妃死后，除少数葬在十三陵陵区内，其余皆葬在京西金山。据《日下旧闻考》记载，金山是明代诸王、公主、嫔妃、皇子从葬所在。魏源《海澱杂诗注》说，“东四墓西四墓，正当万寿山后，宝藏庵前，皆明代妃嫔葬所。”<sup>①</sup>到清初，已有五十



图3 云凤纹金尊

多座陵墓，以后“相继人间丛集、以墓纪村”<sup>②</sup>。

1951年考古发掘两座嫔妃墓，从中出土许多精巧秀美的器物，金银器有23件钗簪组成的凤冠、金饰、金镯、纽扣、金尊、金盆等，工艺精巧，原为宫中用品，后陪葬墓中。如银错金双凤纹盆（图4），制作相

当精美，采用篆刻、锤打、错金等工艺，将双凤展翅翱翔的神态刻画得惟妙惟肖，纹饰错金，黄白相映，尽显团凤之柔美。底刻“大明万历辛巳年



图4 银错金双凤纹盆

银作局造”铭文（1581年）。从墓志中得知，一号墓葬天启帝三个妃子，二号墓葬万历帝七个内嫔。通过出土文物，对研究明代皇族相关殡葬制度、政治制度、文化生活，提供了可靠的历史物证。

在这些出土文物中，明代金银器在制作工艺上尽显华美，采用锤打、焊接、雕镂、篆刻、掐丝、盘丝、累丝、镶嵌等技法，而且和珠玉、宝石相结合，相映成辉，色彩缤纷，雍容华贵。与宋元相比，明代金银器中素面者少，大多饰繁密纹饰，且布满器物周身，造型新颖，亦有不少浮雕型装饰，这对以后清代金银器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明代是金银器空前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因为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下，只允许宫廷皇室，亲王贵族大量使用金银器，并专门设立银作局监管。集中全国各地能工巧匠，“更番赴京输作”，使手工艺特别是金银制作出现繁荣发达的局面。许多制金工艺高手，融合南北技艺，制造出精美绝伦、华彩耀眼的金银艺术佳品。而各地亲王和异姓王公贵族所用金银器，也多出自“输作”制度下宫廷制作。

从装饰风格上看，明代金银器一味追求宫廷金银艺术所特有的富丽华贵，造型随着器物功能的多样化更加丰富，在吸收融合其他艺术的基础上，明代金银器展现出多姿多彩的风貌。尤其体现在凤纹设计上，明代工匠在看似简单的器物上，设计出最祥和、最完美的凤形图案。俗话说“龙在头上变，凤在尾上飞”，在凤纹中最能体现凤鸟隽雅秀美的部位便是凤尾。比其它部位更丰富，更富于变化，具有一种节奏感和韵律美。据载，艺术家将凤尾式样分为二十几种，如夔凤式、火焰式、草纹式、疏叶式、孔雀密式、松毛式等等，可见凤纹之丰富多彩（图5）。



图5 凤尾式样

## 二、凤纹饰发展概况及特点

凤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距今约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在湖南洪江高庙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印有精美的凤纹图案。姿态雄健，长颈、凸喙及花状长尾，这是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凤纹，以后陆续在内蒙古赤峰出土凤形陶杯，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陕西宝鸡仰韶遗址等出土的陶器上均有凤纹。作为中国古代民族的图腾，凤与龙一样，成为先民祭祀天地神灵中的主角，被赋予能保佑农业丰收、六畜兴旺的巨大神力，并且作为神物被膜拜。

到了夏商周，凤纹越来越普遍而清楚地篆刻

在青铜器上，不仅作为一种实用图腾标记，而且逐渐推广成为美的艺术形象，被称为“夔凤”纹，其特点是规整、庄重，有神秘色彩和超凡气韵。同时亦追求较强的装饰性，富于变化。

春秋战国时期，凤纹趋向繁荣。除在陶器、玉器、青铜器上有所展示外，还出现在金银器、丝织、漆器上。使凤纹载体有了新的拓展领域，并与云纹、花草纹、龙纹相结合，组成变形凤纹。尤其是龙凤相互配合，构成同体龙凤，或盘曲缠绕，或顾盼对应。如战国蛟龙双凤纹金带钩，造型呈琵琶式样，装饰为浮雕式兽面纹，层次分明，立体感强。采用鏤花工艺、鏤刻出相对蛟龙和卷曲回顾的双凤。凤尾歧出分尾形，使凤鸟纹饰更加生动。这一时期的凤纹不再追求庄重规整，而是向求变、求美的方向发展。如曾侯乙墓中出土的金盞重2.15公斤，器型别致，设计新颖，底部为三个反转S形的凤形足，与器身装饰繁缛华丽的蟠龙纹、勾连雷纹交相辉映。为战国时期金器中之精品。

秦汉时期，用金银制作的器皿大量出现，特别是金银细工已趋成熟。如锤打、焊接、掐丝、炸珠、镶嵌等工艺十分成熟，而凤形图案，频频出现。如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造鎏金刻花龙凤纹银盘，纹饰采用二方连续的环状图案，刻有三组变体龙凤纹，龙体盘曲、凤首卷弯、宛如几何图形，构图简练古朴，线条富有旋律感，鏤刻纹饰全部鎏金，口沿底面刻有秦代纪年，是迄今所知唯一刻有秦代铭文的银器，对研究当时衡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而汉代最鲜明而富有时代特征的是凤鸟、鸾鸟、朱雀等神化的瑞鸟形象不断出现。《春秋演礼图》说：“凤为火精，在天为朱雀”。明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指出，凤、南方朱鸟可见。凤凰、朱雀、朱鸟，实际上是指同一种神鸟，形象大同小异，实际上都是凤纹丰富多彩的不同表现形式。这时的凤纹作为朱雀，与青龙、白虎、玄武合用，合称为“四神”。其形象在汉代砖石、瓦当、铜镜上都有较丰实的表现。可谓以往凤纹之集大成，具有雄浑大气、富于动感之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是由于佛教的盛行而扩大装饰范围，二是吸收、接纳、融合北方少数民族和西域地区的习俗、观念、审美趣味，使凤纹作为装饰艺术更加强烈。花卉缠枝广泛应用，如忍冬纹、连珠纹、莲花纹等，使凤纹构图带有明显的时代风格。

唐代凤纹，和以往朝代相比，达到艺术创造

的繁荣昌盛时期。新的纹饰不断出现,变得更加绚丽华美,许多凤鸟造型频频出现在金银器上。如鎏金双凤纹银盒,上刻衔草翱翔的双凤纹,周围衬以鸿雁、奔鹿、莲花、卷草、牡丹等纹饰,凤鸟曲颈展翅,花草缠枝流畅。这时期的凤纹形体优美,呈S形弯曲,拖着长长的尾羽,嘴衔同心绶带,盘旋飞舞,生意盎然。这和盛唐的物质文化生活息息相关。反映出社会太平和谐之气象。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女性头部装饰的金钗花冠上,精美的凤纹以它特有的容姿,成为嫔妃、宫女头上的饰品(图6)。

如一种叫“金步摇”的发饰,形如花枝相互缠绕,下缀五彩珠玉以垂下,插在头上,摇动不止,动感极强。诗云:“五佩珠纓金步摇,回鸾转凤意自娇。”<sup>④</sup>“步摇金翠玉搔头,倾国倾城胜莫愁。”<sup>⑤</sup>“云鬓花冠金步



图6 金凤钗

摇,芙蓉帐暖度春宵”<sup>⑥</sup>。其情景可以从敦煌壁画及唐宋时期的画卷中,领略其风采。用金银作发饰,或大量使用金银器皿,是盛唐繁荣富强的表现,唐代艺术创造达到高峰,对开拓唐风这种装饰艺术,起到推动促进作用。

宋元时期的凤纹,虽不如唐凤华丽,但也以刻画精致见长。此时凤纹,大多与鸾相配,雄凤雌鸾,或与凰相配,成双成对,上下飞舞。最突出代表为内蒙古出土辽代陈国公诸于驸马合葬墓中的鎏金凤凰纹银冠、银靴,制作工艺精湛,刻画细微,俩俩相对的凤凰,展翅欲飞,周围饰缠枝花卉,纹饰典雅高贵,具有显著的民族特征。

到了明代,凤纹装饰已成一种特定的形式,这时期的凤纹,采用锦鸡的头,鸚鵡的嘴,鸳鸯的身子,仙鹤的腿,大鹏的翅膀,孔雀的尾。并根据凤的姿态,分为几种(图7):有坐凤、立凤、



图7 凤纹式样

飞凤、卧凤、团凤,同时和与之相配纹饰相结合,又可分为云凤——凤在云中飞,草凤——凤身、凤翅、凤尾呈卷草形,花凤——凤隐于花中或作

花形等。其凤纹表现手法多,想象力丰富,形式感强,洋溢着勃勃生机。

总之,凤不能残缺,要有头有尾,凤身多加装饰性很强的冠花、羽条和绶带。这说明凤纹在明代的共性特征逐步趋于规范化、程式化,发展更加成熟,使其成为装饰艺术中最有代表性的纹饰。而金银器制作风格也和整个宫廷装饰风格相协调,非常讲究凤型纹样与造型完美结合,这种浑然一体的表现手法,使器物不仅工整精致,又富丽堂皇。许多金银器皿既有实用价值,而且又有极高的艺术欣赏性,反映了明代金银器制作达到很高的水平。

综上所述,以凤型纹饰作吉祥图案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演变,艺术家们以极其丰富的想象力和艺术创造力,描绘出各式各样,多姿多彩的凤纹图案,或秀美,或繁丽,或精致,或粗放,尽管其千姿百态,但在承袭发展,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凤型纹饰以其独特的民族造型和艺术魅力,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象征。

### 三、和谐、和美——凤文化的精髓

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使得每一物象都承载着深刻的文化现象,凤纹其实就是凤文化的外在表象。凤文化作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内涵丰富,寓意深远。

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和”。凤凰正是“和”的象征物。首先,凤是融合产生的神物。《说文》中,凤被描述为:“神鸟也。天老曰,凤之象也,鸿前麟后,蛇颈鱼尾,鸛颡鸳腮,龙纹龟背,燕颌鸡喙,五色备举,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四海之外,过昆仑,饮砥柱,濯羽弱水,暮宿风穴,见则天下大安宁……”<sup>⑦</sup>因而凤是中国古人集鸟禽、动物、太阳、风等多种自然现象多元融合而产生的神物。

其次,凤凰是“美”的化身。她的出现,预兆天下太平,人们认为它能带来光明,让祥瑞降临于世,使人们的生活更加美满幸福。所以,人们一直把凤看作是祥瑞之鸟,有兆瑞、示美、达天等神性,是美丽和幸福的化身。及至今日,代表祥和、祥瑞、奋发、进取精神的凤凰图案又被赋予了新的文化使命,北京2008年奥运会火炬接力标志设计灵感就来源于“火凤凰”的概念,主体是两个人共擎奥运圣火奔跑的形象(图8)。凤凰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鸟中之王,是吉祥、永生的代表,高贵美好的象征。以凤凰的形象作为火



图8 北京2008年奥运会火炬接力标志——火凤凰

炬接力的标志，象征通过火炬接力把北京奥运会吉祥美好的祝福传遍全中国，带给全世界。

第三，龙凤合一并举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和谐所在。龙与凤是中国文化的两大图腾，在龙凤身上集聚着中华文化的精髓，都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从龙凤图腾的源头，我们可以看到，

它们一出现，就包含、渗透、体现着宗教的意味，是古人自然崇拜的升华。从最早的玉雕龙、玉雕凤，以祭祀身份同时出现在史前文化遗址中，反映出对龙凤自然神的共同崇拜。都是以敬祀天神为主旨，寓含着祈请神灵保佑之意。两者一开始并没有尊卑之别，而是互相交融，同步崇拜，彼此影响，并且形成渗透配合，携手共荣，同臻美满的格局。如河南安阳妇好墓玉龙、玉凤，江苏西汉墓出土战国交龙双凤纹金带钩，湖南长沙楚墓龙凤人物帛画，河南中山国墓四龙四凤方案器座，湖北江陵楚墓蟠龙飞凤图案的丝织品等，龙凤对应，阴阳和谐，依存荣合。

但是到秦汉，龙的身上开始具有象征君主帝位的神性。秦始皇自称“祖龙”，“祖”有“始”的意思，即“初始的龙”、第一龙。以后历朝历代帝王，都把自己比作真龙天子，地位日益显赫，并出现皇家垄断龙的情形。龙纹遂成为宫廷主要用纹，甚至出现“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触目所见皆有龙的地步。而后，嫔妃们就开始比凤、称凤，但前提是依附于龙。使凤的地位降低，究其原因以男性帝王为标志的男权社会造成的。但到唐代有所改变，由于武则天崇权，把凤的地位抬到一个很高的地位，改年号为“仪凤”，中书省改称“凤阁”，门下省改称“鸾台”，并穿凤服、着凤装、戴凤钗。虽然武则天是威风、强凤，但也改变不了中国历史就是男性皇帝专权的历史，即“龙主凤从”、“龙上风下”的事实。中宗李显复位后，即改号为“应天神龙皇帝”，自然有压倒、代替之意。

在等级制度森严的明代，对龙凤使用有严格限制，官民人等不能随便使用，“如违……一律拏拿治罪”，用以维护皇权至上，以及作为重要统治秩序的等级制度，以冠服为例，就有龙凤冠、鸾凤冠、翬凤冠等。如《明史·舆服二》记载较为

详细，规定“皇后冠服，洪武三年定……其冠，圆匡冒以翡翠，上饰九龙四风，……皇后常服……双凤翬龙冠……诸色团衫，金绣龙凤纹……四年更定，龙凤珠翠冠……冠制如特髻，上加龙凤饰，衣用织金龙凤纹。……皇妃、皇嫔及内命妇冠服，冠饰九翬，四风花钗……，常服、鸾凤冠……金绣鸾凤……。”<sup>①</sup>另外，从金银器中也可以看出，最典型当属明定陵出土的二龙戏珠金冠，皇后戴的风冠，及众多金银器皿上盘绕的龙、飞翔的凤，将龙凤并举合一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但是所有形制均金龙在翠凤之上，寓意龙辖凤，凤从龙。到了晚清，慈禧太后掌权，也不能彻底更改龙主凤从的传统，于是龙凤并举，突出骄凤，凤压龙，这种将凤抬高到龙之上的作法实属特例。

总而言之，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国家，它的民族理念和审美元素，必然渗透到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凤型纹饰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通过对其研究，有助于对民族文化的理解和认识。

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龙文化与凤文化，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展现着中华文化的精神。从远古至今，龙凤文化相对互补，融合渗透，合一演化出中华文化的大千世界。在龙凤身上，寄予了中华民族的理想和精神，可以说龙凤文化的精髓是合力、合美，二者阴阳和谐，相辅相成。龙凤文化既可以为和谐文化、和谐社会提供精神支持，也可作为和谐文化、和谐社会的载体承古开今。

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西郊董四墓村明墓发掘记》，《文物考古资料》，1952年第二期，第78页。

②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西郊董四墓村明墓发掘续记》，《文物考古资料》，1952年第二期，第88页。

③《全唐诗》第九册，中华书局1960年4月第1版，第3072页。

④《全唐诗》第十册，中华书局1960年4月第1版，第3570页。

⑤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219页。

⑥庞进：《中国凤文化》，重庆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4页。

⑦《明史》卷六十六《舆服二》，中华书局，第1615页。

（作者为首都博物馆保管部馆员）

# 从顾绣作品探索其盛衰的原因

韩英

顾绣是我国南方极具特色的代表性刺绣。起源于明代松江府一位名为顾名世的宦府中的闺阁绣而得名。其特点是以宋、元时期优秀画作为蓝本，以针代笔，以线代墨，绣与画结合，浑然一体，高雅精细，有“绣艺鼻祖”之称。

## 一、顾绣的起源

在《顾绣考》“顾绣之起源”中记载“今天下刺绣者，以明代上海顾氏刺绣之名，震溢海内故也。上海顾氏以明嘉靖三十八年进士顾名世而始着称。名世曾筑园于今九亩地露香园路，穿池得一石，有赵方敏手篆露香池三字，因以名园”；“……故世称其家刺绣为露香园顾绣，或顾氏露香园绣，或简称为露香园绣”。<sup>①</sup>

“顾名世，字应夫，号龙泉”<sup>②</sup>，是明代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进士<sup>③</sup>，曾担任内宫管理宝物的官吏，晚年移居上海颐养天年。在扩建自家园林时，偶尔发掘一块刻有元代大书画家赵孟頫篆书的“露香池”石碑，遂将自己原有的“万竹山居”改名为“露香园”。因此，顾绣亦称为“露香园绣”、“顾氏露香园绣”或“露香园顾绣”。顾名世共有三子，据徐蔚南所著《顾绣考》中记载：“顾名世……子三人；长箕英，号汇海，次斗英，字仲韩，号振海；幼奎英，……”<sup>④</sup>。顾名世一生“性好文艺”，见多识广，在他的影响和倡导下，顾氏家族女眷也酷爱艺术，擅长刺绣，精于女红。

顾绣艺术作品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有三位，即缪氏、韩希孟、顾玉兰。明朝时期，在上海民间有着“上海顾绣始于缪氏”的传说。缪氏，是顾名世长子顾箕英之妾。她绣出的作品栩栩如生，形象逼真。韩希孟是顾名世次孙顾寿潜之妻，韩希孟的刺绣技艺使顾绣达到出类拔萃，登峰造极；此时的顾绣又多了一个代表性的称呼“韩媛绣”，

即指韩希孟的刺绣。韩希孟的刺绣多以宋、元名家书画为粉本，擘丝极细，色调得当，所绣山水、人物和花鸟，都极富神韵，精妙绝伦，达到画、绣水乳交融的艺术境界。

韩希孟之后，顾绣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清初期，顾名世的曾孙女顾兰玉继承顾绣之传统，成为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她24岁丧夫，守节抚孤，以刺绣维持生计，开设刺绣作坊，广收徒弟，传授顾绣技艺长达30多年，使顾绣技艺广为流传，民间妇女争相仿制，绣者亦必称露香园遗制，影响遍及江南。她对顾绣刺绣艺术的推广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 二、早期顾绣作品的艺术特点及代表人物

奠定顾绣之美誉基础的代表人物，当属顾家缪氏，她身居闺阁，擅长刺绣。在顾名世博学多才、喜好书画艺术的熏陶和影响下，缪氏凭借自己扎实的刺绣功底，在继承宋代画绣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发展，形成了具有独到刺绣技艺的风格；其所绣之物多以宋代闺阁绣为范本，“绣人物、山水、花鸟大有生韵”，形象逼真，栩栩如生；“姜绍书《无声史诗》称顾会海妾刺绣人物，气韵生动，字迹有法，得其手制者，无不珍惜之。”<sup>⑤</sup>为顾绣风格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民间流传有“上海顾绣始于缪氏”的说法。据明崇祯《松江府志》和《阅世编》记载：“顾绣，斗方作花鸟，香囊作人物，刻划精巧，为他郡所未有而价亦最贵。尺幅之素，精者值银几两，全幅高大者，不啻数金。”<sup>⑥</sup>可见顾绣问世之初已经被时人所称赏。

在顾绣作品中，造诣最高，技艺发展达到极致，且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非韩希孟莫属。韩希孟，又名韩媛，是顾名世的第二个孙子顾寿潜之妻。

顾寿潜能诗善画，曾师从于明代著名书画大师董其昌，深受老师的赞赏。韩希孟在丈夫的影响下，喜好书画，善画工笔花鸟，尤其是刺绣技艺精湛叫绝。韩希孟的刺绣多以宋、元名家书画为粉本，刺绣与绘画相结合；极尽全力地发挥刺绣针法和色彩变化的表现能力，所绣作品，美轮美奂，情趣盎然，惟妙惟肖。她绣制的宋代著名画家米芾所绘的《米画山水图》，在纵 33 厘米、横 25 厘米的白色绫地上，根据近水远山的透视关系，采用套针、斜缠针等不同的针法和浓墨写意似的笔绘表现出山、云、水、天、虚无缥缈、似有若无的意境，描绘出一幅云雾缭绕、渔帆点点的江南山水画面。她刺绣的《葡萄松鼠图》，笔者认为韩媛绣作品中最显功底的一幅力作。《葡萄松鼠图》是韩希孟刺绣的《宋元名迹册》中的一幅，画绣纵 33 厘米、横 25 厘米，绣者在白色绫地上，以针线反映出一幅秋季硕果累累、松鼠欲取果实的大自然闲趣小景。一只灵巧的松鼠，仰爬于硕壮扭结的葡萄藤上，似欲获取成熟的果实。作者以栩栩如生的表现手法，再现出大自然的情趣。如：松鼠茂密蓬松的茸毛、活泼灵巧的身姿、炯炯有神的眼睛、垂涎欲滴的神态和松鼠的警觉机敏，刻画得妙趣天成（见图 1）。再如：土坡的绿苔、小草，藤蔓的纹理、



图 1 韩希孟绣《葡萄松鼠图》

扭曲的枝干，甚至葡萄被虫蛀的藤叶都表现的形象逼真。这种细致入微的表现手法，体现了绣者一方面仔细观察捕捉小生灵顽皮可爱的动作姿态；另一方面领会作者在画中的每一个细节和寓意，并将所有的感悟运用多种针法技艺表现出来。在配色方面，韩希孟具有良好的色彩感觉，在刺绣葡萄叶和葡萄珠时充分的展现出来。她巧妙地使用深绿、浅绿，深黄、浅黄，深蓝、浅蓝，月白和赭石色，大胆地将色级距离相差很远的颜色结合使用，如：把葡萄珠设为蓝色和赭石色，这两种色差较大的对比色相互结合，再借助长短参差的套针刺绣，充分地表现出葡萄珠颗颗饱满，不同成熟度的质感，体现了绣者在调和色彩方面所特有的造诣。韩希孟的绣品无论针法运用与色彩搭配都能神妙独到，造型、设色、构图等技法处理，都没有蜕出宋、元画法窠臼的痕迹。她用高超的刺绣技艺，多变的针法诠释画家的神韵。花鸟鱼虫，生动形象，五彩斑斓，充分表达出原画者的意境。书画大师董其昌见到韩希孟的绣品，惊叹“技至此乎！”、“非人力也！”；欣然为《韩希孟绣宋元名迹册》中的每一幅册页亲笔题写赞誉，给与高度评价。从韩希孟的绣品中，我们可以充分领略到早期顾绣的技术特色以及撼人心魄的艺术魅力。

顾绣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主要原因在于：

1. 深厚的艺术素养。顾绣作品能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刺绣艺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首先与绣者的艺术素养和造诣分不开。顾绣是民间绣艺与文人画稿结合的产物。绣者须具备传统书画修养，懂画、会画、深谙画意。其“真谛”一是画意，二是绣理，两者结合，相得益彰。韩希孟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她不仅懂画，并且善画。这为她把握画的真谛，将画意融入到刺绣艺术当中，为创作出精美绝伦的绣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 颇具匠心的选材。具备较高的艺术造诣，才能颇具匠心的选择画稿。创作一幅优秀的顾绣作品，首先是选择一个最佳的刺绣题材。明代后期画坛以模拟古人为风尚，顾氏家眷在风靡当时江南的松江画派画风的熏陶影响下，选择高雅脱俗的著名画作为蓝本，并仔细挑选、细心揣摩、反复推敲。当年顾绣中的佼佼者韩希孟就是“搜访宋元名迹，摹临……”<sup>②</sup>赵孟頫、米芾、黄荃、吴彬等大家画作为粉本。如顾绣《洗马图》（见图 2）就是韩希孟临摹元代大书画家赵孟頫的墨迹，从而创作出令世人称道的顾绣佳作。

3. 高超的刺绣技艺。顾绣的刺绣技法主要体现于以下三点：





图2 顾绣《洗马图》

第一、半绣半绘，画绣结合。顾绣特点以名画为蓝本，画面均以针为笔，以线代墨，绣绘结合。正如徐蔚南在《顾绣考》中所记“故世被称顾绣之巧，谓为写生如画，他处所无，名之曰画绣。”<sup>①</sup>这是顾绣最为独特之处，因此又称“画绣”。

从国内传世的明清顾绣实物资料分析，绣幅中凡针丝不及之处，皆以画笔补色，于关键处轻描几笔，使作品渲染得宜，更加层次分明。

第二、针法多变，时创新意。据《顾绣考》所载：“露香园顾绣，据称得之内院，其擘丝细过与髮，而针如毫，配色则有秘传，故能点染成文，不特羽毛花卉，巧夺天工，而山水人物无不逼肖活现。”<sup>②</sup>韩希孟仔细揣摩画者的笔锋，擘出细过于发的彩丝，运用如毫般之细针，施以繁复多变的针法，刻意表达画者的风格。她研究继承宋代“闺阁绣”的艺术特色和技巧，在针法上常用的有：齐针、铺针、切针、接针、施针、撮和针、网绣、拉锁绣、打子绣等十多种，并在此基础上发扬创新，创造出散针、套针、滚针等针法，丰富了刺绣的表现手法，刻意模仿绘画的笔墨技巧。绣出的作品无论人物、花鸟、山水、草虫都生气盎然，针脚细腻，以致无针痕缕迹，观者难以辨别是画还是绣。如：《葡萄松鼠图》中用“极细的水路套针分茎，以符合叶脉生长的形态”。采用花纹线、集套针绣制松

鼠的茸毛，借助丝线光泽的变异，松鼠茸毛蓬松、光亮，给人以灵动之感。葡萄藤叶及枝干，均饰以外轮廓线，更显画面的立体感。这些都“是绘画所不能达到的艺术效果”。

第三、调和色彩的表现能力。间色晕色，补色套色，染色之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崭新境界”。据崇祯年间《松江府志》记载：“初有大红、桃红、出炉银红、藕色红，今为水红、金红、荔枝红、橘皮红、东方色红。初为沉绿、柏绿、油绿，今为水绿、豆绿、蓝色绿。初为竹根青翠蓝，今为天蓝、玉色月色浅蓝。初有丁香、茶褐色、酱色，今为墨色、米色、鹰色、沉香色、莲子色。初有缁皂色，今有铁色、玄色。初有姜黄色，今为鹅子黄、松花黄。初有大紫，今为葡萄紫”<sup>③</sup>。这些五彩缤纷、琳琅满目的丝线，为顾绣创造了良好的色彩基础。然而，顾绣并不以绚丽的色彩为绣线的选择，顾绣采用的种种彩色绣线，多为中间色丝线，配色和谐典雅，层层晕色，这样才能更好的表现山水人物、虫鱼花鸟的色彩效果。反对那些依赖五彩斑斓的丝线，炫人眼目的滥用。在刺绣用料上不拘成法，视刺绣图案物象所需而灵活取材。

顾绣早期绣者视刺绣为“古来一技神绝”，绣品费工费时量少质高，一幅作品往往要花数年的时间才能绣成，因而当时的绣品通常属于士大夫、文人雅士欣赏馈赠之物。韩希孟的刺绣在当时得到董其昌等著名艺术大家的赞赏，被称之为“韩媛绣”，为世所珍。韩希孟以其高超精湛的绣艺确立了顾绣在当时全国各种刺绣艺术品中无可企及的卓越地位，她的作品在江南一带享有盛誉。

顾绣之所以能够名声鹊起，广传于世，不仅与顾绣神韵逼真、精妙绝伦的刺绣技艺息息相关，更重要应归功于清代初期顾名世的曾孙女顾兰玉。她年轻丧夫，守节抚孤，迫于生计，开设刺绣作坊，将家传的顾绣密技授与他人，使顾绣技术广为流传，凭借自己的精湛绣艺，开创了顾绣昌盛的新起点。

### 三、后期顾绣发展的窘况及代表作品

清晚期，顾家生活日趋衰落，逐渐倚赖女眷刺绣维持生计，从此顾绣由闺阁女红转向作坊商品绣，众多的绣品涌向市场。以顾名世一家“露香园绣”的刺绣技法和风格为代表的绣品，都称作“顾绣”，顾绣的发展由此进入晚期。此时的顾绣，虽继续保持着以针带笔、以线带墨，绣画结合的

风格，但无论是刺绣蓝本的选择，绣工和色彩的搭配与早期作品相比都过于简单逊色。这从下面介绍的两件清代晚期顾绣作品中即可管窥这一时期顾绣作品的状况。

1、《出行图》·清同治<sup>①</sup>

纵 107 厘米，横 48 厘米（见图 3）。绣品选择的蓝本内容空旷简洁，以三个人物、一匹马、一株桂树布局整幅画面。在米色绫地上绣桂树、出行官员及两位书童；绣工采用打子绣、齐针绣、套针绣、擞和针等针法；配色简单，施墨绿色、橙色、驼色、月白、灰色等丝线。

在此件作品中除了出行官员所骑白马、人物的衣纹及桂树是采用刺绣手法表现出来。其余部分用墨笔渲染描绘，画绣并用。

墨书题跋“掌文衡，执斗标，吹藜火，云汉昭”，落款“露香园”，绣朱文印“露香园绣”。

2、《三星图镜心》·清光绪<sup>②</sup>

纵 121 厘米，横 42.5 厘米（见图 4）。绣面描绘海屋添筹的场景。“海屋添筹”出自苏轼的《三老



图 3 顾绣《出行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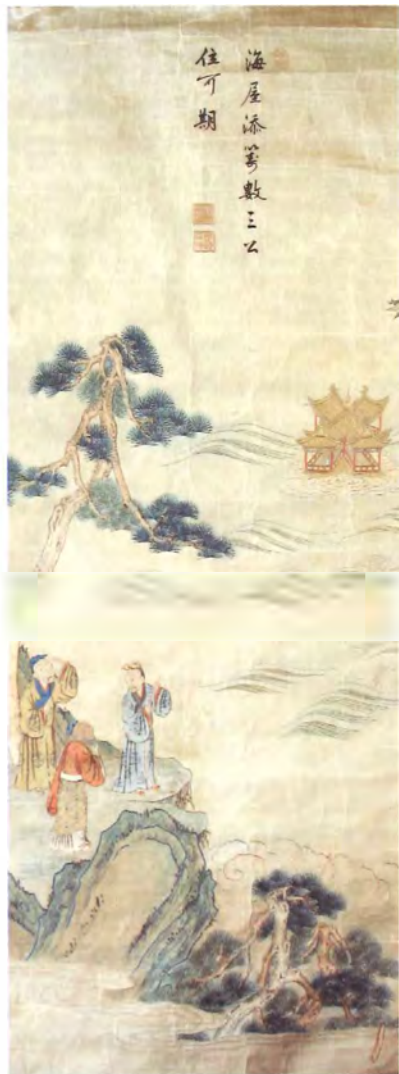


图 4 顾绣《三星图镜心》

语》典故，以三位老人相遇，互问年龄，并夸出长寿之海口为题材，是中国传统的吉祥纹样，比喻长寿，多用于祝寿。

绣品在米色绫地上刺绣三位仙人，海屋、松柏、仙鹤、寿石等吉祥图案。刺绣的针法主要有套针、齐针、缠针、滚针、松针、网绣、盘金绣、打子绣。配以深绿、浅绿、赭石色、驼色、红色、棕色、黑色丝线晕色。寿石、松柏及海水等处略施彩绘添色。

画面引首有椭圆“申江正永”朱红绣章；套针、缠针刺绣行书“海屋添筹数三公位可期”落款；款后绣朱文“露香园”、“武陵手授”两方印。

从上述作品介绍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晚期顾绣失去了原有的精心选择刺绣蓝本。同样是人物题材的刺绣蓝本，早期的顾绣《竹林七贤图》（见图 5）构图饱满，画面层次清晰、错落有致；这是晚期顾绣作品所不及之一。在精细的针法表现中，

仅就枝干这一细节的刺绣表现, 还以早期顾绣作品《葡萄松鼠图》为例, 绣者采用齐针、极细的水路套针、配以黑色、深灰色、浅灰色等颜色的丝线, 把葡萄藤扭曲的枝干纹理、藤结的质感, 以高超的绣技表现的形象逼真; 这是绣者捕捉到大自然的细节, 领会画中的神韵, 从而创作出绘画所不能达到的艺术效果。而晚期顾绣的作品只采用一、两种颜色, 施潦潦针法, 简单表现, 这是晚期顾绣所不及之二。早期顾绣精致的擘丝、精妙的晕色风格, 是晚期顾绣作品所不及之三。就连晚期顾绣用的绫地, 都比早期的稀疏松弛, 可见晚期顾绣作品的粗枝大叶。这个时期的顾绣作品尺幅虽大, 但绣工简单, 绣稿不再讲究; 绣地绫面已不及明代绫面的细密光泽; 半绣半画的点染彩绘也不得章法; 没有早期顾绣的考究; 刺绣针法技巧运用变化简单。此时的顾绣只追求数量, 不再以绣品的精致为标准, 因此, 不及明代的精品卓著, 但仍然保留着顾绣的基本风格。



图5 顾绣《竹林七贤图》

#### 四、顾绣盛衰的原因

通过对顾绣不同时期的作品比较, 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探索顾绣由盛至衰的主要原因:

首先, 是封建社会统治王朝的专制集权、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 给顾绣带来的影响。顾绣起源于何时尚未有准确的考证, 但兴盛于明末清初是毋庸置疑的。它的兴盛与衰落首先离不开政治社会这个大的背景。

明中后期, 宦官弄权, 朋党相争, 朝廷政治黑暗, 统治阶层昏庸腐败, 中央集权衰弱。随着统治阶层对社会的控制逐渐松懈, 无形中给地方上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明朝中后期, 在经济发展的刺激下, 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南

方沿海地区物产丰富, 养蚕、丝织、手工艺发达, 人民较为富足。商业也自然蓬勃兴盛起来, 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思想开放, 大大扩展了艺术活动空间。此时, 不甘同流的一些士大夫不愿卷入宦官、朋党之争, 或弃官返乡, 或明哲保身。他们仕途失意, 但思想活跃, 爱好古典艺术, 喜欢收集古玩字画, 兼具琴棋书画, 追求高品位的生活享受。通过寻求新的生活目标, 博取精神上的安慰, 逐渐形成了一股讲究附庸风雅、崇尚闲趣的风尚。过着“以耽情诗酒为高致, 以书画弹棋为闲雅, 以禽鱼竹石为清逸”的闲情生活。顾绣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脱颖而出, 它以精妙的刺绣手法, 表现宋、元时期字画的神韵, 使其上升到更高的艺术品级, 充分满足了文人士大夫的追求品味, 顺应了时代的需求。从而使顾绣艺术誉满江南, 并被皇宫选为御用, 以至达到鼎盛。

其次, 画绣稿本的选择。

顾绣, 依其绣技特点, 亦被称为——画绣。这里有两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是说, 顾绣

蓝本本身就是一幅画。第二层含义是说, 顾绣作品本身既是用针线刺绣, 同时绣者又深谙绘画技巧, 可以直接在作品上半绣半画。用针刺绣与用笔绘画二者缺一不可, 达到了刺绣与绘画的完美结合, 提高了刺绣艺术的内涵。这是顾绣区别于其它刺绣的不同之处, 也是它最终衰落以至几乎失传的原因之一。

早期顾绣大多选用宋元时期著名的画家作品为刺绣的稿本。目的是作为艺术品, 供文人雅士、士大夫赏玩、收藏和馈赠。为了顺应当时的社会需要, 在选择绣稿时起点高, 以名人的书画为刺绣稿本, 加上高超的刺绣技术和绘画功底, 自然出珍品。晚期许多顾绣作品已沦为日常用品, 正如徐蔚南《顾绣考》中所载: “绣工竟惟以绣蟒服胸背及衣袖佩囊为事, 画幅即偶一为之……”。<sup>④</sup>绣稿的选择多为市场需求而定, 作品的精湛标准大

多是为了满足市场的行情。从根儿上来说，没有名家大作为蓝本，失去创作优秀画绣的基础，晚期顾绣没有珍品也就不难理解了。

第三，个人修养艺术氛围，所处社会阶层。

韩希孟，以及在她之前的缪氏均是顾绣早期的代表人物，在文章开头我们已经介绍。她们修养高，技艺精。不仅具有脱俗的个人艺术品味，而且具备高超的刺绣技能。她们所处的年代，社会环境较为安定，丝织业发达兴旺。刺绣、设色的技艺在宋代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当时顾家是官宦府邸，家境富足。上流社会的安逸，文人雅士的交往，悠闲的生活环境。使刺绣技艺精绝的她们同时又喜好书画，精通工笔花鸟。浓郁的文化氛围，丰富了她们的艺术修养，优越的生活条件使顾绣技艺在韩希孟手中发展到极致。

顾家第二代的顾斗英，乐善好施，生活奢靡，挥金如土，不到二十年就“室如悬磬”，加之生病以至吃饭都成问题。及至晚期顾家早已风光不在，生存环境的改变使顾绣从高雅的殿堂跌落到民间店铺，代表人物已难考证。作品大都署名露香园，但远无法与早期作品媲美。仅从顾绣题材的选择上，就能明显反映出早、晚期绣者本人所处的社会层次和不同的艺术鉴赏力。缺少了著名文人墨客的追捧宣扬，就失去展示作品的市场。很难想象有谁能精心选择名画，揣摩画家的意境，数年如一日的去绣一件得不到重视、无人喝彩的艺术珍品。

第四，利益诉求下的大众化、商品化与创新。

顾兰玉——是清初才女，是顾名世之曾孙女。政权的更替，家境的变迁，生活的窘迫，迫使她开幔授徒。开设绣庄生产绣品，毕竟不是闺阁刺绣，虽然均为手工工艺制作，但因追求的目的不同，绣品需求的对象不同，所得到的绣品既可以是艺术品，也可以是日用品，艺人同时也是匠人。最关键的是，顾绣已经不再是单纯的闺阁女红，发展到可以在一家一户中完成。顾兰玉几十年传艺的结果，使顾绣名震江南，价格昂贵，盛极一时。且作品大多落“露香园”、“虎头”等印章。但也正应了那句老话——物极必反。东西好，销路就好，销路好模仿就多。顾绣艺术的商品化，一方面使顾绣技艺在民间广为传播，为大众所掌握；然而从另一角度来看，正因为大众化，松江地区周边“寒女”争相仿作，以至后来“顾绣”绣庄泛滥，仿作满天。使原本为艺术品的顾绣蜕变成成为普通商品，不可避免的从高雅走向艳俗，最终渐趋衰落，

被其它刺绣所湮没。但在中国上千年刺绣史中，能以自己的姓氏、宅邸冠名的绣艺品种可谓凤毛麟角，顾绣是当之无愧的佼佼者。顾兰玉对顾绣的推广、兴盛功不可没，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至乾隆年间，顾绣有许多为男工所作，正如徐蔚南所著《顾绣考》中记载：“清初工巧渐不如前，价亦迟减，……至乾隆间，顾绣半多男工为之，……”<sup>④</sup>。这时绣品中的幅面宽大者如屏障之类，仍价值甚贵，各方争购。嘉庆时，根据市场需要，顾绣绣品大量转为衣服、佩饰等生活实用品，纯欣赏性的画幅绣品大为减少，仅偶一为之。商品化利益的追求，致使模仿者大量出现，急功近利、粗制滥造，使顾绣流于俗套，顾绣品位一落千丈。至顾玉兰之后，再难见到绣工出众的名人传世。相反从顾绣中吸收营养，有文采、懂绘画功底，绣有成就的一批绣匠，不屑于与俗人为伍，单立门户，以示清高，大家并未宣称与顾绣有师承关系，顾绣渐渐被苏绣所取代。

综上所述，一幅好的顾绣作品是艺术的再创造而绝非一般的模仿，它必须能够创新。任何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如果不能做到在原有技术基础上推陈出新，它就会失去发展的动力。除了客观条件不同以外，从绘画到刺绣，绣者在针法运用、色彩搭配、针工技巧等方面都有一个再创作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中，绣者本人的技艺水平与对其它艺术门类知识掌握程度，起到了决定作用。没有一定技术水平和多学科艺术修养是难以完成的。早期顾绣崛起源于此，晚期顾绣衰败亦源于此。

①②④徐蔚南：《顾绣考》，第1页，中华书局1936年发行。

③朱保炯、谢沛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下卷，第254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发行。

⑤《顾绣考》第2页，中华书局1936年发行。

⑥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六》，第16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发行。

⑦《顾绣考》第12页，中华书局1936年发行。

⑧《顾绣考》第5页，中华书局1936年发行。

⑨《顾绣考》第5页，中华书局1936年发行。

⑩《（崇祯）松江府志》卷七，第27页。

⑪⑫上世纪九十年代，经故宫博物院陈娟娟老师鉴定为顾绣。

⑬⑭《顾绣考》第4页，中华书局1936年发行。

（作者为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馆员）

# 清代“迦陵禅师舍利塔”考

宣立品

北京西山大觉寺内有一处覆钵式白塔，矗立于寺庙中轴线的最高点，塔旁有一松一柏将其环抱，这一景观被人们形象的称之为“松柏抱塔”。“松柏抱塔”作为该寺庙的一处人文景观，多年来被游客广为关注，记载的文章也不胜枚举。然而，对于此塔的来历，知其然而又知其所以然者甚少，以讹传讹者甚多。此塔多被后人认定为清代雍正初年大觉寺著名禅师迦陵和尚的舍利塔而广为传颂。迦陵和尚，讳性音，号迦陵，别号吹馀，生于康熙十年（1671），圆寂于雍正四年（1726），曾任杭州理安寺、北京柏林寺、江西归宗寺和北京大觉寺等多处寺庙住持。<sup>①</sup>因大觉寺是迦陵禅师最后住持的一所寺院，所以后人多认为大觉寺内白塔就是迦陵的舍利塔。不过，也有不少学者对此说法有不同意见。那么这座塔到底是不是迦陵禅师的舍利塔呢？如果不是，这座塔是一座什么样的塔？为何被后人所一再误传？那么迦陵禅师的舍利塔又在哪儿呢？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来翻看一下史料中比较有代表性意见的相关记载。

## 一、大觉寺白塔是否为迦陵禅师舍利塔

### 1、史料中关于大觉寺白塔的相关记载

大觉寺藏清代乾隆十二年（1747）《御制重修大觉寺碑》记载：“大觉寺者，金清水院故址，明以灵泉寺更名。运谢禅安，蔚为古刹。康熙庚子之岁，皇考以僧性音参学有得俾往往住持丈室，御制碑文以宠之。及圆寂归宗，复命其徒建塔於此。”<sup>②</sup>《钦定日下旧闻考》记载：“原黑龙潭北十五里曰大觉寺，宣德三年建……又寺内龙王堂辽碑一，僧志延撰，咸雍四年立。寺旁有僧性音塔。”<sup>③</sup>《光绪顺天府志》记载：“大觉寺，即辽清水院故址也，在黑龙潭北十五里……乾隆间又修，寺旁有僧性

音塔。”<sup>④</sup>《鸿雪因缘图记》记载：“大觉寺在妙峰山麓……康熙五十九年，世宗在潜邸时，特加修葺，命僧性音住持。乾隆十二年，高宗重修……右置精舍曰憩云轩，前为七堂，左设香积厨，坛后有塔，塔后有塘，塘后有楼……”<sup>⑤</sup>通观以上清代史料，我们都可以看到迦陵塔与大觉寺之间似乎存有某种关系，但是“复命其徒建塔于此”的“此”就是指大觉寺内吗？“寺旁有僧性音塔”这一个“旁”字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些史料似乎都没有明确大觉寺内白塔就是迦陵塔的意思。

民国时期《西郊游记》记载：“最后一层在半



大觉寺覆钵式白塔

山中,有一座塔叫藏经塔。塔后有一个泉……”<sup>①</sup>《旧都文物略》记载:“寺在西直门外西北六十里……最后山顶有舍利塔一座,为乾隆时造塔。”<sup>②</sup>《燕都名山游记》记载:“再西北行八里,到妙峰山麓有大觉寺……大悲坛的后面,有座藏经塔,长松环绕,势甚挺秀。”<sup>③</sup>《北京旅行指南》记载:“寺建于山腰,别院有四宜堂、憩云轩、领要亭诸胜,寺后山顶建有舍利塔一座。”<sup>④</sup>这样看来,民国时期的史料,也没有确指大觉寺塔即迦陵舍利塔一事。

直至1953年7月25日,罗哲文先生在《北京日报》发表了一篇《大觉寺》文章以后,关于这座塔才听到与以往不同的说法:“舍利塔在后院正中,是清代乾隆年间所造的。塔旁有一棵巨松,仿佛给塔打了一把伞。这座舍利塔是一个和尚的墓。塔的形状和北海白塔差不多,下部是八角形的‘须弥座’,中部是圆形的塔肚,上部是细长的‘相轮’,顶上装有‘宝盖’。”<sup>⑤</sup>这篇文章虽然没有明确这个白塔就是迦陵和尚的舍利塔,但是它却至少明确了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这个塔建于清代乾隆年间;第二,这个塔是一个和尚的墓塔。这两个问题就足以使后人将迦陵和尚与这座白塔联系在一起。1980年12月14日,《北京日报》上又见到一篇署名为孙秉友先生撰写的《游大觉寺》文章,该作者在罗哲文先生的基础上有所发挥:“拾级而上,是一座白塔。据说,这是大觉寺主持迦陵的舍利塔。迦陵原是大觉寺的烧火和尚。有一年,乾隆皇帝在大觉寺剃度受戒,坐禅时打盹作梦笑出了声,迦陵和尚操起戒尺便打。乾隆皇帝不得不承认‘门阙少缘分,凡尘属寡人。’悄悄地回宫了。人们都为迦陵和尚担惊受怕。后来,乾隆皇帝特意派贴身太监来看望迦陵和尚,迦陵就成了大觉寺的主持。”<sup>⑥</sup>这篇文章里,作者尚使用了“据说”二字,那么随后的文章,如1981年《旅游参考》:“同时在大悲坛的后边,为寺内已故的主持迦陵和尚,建筑了一座秀丽玲珑的舍利塔,形状和北海的白塔相似。”<sup>⑦</sup>又如1982年《旅游》:“泉旁有一座秀丽玲珑的八角砖雕舍利塔,当年是专为已故的寺内主持迦陵和尚而建的。”<sup>⑧</sup>这些文章都明确了此塔即迦陵禅师舍利塔的说法。至于以后的文章,大多因袭此说,于是,大觉寺白塔也就“确实确实”地成为了迦陵和尚舍利塔。

2、考证史料得出的结论——大觉寺白塔不是迦陵禅师舍利塔

综上史料,我们可以明确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清代至民国时期,未见大觉寺白塔即

迦陵舍利塔的确切说法。

第二,大觉寺白塔为迦陵和尚舍利塔的说法始于解放以后,即1953年罗哲文在《北京日报》上称“大觉寺白塔是清代乾隆年间建造的一座和尚墓塔”;1980年孙秉友在《北京日报》继称“据说此白塔就是大觉寺主持迦陵的舍利塔”;1981年以后便开始出现“大觉寺白塔是为寺内已故主持迦陵和尚所建”的确切说法。

通过以上史料考证,我们可以明确“大觉寺塔即迦陵和尚舍利塔”的说法为以讹传讹,是没有历史根基的。由乾隆十二年《御制重修大觉寺碑》“皇考以僧性音参学有得俾往往持丈室,御制碑文以宠之。及圆寂归宗,复命其徒建塔於此。慈恩眷顾,圣迹攸昭……”<sup>⑨</sup>可知,为僧迦陵性音建塔是在“乾隆皇考”时期,即雍正年间,所以,罗哲文先生认为此塔为乾隆年间所造的判断是错误的。而孙秉友先生那个关于乾隆皇帝挨烧火僧迦陵痛打的传说更是子虚乌有,迦陵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被雍亲王胤禛力荐至大觉寺任住持,雍正元年(1723)即离开大觉寺“飘然南游”,雍正四年(1726)圆寂于江西庐山。迦陵既没有在大觉寺当过“烧火僧”,更不可能在圆寂后再度被乾隆皇帝由“烧火僧”提拔为住持。既然这种“据说”不能成立,那么之后的确指就更没有根基了。

## 二、大觉寺白塔到底是一座什么样的塔

在初步推翻“大觉寺白塔即迦陵和尚舍利塔”这一论断后,我们不妨静下心来仔细欣赏一下这座白塔。塔为典型的藏传覆钵式白塔,砖石结构,分为地宫、塔基、塔身、塔刹四部分。塔高约15米,下有八角须弥座,中部是圆形塔肚,上方是细长的相轮,顶上饰有宝盖。塔基高0.5米,呈四方形。塔座为八角形,正面朝东,上枋和下枋雕刻仰俯莲花,四周由祥龙、葵花、牡丹、莲花、西番莲等图案砖雕构成。塔身上宽下窄,正面有焰光式塔门。塔身上面的相轮共有十三层。最上面是华盖,金属华盖上雕刻有一圈“佛”字,共16个,华盖下还悬有风铃8个。塔旁有松树柏树各一株,据古树专家估测,树木已有五六百年以上的树龄。古树的树龄、白塔的形制、塔身的纹饰、以及大觉寺殿堂内供奉的多尊具有明代早期藏传佛教特色的佛造像,似乎都在印证着这座白塔的身世。如今,已有很多专家推断这应是一座建于元代末期或明代早期的“佛塔”。所谓佛塔,是为珍藏佛



20世纪70年代大觉寺南塔院被损毁遗迹

家的舍利子和供奉佛像、佛经之用，而非某个僧人的真身舍利塔。另据大觉寺现藏清代道光八年（1828）文札记载，当时寺院住持真觉和尚向宛平县衙禀报大觉寺内各处建筑等渗漏、坍塌、损坏的情况，其中提到“佛塔一座，不齐。龙潭栏杆鼓闪，龙王堂瓦片脱截……”<sup>⑧</sup>那时即把大觉寺白塔称之为“佛塔”。至于该白塔确切的建塔年代，恐怕只能有待于求证到更明确的文字史料、或者对于该塔进行考古性发掘后而得出的结论了。

### 三、迦陵禅师舍利塔到底在哪里

既然寺内的这座白塔不是迦陵和尚的舍利塔，那么他的舍利塔到底在哪里呢？经过多方考证之后，我们也很快得到了明确的答案，“复命其徒建塔於此”的“此”和“寺旁有僧性音塔”的“旁”实际是确有所指的。

据国家图书馆藏《性音和尚塔记》拓本记载：“性音和尚塔记，清雍正六年（1728）十月刻。石在北京海淀区大觉寺塔院。拓片碑身高56厘米，宽54厘米，额高16厘米。正书‘圆通妙智大觉禅师传临济

正宗三十四世迦陵音和尚塔’。”<sup>⑨</sup>大觉寺塔院，是大觉寺南约1.5公里处的一座寺庙附属建筑群，是清代大觉寺内僧人圆寂之后灵骨安葬之所。上个世纪70年代塔院遭到破坏，目前遗址尚存。迦陵禅师的舍利塔应在此处。

另据国家图书馆藏民国十八年（1929）刊印的《宗鉴法林》由河南大学胡改庵教授撰写的序言中，提到为其亡夫人发愿补刻大觉寺寺藏《宗鉴法林版的过程中，他曾到“寺右”徐各庄村性音塔处祭拜。<sup>⑩</sup>“寺右”者，今大觉寺之南也。由此可知，性音确葬于大觉寺外西南1.5公里的南塔院。

另据大觉寺藏清代木刻经版，也可作为南塔院迦陵塔存在的旁证。《佛泉禅师语录》卷五记载：“先老和尚讬至上供拈香云……两周年塔前上供举肃宗问忠国师‘百年后所需何物？’忠曰‘与老僧造个无缝塔’……三周年塔前上供……”<sup>⑪</sup>佛泉禅师是迦陵禅师的弟子，是继迦陵之后大觉寺第二任住持。雍正四年秋迦陵圆寂于庐山归宗寺，所以这里有“先老和尚讬至”的记载，两年后的雍正六年十月，奉皇命将迦陵灵骨迁至京西大觉寺，所以这里有“两周年塔前上供”以及后面的“三周年塔前上供”等记载。迦陵圆寂一周年之时，其灵塔尚不在大觉寺，所以这里看不到“一周年塔前上供”的记载，而只是从两周年在大觉寺建塔之后开始。《月天宽禅师语录》卷上记载：“师翁塔前上供拈香云……先师塔前上供拈香云……”<sup>⑫</sup>



大觉寺南塔院遗址

月天宽禅师是佛泉禅师的徒子、迦陵禅师的徒孙，是继佛泉之后大觉寺第三任住持。月天宽同时祭拜迦陵塔和佛泉塔，印证了他们的灵塔应在一处，即大觉寺塔院内。

然而迦陵禅师的舍利塔并不是想当然的建造于此的，其间还经历了一些曲折。据《庐山归宗寺志·迦陵国师传》记载：康熙五十九年应命入主大觉寺，雍正元年春，“谢院事，飘然南下，从此一瓢一笠，山栖水宿，居无定止。”<sup>①</sup>雍正四年秋，“复还归宗之吹馀静室，九月二十二日示微疾，候安者皆作悲戚状，因举疏山造塔公案，逐段拈颂，内有‘此处埋老僧不得羊肠鸟道自庚辛’之语，此虽最后垂范，而实似预示迁塔京都西山之大觉也……二十九日酉时泊然而逝。”<sup>②</sup>雍正六年十月，奉皇帝命将迦陵禅师遗骨迁至京西大觉寺。“真身既迁京都，门人实续、法子大觉等与督修何懿复为师衣钵塔，以当胜迹。”<sup>③</sup>由此可知，雍正四年迦陵禅师圆寂后曾被葬于江西庐山归宗寺，后奉雍正之命于雍正六年十月将其灵骨迁移至京西大觉寺，塔铭曰“国师圆通妙智大觉禅师传临济正宗三十四世迦陵音和尚塔”。在灵骨被迁之后，庐山归宗寺弟子们又为迦陵禅师建造衣钵塔以当胜迹，并于同年十二月，得到雍正皇帝褒赐的碑文，追赠迦陵性音和尚为“国师溢圆通妙觉大智禅师”<sup>④</sup>，并于迦陵衣钵塔旁立碑石以示恩宠绵延。《庐山归宗寺志》对此有专门记载：“国师塔在寺右里许，即古灵溪观地，塔惟衣钵，真身迁北京西山大觉寺矣，塔左有御碑亭。”<sup>⑤</sup>所以，江西庐山归宗寺国师塔实为迦陵禅师衣钵塔，而迦陵禅师真身舍利塔应在北京西山大觉寺塔院内。

综上所述，大觉寺白塔实为一座佛塔，而非迦陵禅师舍利塔。迦陵禅师塔应有两座：一座在江西庐山归宗寺，是为衣钵塔；另一座在京西大觉寺南塔院，是为真身舍利塔。所以，通常所说的迦陵禅师舍利塔，实应为大觉寺南塔院内迦陵和尚塔。我们在亲往踏查后发现，两座塔如今都已不存于世，虽遗址尚存，但终无法再亲瞻胜迹。好在流芳于世的《庐山归宗寺志》、《理安寺志》、“大觉寺藏清刻禅宗典籍八种”和“大觉寺藏迦陵禅师画像”等珍贵的史料为我们开启了一扇了解迦陵禅师的方便之门，使我们尚有机会得以在衣钵塔和舍利塔的遗址上哀思凭吊。在了解了史实后，

我们就更不应该再将“大觉寺内白塔为迦陵禅师舍利塔”这个观点一再地误传下去了吧！

①②③④(明)释德清；(清)周宗建著：《庐山归宗寺志》，87-93页，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6年版。

⑤(清)高宗弘历撰文，庄有恭正书：《御制重修大觉寺碑》，刻于清代乾隆十二年，碑石立于大觉寺南碑亭内。

③(清)于敏中等编纂：《钦定日下旧闻考》(第六册)，1764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④(清)周家楣等编纂：《光绪顺天府志》(第二册)，568-569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⑤(清)麟庆著文、汪春泉等绘图：《鸿雪因缘图记》之《大觉卧游》篇，北京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⑥陈说撰：《西郊游记》之《从温泉到大觉寺》篇，21页，民国23年版。

⑦北平市政府秘书处编：《旧都文物略》之《大觉寺》篇，24页，北平市政府秘书处，民国24年版。

⑧李慎言撰：《燕都名山游记》之《大觉寺》篇，123页，北京燕都学社，民国25年版。

⑨马芷摩撰：《北京旅行指南》之《大觉寺》篇，218页，北京新华书局，民国30年版。

⑩罗哲文撰：《大觉寺》，《北京日报》，1953年7月25日版。

⑪孙秉友撰：《游大觉寺》，《北京日报》，1980年12月14日版。

⑫《旅游参考》之《大觉寺》篇，8页，1981年78期。

⑬安仲皇撰：《旅游》之《狮子滚绣球 一佛二菩萨——记大觉寺》篇，1982年4期。

⑭《西山大觉寺住持僧真觉禀报文札》，大觉寺藏，清道光八年版。

⑮(清)《性音和尚塔记》拓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

⑯(清)释性音编《宗鉴法林》，序言，胡改庵撰写，民国18年版。

⑰(清)释际宽等编：《佛泉禅师语录》卷五，1-2页，板存大觉寺，清乾隆三年版。

⑱(清)释了睿等编：《月天宽禅师语录》卷上，3页，板存大觉寺，清乾隆年间版。

⑲(明)释德清；(清)周宗建著：《庐山归宗寺志》，29页，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6年版。

(作者为北京大觉寺管理处助理馆员)



# 元通惠河下游河道 与河门上闸位置的选择

周良 戴立军

研究我国运河文化的学者专家都知道，元代至元三十年(1293年)秋开凿成功的通惠河河道上，自上游至河口依次设有广源、西城(会川)、朝宗、海子(澄清)、文明、魏村(惠和)、籍东(庆丰)、郊亭(平津)、杨尹(溥济)、通州(通流)与河门(广利)等24座水闸，用以节制水流而利于行船。其中通州上、下二闸与河门上、下二闸均在今通州区区内。

关于通惠河下游河道与河门上闸位置的选择问题，由于史料记载粗疏，有些学者根据《元史·河渠志·通惠河》、《析津志辑佚·河闸桥梁》和《漕河图志·漕河水程》等不少古籍中所载，即通州闸“在通州之西北”、“上闸在通州西门外”、“下闸在通州南门外”、“高丽庄广利闸二”、“广利闸在张家湾中马头西”等寥寥数语<sup>①</sup>，便以为元时通惠河下游河道穿今通州城中(新华大街)，再折向东南，到今张家湾镇里二泗村西入白河。这种结论实是欠妥。

其一，金天德三年(1151年)，通州乃是“取漕运通济之义”而名<sup>②</sup>，表明潞水(元代称白河)已被开辟为运河。且为解决首都中都城(今北京宣武区一带)至通州之间的水路运输漕粮问题，金世宗、章宗两朝先后利用高粱河东段南支(今通惠河)开为金口河、闸河<sup>③</sup>，则进一步证明潞水通漕河直抵通州城下。又，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为转运由白河运到通州的漕粮及时入储大都城光熙门(今北京东直门)外国仓，首先开凿坝河<sup>④</sup>，再一次说明直到元代，通州城东侧的潞水(白河)都在通漕。

本来通州城离大都城很近，本来通州城下白河通漕，本来首都与通州之间有旧时运粮水道金闸河遗迹，本来水利专家郭守敬完全应该疏导前朝闸河故通，于通州城东入白河，省工省费又近便，为什么不这样做，偏要将通惠河开凿到通州城东后将河口远设在40里外的里二泗村西呢？这个问题，可由读者去思考，就可否定通惠河下游河道穿经今通州城而后折向东南去里二泗的推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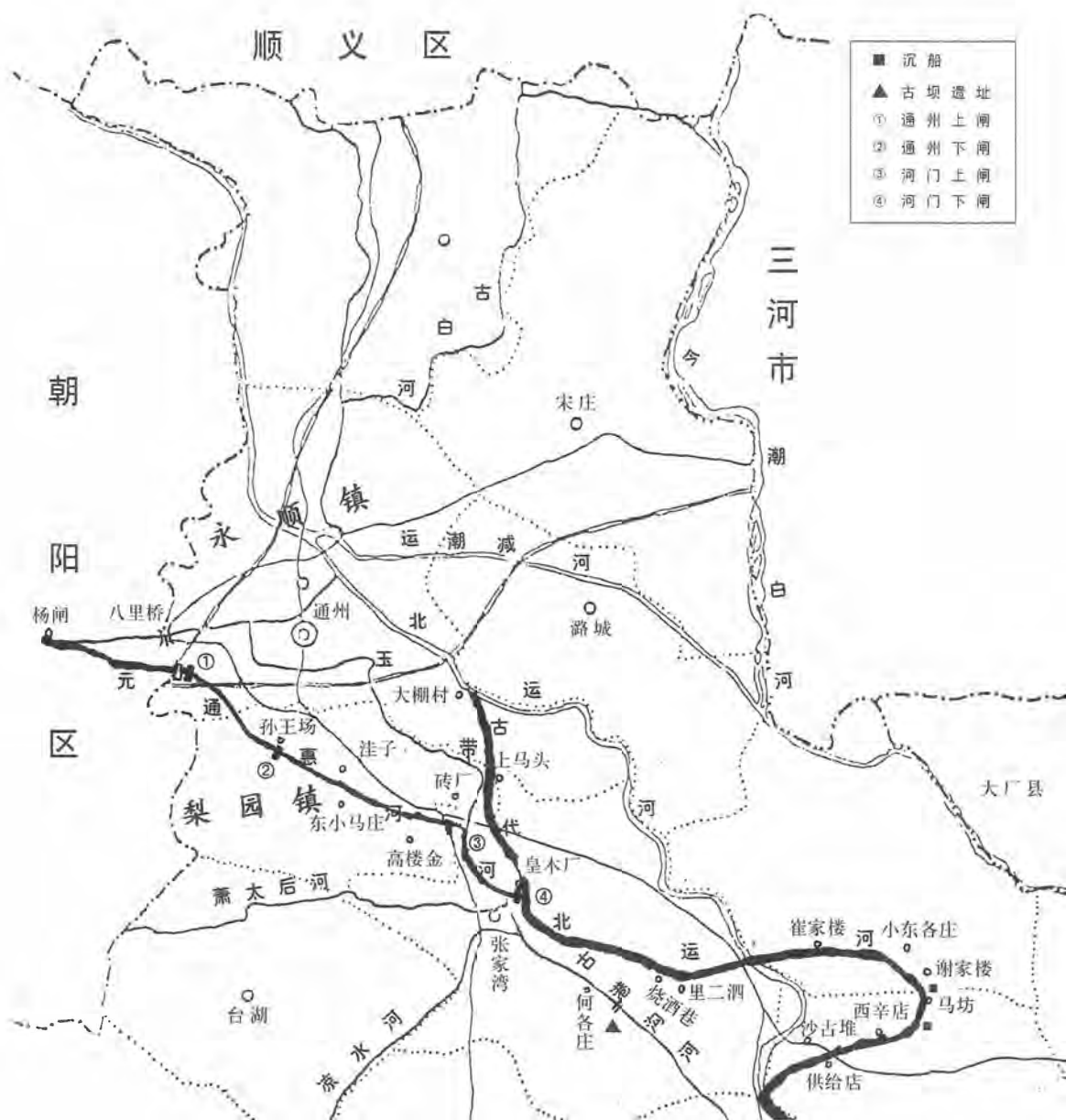
其二，持“通惠河下游河道穿今通州城”论者的主要依据是通州上闸“在通州西门外”、下闸“在通州南门外”，而元代通州城在今通州城中新华大街以北区域，且将明万历年间修建的南浦闸当作元代通惠河通州下闸的位置，用以证明元代通惠河河道走向。其实，金末元初的改朝换代战争，通州城及其郊域是重灾区，加上元初的残酷统治，通州城外的农村破坏殆尽，就连通州上、下闸的具体位置都不能像其它魏村闸、效亭闸那样以闸所在位置的当时村名就能确定闸位，而是以“西门外”、“南门外”的宽泛字眼儿来记述通州上、下闸的位置。这里的“外”字不能理解为“旁边儿”，“西门外”、“南门外”所指的范围很大，实际在于何处，这得从今天的实地考察才能知道。

另外，“南浦闸”是明代万历年间创建的，是为保证用护城河剥运土坝验收后的漕粮入储通仓而保持水位才建的水闸，虽然史料没有言明闸下河流的名称，但据一般的地名规律断定，这河的名称应该叫“南浦河”。“浦”是通往大河的小河，又在通州城南，故称南浦河，在此河上只建一座水闸，故称之为“南浦闸”。据我们在1983年进

行文物普查时沿着南浦闸遗址处小河遗址向南踏察所知，此河在今张家湾镇土桥村东北汇入古运河（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以前的大运河道）。这就从实际上否定了南浦闸下的河道不是元代通惠河下游河道。1973年我们在张家湾公社知青办工作的时候，曾经参加过在土桥村东北平整大运河故道的劳动，至今记忆犹新。后来大运河改道，南浦河改称为玉带河，在土桥村南利用了元代通惠河的一段故道。

其三，《元史·河渠志》及其它许多史料都说通惠河“东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sup>⑤</sup>，无可辩驳地指出，通惠河河口即汇入白河之处离高丽庄不远，附近没有可作河口标志性的村庄，所以史书上在记

述通惠河河口位置时才那样去写。在开通惠河时，今张家湾镇域内有几个较大的村庄，北部的小街村（唐时称临河里）、西部的高丽庄（唐贞观间太宗李世民自辽东俘虏来高丽人所建，后与汉人同化，明代写成高力庄，即今大高力庄）、南部的枣林庄、东部的里二泗（《元史》中写成李二寺）与千户屯（今西定福庄）。在这些古老村落中，只有高丽庄距通惠河口最近，故而史籍都写成通惠河在“通州高丽庄入白河”，而其余几个老村庄则无缘谈及了。假如该河口离里二泗近，自然就写成“在里二泗入白河”，为什么没如此写呢？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离此村较远。由此可见，通惠河河口离里二泗村很远，因此说“河门下闸”在里



元通惠河下游河道与河门上闸位置示意图

二泗村西就不辩自倒了。持河门下闸在里二泗村西提法的学者，应该自问一下：既然白河都到了高丽庄附近，怎么会由西北而来的通惠河非要绕过高丽庄附近的白河河道，偏偏要远远地到里二泗村西的白河河道去汇入呢？为什么非要在高丽庄附近与白河河道并行很长一段才汇入白河呢？

持河门下闸在里二泗村西的重要依据是有学者在那里发现了闸址夯土遗迹，于是就下了那样的结论。其实是这位学者不了解通州的河道变迁情况所造成的。里二泗村西发现夯土闸址的河道，是古代港沟河河道。1954年春，河北省在治理北运河水系凉水河时，将在张家湾汇入北运河的凉水河，与港沟河接通，再顺港沟河河道向东南方向治理，到今潮县镇许各庄东抛开港沟河故道，而将凉水河开引到苏庄村南入运河。实际上，那闸址是在古代港沟河上，没在所谓的“通惠河”上，学者将港沟河与通惠河弄混了。

古代大运河在今张家湾附近有5条河流相聚，通惠河、萧太后运粮河、凉水河自西南、西、西北方向来入大运河，但起点在张家湾的港沟河（古代箭沟遗迹）也与运河相通，分流运河水量，影响运河水位，故在此河中建滚水坝，用以节制流量，保持运河水位，保障漕运。由于学者没有弄清古运河（嘉庆十三年改道后称小盐河）故道在张家湾镇内的具体线路和凉水河、港沟河的变化情况，见一处坝址夯土而不顾其余，遂产生了甚不妥当的河门下闸位置论断，随之也就将通惠河下游河道走向及河口位置弄得驴唇不对马嘴了。

上面从史籍与实地踏察方面，指出了元代通惠河下游河道不穿经今通州城，河口及河门上闸不在里二泗村西。那么，该河下游流经今通州区何处呢？通州上、下闸与河门上、下闸具体位置在哪里呢？

要讲明通惠河下游河道在通州城内走向，就得从设在今通州永顺镇、张家湾镇内的两座水闸说起。上世纪80年代，我们在下班后曾几次来到通县（1997年复称为通州）西火车站候车室东面的一个条形坑内用踹网下水捕鱼，坑为西北—东南走向，长有不少芦苇。坑的偏南一端有一座桥，桥洞宽约6米，洞壁为条石垒砌，陡直，但桥面是平的，为钢筋混凝土筑，明显为两个时代所为。洞壁两侧砌有略显“八”字形的石壁，西面的石壁较长，东面的石壁因修路毁掉大部。桥南是窄沟，通往东南方向中国科学院印刷厂的古河道遗迹。根据桥洞的宽度与洞壁及雁翅的形制，可以推断这里是一座古代石闸，依据条形水塘的

走向，再沿着水塘两端延长线踏察，发现有西北向延长线上有一条河道遗迹通向八里桥以西的通惠河南岸，而东南向延长线上也有一条水沟通向科印厂附近的古河道遗迹。走访当地老人，亦言有一条老河经此。2001年秋，农业部印刷厂装订车间质检员、文物爱好者朱大顺，在梨园镇孙王场村南条形坑塘内发现一艘古代沉船残体，长10米左右，已经糟朽。这个条形坑塘基本上还是西北—东南走向，与西火车站处的条形水坑在一条延长线上。

上面记述的是永顺镇域内西火车站候车室前面的一座水闸及其闸门两侧延长线河流遗迹的实际情况。下面讲现存张家湾镇域内土桥村西口外的一座水闸。

在土桥村中，2003年前尚保留一个东西向条形水塘，水塘上建有一座独券平面石桥，以连接古运河北端码头张家湾通往通州、北京的陆路运输大道。桥面南北向，桥洞东西向，表明桥下河道自西而来。此桥正名叫广利桥，俗名土桥，桥尚完整存在。桥西100余米处，有一座石闸遗址，早已掩在地下。2005年，土桥进行旧村改造，施工中将石闸的几块长方形石料挖出3根，丢弃在村西公路东侧下坡处。石料为青色花岗岩，长约3米，宽约0.5米，厚约0.3米，端部两侧都有燕尾榫，似是石闸雁翅石壁用料。根据条形老塘与广利桥准确判断，此座石闸闸门亦应向西，而且应叫广利闸，闸与桥同名，是先有闸而桥以闸命名，还是先有桥而闸依桥命名，抑或是闸、桥同时而建且相距甚近则取同名，史无记载，不得而知，不能妄言和推断。但有一点绝对肯定，河道自西来。史料载广利闸是建在元代通惠河上者，则证明桥、闸间条形水塘必定是通惠河故道，而进一步证明元代通惠河是在广利闸之西，而不是从北面的通州城走来。从现场实地考察来看，元代通惠河从土桥村西过来，过了广利桥，向张家湾城东行去，与从北面流来而经土桥村东的玉带河毫无关系，这就更加表明，元代通惠河不流经今通州城再折流张家湾。

明户部侍郎王琼所撰《漕河图志》载：“广利闸，在张家湾中码头西”，明确指出广利闸的具体位置，还载此闸至河口3里<sup>⑥</sup>，表明此闸就是元代通惠河的河门上闸。何处是张家湾中码头呢？没有明确记载，只知道今张家湾镇内有个“上马头”村，村南、东有古运河遗迹，表明这个村名是因张家湾的上游码头位置得名，见证了张家湾上码头的位置，而中、下码头则史籍无载。然而，从

土桥村西高楼金村（清代所建小高力庄、娄子庄、金庄合而称之）南侧出土的明处士戴芳墓志的铭文中，可以见到张家湾中码头位置的端倪。此合墓志于1995年6月高楼金村南侧出土，村民新建房挖自来水渗井时发现，我们及时收集入藏文物管理所内。志盖题额为篆书“大明故戴处士墓志铭”等9字，志底首题为“明故戴处士墓志铭”等8字。志文戴处士戴芳祖先乃淮安盐城望族，富甲于乡。“永乐初，取天下富民实京师”，其父一家被征而迁到顺天府宛平县德胜门里，后遭时艰，门户日衰。其欲振家业，便“徙居通津张家湾，创业于中码头，不憚江湖之险，往来南北贸易，辛勤数十年，业益饶裕，子孙于是遂家焉。”<sup>①</sup>死后，就葬在土桥村西高力（丽）庄北，土桥村中戴姓应是戴芳后代。从志文中记载可知，《漕河图志》中所载“张家湾中码头西”就是今土桥村西，则表明今土桥村东就是古运河道，那里有座码头，称作中码头，永乐间建北京而由大运河自南方运来的城砖，就由中码头卸船上岸，存储在中码头北面不远的工部砖厂，今土桥村北隔京津公路相望的砖厂村，就是因设砖厂而产生而村名。由此可以准确断定土桥村西口处的水闸遗址就是元代通惠河河门上闸（广利上闸）遗址。从《漕河图志》所载广利闸“下至闸河口三里”的情况断定，广利下闸即河门下闸的位置也就在土桥村南3里处的皇木厂村南虹桥（尚存）东侧之处了。

确定了广利上闸即河门上闸的具体位置在今土桥村西口处，再依据《漕河图志》所载广利闸“上至通流（通州）下闸11里”、通流下闸“西北至上闸五里”<sup>②</sup>的情况，去实际踏察，推定在今梨园镇内王家场村南、车里坟村西、孙庄村北的古塘东南角处，应该有通流（通州）下闸遗址。走访老人得知，那里确曾有过一段石壁塘岸，而且附近坑底还曾发现过古代沉船，可以确定通州下闸即在此处。从此闸“西北到上闸五里”的记载和实地踏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通惠河下游河道过了杨尹（溥济）闸后，便折向东南而走，在今永顺镇域的西火车站候车室东侧设有通州（通流）上闸；过此闸继续东南而走5里，在今梨园镇域内孙王场村南设有通州下闸；过此闸基本转向东走，至11里处的张家湾镇域内土桥村西口，设有河门（广利）上闸；过此闸穿广利石桥后南转，走至3里处的皇木厂村南虹桥东侧，设有河门下闸，过此闸便入白河即京杭大运河了。

从省钱省力这个角度看，郭守敬当年开凿通惠河，其下游河道完全可以利用疏浚金代闸河故

道（今通惠河），在通州城东北角外凿入通漕的白河，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利用金代闸河很长一段河道后，甩开金代闸河故道，却在杨尹闸东转向东南开向通州之南高丽庄；在开到今土桥村时，设了河门上闸后，也完全应该继续东开，大约再开400余米就直入白河了，但他也没有这样做，而由土桥村向南开有3里地远，在今皇木厂村南入白河。

在土桥至皇木厂村之间，通惠河同白河南北平行3里，费钱费力费时，这是为什么呢？最根本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为节约少得可怜的通惠河水源。温榆河、潮白河水用不上，永定河水太急，惧怕用了威胁首都城安全，金朝开金口河失败已经有了严重教训。怎么办？通惠河水源不得不远引昌平白浮泉、一亩泉等大都西北山区一些潺潺泉水，在保障大都城皇家用水之后，才用于通惠河漕运。加之在兴建大都城时，山区林木被砍伐殆尽，生态环境被极大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地下水涵养甚差，泉水也大大减少，故通惠河水源极其短缺。如何节约水源，保持水量，维持漕运，便摆在了郭守敬等水利专家的面前。因为计划开凿的通惠河漕运，使用的是提闸过船法，在行漕过程中必然要流失一定数量的河水，所以科学节约用水的问题则更为突出。这样，选择河门上闸的位置就极为重要了。

根据实地踏察，发现郭守敬当年设置河门上闸即今土桥村西口广利上闸遗址处以西，至通州下闸即今孙王场村南处，两闸间10余里的河道，曾有一狭长的湖泊。此条形湖泊没有辽金时期今通州域内的延芳淀、姚村淀、金盞淀和台湖那样广阔，也不敌元时通州域内的马家庄、南辛庄、栲栳堡及柳林海子等4处飞放泊之大<sup>③</sup>，故未记入方志之中。虽然未入志但是其宽阔也算可观。是湖西起车里坟，东至土桥，长约4000米，宽100—200米，据当地老人说，最宽处得有400余米。

1975年春，梨园公社（今梨园镇）组织万人平地“大会战”，通县（今通州区）各委办局机关干部参加义务劳动，号称“大战金沙灘”，平整的地面就是通惠河穿经的这处条形洼地。我们当时是通县文教卫生局文化组干事，也曾参加了这次平地劳动。亲眼目睹了这片条形湖泊遗迹的洼地，确实很大。2002年深秋为配合八通轻轨铁路终点站大型基本建设，我们区文物管理所紧密依靠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土桥村西的铁路终点站占地进行考古勘探，确实探出了一条宽百余米的古河道，这条宽阔的古河道，正对着东面不远的广利闸遗

址和广利桥，表明这古河道是元通惠河。现在这长约8里的通惠河穿经的条形湖泊遗址，其大部分被城市渣土填塞后或建了居民楼，或建了学校（北京育才中学分校即此），或建了工厂，余下的部分仍保留历史风貌，有的用以养鱼，有的植藕，有的种植茭白。

当年郭守敬将河门上闸设在这条形湖泊东端附近的位置，看中的就是这片湖泊。可以算一笔账，从现在科学勘测的地势海拔高度上看，闸河口即河门下闸所在位置的皇木厂，海拔18.6米，河门上闸所在的位置的土桥村，海拔19.5米，通州下闸所在位置的孙王场村，海拔22.5米，通州上闸所在位置的五里店村（西火车站处），海拔24米<sup>①</sup>。按照提闸过船法梯航，从河门下闸到河门上闸间的3里河段，放出去2700立方米的水量（长1500米×宽20米×地差0.9），河门上、下闸间通惠河段内水位与大运河水位相平，运粮船就可以从大运河行进通惠河。如果要使行进通惠河河门上、下闸间的船再行到通州下闸至河门上闸间的通惠河段，就得从此段河道内放下27000立方米水量，恢复河门上、下闸间河段内的水位，再从河门上闸的上游段放下来18000立方米的水量，就能使河门上、下间河段水位提高0.6米，同河门上闸位置的海拔高度相平，而河门上闸与通州下闸间的条形湖泊仅下降水位0.03米，使河门上闸下游的粮船行人到下游河段。同样道理，从通州上闸的上游段放下少量的水，就能迅速下降上游段的水位，稍稍升起下游湖泊段的水位，使上、下游河段水位平衡，粮船由下游段行人上游段。

元代运河粮船与明代的大小基本一样，底长5丈1尺，稍长9尺5寸，头长9尺5寸<sup>②</sup>，共长约23米，底阔9尺5寸，约宽3.1米。那么河门上、下闸间3里河段，一次可从大运河转入粮船约400只，而在河门上闸的上游条形湖泊段内可一次停泊粮船8000余只。河门下闸放一次水，流失27000立方米水量，就可放入粮船400只。通过上面的粗浅计算，看出当年郭守敬在开凿通惠河时充分利用今土桥村西那片较大条形湖泊，并将河门上闸设在这片水泊东端附近河道上，即减轻了开河的费用，以此水泊为天然河道，又大大节约和保养了水源，有力地保障了通惠河的漕运畅通，无因水源流失过多而容易发生浅涩胶舟之虞，使“无不仰赖于江南”的大都城内“百司庶府”、“卫士编氓”<sup>③</sup>没有嗷嗷待哺之患，对维护大都城及都城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就是元代通惠河下游河道与河门上闸位置选择的科学性与重

要性。

有人也许会提出来，为什么通惠河开到今土桥村后不直接向东开入白河？那样不是更省工省费吗？如果直向东开，只再开400米左右就能直入白河，是既省工又省钱。但是，河门下闸与上闸间的通惠河道太短，开一次下闸仅从大运河上放进来50多只粮船，太少，要想多行船，就得增加提闸、放闸的频率，这样一来，耽误了行船时间，也加大流失水量；如果将河门上闸向西移建，则条形湖泊的保养水源与节约水源功能就大大减弱或消失，更危害通惠河畅行。因此，河门上闸的位置不能变。为了多将粮船从大运河上放入通惠河河门下闸的上游段河道，减少提、放闸次数，有效节约水源，就将通惠河道从今土桥村处向南转折，开到今皇木厂村南去入大运河，在那里建河门下闸。表面上看是多开了1000余米的河道，费了工费了钱，但从长远角度看，则是省了工省了钱，节约了水源，保障了漕运，这就是郭守敬当年开凿通惠河的高明之处。

写到这里，基本上将元通惠河下游河道与河门上闸位置的选择问题讲完了。但有一个弦外之音也想弹上一弹，那就是我们今人研究古代史迹，既要尽量多读一些古籍有关记载，又要结合实地情况去认真考察，再进行科学的分析研究，以求得出确切的哪怕是较为确切的结论。如果在实地考察中发现了新史料或新的历史遗物遗迹，那就要虚心地面对这些新发现去进行科学分析，得出新的认识或判断，而不是像黑旋风李逵那样挥起板斧就砍。只有这样，科学才能进步，学术才有发展。本文所讨论的问题就表明了这种观点与态度。

① 《通惠河志·附录一，二》。

② 《读史方輿纪要·通州》。

③ 《金史·河渠志》、《金史·韩玉传》。

④ 《元史·王思诚传》、《元史·百官志》。

⑤ 《元史·河渠志》及《嘉靖通惠河志》、《日下旧闻考》、《天府广记》、《光绪顺天府志》、《通州志》等众多古籍。

⑥⑧ 《漕河图志·漕河》。

⑦ 今墓志铭藏于通州区文物管理所。

⑨ 《通州志·山川》。

⑩ 《通县地名志·城关镇、梨园镇、张家湾镇》。

⑪ 《北京漕运和仓场·明代漕运概说·河运》。

⑫ 《元史·食货志》。

（作者为原通州区文物管理所所长和通州区博物馆副馆长）

# 北京地区及周边

## 清代王爷园寝地宫形制管窥

周莎

### 一、清代王爷园寝现存情况简述

王爷坟严格的称呼叫园寝，“园寝”一词最早见之于《后汉书》。《后汉书·祭祀志下·宗庙》：“古不墓祭，汉诸陵皆有园寝，承秦所为也。说者以为古宗庙，前制庙，后制寝，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后有寝也。”可见，“园寝”一词最初的含意，是指帝王的墓葬，包括“园陵”与“寝庙”两个部分。《史记》卷九九《叔孙通传》：“高帝崩，孝惠即位，乃谓叔孙生曰：‘先帝园陵寝庙，群臣莫能习。徙为太常，定宗庙仪法。’”

清代自努尔哈赤建国起，直系皇子共有 114 位，旁系更多。据统计，清朝正式有封爵的王爷有 240 多位。众多王爷及家族葬于北京周围，在北京周边形成了以众多王爷园寝为中心的满族贵族家族墓地群。大清王朝铁骑扬起的硝烟早已散去，世袭罔替的宗室王公也气化清风骨化泥，唯有散落于乡间草陌之间的王爷园寝成为研究清代帝王陵墓制度、皇族世系、宫廷生活史、文化史、建筑史及其它专门史的重要文物资料。

清代王爷园寝历史上是家族管理，每座园寝都有守墓人，国朝更替，事过境迁，大多数王爷园寝渐渐无人管理，被人们遗忘，甚至有些守墓人因为生活所迫，变卖王爷园寝的木材和石料，对王爷园寝造成极大的破坏。目前除部分王爷园寝被各区文物部门公布为文保单位外，更多的王爷园寝仍处在“三无”状态，即“无人管理”、“无迹可寻”、“无名无姓”。

北京地区及周边清代王爷园寝有遗迹的现存较少，几乎可以说没有形制完整的。清代王爷园寝建筑规制尚可查阅《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但其地宫的形制却少有记载。笔者曾对北京地区及周边清代王爷园寝做过详细的实地考察，现对每座现存的王爷园寝地宫现状予以管窥，笔者希望这些散落于山野田间的园寝地宫能够早日清理并予以妥善保护。

### 二、北京及周边王爷园寝地宫调查

从表 1-1 中我们可知现存地宫的王爷园寝仅有 11 座。其中目前没有封闭能考察的尚有 8 座。为便于分析，笔者把各园寝按年号划分成四个时期，分别是：

- 1、清代早期：天命朝、天聪（崇德）朝；
- 2、清代前期：顺治朝、康熙朝、雍正朝；
- 3、清代中期：乾隆朝、嘉庆朝、道光朝；

表 1-1: 北京及周边王爷园寝地宫调查表

序号	墓主	爵位	谥号	园寝建成时代	现存遗址	地宫状况	地址
1	博果铎	庄亲王	靖	清代前期	墓坊、地宫	地宫渗水	北京市房山区河北镇磁家务村
2	允祐	淳亲王	度	清代前期	地宫	存遗址, 可考察	河北省保定市易县高村乡神石庄村
3	允礼	果亲王	毅	清代中期	一孔桥、石狮、螭首龟趺碑、东朝房、享殿、宝顶	封闭	河北省保定市易县梁格庄镇上岳各庄村
4	永璿	果亲王	简	清代中期	螭首龟趺碑、东西朝房、石狮、宫门、享殿、宝顶	存遗址, 可考察	河北省保定市易县梁格庄镇下岳各庄村
5	永皓	恒郡王	敬	清代中期	平桥、螭首(已残)、一孔桥(神道桥)、地宫	存遗址, 可考察	天津市蓟县穿芳峪乡果香峪村
6	永璘	庆亲王	僖	清代中期	一孔桥、部分红墙、角门、地宫	存遗址, 可考察	北京市昌平区流村镇白羊城村
7	绵恩	定亲王	恭	清代中期	一孔桥、地宫	存遗址, 可考察	北京市密云县穆家峪镇羊山村
8	奕誌	瑞郡王	敏	清代中期	螭首龟趺碑、红墙、须弥石座(残)、地宫	存遗址, 可考察	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镇瑞王坟村农科院果树队内
9	奕湘	镇国公(加贝子衔)	恪慎	清代晚期	地宫	存遗址, 可考察	河北省保定市易县梁格庄镇下岳各庄村
10	奕譞	孚郡王	敬	清代晚期	一孔桥、碑楼、螭首龟趺碑、南北朝房、宫门、享殿、月台、红墙、宝顶	封闭	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北安河村
11	载滢	多罗贝勒		清代晚期	地宫	存遗址, 可考察	北京市门头沟区永定镇苛罗坨村西峰寺

4、清代晚期: 咸丰朝、光绪朝、同治朝、宣统朝。

以上四个时期以清代中期的园寝保存得较多, 是研究清代王爷园寝规制不可多得的实物。

### 三、清代王爷园寝地宫建筑风格

解放后, 中国考古界抢救性地清理了不少墓葬, 其中如清崇陵、清恭亲王常宁等清代帝王、王爷的地宫。在这些墓葬中, 建筑形制类似, 由外至里依次为挡券墙、罩门券、门洞券、梓券和金券, 即四券型。在帝后陵寝地宫中, 设有汉白玉棺床, 中央有一个长形方孔, 中间填的是黄土, 也就是选择墓穴时的第一铲黄土, 叫做金井。它是整座陵寝建筑格局的基本点, 在棺椁四周和棺椁内放有玉石, 或者在死者口中含有玉石, 称为玉葬。因为古人认为金井可以沟通阴阳, 交流生气, 而玉葬能够保持尸体不腐烂。金井玉葬在明清两代是最高等级的葬礼。大部分王爷园寝地宫也采用此法, 金井多为圆形, 其中在现存实例中, 恒敬郡王永皓地宫是比较特殊的一个, 他的金井呈桃状。“桃”能使人长寿, 有寿桃之美称。笔者猜测墓主可能想使尸体不腐, 灵魂得到永生, 故将金井设为桃状。

地宫内各结构的称谓释义:

(1) 挡券墙: 俗称金刚墙。砖砌结构, 墙外为墓道, 将墓主人入葬完毕后, 将填土夯实, 起封闭墓室作用。

(2) 罩门券: 俗称砖发券。挡券墙之前、石门之外的券室。

(3) 门洞券: 即石券。石门打开后的第一间券室。

(4) 梓券: 门洞券与后室相连处的拱券式门洞, 券顶为石券结构并独立成券。

(5) 金券: 即墓室, 正中设有棺床, 券顶为石券结构。

因此, 我们可以把地宫形制简单的分成四种型制: ①四券型; ②三券型; ③特殊型; ④棚板石型; ⑤竖穴土坑型。

#### 1、地宫的结构

##### (1) 券、门形制

###### ①四券型

包括挡券墙、罩门券、门洞券、梓券和金券以及石门一道。能够考察的实例有多罗贝勒载滢地宫、定恭亲王绵恩地宫。

在军阀混战的年代, 王爷园寝大多被盗或损毁, 大部分地宫的挡券墙和罩门券已不存在或不完整, 但其门洞券、梓券和金券保存较好。下面以定恭亲王绵恩和多罗贝勒载滢地宫为例, 简述此种类型地宫的特点。(见图 1)

在现存的四券型王爷园寝中, 清代中期的定恭亲王地宫保存较好, 尚存门楼、罩门券、砖券、梓券、金券。在门洞券上雕刻有 4 枚花形门簪, 现其地宫渗水, 棺床已毁。(见图 2、图 3) 清代晚期的多罗贝勒载滢地宫结构属亲王级, 清光绪年间, 恭亲王奕訢为了避难, 居住在戒台寺。在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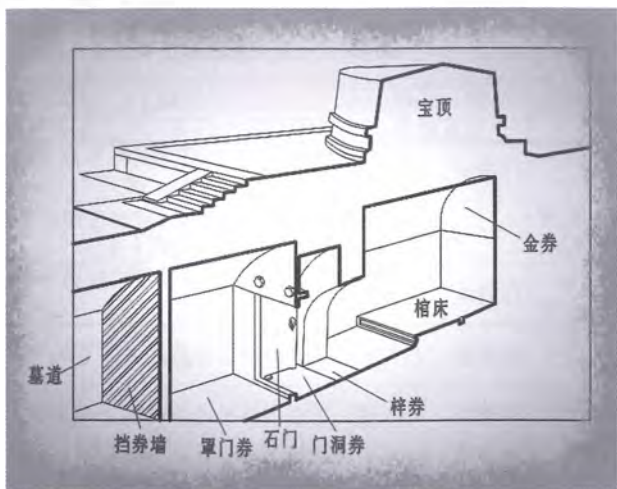


图1 四券型地宫示意图

因地宫内设有泉眼，故梓券至棺床之间有神桥一座，较为特别。金券为石券，内设有棺床，棺床中央有一圆形金井，顶部有悬棺铁，其棺椁为悬棺葬。每逢夏季，地宫中会有“地宫泉涌”之景色，这也是载滢地宫与众王爷园寝不同之处。（见图4、图5、图6）



图2 定恭亲王地宫门楼及罩门券



图4 载滢地宫门券、梓券及铸铁门楣



图3 定恭亲王地宫金券



图5 载滢地宫金券及顶部悬棺处

居住时，奕訢对戒台寺给予了修缮。戒台寺方丈为了感谢恭亲王，便将下院西峰寺赠给奕訢做为福地。恭亲王奕訢薨逝后，光绪皇帝将昌平的一块地赐予他做福地，于是，这里便成了恭亲王次子载滢的墓地。载滢地宫尚存罩门券、砖券、梓券、金券。在门洞券的月光石上雕刻有4枚素面门簪，



图6 载滢地宫金井



### ②三券型

包括挡券墙、罩门券、门洞券和金券，没有梓券结构。此类型的地宫能够考察的实例有淳度亲王允祐、恒敬郡王永皓、庆僖亲王永璘、瑞敏郡王奕誌、孚敬郡王奕誥的地宫。这些地宫的挡券墙和罩门券多已不存或被土所掩埋，故门洞券和金券相对完整。（见图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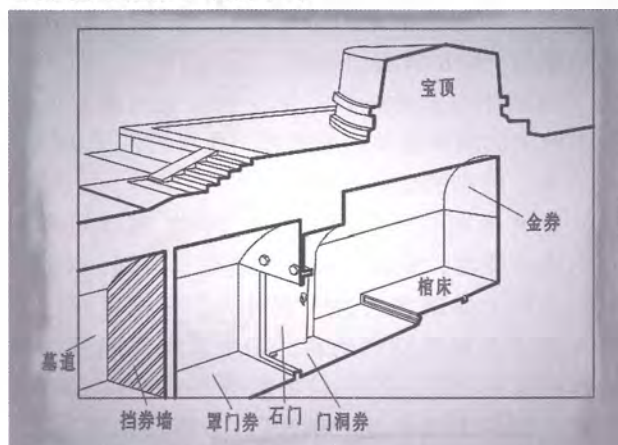


图7 三券型地宫示意图

在现存的三券型王爷园寝中，清朝前期的淳度亲王地宫罩门券被土掩埋，其门洞券与金券直接相连，应为三券一门型地宫。其地宫门洞券与金券铺顶相交处呈圆弧状，衔接处用以特殊形制的铺顶砖。清代中期的恒敬郡王地宫是三券型地宫中保存较好的。尚存门楼、罩门券、门洞券和金券，金券内棺床上的金井与众不同，为桃状。在门洞券的月光石上雕刻4枚精美的门簪，从东至西分别是牡丹、荷花、菊花、腊梅，代表春夏秋冬四季。清代中期的庆僖亲王地宫的罩门券被土掩埋，门洞券已毁。其石门贴壁而立，没有空间构建梓券，推测其地宫为三券型。清代中期的瑞敏郡王地宫和清代晚期孚敬郡王地宫也是三券型，其门洞券直接连接金券。

### ③特殊型

清代中期果毅亲王的的地宫形制较特殊，其金券内各有壁龛一个，未建梓券，门洞券是平顶券，可称为改良的拱券，勉强可算特殊的三券型。（见图8）

### ④棚板石型

果简亲王永璩的地宫铺顶置以棚板石，金券与门洞券为顺直向设置，挡券墙后门洞券两侧墙壁有对联一幅，东侧对联为：“仙灵一点藏”，西侧对联为“艺林塾慰润”。因被土掩埋，对联尚不能看全。

### ⑤竖穴土坑型

镇国公奕湘的地宫已属清代晚期，规制是现今能考察的清代王爷园寝中最低的。地宫为夯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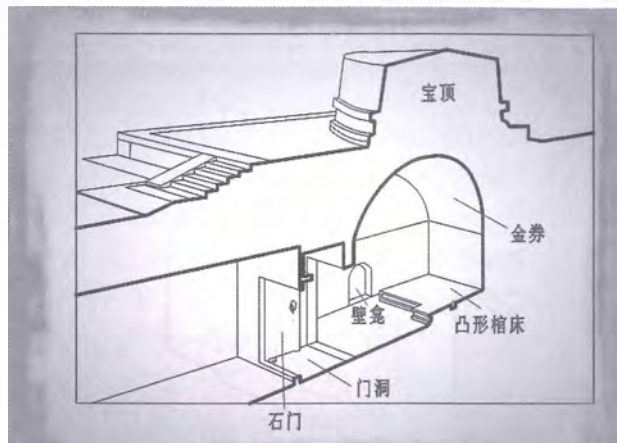


图8 果毅亲王允礼地宫示意图

结构，铺顶置以棚板石，顶部置雕花石梁一根。笔者考察时，在土坑墓穴中发现有木椁残渣，木椁紧贴于土层中，上有一层黑色的漆皮。发现了几片绘有金龙图案的椁板漆皮。奕湘虽是镇国公，但加贝子衔，或许这样的规制在镇国公品级上已略有放宽。

### 2、地宫金券的走向

除王爷园寝的地宫内各券在数量上有所差异外，其墓室的金券走向也各有异同。金券走向是指金券主墓室与门洞券等其余各券洞的衔接方向，存在平行和交叉两种，即顺直向和垂直向。大部分清代王爷园寝以平行为主，“T”字型相交的垂直向是较少见的。

#### ①顺直向类型

金券与门洞券顺直设置最普遍。（见图9）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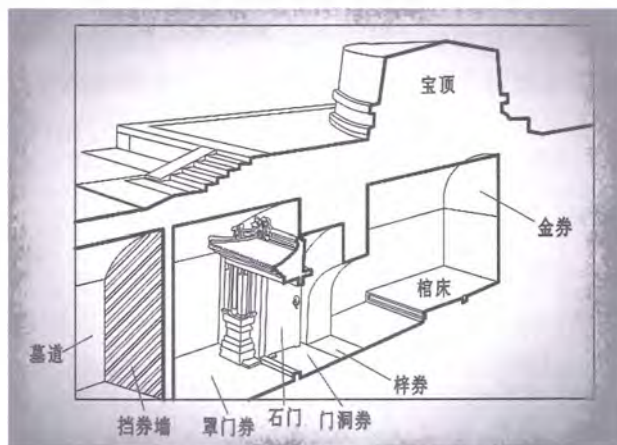


图9 顺直向类型

宫中各券洞走向一致，地宫呈长方形，对于地宫的营建较方便。此类代表地宫有：果简亲王地宫、庆僖亲王地宫、定恭亲王地宫、瑞敏郡王地宫、孚敬郡王地宫、多罗贝勒载滢地宫。

#### ②垂直向类型

金券与门洞券垂直设置型规制较高，仅次于清

代帝陵。(见图 10)。地宫与门洞券“T”字形相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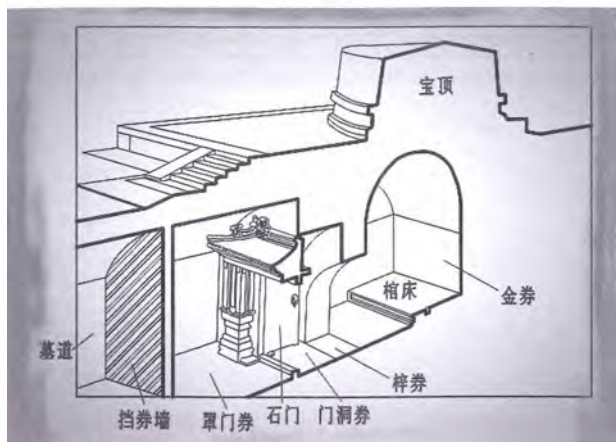


图 10 垂直向类型

对于地宫的营建较复杂。此类代表地宫有：淳度亲王地宫、果毅亲王地宫、恒敬郡王地宫。要特别提出的是恒敬郡王地宫属四券中的垂直型，金井的形状特别，其原因有待史料详实后加以破解。

### 3、建筑材料的应用

在已发掘和开放的清代帝后地宫中，金券均为石券，规制较低的妃嫔地宫或为石券，或为棚板石结构。笔者通过考察，发现大部分清代王爷园寝地宫建材为石券，各个时期的大都如此，没有等级的限制。

### 4、地宫石门的门楣

1956年，考古工作者在清理明朝定陵地宫时，发现其石门的门楣是铜制的。笔者在尚能考察的王爷园寝地宫中，也发现了几座石门的门楣与其它不同，其所使用的材质是铸铁。代表地宫有：庆僖亲王地宫、定恭亲王地宫、多罗贝勒载滢地宫。

### 5、地宫内的棺床及金井

在尚能考察的8座地宫中，能见到棺床的，仅有果毅亲王地宫、恒敬郡王地宫、孚敬郡王地宫、多罗贝勒载滢地宫，另外能考察地宫棺床或为损毁，或为掩埋。棺床大部分由若干雕有汉白玉须弥座状的石块组成，呈长方形。但也有例外的，果毅亲王的棺床呈“凸”字形。笔者推测之所以设置“凸”字形棺床，是将果毅亲王的棺槨放置的略靠前，突出其身份地位。

在棺床有金井一口，至今仅能见到多罗贝勒载滢棺床的圆形金井和恒敬郡王地宫的桃状金井。

### 6、特别的地宫形制

地宫形制与历代陵寝规制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完善，或许与墓主的爵位、等级、时代、财力、物力等诸多人为因素有关。根据考察，笔者发现了几座特别的地宫。①果毅亲王地宫。其地宫棺床为“凸”字形，较特别。②恒敬郡王地宫。其地宫棺床上金井呈“桃状”。③淳度亲王地宫。其地宫门洞券与金券铺顶相交处呈圆弧状，较特别。④多罗贝勒载滢地宫。其地宫夏季涌泉并悬棺葬。这些疑问为清代王爷园寝的研究增添了几许神秘，都有待进一步研究。

## 四、关于清代王爷园寝地宫制度的讨论

综上所述，从地宫形式来看，清代王爷园寝地宫制度与帝陵制度显然不是一种模式，其规制并不十分严格，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其变化也不尽系统规范。(见表 1-2)

表 1-2: 清代王爷园寝地宫结构表

序号	墓主	爵位	园寝建成时代	规格	门洞券门楣结构	地宫走向	金券建材	棺床形状	葬制
1	博果铎	庄亲王	清代前期	未知	未知	未知	石券	未知	未知
2	允祐	淳亲王	清代前期	三券一门	石门楣	垂直型	石券	未知	未知
3	允礼	果亲王	清代中期	三券一门	石门楣	垂直型	砖券	凸形棺床	未知
4	永臻	果亲王	清代中期	未知	无	顺直型	棚板石	未知	未知
5	永皓	恒郡王	清代中期	三券一门	石门楣	垂直型	石券	长方形棺床	金井玉葬
6	永璘	庆亲王	清代中期	三券一门	铸铁门楣	顺直型	石券	未知	未知
7	绵恩	定亲王	清代中期	四券一门	铸铁门楣	顺直型	石券	未知	未知
8	奕誌	瑞郡王	清代中期	三券一门	未知	顺直型	石券	未知	未知
9	奕湘	镇国公(加贝子衔)	清代晚期	竖穴土坑	无		棚板石	无	未知
10	奕諲	孚郡王	清代晚期	三券一门	石门楣	顺直型	砖券	长方形棺床	未知
11	载滢	多罗贝勒	清代晚期	四券一门	铸铁门楣	顺直型	石券	长方形棺床	金井玉葬

由此表可知，清代中期至晚期，地宫门洞券以铸铁门楣为主，金券中以石券较普遍，亲王府和郡王府券洞在等级上没有严格的划分。其它爵位规

制实例较少，研究起来较困难，只能待考古发掘后加以破解。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会员)

# 元明清北京花乡的形成与发展

范军  
周峰

当今北京市丰台区有一个名为花乡乡的行政建置，其原名为“黄土岗人民公社”、“黄土岗中甸友好人民公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名为花乡乡。这一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北京市花卉的重要产地，因此，这一名称正是历史与现实的最佳反映。花乡乡位于丰台区中南部的南侧，东临南苑乡，西临宛平城地区，北与丰台镇、卢沟桥乡相邻，南与大兴区接壤。面积50.3平方公里。下辖草桥、黄土岗、新发地、白盆窑、郭公庄、高立庄、六圈、看丹、榆树庄、羊坊、葆台、樊家村、纪家庙、造甲村、四合庄等15个村。这一地区以草桥及附近的丰台为中心，“丰台在宛平县西，草桥南接连丰台，为近郊养花之所。元人园亭皆在此，今每逢春时，为都人游观之地。自柳村、俞家村、乐吉桥一带有水田，桥东有园，其南有荷花池，墙外俱水田种稻，至蒋家街，为故大学士王熙别业。向时亭台极盛，今亦荒芜矣。其季家庙、张家路口、樊家村之西北地亩，半种花草，半种瓜蔬。刘村西南为礼部官地，种植禾黍豆麦。京师花贾比比，于此培养花木，四时不绝，而春时芍药尤甲天下。泉脉从水头庄来，向西北流，约八九里，转东南入南苑北红门，归张湾。水清土肥，故种植滋茂，春芳秋实，鲜秀如画。”<sup>①</sup>由于这一地区水土条件一直较为优越，且处于京师近郊。因而自元代之后，这里逐渐由私家园林遍布之处变为了明清以来的花乡胜地。

## 一、从私家园林到花乡胜地

元代，草桥及附近地区分布着众多私家园林。其中以万柳园、匏瓜亭、玩芳亭、遂初堂等最为出名。“今右安门外西南，泉源涌出，为草桥河，接连丰台，为京师养花之所。元人廉左丞之万柳园、赵参谋之匏瓜亭、栗院使之玩芳亭、张九思之遂初堂，皆在于此。”<sup>②</sup>万柳园的主人是官至中书平章政事的廉希宪，在园内有“名花计万本，京师号为第一”<sup>③</sup>。廉希宪曾在此设宴招待卢挚、赵孟頫两位名士。“时歌儿刘氏名解语花者，左手折荷，右手执杯，歌小圣乐侑酒。赵公喜，即席赋诗云：‘万柳堂前数亩池，平舒云锦盖涟漪。主人自有沧州趣，游女仍歌白雪词。手把荷花来劝酒，步随芳草去寻诗。谁知咫尺京城外，便有无穷万里思。’小圣乐乃元遗山所制，俗名骤雨打新荷者是也。”<sup>④</sup>由此可见万柳园花木的繁多以及园内池塘荷花盛开的美景。

匏瓜亭，又称赵参谋匏瓜亭、赵参谋别墅。其主人赵鼎官至断事府参谋，园因此得名。刘因曾以《匏瓜亭》诗一首相赠：“匏瓜陨自天，中涵太虚气。造物全其真，世人苦其味。虽得终天年，惜作无用

弃。伊谁穷混沌，太朴分为二。一供颜渊乐，一为许由器。颜有圣人依，许逢尧舜治。天下非其责，行藏适自遂。秋色高箕山，春风满洙泗。后来鼎铛徒，谁知两瓢贵？寥寥千载间，复随无用地。神物终有归，至人可重值。伟哉子赵子，独兼许颜义。匏瓜集大成，高亭挹空翠。感君亭上名，发我思圣喟。人知圣人言，孰有圣人志？圣人心如天，何时无生意？时无不可为，人无不可致。吾道苟寸施，吾民犹寸庇。坚白自有持，磨涅岂吾累？岂不欲无言？恐与匏瓜类。仲子诚少野，强直无再思。圣人进退间，历历生私议。请观欲往心，岂与乘桴异？我生学圣人，栖栖形寤寐。穷年忧道丧，漫自中肠沸。君才当有为，自以无用置。我才当无用，自以有为觊。物性虽有殊，我心良可愧。顾君志我志，才志庶相利。使君名我名，名实亦相位。留彼匏中酒，供我浩歌醉。行当取其种，移动易川植。”<sup>②</sup>

玩芳亭，是栗院使别墅，栗院使其人生平事迹不详。“亭多花草，一时文人骚客来游赏者，多有题咏。”<sup>③</sup>官至参知政事的王士熙有《题玩芳亭诗》五首，其一：“每忆城南路，曾来好画亭。栏花经雨白，野竹入云青。波景浮春砌，山光扑画局。褰衣对薜萝，凉月照人醒。其二：何处春来好？城南尺五天。地幽迷晓树，花重压春烟。上客抛罗袂，佳人舞画筵。晓来清兴熟，移坐曲池边。其三：留客青春过，题诗碧雾寒。乱莺穿舞障，轻蝶立回栏。白日闲斟酒，清时早挂冠。主人多雅兴，不觉玉卮干。其四：拂拭亭前石，东风屋角生。浅云浮水动，迟日傍花明。春去青林合，人来白鸟迎。暮尘回首处，此地可忘情。其五：美酒朝朝熟，佳宾日日来。玉卮擎雨露，翠袖拂尘埃。预恐春城闭，先教晚骑回。只今行乐地，飞絮落莓苔。”<sup>④</sup>从中可看出玩芳亭园内亭、池、回廊、假山毕备，花木繁多，竹林蔽日，莺飞蝶舞，美不胜收。薛元卿的《燕栗总管玩芳亭诗》写到：“栗氏林亭好，南邻借马游。药栏当户密，花径近城幽。未许朝参懒，聊因逸兴留。使君行乐处，风物为春柔。”<sup>⑤</sup>马祖常也有《南城》二首专门描绘玩芳亭的美景，其一：“城南牡丹一百本，翰林学士走马来。渡水杨花逐飞燕，苑中芳草送春回。”其二：“栗侯亭前花一园，客来日日费金钱。明朝碧树看城合，恨不江头问酒船。”<sup>⑥</sup>可见玩芳亭的景观以花取胜，而花中尤以牡丹著名。如今，在玩芳亭的遗址上，建立了万芳亭公园，续写了这一名园的历史。

遂初堂，又名遂初亭，“元詹事张九思别业，绕堂花竹水石之胜甲于都城。”<sup>⑦</sup>赵孟頫有《张詹

事遂初亭》诗：“青山绕神京，佳气溢芳甸。林亭去天咫，万象争自献。年多佳木合，春晚余花殿。雕栏留戏蜂，藻井语娇燕。退食鸣玉珂，友于此中宴。”<sup>⑧</sup>

到了明代，草桥一带，“土以泉，故宜花，居人遂花为业。”<sup>⑨</sup>天启年间，在草桥之北又建了碧霞元君庙，俗称中顶。“岁四月，游人集遽且博，旬日乃罢。”<sup>⑩</sup>这样，庙宇、花田与园林在这一地区交错分布，更使游人如织。著名文学家袁宏道《游草桥别墅》一诗写到：“郊居绝胜午桥庄，南客行来眼亦忙。马上乍逢蒲苇地，梦中移入水烟乡。疏林透户凉风出，翠叶平池急雨香。危石幽篁相对冷，一庭清影话潇湘。”<sup>⑪</sup>在他的笔下，草桥一带修竹林立，芦苇丛生，一派水乡景致，使作为湖北人的作者也目不暇接。同样，在常州人管绍宁的《集草桥庄》中，草桥也是一派旖旎的江南水乡风光。诗云：“官闲更喜调相同，把手郊园兴未穷。一曲水环鱼藻绿，几肩花过石桥红。柳荫落日帘斜出，荷气微风香暗通。池上客逢藜火夜，霜雪应耀尾箕中。”<sup>⑫</sup>在明代诗人的笔下，春天与秋天的草桥景色是不同的，也都分别得以体现。公胤《游草桥》写到：“参差三月游难约，才共班荆见落花。黄鸟云云春欲老，青山望望外为家。城隅旧寺生新草，溪上晴云堕湿沙。胜国馆亭何处问，平林一带只昏鸦。”<sup>⑬</sup>在早春三月，作者与知己好友来到久想一游的草桥，落花与新草，旧寺与馆亭，是此时此地的典型意境。在淡淡的忧伤中，也可体味出优美的环境给作者带来的淡淡喜悦。金孺瞻的《秋日游草桥》则体现了另一番意境：“蝶衰蜂少草虫辰，老圃如农赛社神。除却菊花俱入窖，人间秋矣地中春。”<sup>⑭</sup>时值金秋，虽然蝴蝶、蜜蜂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但这时草虫却登上舞台，长鸣不已。花农也在丰收时节祭祀土地。此时虽然菊花已在盛开过后入窖保藏，但是秋天的大地仍象春天一样繁茂。

到了清代，从草桥到丰台，花田已经连成一片，绵延不绝。“右安门外八里，前后十八村，甘泉沃土，养花最宜，故居民多以养花为业。”<sup>⑮</sup>汤西陲《自黄村归经草桥》一诗可验证这种盛况。诗云：“按鹰台北接春郊，信马闲行未觉遥。尺五城南好光景，到天烟色柳条条。右安门外旧池亭，别墅参谋堂右丞。今日草桥清浅水，还留一缕照衰兴。天桃穠杏一时开，上巳风光次第来。向有殿春红芍药，连滕十里到丰台。”<sup>⑯</sup>可见，在连片的花田中，尤以芍药为特产。而到丰台观赏芍药，也成了官员、文人乐此不疲的快事。康熙时任吏部侍郎的汤右

曾有《丰台看芍药》诗二首，其一：“晓色葱茏金障开，殿春花事数丰台。天公雨露园公力，等是批红判白来。”其二：“休嗟狼藉市门前，绕郭栽花望眇连。当日洛阳全盛日，一支姚魏直万钱。”<sup>⑨</sup>可见，当时的花田已经在南城外接连成片分布，而尤以丰台花事最盛。在众多的花木中，也不乏象洛阳牡丹中的姚魏那样珍贵的品种。同样在康熙时任翰林编修的宋至有同名诗：“昨日慈仁买花归，插满铜瓶香彻夜。今日丰台赏花来，补茵更坐芳丛下。溥溥朝露犹未晞，东风吹过珠还泻。珊瑚成堆玉作盘，殷红腻白纷低亚。晴郊士女如云屯，野老孤亭容我借。南国美人怅望遥，赋手空怀鲍与谢。适情无事张华筵，白酒黄鸡供村舍。帽侧狂歌惊四邻，醉来欲啖昆仑蔗。长安贵游尽奢豪，杂沓欢愉犹梦怕。只应此地任栖迟，手斧腰镰远汕骂。”<sup>⑩</sup>所谓“慈仁”，就是“慈仁寺”，即今报国寺。在当时，每逢初五、十五、廿五，都有庙会和花市。作者在游过慈仁花市后又来丰台赏花，此地鲜花丛集，游人如织，不仅有花可赏，还可以在农家品尝田园风味的美酒佳肴，作者不禁留连忘返，乐不思归了。

丰台赏花，不仅得到下至平民百姓，上至官员文人的喜爱，甚至贵为天子的乾隆帝也多次前往观赏，留下了两篇丰台赏花诗，其中乾隆三十九年（1774）的题为《丰台》：“丰台仍是旧名呼，接眇连畦种植俱。点缀韶光宁可少？偷移天巧得曾无？幻开顷刻欺殷七，下策火攻学阿奴。日下南门精数典，谓当花事祝蕃庑。”<sup>⑪</sup>乾隆四十一年（1776）的题为《丰台行》：“广甸演迤临丰台，丰台村景殊他哉。郭驼遗风杂树种，殷七妙术繁花开。花开树种今复古（丰台植花木，自胜朝已然，见《日下旧闻》——原诗小注），村人世业如商贾。何不治田为农夫？惜矣垦植斯膏土。更思敷治在顺民，百万亿分斯一分（丰台种花树之地，在京县内不过亿万分之一耳——原诗小注）。所失或多得或少（如禁其种花树而令种田，则失业者或反致多耳——原诗小注），法令禁制徒纷纭。冬雪春霖今岁好，嫣红姹紫看夹道。黄筌画中五里行，李贺诗囊益不少。胜朝酬唱多雅人，饮酒挟妓遨游频。百年来却鲜继者，亦足以见风俗淳。”<sup>⑫</sup>前一首诗主要赞叹丰台花农高超的育花技术，其中重点提到冬天的堂花，下文详述。第二首则反映了乾隆的一些经济思想，在传统重农思想中，无疑把粮食的生产放在第一位。据此，有些人认为应将丰台的花田改为粮田。但是乾隆对此则不以为然，认为在京师各县的农田中，丰台种花之地

只占有极小的比例，而且花农自明朝就开始种花，如果强制他们改种粮食，则可能失大于得。乾隆的这种思想无疑具有先进性及科学性。另外在诗中，他对明朝文人雅士游览丰台时多纵酒挟妓颇有微词，认为本朝风俗淳朴，在游赏丰台花事时没有这种情况。

除了丰台在清代成为新的赏花中心外，草桥及周边地区也保持了它自元代以来的游览胜地的地位，而游览活动也大多围绕赏花来进行。清代，这一地区出现了祖氏园、中顶、花之寺等著名景点。

“祖氏园在草桥，水石林亭，擅一时之胜。游草桥、丰台者，往往过焉。乾隆初年，归于王氏，今又易主矣。”<sup>⑬</sup>康熙朝官至礼部左侍郎的严我斯有《游祖氏园》诗：“出郭不数里，名园傍水涯。芦花围野岸，杨柳几人家。小阁临池迥，疏篱抱径斜。到来幽兴极，竟日许停车。泯泯濠梁上，萧萧落叶天。柳歌鱼拨刺，荷碎鹭联拳。曲水萦花圃，晴云下渚田。小山遗胜在，临眺几流连（去园里许有九莲寺，或曰明慈圣太后九莲菩萨后身也——原诗注）。更寻黄叶寺，几眺白云秋。径曲双桥隐，门开一磐幽。残碑频系马，过客倦登楼。叹息前朝事，西风芦荻洲。”<sup>⑭</sup>可见，此地曲水环绕花圃是其最显著的景观特点。

在今草桥以北的中顶村有一座碧霞元君庙，俗称中顶，和京城其他四座碧霞元君庙一起合称五顶。“中顶碧霞元君庙在右安门外十里草桥地方，每岁六月初一日有庙市。市中花木甚繁，灿如列锦，南城士女多往观焉。”<sup>⑮</sup>观赏花木，是中顶庙会的特色。由于时值六月，附近河池甚多，因此，盛开的荷花给游人以无限乐趣。“月朔日，各行铺户攒聚香会，于右安门外中顶进香，回集祖家庄回香亭，一路河池赏莲，箫鼓絃歌，喧呼竟日。”<sup>⑯</sup>

距离中顶不远的右安门外，还有一座以花闻名的寺庙——花之寺。“花之寺，自曾宾谷先生修后尚无恙，俗呼三官庙。壁悬宾谷先生诗幀，花木盈庭，大有葱倩之致。”<sup>⑰</sup>著名的诗人龚自珍曾于道光七年（1827）暮春游览此地，留下了著名的诗篇《西郊落花歌》：“西郊落花天下奇，古来但赋伤春诗。西郊车马一朝尽，定庵先生沽酒来赏之。先生探春人不觉，先生送春人又嗤。呼朋亦得三四子，出城失色神皆痴。如钱唐夜潮澎湃，如昆阳战晨披靡，如八万四千天女洗脸罢，齐向此地倾胭脂。奇龙怪凤爱漂泊，琴高之鲤何反欲上天为？玉皇宫中空若洗，三十六界无一青蛾眉。又如先生平生之忧患，恍惚怪诞百出难穷期。先生读书尽三藏，最喜《维摩》卷里多清词。又闻

净土落花深四寸，冥目观想尤神驰。西方净国未可到，下笔绮语何漓漓！安得树有不尽之花更雨新好者，三百六十日长是落花时！”<sup>②</sup>诗前小序写道：“出丰宜门一里，海棠大十围者八九十本。花时车马太盛，未尝过也。三月二十六日，大风；明日风少定，则偕金礼部应城、汪孝廉潭、朱上舍祖毅、家弟自谷，出城饮而有此作。”丰宜门是金中都城的正南门，此处指代右安门。可见，花之寺以八九十株高大的海棠树而闻名。当花开时节，车马杂沓，众人竞相来此赏花。

## 二、花卉种类、种植技术与花卉的販售

明代，草桥等地种植的花卉种类就已十分繁多，并且四季皆有。春天的花卉就分为三类，初春的梅花有九英、绿萼、红白细等品种；山茶有宝珠、玉茗等品种；水仙有金钱、重胎等品种；探春有白玉、紫香等品种。春季中期有桃李、丁香，海棠有上西府、贴梗、垂丝等品种。暮春有牡丹、芍药、李枝等。夏、秋两季的花卉更是种类繁多，“入夏，榴花外，皆草花。花备五色者：蜀葵、莺粟、凤仙。三色者：鸡冠。二色者：玉簪。一色者：十姊妹、乌斯菊、望江南。秋花耐秋者：红白蓼（江乡花也，此地高几以丈）。不耐秋者：木槿（朝鲜夕萎）、金钱（午后仅开，向夕早落）。耐秋不耐霜日者：秋海棠（一曰断肠，或曰思妇泪所凝也）。木樨，南种也，最少。菊，北种也，最繁。”<sup>③</sup>

在花乡出产的北京本土花卉中，尤以春天的芍药和秋天的菊花种类最为繁多，也深为大众喜爱。“京都花木之盛，惟丰台芍药甲于天下。旧传扬州刘贡父谱三十一品，孔常父谱三十三品，王通叟谱三十九品，亦云瑰丽之观矣。今扬州遗种绝少，而京师丰台，于四月间连畦接畛，倚担市者日万余茎。游览之人，轮毂相望。惜无好事者图而谱之。如宫锦红、醉仙颜、白玉带、醉杨妃等类，虽重楼牡丹亦难为比。”<sup>④</sup>秋天，几乎家家有赏菊之俗。“秋日家家胜栽黄菊，采自丰台，品类极多。惟黄金带、白玉团、旧朝衣、老僧衲为最雅。酒垆茶设，亦多栽黄菊，于街巷贴市招曰：某馆肆新堆菊花山可观。”<sup>⑤</sup>富裕人家往往把数百盆菊花摆在架子上，下宽上窄，称为九花山子。而四面堆积的，成为金字塔形，号称九花塔。菊花有陈秧、新秧之分，而两者又各分为粗种、细种两大类。陈秧粗种中又有大红宝珠、金连环、金碧环、大金葵、渗金葵、金盘献露、金毛狮子、

金凤翎、紫凤舒翎、紫凤双叠、紫龙靠爪、紫蟹爪、真紫钩、徐家紫、黄鹤毛、鹭鹤毛、苍龙须、苍龙训子、云龙焕彩、二色莲、三季秋荷、映日荷花、旱地金莲、芙蓉秋艳、玉扇银针、紫松针、水红针、玉匙调羹、粉屏、白牡丹、紫牡丹、粉牡丹、星光在水、枫林落照、夕阳斜照、鸦背夕阳、晓天霞、蓝翎九等品种；陈秧细种中又有蜜连环、银红针、桃花扇、方金印、老君眉、西施晓妆、潇湘妃子、鹅翎管、米金管、灯草管、紫虎须、灰鹤翅、平沙落雁、杏林春燕、朝阳紫、软金素、青山盖雪、朱砂盖雪、白鹤卧雪、青莲子、清河莲、朱瓣湘莲、玉池桃红、玉笋长、玉楼春晓、宝刹浮图、落红万点、泥金万点、藕色霓裳、伽蓝袈裟等品种；新秧粗种中又有金佛座、金钩挂玉、金边大红、玉堂金马、紫绶金章、紫袍金带、紫电青霜、绿柳黄鹂、杨妃醉舞、西施粉、六郎面、墨麒麟、鹦哥抱子、蜜蜂窝、合家欢乐等品种；新秧细种中又有银虎须、墨虎须、朱墨双辉、金卷朱砂、金凤含珠、凤梧添线、汉宫春晓、浣花溪水、天半朱霞、秋水明霞、秋水芙蓉、汉皋解佩、二乔争艳、天女散花、桃花人面、鸟爪仙人、黄鹤仙人、羔裘大夫、仙人掌、醉太白、南极仙翁、文经武纬、风管鸾笙、洋蝴蝶、羚羊挂角、香白梨、金如意、水晶如意、沉香贯珠、一斛珠、碧玉骚头、黄绣球、珊瑚钩、金带风飘、慈云点玉、慈云万点、柳线垂金、重阳居住等品种。除了以上品种外，还有200多种菊花。<sup>⑥</sup>

在漫长的生产实践中，花乡花农总结出了一系列的种植技术。以种植牡丹为例，就有“栽之法，分之法，接之法，浇之法，医之法”<sup>⑦</sup>等等。具体到“医之法”也就是花木的病虫害防治，则更为花农所重视，他们针对不同的害虫总结出了不同的防治方法。以菊花为例，“种菊之法，自春徂夏，辛苦过农事。菊善病，菊虎类多于螟螣贼蠹，瘡头者菊蚁，瘠枝者黑蚰，伤根者蚯蚓，贼叶者象榦虫。菊蚁以鳖甲置傍，引出弃之，黑蚰以麻裹筋头搯出之，蚯蚓以石灰水灌河水解之，象榦虫磨铁线穴搜之。”<sup>⑧</sup>

花乡花农还继承和发展了冬季在温室中栽种花卉的技术，也就是堂花或唐花。“今京师腊月即卖牡丹、梅花、绯桃、探春诸花，皆贮暖室，以火烘之，所谓堂花，又名唐花是也。按汉书召信臣传：信臣为少府，大官园种冬生葱韭茹，覆以屋庑，昼夜煖蕴火，待温气乃生。唐人诗：内园分得温汤水，二月中旬已进瓜。盖汉唐以来皆然。”<sup>⑨</sup>堂花技术使北京的冬天也充满了盎然生机，“牡丹

呈艳，金橘垂黄，满座芬芳，温香扑鼻，三春艳冶，尽在一堂”。<sup>①</sup>乾隆帝为此曾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作《戏咏唐花》：“煖媪媪万芳新，巧夺天工火迫春。设使言行信臣传，怜他失业卖花人。”<sup>②</sup>

北京的卖花人多为花乡花农，其贩卖方式多为沿街叫卖，所卖的多为玫瑰、芍药等时令鲜花。“玫瑰，其色紫润，甜香可人，闺阁所爱之，四月花开时，沿街唤卖，其韵悠扬。晨起听之，最为有味。芍药乃丰台所产，一望弥漭。四月花含苞时，折枝售卖，遍历城坊。有杨妃、傻白诸名色。”<sup>③</sup>鲜花中尤以芍药为人喜爱，所谓“京师鬻花者以丰台芍药为最”。<sup>④</sup>在花之寺的南面都是花田，“每晨负担人入城，卖花声里春事翩跹，大多以此间为托根之所。而以芍药为尤盛，十钱可得数花，短几长瓶，春色如海矣。”<sup>⑤</sup>可见，芍药的价廉物美，是深受欢迎的重要原因。卖花人尽管辛劳，但生活仍不免困苦，有些人家的女儿沦为别人的姬妾。如“丰台卖花翁张姓女，名阿钱，毛检讨奇龄纳为小妾。”<sup>⑥</sup>

除了沿街叫卖外，还有每月定期的花市。“丰台种花人，都中目为花儿匠，每月初三、十三、二十三日，以车载杂花至槐树斜街市之。桃有白者，梨有红者，杏有千叶者，索价恒浮十倍。日昃则虽不得善价亦售矣。”<sup>⑦</sup>较花市更进一步则有长期开设的花厂，花厂在城内、城外都有开设，专门卖花。城内多设置在游人众多的寺庙，其中以隆福寺、护国寺（合称东西庙）最为有名。“两庙花厂尤为雅观。春日以果木为盛，夏日以茉莉为盛，秋日以桂菊为盛，冬日以水仙为盛。至于春花中如牡丹、海棠、丁香、碧桃之流，皆能于严冬开放，鲜艳异常，洵足以巧夺天工，预支月令。”<sup>⑧</sup>城外的花厂多坐落在花乡地区，翁同龢曾出城访花，“出南西门坐花之寺，又访丰台芍药，至所谓樊家村者（距南西门八里），颇有大大花厂，皆常卉，有数处篱落中芍药甚密而皆蓓蕾。”<sup>⑨</sup>

①（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九十《郊坰·南》引《京城古迹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536页。

②⑥⑩（清）孙承泽：《天府广记》卷三十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562页。

③（清）吴长元：《宸垣识略》卷十三《郊坰二》，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59页。

④《天府广记》卷三十七，第561页。

⑤《天府广记》卷三十七，第561～562页。

⑦《日下旧闻考》卷九十《郊坰·南》引《皇元风雅》，

第1533～1534页。

⑧（清）佚名编：《人海诗区》卷二《园亭》引《文翰类选》，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04页。

⑨《人海诗区》卷二《园亭》引《石田集》，第341页。

⑩《人海诗区》卷二《园亭》引《松雪斋集》，第292页。

⑪⑬⑭⑮（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三《城南内外》，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20页。

⑯⑰⑱《帝京景物略》卷三《城南内外》，第121页。

⑲（清）麟庆：《鸿雪因缘图记》第二集《丰台赋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4年。

⑳（清）戴璐：《藤阴杂记》卷十一，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09页。

㉑㉒《宸垣识略》卷十三《郊坰二》，第262页。

㉓《日下旧闻考》卷九十《郊坰·南》，第1536～1537页。

㉔《日下旧闻考》卷九十《郊坰·南》，第1537页。

㉕《宸垣识略》卷十三《郊坰二》，第259～260页。

㉖《藤阴杂记》卷十一，第108页。

㉗（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北京出版社，1961年，第69页。

㉘（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北京出版社，1961年，第23页。

㉙（清）震钧：《天咫偶闻》卷九《郊坰》，光绪三十三年（1907），甘棠转舍刊本。

㉚《龚自珍全集》，中华书局，1959年，第367页。

㉛《帝京岁时纪胜》，第18页。

㉜《帝京岁时纪胜》，第29页。

㉝《燕京岁时记》，第77～78页。

㉞《日下旧闻考》卷一百四十九《物产》引《居易录》，第2385～2386页。

㉟《燕京岁时记》，第91～92页。

㊱《日下旧闻考》卷一百四十九《物产》，第2386页。

㊲《燕京岁时记》，第61页。

㊳《日下旧闻考》卷一百四十九《物产》引《香祖笔记》，第2385页。

㊴《天咫偶闻》卷九《郊坰》。

㊵《藤阴杂记》卷十一，第106页。

㊶《日下旧闻考》卷一百四十九《物产》引《六街花事》，第2384页。

㊷《燕京岁时记》，第51页。

㊸瞿宣颖编：《同光间燕都掌故辑略》第二引《翁文恭日记》二七，光绪十四年四月初十日，世界书局，1936年，第15页。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 金炉圣母铸钟娘娘庙考

庑 华

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是专门收藏古代钟铃的专题性博物馆，但该馆有一件藏品很特殊，既不是钟，也不是铃，而是一块石匾。石匾呈长条状，表面自右往左雕刻“金炉圣母铸钟娘娘庙”九个楷书大字，字体端正挺拔，苍劲有力。除九个大字之外，其上无其他装饰纹样。石匾征集于北京德胜门城楼附近的居民区。（见图一）

德胜门、安定门是明清北京城北边的两座城门，德胜门居西，安定门位东，钟楼、鼓楼是北京城中轴线北端的两座标志性建筑，在德胜门城楼与钟鼓楼之间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居民区，东为旧鼓楼大街，西南侧为鼓楼西大街。《燕都丛考》中记载：“自地安门外而北曰地安桥，又北曰鼓楼大街，又北为鼓楼，又北为钟楼。稍西而北曰旧鼓楼大街，以达于德胜门内东城根。”<sup>①</sup>在这个三角形的区域内曾经有个铸造铜钟的铸钟厂，是明清时期北京城铜钟的主要铸造场所。记载明北京城情况的《春明梦余录》中有这样的文字：“华严钟厂在德胜门内，旧铸高二丈余，阔一丈，余者尚有十数，仆地上，皆楷书佛经。”<sup>②</sup>《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五十四中也有相关记载：“德胜门东为铸钟厂，其地有真武庙，内有顺治辛卯年刘芳远撰碑，华严钟仅存其一，旧悬万寿寺，今移于觉生寺，余钟无考。”<sup>③</sup>文献所称仅存的华严钟即悬挂在大钟寺（原名觉生寺）大钟楼内的永乐大佛钟。现如今，虽然铸钟厂早已不复存在，“铸钟厂”、“铸钟胡同”作为地名沿用至今。

为了查找金炉圣母铸钟娘娘庙的准确位置，

笔者对位于德胜门与钟楼之间的居民区进行了实地走访。在铸钟胡同遇见很多热心的居民，他们痛心地说这座庙宇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被彻底毁坏。一些年长者依稀记得这座庙宇的建筑情况，其中一位七十多岁名叫张连庆的老人说他家祖辈在清朝光绪年间移居此地，对这座庙宇比较熟悉，在他的带领下，笔者找到了金炉圣母铸钟娘娘庙原址所在地。它位于钟楼西侧的铸钟胡同与小黑虎胡同的交汇地，即小黑虎胡同24号、26号民房所在地。据当地人介绍说，铸钟娘娘庙是一座道教庙宇，由女道士驻守，庙宇坐北朝南，中轴线上依次为山门、前殿、中殿、后殿以及东西配殿，书题写“金炉圣母铸钟娘娘庙”的石匾原本镶嵌在山门上方。关于这座庙宇的始建年代人们并不清楚。笔者见到：庙宇所有的建筑均已不复存在，矗立在原址之上的只有拥挤不堪的民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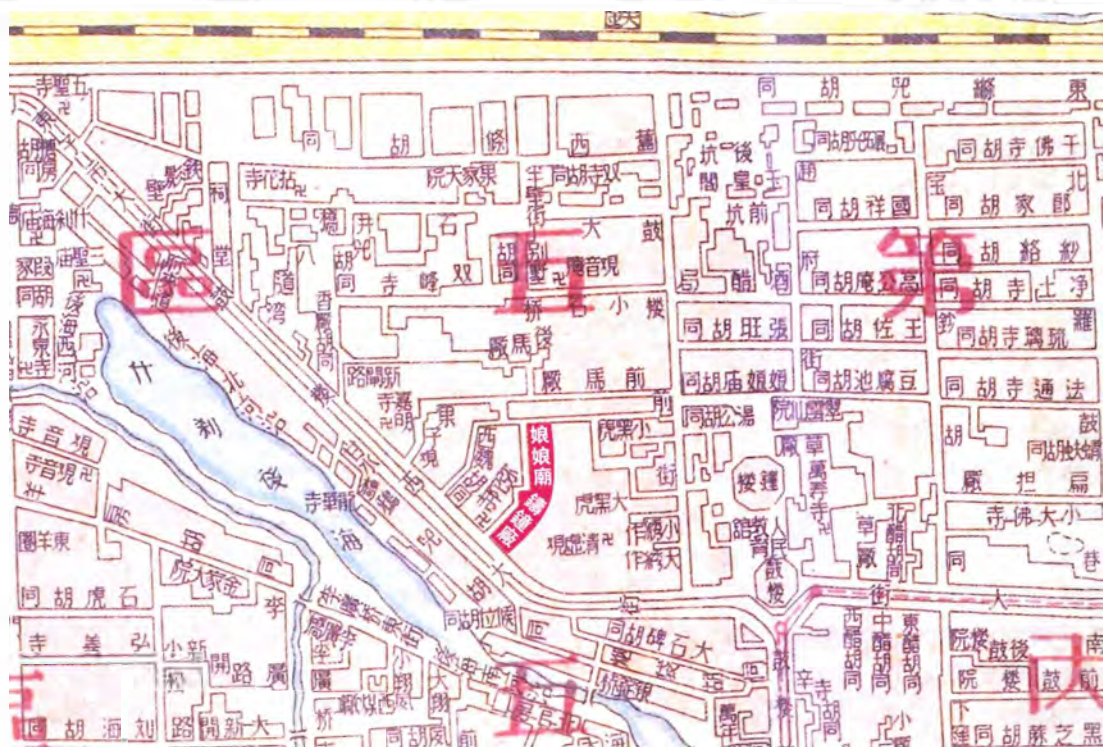
1950年北京市街道详图中明确标明了位于钟楼西面的“铸钟厂”<sup>④</sup>（见图二），在其东北方位标写“娘娘庙”，这座娘娘庙与笔者实地走访的“金炉圣母铸钟娘娘庙”位置完全吻合，毫无疑问，地图上的“娘娘庙”就是“金炉圣母铸钟娘娘庙”。

铸钟娘娘何许人？她是一位怎样的女性？缘何被尊为铸钟工匠的保护神？历史文献中没有找到相关记载，但是笔者在走访中听当地居民讲述了这样一个传说，大意是说：好大喜功的明成祖朱棣在登上皇位之后，当即着手调遣能工巧匠营建北京城，在北京城中轴线最北端建造了巍峨高大的钟楼和鼓楼，并下令铸造出体量巨大、声音



图一 石匾额“金炉圣母铸钟娘娘庙”拓片





图二 1950年北京市街道图中的“铸钟厂”和“娘娘庙”位置

洪亮的大钟悬挂于钟楼之上，为京城百姓鸣钟报时。铸钟师接到命令之后立即带领工匠们在铸钟厂里日夜劳作，筛研泥土，制作模范，雕刻花纹，熔化铜液，反复浇铸，但铜钟始终不能成功铸就。眼看着向永乐皇帝呈献大钟的期限已到，铸钟师和所有工匠们都心急如焚，彻夜难眠。铸钟师的女儿不仅聪慧美丽，而且十分孝顺。她看着父亲日渐憔悴的面容，暗自思量着帮助父亲的办法，因为她深深知道，如果工匠们不能按期铸出大钟，父亲要担当杀头之罪。就在工匠们做最后一次努力的时候，她纵身一跃，跳进了熔化铜液的熔炉中，瞬间化为一缕青烟，升向空中。大钟终于浇铸成功了，铸钟工匠们为了纪念这位舍身救父的年轻姑娘，尊她为“金炉圣母铸钟娘娘”，并在铸钟厂的旁边为其筑建庙宇，永久供奉祭拜。据说，这一传说故事在上个世纪被以连环画的形式描绘在小人书上，在民间广为流传。

金炉圣母铸钟娘娘庙的兴建与位于此地的铸钟厂有密切关联，而铸钟厂的设立又取决于钟楼在该地的建造。在没有大型起吊机械设备的古代社会，通过人力搬运、悬挂数十吨重的巨型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工匠们往往就近择地铸造，由于这种客观原因，铸钟厂的位置选在了钟楼西侧，铸钟厂与钟楼之间相距仅数百米之遥。由此，我们推断金炉圣母铸钟娘娘庙始建时间的上限应该不超过明朝永乐年间，至少在明北京城钟、鼓

二楼建造之后才得以兴建。

经过明清两朝数百年的发展，钟鼓楼区域成为北京地区钟铃等器物的主要生产场所。《燕都丛考》记载：“自旧鼓楼大街以东，鼓楼东大街西头而北曰宝钞胡同，其西曰北醋儿胡同，曰草厂，有东西南北四口。越钟鼓楼而西曰钟库胡同，曰小铃铛胡同，曰铃铛胡同，曰牛圈，曰汤平胡同，《顺天府志》作汤锅胡同。至是而北曰赵府街，为南北胡同。其西为娘娘庙胡同，稍北曰张帽胡同，《顺天府志》帽或讹作旺，又讹望。”<sup>⑨</sup>这段文字清楚地告诉我们在钟楼附近曾经是京城铜铁器具的制作场所，不仅有铸造大钟的铸钟厂和存放钟的库房“钟库”，还是大小铃铛、汤锅等日常用具的生产地。可以想见当时冶炼铸造行业的工匠汇聚此地的繁盛景象。铸钟工匠们在这一带工作、生活，传承着古老的手工技艺。为了顺利制作出一件件精美理想的作品，他们小心翼翼地供奉着他们的行业神灵——金炉圣母铸钟娘娘。

中国民间神灵信仰包罗万象，行业神灵信仰是其中重要内容之一。人们将各行业贡献突出的历史人物、传说人物尊奉为行业祖师或行业保护神，并建筑庙宇、撰文立碑，对他们进行各种各样的祭祀活动，以祈求神灵保佑行业兴旺发达、经久不衰。明清时期，北京地区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商业贸易的日趋繁荣，民间行业神灵崇拜曾一度达到鼎盛时期。木工行、骡马行、玉

器行、米粮行、轿行、医药行等众多行业都有供奉祖师的祭拜活动，东岳庙（北京民俗博物馆的所在地）曾经是北京民间行业神灵崇拜的重要场所，至今保存着大量碑刻等反映行业神灵崇拜的文化遗物。行业祖师和行业保护神是行业的象征符号，在行业内部管理、行业技艺传承等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金炉圣母铸钟娘娘庙”是明清时期北京地区铸钟工匠供奉铸钟娘娘、并对她进行祭拜活动的场所，反映了民间铸钟行业的神灵信仰。

铸钟业是中国古代社会一个历史悠久的手工行业，自从有了金属钟铃的出现，这一行业就诞生了。山西陶寺遗址出土的铜铃证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钟铃铸造业已经萌芽，夏代青铜合范铸造技术获得快速发展，中原一带出现了合范铸造的青铜铃。至商代，青铜文化日趋成熟，青铜铸造业初具规模，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和长江中下游都铸造出了早期钟类器物——青铜铙，尤其在长江支流湘江流域得到蓬勃发展，青铜铙的数量远远超出其他区域。西周礼乐制度的建立导致了礼乐文化的兴盛，作为礼乐文化载体的青铜乐钟大行其道，不仅成为中国古代重要礼器，而且以优美动听的乐音位居“八音”之首，成为演奏“金石之声”不可或缺的金属体鸣乐器。大量的考古资料证明铸钟业在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空前繁盛，铸钟技艺精湛绝伦。铸钟工匠在青铜成型技术、造型艺术、声学、音乐艺术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周礼·考工记》对于当时的铸钟技术有十分详尽的记载，是古代铸钟工匠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铸钟业发展到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钟铃等响乐器具的使用范围得到进一步拓展，在佛教、道教等宗教场所得到广泛应用，充当着法器、报时器、信号工具，发挥着多种功能。用途的不同导致钟在形制上有很大差异，青铜乐钟形体相对较小，钟体呈扁圆型，主要盛行于先秦时期，秦汉以后逐渐衰落。佛寺、道观、坛庙等宗教用钟以及形制相仿的城市钟楼报时钟、帝王宫廷朝钟与先秦乐钟明显不同，钟体均为正圆筒形，形体较大，声音绵长。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之后，中国古代铸钟业在明朝时期再一次达到鼎盛，洪武、永乐年间相继出现了许多质地精良的巨型钟，崇祯年间刊行的中国古代综合性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对农业和手工业的丰富经验进行了总结，其中包括了铸钟业，对于铸钟技术、铸钟工具的名称、形状、工序等都进行了详细描绘。金炉圣母铸钟娘娘庙的出现印证了这一时期铸钟业的高度发展。

金炉圣母铸钟娘娘庙在数百年的沧桑岁月中经历了多次重修，新中国成立之后，庙内还保存数块重修碑记，笔者所知有两块保存至今，其中一块被收藏在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另一块收藏在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从碑记中我们可以获得这座庙宇的一些历史信息。

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收藏的石碑是清朝乾隆年间重修时刻写的，由古代建筑博物馆业务干部从德胜门附近的拆迁工地拣回并收藏于博物馆。碑首正中书写：“万古流芳”四个大字，字体上方及左右两侧有双线刻卷云纹浅浮雕装饰。碑文竖写，自右向左依次书写：

#### 重修铸钟娘娘大殿碑记

盖闻人天路上修福为先，万善门中布施第一。兹因鼓楼西铸钟厂真武庙原有金炉娘娘正元君大殿三间，年深日久，渗漏损坏，住持道衲昼夜悬念，钱粮浩大，独立难成，不免募化十方施主，此众信之虔心，士庶善之，诚意资财，共成圣事。大殿业已鼎新，金身彩塑，功竣。

乾隆乙巳年孟冬朔日吉立。住持道衲 王志诚 扣草。

收藏在大钟寺古钟博物馆的石碑刻写于清朝道光七年。石碑碑首书有“名标千古”，碑文竖写，自右向左依次为：

兹因鼓楼西铸钟厂娘娘庙，金炉圣母大殿三间渗漏不堪，道衲昼夜悬念，今募化彭礼寿独立重修，其功德莫大矣。上驷院司礼圈既长信官弟子彭铸钟保、道号礼□。

率男 长子厥副松禄

次子库使松存

三子厥副松贵

四子厥副松常

道光七年 月 日 住持道衲黄□□

由碑文可以看出，金炉圣母铸钟娘娘庙是一座道教庙宇，其始建年代虽然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但可以推测大致在明朝永乐年间或以后的时期，清朝初期逐渐破败，经过几次重修，至上个世纪中叶其建筑格局依稀尚存，20世纪下半叶金炉圣母铸钟娘娘庙彻底销声匿迹。

金炉圣母铸钟娘娘庙所处的区域在元大都时就是城市中心区域，曾经是大都城钟鼓楼的所在地。《元一统志》：“（至元）九年二月，改号大都，迁居民以实之，建钟鼓楼于城中。”<sup>⑤</sup>《析津志》：“中心台在中心阁东十五步，其台方幅一亩，以墙缭绕。正面（南）有石碑，刻‘中心之台’。又双清杨树大井关帝庙，北去则昭回坊矣。前有大十字街，

转西，大都府、巡警二院，直西，则崇仁倒钞库，西，中心阁，阁之西，齐政楼也，更鼓譟楼。楼之正北，乃钟楼也”<sup>①</sup>。不过，元时钟鼓楼与明时钟鼓楼的位置有些差异，元时钟鼓楼相距更远，钟楼的位置接近今天北京市区的北二环。元时钟楼附近是否有铸钟场所？其附近是否也有铸钟娘娘庙？目前还没有相关的资料使这些疑问得到证实。

无独有偶，对于铸钟娘娘的信仰与崇拜并非仅限于北京，南京市大钟亭附近的“三姑殿”证明了这一信仰在南京地区同样流行。大钟亭位于南京市鼓楼广场东北角，内悬一件明洪武二十一年铸造的巨型铜钟。该钟原悬挂于南京城鼓楼北面的钟楼内，清康熙年间，钟楼倒塌，被移挂在后世修建的大钟亭内。三姑庙位于大钟亭的一侧，是用来纪念当年为铸造大钟献出生命的三个年轻女性的。相传，朱元璋限期铸成大钟，铸钟师和工匠们久铸不成，眼看限期将至，整日惶恐不安。一天，铸钟师的三个女儿穿戴整齐，来到铸钟现场，表达要帮助父亲铸造大钟的心愿之后纷纷纵身跳进了火花四溅的熔炉之中。之后，大钟果然奇迹般的铸成了，人们被三位姑娘的孝心和献身精神深深感动了，为了纪念她们，建了三姑殿。据说清朝乾隆皇帝七次下江南，其中三次来到鼓楼大钟亭，并亲自提笔御书“三姑殿”三个大字匾额，高悬于殿门上方。

通过比较，我们发现分别出自南北两地的两则传说故事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首先，故事内容相同，都是在铸钟工匠不能顺利完成皇帝交给任务的情况下，铸钟师的女儿纵身熔炉，舍身铸钟救父。略有不同的是铸钟师女儿数量不同，南京的传说是三个女儿，而北京的传说是一个女儿。其次，故事发生的时间相近，一个明朝洪武年间，一个是明朝永乐年间，都是明朝初期。如此相似的两个民间传说之间是否有着某种内在关联？笔者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些粗浅分析：

一、明成祖营建北京、迁移都城，客观上促进了以北京钟楼、鼓楼为中心的铸钟行业区域的形成，大量的铸钟工匠会聚此地，使这一区域成为北方地区铸钟业发展中心，为铸钟娘娘信仰在这一地区的产生提供了行业背景和社会环境。

二、明成祖在营建北京城的过程中征用了大量外地工匠，其中不可避免地有相当一部分工匠来自南京及其周边地区，铸钟工匠亦不例外。南京和北京现存明朝初期所铸大钟有力地证实了这一观点。北京现存明朝永乐年间铸造的铜钟有4件，钟楼悬挂的铜钟、大钟寺大钟楼的佛钟、收藏在

大钟寺九亭钟园的铁钟（原悬挂于北京城钟楼）以及天坛的一件铜钟，将这些钟与南京大钟亭悬挂的明朝洪武二十一年铜钟相比较，会发现它们的钟体均为长筒喇叭型，在体量、造型、工艺等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而与北京周边的河北、山西等省的头盔型北方钟截然不同。笔者推测，明朝初期，南京与北京两地铸钟工匠的铸造技术与艺术风格有明显的师承关系，甚至可以说他们同属一个铸钟师集团。铸钟工匠自南而北的迁徙为南方民间习俗在北方地区的传播创造了便利条件。

三、明朝初期，道教势力与皇权集团紧密勾结，相互利用，道教日渐兴盛。明成祖迁都过程中对道士姚广孝的重用进一步推动了道教在北京地区的传播。姚广孝成功设计、督造了重约46.5吨的永乐大钟，他在铸钟行业的地位和影响更是非同寻常，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铸钟行业内信奉道教的人数迅速增长，北京金炉圣母铸钟娘娘庙的兴建一方面迎合了信教民众的心理，满足了他们越来越强烈的信仰需求，另一方面充实了北方道教神灵信仰体系，扩大了道教势力。

综上所述，明成祖朱棣将都城从南京迁往北京为南北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机遇，对明朝铸钟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导致铸钟师的迁徙、铸钟技艺和民间信仰习俗的异地传播，促使北京地区铸钟业获得了空前发展。北京金炉圣母铸钟娘娘庙和南京三姑殿都是铸钟行业神灵信仰的载体，关于“铸钟娘娘”和“三姑”的民间传说均反映了明朝初期南北两地铸钟手工艺人的艰难境地和特殊心理，北京“铸钟娘娘”信仰是南京“三姑”信仰的承袭和发展。

①⑤（清）陈宗蕃：《燕都丛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②（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③（清）朱彝尊原辑，（清）于敏中、英廉等奉敕撰纂：《钦定日下旧闻考》，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④中国地图出版社根据郑奇影、杨柏如编制、亚光舆地学社1950年出版的原图复制。

⑥（元）李兰兮、赵万里校辑：《元一统志》，中华书局，1966年版。

⑦（元）熊梦祥：《析津志辑佚》，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为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副研究员）

# 《正阳桥疏渠记》碑

## 与天桥地区的环境变迁

陈倩

《正阳桥疏渠记》碑位于今北京市崇文区红庙街78号天桥路口东北面。该碑建于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碑身方形,碑首为四角攒尖式,碑座为束腰须弥座式,上刻精美浮雕,覆仰莲瓣及云、龙、菩提叶等纹饰。碑体通高8米,各面宽1.45米。顶端是三层飞檐的宝盖。四重脊各雕一龙,昂首曲身似欲腾飞,辐凑于宝顶。碑身正面上首镌刻汉字题名“正阳桥疏渠记”,碑的南、西面为汉字,北、东面是满文。为清乾隆帝亲笔手书楷书,记述乾隆五十六年治理天桥南河道工程的事。清初年间,天桥附近的水,往东经金鱼池、状元桥、红桥、窑坑(今龙潭湖)<sup>①</sup>后出城。天桥南一带因地势低洼到夏天雨季经常积水。乾隆五十六年在天桥以南地区疏浚水道。因这次疏渠成效显著,故乾隆皇帝亲书为记。1984年,该碑被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文物保护单位。

目前关于此碑的研究较少,多是对于这一文物保护单位的介绍性材料,主要介绍碑的形制、功能及碑文主要内容,分析碑文则强调乾隆治理天桥河道对于水利设施的改善和建设。这块石碑的确是对这次疏渠工程记载最详细的史料,但除水利建设的研究视角外,还可以对碑文的内容有不同理解。民国学者张江裁对于北京天桥地区的研究较为全面,其《北平天桥志》和《天桥丛谈》等书谈到此碑,并记载了一些相关的历史事件。这为研究此碑提供了一些材料线索,其文为志书体例,对于碑的介绍也仅是一笔带过,比较简略。今之学者韩锐介绍此碑,则认为碑文亦反映了环境保护的思想内涵,这次修渠工程对于改善天桥地区小环境的气候条件有很大的作用。<sup>②</sup>受此观点启发,本文试结合碑文及一些史籍记载,从环境的角度对碑文做一分析,并探讨当时水道的改建

及其后来的变迁,对天桥地区环境的影响。

### 一、《正阳桥疏渠记》碑文及分析

根据《正阳桥疏渠记》碑拓片<sup>③</sup>,将碑文录文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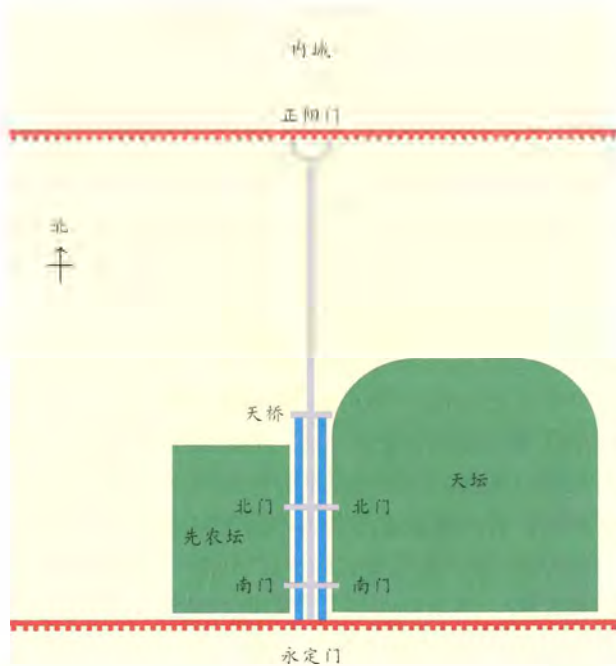
正阳门外之石衢抵正阳桥,桥之左右,市廓栉比,允帝王都会万方辐辏之基也。桥之南为天桥,其南石衢直达永定门,则答阳黄道,荡荡平平,会极归极之宗也。衢之左为圃丘,祈年殿之西外围垣,右为太岁坛、先农坛之东外围垣。各有石衢二,横接围垣之南、北门,为诣坛辇路。盖地势东高而西低,故石衢之西恒积水,而东之沙土常因西北风吹壅西垣之半,每诣斋宫,怵弗愜观。今年上辛祭毕,爰命司工于天桥南石衢之左右自北而南各疏渠三。第一渠长各一百六十余丈,宽北各三十余丈,南各二十丈,第二渠长各一百三十丈,宽各二十丈,第三渠长各五十五丈,宽各二十丈,深各三尺。其四达坛之横衢,命各辟土道,宽二丈,以为往来车路,并各去其向禁人之木栅。(东西诣坛之横衢四,旧设木栅,以禁行人往来,盖地近坛垣,理宜严肃而重,车皆由正石衢以行,易致石弊。今石衢左右既开广渠,且各留土路,是四横衢之南北皆有界限,木栅亦可以不设矣。)疏渠之土即筑为渠岸之山,周植以树,兼培行车之土路,于是渠有水而山有林,且以御风沙,弗致湮。坛垣一举而无不便,向来南城井多苦水,兹胥得饮渠之清水为利亦溥,而都人士之游涉者咸谓京城南愜观瞻、增佳景。然予之意原不在此也。洁坛垣而钦崇祀,培九轨而萃万方,协坎离以亨既济(都城南为离位,今开浚水渠六,坎为水卦,是为水火既济之象,亨之道也),

莫经涂以巩皇图。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故不得考工之请而为之记，亦合向之《知过论》所谓不可已者，仍斟酌为之之义，值此耄龄，复得蒞一大工作，孰莫非昊苍鸿眈，钦承开国家万年有道之长也哉。

乾隆五十有六年岁次辛亥仲夏月御笔。

从碑文可以看出如下几方面内容：

1. 六条渠道的分布走向：按照碑文中的描述，从天桥迤南，由北向南分三渠，两岸共六渠，傍行于正阳门至永定门之间的石衢（即今天桥南大街）两侧，南北相继，从天桥一直延伸到永定门。第一渠与第二渠以及第二渠与第三渠的分界处，应有桥位于渠上。（如示意图）



2. 四条横衢。沿着先农坛东墙的南北两门，天坛西墙南北两门，延长至正阳门石衢，共有四条横衢，这四条横衢与南北向的石衢相连接的交点处，恰是第一渠与第二渠以及第二渠与第三渠的分界处，即渠上桥的位置所在。横衢的南北有土路为往来车道，土路以挖渠之土培垫，用以行车可以保护石衢的路面不受破坏，同时可以作为石衢辇路与普通行人的界限。

3. 乾隆疏渠这一工程的本意。在碑文中乾隆解释为神圣之举，即通过疏渠种树，净化天坛与先农坛周围的环境。这不仅是为“惬意瞻、增佳景”，营造一片优雅宜人的自然环境，更是要“洁坛垣而钦毳祀，培九轨而萃万方，协坎离以亨既济，莫经涂以巩皇图”，即在此地建立一种严肃庄重的

氛围，并追求风水的和谐。故有“意原不在此”、“其在斯乎”之语。乾隆帝连年在京城内外大兴土木，修建园林，以资“游目赏心”，晚年曾写《知过论》承认自己一生的过失是好兴土木，引咎自责。对于疏浚正阳桥沟渠目的的申说或许是针对某些大臣反对兴作的谏言而发。言虽如此，由于疏渠植树，修渠的客观效果仍是使得周边自然环境大为改观。

## 二、修渠对于水道与环境的改善

### 1. 天桥地区的水道情况

天桥地区在元、明及清前期是一片水域沼泽地带。元代时期为大都的南郊。明嘉靖以降，为防御北方蒙古族的侵扰，统治者将都城“南扩北缩”，修筑外城至永定门，南郊地区被圈在外城里。天桥以南地区初为水泽，到明后期修外城时填平，因地势低洼，成为易于积水地带。据《清会典事例》记载：“雍正七年谕，正阳门外天桥至永定门一路，甚是低洼，此乃人马往来通衢，若不修理，一遇大雨，必难行走。至广渠门内之路，亦着一并查勘具奏。遵旨查勘……天桥起至永定门外吊桥一带道路，应改建石路，以期经久。”<sup>④</sup>乾隆五十六年所疏河渠，是在明代修外城时填平的水域又重新开挖河渠，并且进一步沟通了天桥地区南北方向的水流。

### 2. 疏渠后天桥地区的环境变化

水道疏浚之前，天桥周边地区的环境较差，据碑文记载，因地势东高西低，石衢之西经常积水，“东之沙土常因西北风吹壅西垣之半”，以致乾隆帝“每诣斋宫，怵弗愜观”。查阅史籍，天桥周边的风沙天气在明代即有文字记录。如成化四年（1468）“四月庚子太常寺奏：‘天地坛外墙风沙堆积几与墙等。内坛及山川坛周围盖瓦俱被风损坏，宜速修治，工部覆奏，从之。’”<sup>⑤</sup>风沙堆积与天坛的围墙等高，这和乾隆御制碑文中的描述“东之沙土吹壅西垣之半”是很相似的。据研究，这里的风沙大是天坛附近大量取土的人为原因造成的。<sup>⑥</sup>正统初年，明廷认为在西北烧窑有碍风水，下令“京城西北俱不得掘土，其东南许出城外五里，天地、山川坛许去垣外三里”<sup>⑦</sup>。在近城附近大量取挖泥土，必然造成大面积的裸土地面，成为沙尘的起源地。如天坛附近是挖土活动较为集中的一处地方，天坛东今龙潭湖之地即是明代修建外城后留下的一片窑坑。地面浮土遇风则起，整个京城春天多风沙，天桥地区的小环境尤甚。朝鲜使者金昌业来华所写的《老稼斋燕行日记》中

也记载了天坛外的风沙。金昌业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冬至随兼谢恩使正使金昌集访华,他发现先农坛与天坛的地势不同,“天坛垣外尽树黍干篱,问其由,则以此地多西风,故路中沙土随风来积,以至埋垣,设此所以障也。黍高几二丈,而沙积其外者半焉。先农坛不受风,故不设篱,地势然也。”<sup>⑧</sup>天坛地势高,因此西墙外多西风刮来沙土堆积,故而在天坛外设有篱笆作为挡风沙的屏障,先农坛外则没有。<sup>⑨</sup>从明、清的史籍记录联系到清乾隆正阳桥疏渠记碑文的内容,可见天桥周围春季的风沙一直都比较大大。而在乾隆五十六年的疏渠工程中,以疏渠之土作为渠岸之山,在渠旁植树,并培垫行车之土路,形成树林,以御风沙,以防湮没坛垣。因为疏导水利、植树固沙而将这个地区改造得渠清柳绿,风景宜人。

天桥附近因疏通水渠而增加了无限风光,两岸遍植红莲绿柳,风景甚佳,几乎可与江南媲美。当时文人的诗文对此多有描述。嘉庆五年(1800),张问陶有《天桥春望》诗曰:“种柳开渠已十年,旧闻应补帝京篇。天桥南望风埃小,春水溶溶到酒边。(渠开于乾隆辛亥)明波夹道且停车,人为临渊总羡鱼。尘外濛濛千树柳,随风绿到第三渠(第一渠近天桥,第三渠至永定门下)。城南车马太匆匆,坛树挈云返照红。几个闲人临水立,任他疑作信天翁。”<sup>⑩</sup>这首诗很形象地描述了天桥南水渠修浚后景观的改变。诗中的时间、空间都很写实。作诗之时,恰好离乾隆五十六年(1791)已过去十年,“风埃小”说明这一地区的气候条件大大改善,风力减小,尘土减少,满眼是溶溶春水,粼粼明波,游赏之人到这里自然慢下脚步,怡然自得。劬葆祺同年所作诗云:“桥头新水活粼粼,桥外高楼聚酒人。酒人漫说登楼好,春衣且步沿溪草。碧瓦朱楹护径云,千重坛树波光绕。……清漪夹道苍烟暮,指点游人垂钓处。……桥下水为当日无。”<sup>⑪</sup>诗中着重描写了桥头的桥新水和树影波光掩映的情景。另孙尔准《泰云堂词集》卷二有《杏花天》一阙,其小引曰:“小寒食,宿雨初霁,踏青至天桥,登酒楼小饮。柳晴波,滴空皱绿,渺渺余怀,如在江南村店矣。……”词中有“濛濛新柳余寒浅,一夜雨丝绿糝……杏花也带江南怨,慵傅晨脂浅淡。”<sup>⑫</sup>等句,亦是天桥春景的形象写照。据孙尔准之子所编《平叔府君年谱》、《海棠巢乐府》集中的词作于嘉庆九年(1804)至十八年。<sup>⑬</sup>此时距乾隆朝疏渠的时间至少十三年。从其诗词中关于绿柳和碧水的描述,也可见天桥地区的动人春色。这些诗文明显突出了水的景色,可见天桥地

区更增添了几分江南水乡的气息。

昔日的风沙扑面、泥水淤塞之地经过整饬疏浚河道,变成了杨柳依依、碧波荡漾的江南。可见乾隆五十六年这次疏渠的意义。乾隆皇帝对自己晚年兴作的这项工程也很满意,因此在御制碑文中称之为“一大工作”。而这番美景与今天的天桥景观相去甚远,是因为在嘉庆朝后期,天桥河道被填埋,附近的自然风貌又开始改变。天桥河道被填埋,还与一次著名的政治事件有所关联。

### 三、嘉庆年间天理教起义与填埋天桥河道

嘉庆年间,白莲教的支派天理教在北京活跃起来。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十五日,天理教主林清所部教徒兵分两路,冲进东华门、西华门。几十名起义军在太监高广福带领下,登上午门五凤楼,与清军展开激战。清廷火器营官兵千余人投入反攻。天理教军寡不敌众,归于失败。<sup>⑭</sup>这次起义攻入了清廷内部,严重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

清人笔记中谈到,在这次事件之后,堪輿家端木国瑚说白莲教“作乱”与乾隆时疏浚天桥河渠有关。此河破坏了清廷的风水,导致了这场千古奇变。于是清王朝下令“湮河流,填土人之”;“闻之潘文勤公云:‘天桥甬道,两旁近坛,墙外从前系河池,满植芰荷,茶肆酒楼鳞次,夏日游人憩息其间。嘉庆时白莲教匪作乱,堪輿家言有关风水。始湮塞河流,填土实之。然识者谓,自塞后国家财源渐竭,亦失计也。’”<sup>⑮</sup>虞山丁国钧按:“所谓堪輿家,盖青田端木国瑚也。曾见端木与人书,言是河之当塞,故知之。”<sup>⑯</sup>前引劬葆祺的诗中也提到了填埋河道之事:“谁占水势说兵机,欲掩春渠计恐非。烟波果洗三军甲,我愿填桥化鹤飞。(按:渠成于乾隆辛亥,近闻有人请仍填之,以镇兵气,故及之。)”<sup>⑰</sup>诗作于嘉庆五年(1800),看来认为此渠破坏风水之说早已出现。是否端木国瑚进言天理教作乱与风水有关,尚没有更多的史料作为佐证。根据一些零星的材料,仔细考查这一事件的前后,可以肯定以下几个问题:

#### 1. 天桥河道为嘉庆皇帝下诏填埋。

在嘉庆十八年十二月的诏书中,嘉庆帝明确提出反对天桥河渠的态度:“谕据钦天监奏正阳桥护城河水周流环绕。直达通路,合之正阳门永定门南北方位。正协水火既济之义。今天桥南河泊六处,阅年渐久,泥土半淤,审度地势,似涉水火相争,应将两岸积土趁势填实等语。正阳门

就外城形势而论，地居坎位，永定门在其南地，居离位，正阳桥近北，导引河流，委输通潞，恭读皇考高宗纯皇帝圣制正阳桥疏渠记，本取坎离既济之义，辨方位巩固皇图，彼时司工官未喻圣意，遂挖河泊六处，我皇考以成事不说，故不待请而为之记，兹正阳桥一带护城河渠浮沙淤垫，亟宜疏浚，以达流泉，其天桥迤南河泊六处。该监审读象涉水火相争，与圣制文协坎离以亨既济本义殊不符合。其地依形家言为都城明堂，法宜坦平正直。今凹凸参差于郊坛左右，观瞻亦复不肃，著照钦天监所请，交步军统领衙门，即用两岸积土将河泊六处一律培垫，以大和会而昭荡平。敬述圣制文奠经涂以巩皇图本义。该衙门即择吉办理。”<sup>⑧</sup>此文中嘉庆帝将乾隆帝的原意做了改变，并称是修渠时的司工官未喻圣意，正阳桥一带河泊六处破坏了风水。回到乾隆碑的原文，乾隆所说的坎离相济，是指南为离位，坎为水卦，水火相济。嘉庆所说的坎离相济，是指正阳门就外城形势而论，地居坎位，永定门在其南地，居离位。这样一解释就把河泊六处置于阻碍风水的境地，似涉水火相争。对比乾隆帝碑文和嘉庆帝的说法，嘉庆帝的说辞自然是对乾隆帝原意的扭曲。这道圣谕使得天桥河道寿终正寝。

## 2. 嘉庆帝反对河渠的态度产生在天理教事变之后

嘉庆皇帝在嘉庆十八年的圣谕中公开表明对疏浚天桥下的河道持反对态度。但这种反对态度是在天理教作乱之后才有的。据嘉庆八年奏准：“天坛、先农坛外围墙垣并泊岸间段坍塌。查泊岸系砖土相间，不能胶粘，一经雨水冲汕，随势坍塌，请将泊岸砖块拆抵墙身，将泊岸一律改筑灰土。”<sup>⑨</sup>这说明嘉庆皇帝起初并不反对这六条河渠的存在，还奏准修缮泊岸。而下令填埋河渠是在嘉庆十八年的十二月，这恰好在天理教事变刚刚平息之后。这两件事情之间应该有着某些内在的联系。

## 3. 天理教徒的活动空间在南城地区

在记载天理教起义事件的史料中，我们可以寻找一些线索来建立与天桥河道的联系。从嘉庆时礼亲王昭槿在《啸亭杂录·癸酉之变》的记述中可以寻找出天理教的活动范围：其中参与天理教的茶房太监杨进忠“以铸军器为己任，暗于宣武门铁市中铸刀数百柄”<sup>⑩</sup>，“十四日，林清贼党分二队：其东自董村至者，……约由东华门而入；其西自黄村至者，……约于菜市口齐集，由西华门而入。正阳门外开庆隆戏园刘姓者，亦其党羽。”<sup>⑪</sup>另据《靖逆记》，林清癸酉八月二十四日“入都城，得财召至广宁门酒肆中，密告以九月十五日起事”。<sup>⑫</sup>

根据事变后林清的供词，林清预先派人分路陆续进入京城，分驻于前门外，约定十五日会齐攻进紫禁城。<sup>⑬</sup>据其他天理教徒的供词，他们的入城路线分别有：或进永定门、前门，再到西华门，<sup>⑭</sup>或进南西门，到前门外鲜鱼口，再进西华门。<sup>⑮</sup>或进南西门（右安门），到菜市口，进顺城门（宣武门），走到外西华门，<sup>⑯</sup>或进沙窝门（广渠门）、海岱门（崇文门）、前门，到东华门。<sup>⑰</sup>天理教徒活动所涉城门有广宁门、永定门、宣武门、右安门、正阳门、广渠门、崇文门。这些城门都集中在北京南城。事后审理此案的官员奏请“并将失察逆贼进城之右安门、正阳门、宣武门三处城门官员奏请革职。”<sup>⑱</sup>说明这三门在这次事件中防守疏漏最为严重，使得天理教徒得以混入。联系分布在南城的前门外三合店、珠市口、鲜鱼口、菜市口、宣武门、正阳门外、广宁门这些地点，可推断参与林清之变的天理教徒的活动区域即为北京南城地区。尤其珠市口一带的庆隆戏园和位于正阳门外为天理教出资散财收买太监的王姓所开首饰楼万兴号都是天理教徒活动的秘密据点。<sup>⑲</sup>天桥地区因为多酒肆、茶馆、戏院，本身就是商贾及外来人员聚集之地，难于管理。天桥至永定门的河渠直接连至外城护城河，二十余丈宽的河渠加上沿岸的树荫及城门水洞等，必然给城防和管治带来困难，容易出现防控漏洞。

联系到天理教的进攻路线和活动范围，可以推测嘉庆帝填埋天桥河渠的意图，很大程度上是便于对南城天桥地区加强管治，以肃清天理教残余势力。由于史料的局限，我们无法确知这一点，但至少可以判断：堵塞河渠的直接原因，当是天理教作乱使得嘉庆帝对这一地区格外关注。

## 四、天桥水道与环境遭到破坏

从乾隆五十六年至嘉庆十八年，天桥南面的这六条渠道只存在了24年便被掩埋。此举破坏了外城的河道系统，天桥地区的水不能向南流至永定门导入外城护城河，只能按修渠之前的渠道流淌，水流必然不通畅，至雨季更易积水成灾。

天桥下的河道堵塞之后，碧波荡漾、红莲映日、杨柳依依的景色不复存在。但民国年间曾小有反复。民国初年，天桥开始建戏园、建平民市场。其环境已是“五方杂处，百商蝟集。惟地势低洼，每夏，积水成渠。入夜，则蛙鸣不已，蚊虫虻集。明沟秽水，臭气熏蒸。六年，高尔禄长外右五区，督清道队，削平其地，筑土路，析以经纬。

同时是区绅士，卜荷泉诸氏，复鸠资于先农坛之东坛根下，凿池引水，种稻栽莲，辟水心亭商场。招商营业，茶社如环翠轩、绿乡园，杂耍馆如天外天藕香榭，饭馆如厚得福，皆美善。造河筑长堤，夹岸植杨柳，其南其西，各启一门，皆跨有木桥。河置小艇，一届炎夏，则红莲碧稻，四望无涯，一舸嬉游，有足乐者”。<sup>①</sup>民国八年（1919）闽人林传甲，曾在水心亭遍觞名流，作天桥之集，颇极诗酒之盛。这时的水心亭只能是一小片水面，无法与乾嘉之际宽阔浩淼的水渠相比。民国九、十两年，“天桥三遭大火，而水心亭尤烈，不能复修。后将亭之北部地基，售与电车公司，建筑总站，尘嚣既甚，遂不复花明柳绿矣”。<sup>②</sup>到这时天桥地区的环境风貌基本奠定了今日的景象。天桥环境的改变非一朝一夕形成，有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但乾隆、嘉庆之际天桥曾出现的如江南般的美景不再，还是从嘉庆十八年填埋掉这六条河渠开始的。

（附注：本文写作中，蒙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石刻专家韩锐先生指点思路并提供资料，特此致谢。）

①原为明代修建外城后留下的一片窑坑，后为龙须沟污水排泄处。1952年修整成东、中、西三个人工湖，因与龙须沟成首尾之势，梁思成起名为龙潭湖。

②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京志·文物志》第四章第二节“碑碣”，北京出版社，2006年，第514页。

③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75册，第175页。

④《清会典事例》卷932《工部》七一《桥道·桥梁道路》，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第十册，第701页。

⑤《明宪宗实录》卷53成化四年四月庚子条，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校印本，第23册，第1071页。

⑥高寿仙：《明代北京的沙尘天气及其成因》，《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⑦《明英宗实录》卷23正统元年十月庚辰条，第13册，第0465页。“禁京城外掘土治窑者初武襄诸卫擅于西直门外河次掘窑，御史劾罪之，以为京城外自永乐来置陶冶俱有定方，其西北俱堪奥家当忌，至是，上命行在督察院出榜禁约京城西北俱不得掘土，其东南许去城外五里，天地山川坛许去垣外三里，违者罪之。”

⑧〔朝鲜〕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国译燕行录选集四》，汉城民族文化促进会，1976年，第91页。

⑨连同上注参照庚华：《清代朝鲜访华使臣关于北京先农坛的记述》，《北京文博》，2004年第3期，第92页。

⑩〔清〕张问陶：《船山诗草》卷15“己庚集”之“庚申”，《续修四库全书》第1486册，第399页。

⑪〔清〕邵葆祺撰：《桥东诗草》卷十二“庚申（1800）”《同人游天桥池上作》，同治十二年（1873）大兴邵氏刻本第五册，第七、八页。

⑫〔清〕孙尔准：《泰云堂词集》卷2《海棠巢乐府拈题》，《续修四库全书》第1495册，第649页。

⑬〔清〕孙慧悖、孙慧翼：《平叔府君年谱》，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年谱丛刊》第131册据清道光二十二年刻本影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469页。

⑭〔清〕昭槎：《啸亭杂录》卷6《癸酉之变》，中华书局，1980年，第159—164页。

⑮〔清〕李佳继昌：《左庵琐语》，光绪三十年刻本，第45页。

⑯引自张次奚编著：《天桥丛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页。

⑰《清实录》第31册，嘉庆十八年十二月上戊戌，中华书局，1985—1987年，第821页。

⑱《清会典事例》卷865《工部》四《中祀·坛庙规制》，第十册，第46页。

⑲〔清〕昭槎：《啸亭杂录》卷6《癸酉之变》，第160页。

⑳〔清〕昭槎：《啸亭杂录》卷6《癸酉之变》，第161页。另《李奉全供词》也提到“十四日早间进永定门，到珠市口三合店”，“有开戏园子的刘二（即刘潮栋）代我们找房子住宿”。刘潮栋所开庆隆戏园应是秘密据点，在正阳门外珠市口地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项》，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九日。）

㉑〔清〕盛大士：《靖逆记》卷上“刘得财”条，《中国野史集成》第40册，巴蜀书社，1993年，第495页。

㉒《林清供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项》，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九日。

㉓《赵增供词》、《杨进忠供词》、《李潮佐供词》。

㉔《贺万金供词》、《祝林供词》。

㉕《李三供词》、《金黑供词》、《刘二供词》。

㉖《王博供词》、《刘狗供词》。

㉗北平故宫博物院主办：《故宫周刊》第202期，《林清教案》之《托英和等奏呈各逆犯供词折并附九犯供词》，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九日，见林案供词档。

㉘据《阎进喜供词》，《军机大臣会同刑部提讯太监于吉庆严进喜等由奏片及各犯供词》，嘉庆十八年十月十三日，见林案供词档。

㉙张江裁著：《北平天桥志》，北平研究院总办事处出版课，1936年，第9、10页。

㉚《北平天桥志》，第10页。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馆员）



# 醇亲王墓考

王晓军

醇亲王墓，为清道光皇帝的第七子醇亲王奕譞之墓，俗称为七王坟。位于北京海淀区北部苏家坨镇妙高峰山脚下，是北京地区现存规格最高、保存最完整的亲王府墓园。1984年被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加以保护。

作为著名的文物古迹和旅游景观，很多专家学者都曾发表文章，对这里别致的自然景观、神秘的传说故事、独特的建筑形式及悠久深厚的人文历史，进行了全面的介绍，但或因资料所限，引用有误，或因未能实地认真查实，也就难免在其介绍文章中存有疏漏或不准确的地方，也留下了许多需要进一步考证之处。

本人曾在海淀区从事文物工作多年，因工作关系，曾经数十次到醇亲王墓进行考察，并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每一次考察都有一些新的发现，现将对其考察调查的情况，综合成文，作为补遗。

## 一、醇亲王墓概况

醇亲王墓背靠大西山妙高峰，坐西朝东，依山而建。墓园范围直至山下现状公路，至今入口处仍立有两个花岗岩石界桩，上刻有：妙高峰道界。墓区占地面积包括阴宅、阳宅、阿哥圈、宰牲亭、驻守看护墓园的八旗官兵营房及看坟佃户住房、所租种的土地共约为8平方公里。

墓地主体构成分为阴宅和阳宅两部分。

阴宅位于墓地的南侧，依山势自下而上分为三部分，东西长约200米，南北宽约40米，前部为长方形，后部为半圆形宝城，前方后圆，是典型的中国墓葬园寝规制。

墓的最前端为一面由岩石砌起的高大的石墙，石墙中间是一条由青砖砌成的台阶神道，台阶共有111级。台阶顶端为一片开阔的平台，是阴宅建筑的第一部分。主要建筑是平台正中建的黄琉璃瓦、歇山顶碑楼一座，内立螭首龟趺石碑一通，碑文为满汉合璧，是光绪皇帝亲笔御书。碑文内容记述了醇亲王的生平。碑亭后建有单孔石拱神

桥，下为月牙河，皆用花岗岩石砌筑而成。碑亭四围遍植古松。北侧有砖砌台阶下至城关及阳宅，正面前行过石桥再登39级台阶，即达墓园的第二层。

这里是当年祭祀的主要场所。正中建有园寝的正门隆恩门，南北两侧建有朝房。隆恩门面阔三间，上覆绿琉璃瓦，前有月台，南北两侧墙各有角门一座。南北朝房各三间，现北朝房尚存，南朝房已毁，仅存遗址。过隆恩门有两株高大的白皮松，人们称之为“白袍将军”，进而为享殿位置。享殿于1933年被毁，现仅存八块石柱础以及残损的砖石，尚可隐约辨出建筑基址。在《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中对享殿规制有具体记载：“享殿一座五间，广五丈三尺，纵二丈七尺，檐高一丈一尺五寸。享殿前抱厦三间，广三丈二尺，纵一丈五尺，檐高一丈一尺。”

过享殿跃上15级台阶，入陵门，为一半圆形院落，即墓地的宝城部分。

宝城内共有四座宝顶，中间一座高大宝顶内葬的是醇亲王奕譞和嫡福晋叶赫那拉氏。墓穴具体情况在《清稗类钞》中有载：“奉安龙穴方广约数十丈，则全以山石挖空凿平，再用方砖铺砌者。其龙穴结脉之处，约一丈六尺，宽一丈，筑有石室一间，中央砌石床，即为停放金棺之所，南向设石门两扇，奉安后，即下千斤石锤封锁。”虽然如此仍在1937年被盗掘。北侧一座较小的宝顶葬的是侧福晋颜札氏，南面两座宝顶葬的是醇亲王另外两个侧福晋刘佳氏、李佳氏。墓的前面北南两侧各立有石碑一座，北侧为《懿旨追封》碑，南侧为《古树枯朽记》碑，宝城内植有高大的白皮松33株，纵横环列，使整个墓地更加静穆。

碑楼于1999年重修，宝顶及隆恩门等部分建筑于2003年重修。

宝城后为一片古松林，有醇亲王刻石数方，此处应为原金章宗“西山八院”香水院金鱼池旧址。

阴宅北侧为阳宅部分。阴、阳宅中间有一条长沟将其相隔。入口处建有城关式券门将其相联。

城关券门正中镶嵌有石匾额，上刻“隔尘入胜”四字，为醇亲王亲笔手书。进券门向左有砖砌台阶向上即可达阴宅，并有八字影壁，向右进而为阳宅正门。

阳宅又称“退潜”别墅，取自醇亲王别号“退潜居士”。主体建筑坐西朝东，由层层升高的五进院落组成，地势略低于阴宅。

第一进院落为一排十五间坐东朝西的倒坐房，正房五间，南北两侧各有配房五间，为看院仆人住室和车马库。西侧建有南北两侧可上的台阶，进入二进院落。

第二进院落四合布局，西为正房五间，名纳神堂。南北各有配房三间及耳房一间。东房中为过道，两侧房为门房。

院的北侧还有一进跨院，为一别致的小花园。园内四围沿墙有叠石假山，中有池塘，池塘西侧建有五间歇山顶敞轩，内立有记述醇亲王墓地选址经过的卧碑。园东南角假山上，建有六角小亭一座，并有山石题刻“拨云蹬”。园西侧建有石窟，上有刻石题字“藏真”等字。石窟上有门，通公主楼。从纳神堂北侧沿墙向上有两丈多高的台阶直通第三进院落。

第三进院为醇亲王的寝院，有坐西朝东正房五间，南北配房三间及两侧耳房各一间。房屋整齐明亮，院落开阔。正房北侧建有曲水流觞流杯亭一座，现仅存亭石座。院北侧有跨院，建有二层小楼一座，为专供醇王府公主小姐来此居住的公主楼。

进而为第四进院落，分为里院和外院两部分。外院南北各有相对房屋三间。内院自成一体，三合布局。正房五间，两侧各有耳房一间。南北两侧配房各三间。现在房屋形式基本完好，仅屋顶有的已改为现代形式。

沿四进院落前左侧甬路，可上至第五进院落建筑。这里只有平房三间，但因地势较高，视野很开阔。院内散置石桌椅，可以休息、品茗、下棋、纳凉、赏月，别有情趣。

整座阳宅建筑师法自然，自成一体，构思精巧，清幽静谧，实际上是醇亲王的一座修身养性的别墅。

醇亲王墓的阴宅、阳宅，以自然地形建设，既浑然一体，珠联璧合，又独立为一单元，互不干扰，将中国风水园林建设的精髓充分发挥，是古典园林的典范之作。

## 二、拾遗、补缺、勘误

醇亲王墓因其特殊的地位，很早就引起文史

专家的关注，介绍文章很多、很全面，在此不再赘言，仅对以往未尽之处加以拾遗补缺，并对传误之处勘误。

### 1. 神道

醇亲王墓是依山而建的，首先纳入人们视野的是一道高高矗立起的用岩石垒砌、高约15米的墙壁，中间则是一条斜起的台阶甬道，也就是墓地的神道。神道倾斜角度约45度，站在神道前，仰面望去，是神道层层叠起的台阶，最上端仅可隐约看到功德碑楼顶端黄灿灿的琉璃瓦，难以望见墓地其它建筑。

神道长约50米，宽约8.5米，中间为台阶，两侧为青砖平铺的斜面。共由三层阶梯组成，第一层有台阶78级，阶宽1.7米，两侧斜面各宽2.9米，立高约10米；第二层有台阶21级，阶宽1.55米，两侧斜面各宽1.9米，立高约3米；第三层有台阶12级，阶宽1.45米，两侧斜面各宽1.4米，立高约2米；神道台阶共计111级。

多年来，在人们对醇亲王墓的介绍文章中，对神道的关注并不多，特别是对神道台阶的级数记述多不准确，有的认为是99级，有的记为108级、123级，而其准确的级数应为111级，其前两层为99级。

作为墓地的最前端，其实从神道的铺砌到级数的设置，都是很讲究的，其对阿拉伯数字运用是非常到位的。从下至上，主要的两个阶梯，共计99级台阶，达到了中国文化记述数字的最高位数。而最后一层共有12级，与99级相加，共计111级，而9在中国数字中是最大个位数，1则是第一位的数，两头都占全了，因此可见其在台阶的铺砌时是动了心思的。

而对神道的长度、宽度也少有人对其勘察、记述。神道长度、宽度则是下宽上窄，逐步收缩递减的。

我们现状所看到的神道，是由青砖砌筑而成的，而墓园的其它台阶都是用花岗岩石砌筑的。这是为什么呢？经与当地长者询问得知，实际上这些台阶也是用花岗岩石垒砌的，而且在台阶的两侧还砌有约0.80米的扶手墙，扶手墙的墙帽也是花岗岩石制作的。在1958年修建人民大会堂时，将这些条石台阶拆去使用了，后来为方便又铺上砖，成为现在这种形式。至今旁边荒地还留有散落的一块扶手墙帽的花岗岩石料，可以印证当年这段神道铺砌的是与上面台阶一样的花岗岩石阶。

### 2. 功德碑亭及碑

刚刚进入墓园神道，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这座亲王墓的不同之处。

神道之上平台建有功德碑亭，这座碑亭规格在等级森严的时代显得极为特殊。碑亭为歇山顶，上覆黄琉璃瓦，四面辟券门，内立高大的螭首龟趺石碑一通。

其实，功德碑亭及碑形式有很多，而这座碑亭及碑的独特之处在于其琉璃瓦的使用和关于石碑曾经被“调包”的传说。

按照《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等级规定，只有皇帝享有使用黄琉璃瓦的权力，而亲王最高仅可使用绿琉璃瓦，越制是有杀头之罪的，亲王使用黄琉璃瓦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为什么在这里会这样做呢？其实这是因醇亲王不同一般的特殊身份决定的，这在功德碑的起首之句就有说明。碑文为满汉两种文字，由光绪皇帝亲自撰写，起首之句为“皇帝本生考……”，这一句就说明了在一座亲王碑亭上使用黄琉璃瓦的原因，它告诉人们这座墓的主人是皇帝的亲生父亲，功德碑是为他而立的。而且所立之碑为光绪皇帝御笔所书，也就破例使用了黄琉璃瓦顶。只是为了规制上与皇帝有所区别，将歇山两山的铃铛排山处的最后一块勾头使用为绿琉璃瓦。不仅如此，因为墓主人是“皇帝本生考”，光绪皇帝还要“诣邸成服”并“持服期年”，由朝廷尊谥号曰“贤”，特定其称号为“醇贤亲王”。而且明文立庙，配享太庙，“葬以王，祭以天子，立庙班讳”。庙制和祭礼明文要求按照皇帝的规格举办。可以说这座亲王的功德碑亭已远远超出亲王地位所应享受的待遇，这是一座不受正常礼制约束、极为特殊的建筑。

不仅如此，关于碑亭内所立的功德碑，也因一段谬传已久的传说，更为其增添了许多传奇。

醇亲王功德碑亭高大雄伟，内立石碑高约5.56米，宽约1.23米，厚约0.64米，在高大碑亭内略显短小。而在距醇亲王墓仅数里之遥的山脚下，建有其九弟孚郡王奕譞的墓园。其碑亭略小，也就显得石碑高大，这就引起了一段传说，因流传甚广，也就在很多书籍、文章中都作为正史引用。

在《北京名胜古迹词典》孚郡王墓条目中，对醇亲王墓和孚郡王墓功德碑有这样的记载：“孚王坟的石碑高7.5米，硕大无比。据说这碑原来是为七王（醇亲王）准备的，但七王坟建于半山，山路陡峭，不易运送。时九王坟也在兴建，而碑小仅5米左右，于是由修坟的太监将两碑对换。所以九王坟的碑比七王坟的碑高2米”。而且在《清代王爷坟》等介绍西郊名胜古迹或古墓的书籍、

文章中，均沿用了这种说法。而事实上醇亲王的功德碑要小于孚郡王的功德碑2米有可能吗？从这两位王爷的地位、墓的修建情况看，这种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醇亲王奕譞生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卒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墓地自清同治八年（1869年）开始修建，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园寝已基本建成。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移葬于此。在墓的北侧建有阳宅，又称之为退潜别墅。修墓期间，醇亲王经常来此居住，监管工程，修墓太监断不敢因碑高大难运，擅自将石碑“调包”，如果“调包”怕是也难以瞒过当时还在世的墓主人的。这样做的可能只有是经过醇亲王的同意了，这又怎么可能呢？或是在醇亲王去世后才立的碑。而这种可能性也是不存在的。

孚郡王奕譞生于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卒于清光绪三年（1877年），一生平庸，无所建树，享年仅33岁，早于醇亲王14年去世，其墓的完工使用也早于醇亲王墓，也就更不可能在醇亲王墓立碑之后再为其立碑了。

为了弄清这种传说是否准确，本人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但奇怪的是都没有找到对两座碑尺寸的准确记录，即使在海淀区文物管理所的历年文物普查档案中也是空白。因此只有亲临实地进行测量，才能解除心中的存疑。

经过实测，醇亲王墓功德碑的高为5.56米，孚郡王墓功德碑高5.50米左右，尺寸应该是相同的，只是略有误差。这说明过去对两碑的尺寸记述，孚郡王墓碑为7.5米高于醇亲王墓碑两米的传说，有着太深的谬误。而后人引用时又未加以实地认真地考证，也就造成了多年来以讹传讹。事实上两座碑的规制应该是相同的。

### 3. 《懿旨追封》碑和《古树枯朽记》碑

在醇亲王墓功德碑之外，醇亲王墓宝城宝顶前，南北两侧各立有一通石碑。这两通碑虽然不大，形制也很普通，但碑上所刻的内容、文字却很独特。

立于北侧的为《懿旨追封》碑，碑通高2.15米，宽0.80米，厚0.30米。碑首刻有“懿旨追封”四个篆字，碑身正面所刻文字均为篆体字。中间刻字为“侧福晋颜札氏之墓”八个篆字，其两侧还各刻有七个象形篆体字。这些字字体独特，很是少见，因此多难辨识。虽多方请教亦未能全部识出，有待专家进一步考证。

此碑正面所刻文字均为篆书，辨识颇费周章，可见匠心独运了。而此碑上首所刻“懿旨追封”四字之意为：颜札氏是慈禧太后亲自封为醇亲王侧



懿旨追封碑

福晋的。

碑阴所刻文字为醇亲王奕譞亲自题写的一首七言律诗。诗名为《钦奉懿旨颜札氏追封侧福晋敬记》，内容为：“流芳遗挂都无迹，丹棘青棠莫慰情。戚戚鸡窗悲繡帐，煌煌鸾诰降瑶京。梵文妙谛千华藏，鲜饌奇珍七宝羹。没受殊恩生拜赐，旁妻几见此哀荣。光绪辛巳仲冬下浣并书。”落款两方用印为：“九思堂印”、“皇七子”。诗句之间还有注文：“蒙皇太后赐白檀、梵火牌、玉佩、荷包，复蒙，派中使酌奠，凡五次。”“十一月十四日钦奉懿旨追封侧福晋时尚停汇于邸”、“自前年选赐恩赉骈蕃，并诏入宫禁二次。”等等。

醇亲王嫡福晋为慈禧太后的胞妹，而颜札氏为内务府中的一名秀女，是慈禧太后为笼络醇亲王，将颜札氏赐予醇亲王的，并曾两次召见其进宫，赐予宝物，可见对其关照，也就有了这通不知醇亲王出于何种心情，为其单独立的、连贵为慈禧太后的胞妹的福晋及另外两个侧福晋，都不能享受此等殊荣的石碑了。

墓前南侧也立有一通石碑，所立之碑名为《古树枯朽记》碑，是专为一株枯死的古树而立的。碑高1.14米，宽0.68米，碑文内容是光绪八年（1883年）季春十七日移古松“小青”于南墙外的记述。从碑文看所记内容无任何实际意义，只是将一株古松的枯朽、伐置情况加以记述，但从醇亲王一生为人处世，小心谨慎，事事无不“九思”，时时想着“退潜”的心态，从此中也可略见一斑，其立此碑，免人附会非议，又是多么的用心良苦。

#### 4. 醇亲王墓选址碑

在醇亲王墓阳宅二层北侧花园的敞轩内，立着一通卧碑形式的石碑。碑身刻满了碑文，详细反映了醇亲王墓从选址到修建的过程。

碑身高1.90米，宽1.20米，厚0.30米，座高0.90米，宽2.20米，厚0.60米。碑的正面主要内容是醇亲王亲自作并书写的一首名为《同治戊辰九月十九日勘定妙高峰风水志喜并序》的律诗及小序，诗、序中详细记述了其选择此处为园寝墓址的情况。具体碑文如下：“同治戊辰九月十九日看定妙高峰风水志喜并序。余夏间病后，气弱弗克趋公，蒙慈恩、圣恩赏假至蔚秀园小住旬余，复往西山响塘庙避暑。是庙为太监王照禄、王正光等创建，皆余旧仆也，素性朴诚，行复清洁。遁世山居深洽余宿好，偶话及是处林峦之妙，王照录因余尚无园寝，深为系念，告于山南有九龙口者，九峰环抱局势颇佳，欣然请勘與托某往视奈尹竟无可否。秋间闻有勘與李唐字尧民，深通斯术，于是请假邀与俱往，周视上下，据云山高地狭，万难适用，乃索然思返。王照录复告以山北最高之峰名妙高峰，盍往视之。余尚夷犹护军校色克图、太监曹进寿从旁敦劝姑为一游。北行二十余里，甫露峰岚，尧民即遥瞩称善，至则层嶂巍峨，丛林秀美，遍山流水潺湲，其源澄澈如镜。山高三里许，凭凌一望，目极百里，洵大观也。尧民深赞不已，指古松西北为来龙正脉点穴最佳，余喜极，不复狐疑，一言断决，念斯事切要，而余看择风水如此之速，又如此之佳，实王照录之力也，喜吟长律记之。”其长律诗为：“游迹探奇托，名山几度经。平生耽夙好，秘诀缅前型。顾我必如结，中人念独惺。寄身闲似衲，防口守如瓶。清话烦炊黍，浮踪偶聚萍。九峰陈历历，十里策骊驹。未卜金精吉，空劳玉勒停。积诚机妙转，虚受语兼听。爰命轮号发，重寻草木灵。螺髻殊解意，鹤膝俨成形。石湊玲珑骨，林开锦绣屏。细流分径曲，斜日印渊渟。鱼漾千头碧，龙盘百尺青。奇缘钟造化，佳气郁崢嶸。实获偿虚愿，频行趁壮龄。集谋同筑舍，决计异盈庭。款志嘉敦笃，欢惊勒志铭。从来多戚戚，一笈会苍冥。”长律多处还有注文，对墓的选址进一步加以注释。其中，对“螺髻殊解意，鹤膝俨成形。”注释为“尧民云：妙高峰诗势如鹤膝，为金象最佳”。对“石湊玲珑骨，林开锦绣屏。细流分径曲，斜日印渊渟。鱼漾千头碧，龙盘百尺青。”有这样的注释：“老松高六丈许，银杏一株，围三丈五尺，清荫盈亩。垂实累累，皆数百年物也。水源出石罅，周砌以石，游鱼千头，



墓地选址碑

堪輿云是生气。”等等。

在碑的北侧面也刻有文字，刻的内容是一首小诗：“深公只解巢由隐，支叟无由谢俗缘。何幸平生遭际盛，圣明钦赐买山钱。”下面特意注释道：“买山建茔蒙慈恩圣恩赐银伍万两”。碑的背面所刻文字为奕譞撰写的《豫杜妄论一奏》。碑的南侧面还刻有“中情犹豫逐时添，卜吉迟迟岁月淹，立异漫夸三识慧，决疑须协二人占，心通柳暗苍明境，语绝瓜田李下嫌。（注：妙高峰风水经李尧民看定，本无疑义，又旋有称不可用者，复请萧山叶绣圃观，始知皆属于虚。）分付與儻宜便了，朴诚忠信喜相兼。（注：命七品首领太监范常喜、护军校色克图董厥事一切章程均极周妥，山田互易，公平售买，亦毫无抑勒沾染，虽由余指画，伊等实能恪遵。）”

此碑文字内容丰富，详细记录了醇亲王选定园寝的经过，以及修建用地的费用情况、周边环境、堪輿风水等等，是研究醇亲王墓的重要实物资料。

### 5. 流杯亭及其它刻石

在北京的一些著名的园林中都留有流杯亭这种形象各异建筑基址。如潭柘寺有图案呈南北虎造型的流杯亭座，恭王府有图案呈“亭”字形的流杯亭座，阳台山朝阳院图案呈篆体“寿”字形的流杯亭座等等。

在醇亲王墓阳宅的第三进院正房北侧的这座流杯亭，建筑已无存，石质的基座依然保存完好。

醇亲王墓阳宅流杯亭石座为正方形，内长3.3米，外长5米。流水自石槽西南角流入，顺石槽图案至东南角流出。石座是由两块方石拼接而成。曲水流觞图案颇具匠心，图案从南侧看为狮脸，从北侧看则变成了虎脸的形状，为南狮北虎图案。

亭的四角还留有柱础石，可以看出亭子的基础轮廓。令人费解的是靠南侧的柱础石，一半压

在了房的山墙下，仅露出半个柱础，不知因何缘故？而一般的流杯亭都是建在花园中的独立建筑。

醇亲王墓阳宅流杯亭是一座可以和潭柘寺流杯亭相媲美的建筑，从图案看，这座狮虎脸亭座规制应是低于潭柘寺那座龙虎脸的了。

醇亲王墓园刻石很多，前面已提到一些，碑刻以外要数阴宅宝城后的金章宗香水院金鱼池遗址松林石刻了。这里的岩石上几乎都留有刻字。其中最大的一方石上正面刻“云片”二字，阴面刻“一卷永镇”四字，上款“光绪乙亥五月题”，下款署“和硕醇亲王”。另外还有“漱石枕流”、“洗心”、“插云”、“翠萝风”、“挂月”、“神运石”等等。

在阳宅的小花园中也散落着许多刻石，有“藏真石窟”、“拨云蹬”、“漱石眠云”，在花园西北角原有一条小瀑布，在其侧刻有一首诗，内容为：“一条寒泻玉琤琤，激石穿云昼夜声；悟澈澄清淆浊旨，洗心洗耳总邀名。寒秋观瀑题诗 退潜居士。”



流杯亭座

## 三、后记

醇亲王墓园的修建浓缩了许多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知识，许多专家、学者，都很关注其文化现象。作为北京地区现存的一座最大最完整的，仅次于最高等级皇帝陵园的亲王墓园，而醇亲王本人在清代晚期又是一位有着特殊身份的历史人物，其墓地也就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历史信息，需要我们进一步发掘、研究，而且，墓地本身还有一些谜团因知识、资料所限需要进一步考证，方可解开。如墓穴的地宫情况、被盗情况，阿哥圈的情况、末代皇帝溥仪母亲墓情况、墓地驻守八旗兵情况、看坟人情况等等。

（作者为原海淀区文物管理所所长）

# 刘多生与北京寺观

韩建识

刘多生为清末著名太监。在清光绪时曾为宫廷内务府副总管，为内务府总管李莲英之副手。他依靠本人的财力和权势，修缮寺观多处，对北京地区寺观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试对其生平、所修寺观情况及归葬地等问题加以研究。

## 一、皈依道教，屡充白云观护坛化主

刘多生，法名刘诚印，又名刘明印，道号素云道人<sup>①</sup>，又号符合子，祖居山东即墨（今山东省即墨市），明代迁至直隶东光县（今河北省东光县）。道光三十年（1850年）定居京师。后因其才识为怡亲王所赏识，被诏入内侍，赐名增禄，又字德印。光绪十五年（1889年）被授予总管六宫事务之职，曾受园亭骑马乘舟回寓、疾时加赐黄金药品之宠。光绪二十年（1894年）万寿庆典时恩赏三品顶戴，惠及三代。<sup>②</sup>清同治年间，刘多生皈依道教，从此与北京道教寺观结下了不解之缘。

太监刘多生之所以能与道教发生关系，据《素云刘先师碑记》载：“戊辰因奉差至白云观，适南阳张律师阐教观中，一见相洽，殷勤展拜，执弟子礼甚恭，此师皈依道教之始也。”<sup>③</sup>《素云真人道行碑铭》载：“南阳张真人传戒白云观中，公适因公至观，遂执弟子礼焉。”<sup>④</sup>同治年间慈禧太后之母去世，其棺寄存在白云观，太监刘多生因料理“皇姥嫔”事<sup>⑤</sup>，与白云观第十九代方丈张耕云（张云樵，名圆璿，号耕云）<sup>⑥</sup>结识，一见相洽，拜张耕云为师。据刘诚印碑铭<sup>⑦</sup>，他于清同治九年（1870年）皈依道教。后来成为白云观第二十代律师<sup>⑧</sup>。

刘多生对白云观的主要贡献有捐巨资传戒、重勒碑志、拓修云集山房、创建和捐助长春永久供会及刊版印经等。

张耕云律师在白云观传戒时，刘多生被举为本观护坛。同治十年（1871年）张耕云律师传戒，刘多生募捐五千余金为传戒费，受戒者367人；高云溪（高明峒，字云溪，又名仁峒，号寿山子）

为白云观主持时，屡开戒坛，刘多生均为保举大师监戒。光绪八年（1882年）募捐七千余金，为衣钵口粮传戒费，受戒者400人。光绪十年（1884年），募捐九千余金，为传戒费，受戒者525人。这样，在同治十年、光绪八年、光绪十年、光绪十七年（1891年）先后四次传戒中，刘多生慷慨募捐了以万计的薪粮扉履之资，受戒者共计1642人。<sup>⑨</sup>

白云观是长春祖师阐教处所，数百年来，殿宇频增，碑志林立。由于担心旧碑磨灭，孟豁一方丈时就有重勒诸碑的想法，但心愿未遂而仙去。张耕云律师主持本观时，托付刘多生实现孟公重勒碑志的夙愿。<sup>⑩</sup>据小柳司气太著《白云观志》记载，光绪十二年（1886年）刘多生捐资重勒白云观重修碑（后土殿前西）、长春邱真人道行碑（老律殿前东）、白云观重修碑（罗祖塔前西）、白云观重修碑（后土殿前东）、重修白云观碑记（南极殿前东），立罗真人道行碑（罗祖塔前）、重勒诸碑记（祠堂前西）、七真道行碑（老律殿前西）等。<sup>⑪</sup>上述诸碑，据笔者2008年8月调查，赵士贤撰《白云观重修碑》在白云观西路元辰殿前西、张璿撰《长春邱真人道行碑》在老律堂前东、顾颐寿撰《白云观重修碑》在西路元辰殿前东、王常月撰《重修白云观碑记》在东路雷祖殿前东、孟珙撰《七真道行碑》在老律堂前西。

光绪十六年（1890年）刘多生及诸大护法，慷慨捐资，庀材鸠工，利用白云观后余地，修筑了云集山房及戒台、游廊、假山、亭台等，作为接待宾客、道侣集讲处所。其中，刘多生捐助修园墙楼房银一万五千两。<sup>⑫</sup>（图1）

由于燕九、九皇祖师两圣诞香供澹泊，刘多生敬约善信张诚明、张诚五及内官信官助善者百余人，于光绪八年（1882年）建立了长春永久供会，每年香供费用约需三百余金。到光绪十二年（1886年），会中积蓄已经不多，刘多生担心其失传，又自捐三千二百六十金，在昌平州购置土地四十五顷有奇，每年收租三百三十金交白云观作为二会香供灯果费。<sup>⑬</sup>



图1 白云观云集山房(2008年8月摄)

光绪十年(1884年)秋,张耕云方丈再次来白云观授戒传法时,刘多生倡议开创了“龙门岔支霍山派”。以公众名义,叩请愿遵“宗”字为第一代号。实际即尊“邱祖”为祖师,张耕云方丈为该派第一代宗师,刘素云本人则为第二代宗师。从此,太监有了自己的道派,归为全真龙门道徒。<sup>④</sup>

## 二、重修福慧寺、双泉寺、宏恩观等寺观三十余所

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兴修福慧寺开始,刘多生“凡见有荒庙废祠,无不力任筑削,务使气象重新,计共修寺观三十余所”,在他所修的三十余所寺观中,宏恩观最为著名。<sup>⑤</sup>

福慧寺(福惠寺)位于今石景山区青龙山狮子窝,明代时称太平院。<sup>⑥</sup>乾隆十六年(1751年),僧源方住持狮子窝,当时虽有庙基但并无房舍,自本年开山,源方同穆克登额开山修道,建立庙宇。<sup>⑦</sup>(图2)清嘉庆年间,魏双庆、王福喜捐资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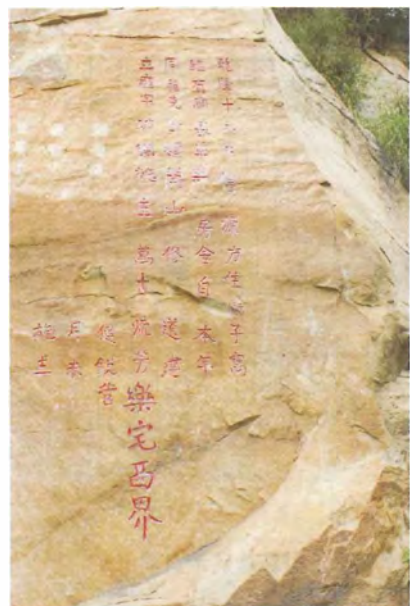


图2 佛宇岭摩崖石刻(2008年8月摄)

修。<sup>⑧</sup>清同治年间,由刘多生等三内监购置此寺。<sup>⑨</sup>同治十一年,刘多生重修此寺。<sup>⑩</sup>他任福慧寺主持<sup>⑪</sup>,该寺成为其别墅。“地当山口,长廊架空,画壁精绝,下瞰玉泉、昆明,如在足底。有‘碧云天’三字题额”。<sup>⑫</sup>此次重修后易名青龙山福惠

寺,并在寺南山冈上建狮子窝塔院。<sup>⑬</sup>福慧寺今被一军事单位占用。

双泉寺位于今石景山区黑石头乡双泉寺村。始建年代不详。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章宗曾到此寺避暑;因寺有双泉,故名双泉寺;在寺北建祈福宝塔。宣德二年(1427年)十二月,奉宣宗旨意,寺院成为大能仁寺的下院,宏善妙智国师兼该寺主持。明成化五年(1469年)十月,宪宗赐名香盘禅林。嘉靖元年(1522年),双泉寺被修缮一新。双泉在寺右,左侧有一塔,高约七丈余。<sup>⑭</sup>嘉靖元年冯姓太监重修后,虽屡有增修,但到光绪年间,双泉寺已屋椽倾斜,门径萧索。刘多生等立愿重建,鸠工庀材,工程从光绪九年(1883年)三月初三日开始,光绪十年(1884年)九月十九日竣工。重修后,旧有大殿三间焕然一新,顺大殿左右复增修客堂各三间,又增修东西客堂各三间、耳室各一间,二门罩壁颇为壮观。在外院东西修客堂各三间、抱厦一间、山门一间、角门、旗杆各二,寺院围以墙垣、饰以彩绘。并将香盘寺二碑抬到寺内。<sup>⑮</sup>1928年北平特别市寺庙登记时,双泉寺“面积南北约十五丈,东西约十一丈,山门前有地一亩半,瓦房二十四间,平台两间。管理及使用状况为除正殿三间供佛像外,其他房屋住人或置物,各房屋均尚完整。”<sup>⑯</sup>1958年7月北京市文物古迹调查登记时,双泉寺尚存山门、东西厢房各三间、正殿三间及东西耳房各三间、东西配殿各三间、东耳房一间。二门北有砖石砌罩壁。院中有铁香炉一个,带亭高2.7米,口径0.6米,上铸字:“大清光绪乙酉年清和月,翠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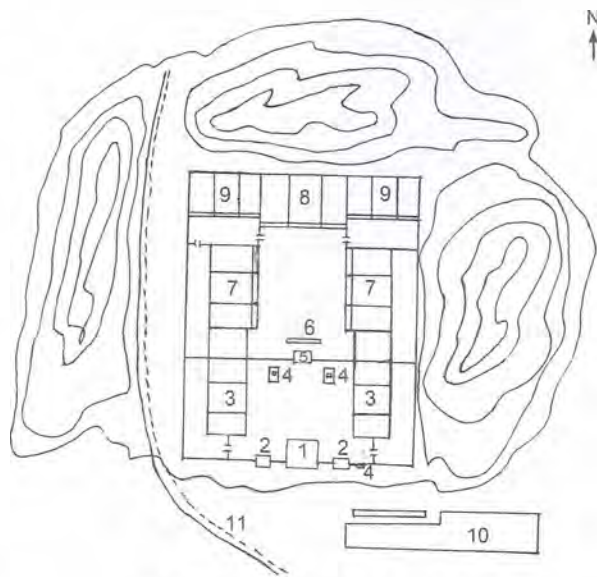


图3 1958年双泉寺建筑示意图

1. 前殿 2. 旁门 3. 东西厢房 4. 石碑 5. 二门 6. 罩壁 7. 东西配殿 8. 正殿 9. 东西耳房 10. 双泉寺村生产队办公室 11. 通往天太山小路

山双泉寺，东光素云道人刘诚印敬献”。二门前东、西有碑各一，东碑为“重修翠微山双泉寺记”碑，西碑字迹不清。东旁门边的围墙上嵌有“弘善妙智国师塔铭”。双泉寺生产队住此寺内。<sup>⑤</sup>（图3）双泉寺今仅存二门前东西两碑、西厢房、东西配殿及东耳房等。（图4）



图4 双泉寺（2008年8月摄）

在双泉寺东有一单拱石桥，名万善桥。此桥始建年代不详，在明代时称双泉桥。因明弘治五年（1492年）昌国公在桥南新建茆兆，弘治六年（1493年）自春至秋，此石桥被重修。<sup>⑥</sup>此桥因年久而损坏，由于地处登妙峰山交通要道，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刘多生重修双泉桥，改名为万善桥。<sup>⑦</sup>万善桥为南北向，桥身如虹状，弧度很大。高约10余米，桥身长18.4米，宽3.1米。青石砌桥基和桥栏板。桥栏板外有石额刻：“万善桥”。桥北有石碑三通，明代石造像一尊。<sup>⑧</sup>万善桥今为砖石结构，石佛尚存。

宏恩观坐落在东城区鼓楼东北、豆腐池胡同以北、张旺胡同以南。元代元贞二年（1296年）创建，在都城坎地金台坊。明代宣德八年（1433年）、清代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嘉庆十年（1805年）等一再重修。宏恩观在元代称千佛寺，明代正统三年（1438年）五月，敕赐为吉祥寺，但仍俗称千佛寺。明代万历九年（1581年），在德胜门北八步口另建千佛寺，为了加以区别，该寺改称小千佛寺。明代还曾改名为清静寺。清代光绪年间，刘多生对其重修后改寺名为宏恩观。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主持本庙僧人振龄因焚修无力，把寺庙转给了本门僧人闻庆。有洋人打算购买此寺作为寄庐，此事将要促成时，被内务府郎中厚安得知，厚安感慨“斯地当龙尾之要”，担心其毁在外国人之手，就与闻庆订立契约，由厚安接修，本寺事务仍由闻庆负责管理。光绪十三年（1887年）闻庆又将此庙转给了刘成富、梅顺安，

但因他本人没有手本契纸，只能给二人白字一纸。这年秋天，刘多生到该寺瞻仰圣像，看到庙貌倾颓、美材独存，于是不惜重资，鸠工庀材，重修此庙。在寺庙前山门供奉四天王作为护法，正殿供奉关圣帝君、文昌帝君、孚佑帝君，西殿供奉地藏王菩萨、十殿阎君，东殿供奉碧霞元君等位，后殿供奉三世佛，左右供奉十八罗汉、妙道真君、财神诸像。此次重修于光绪十三年九月初三日开工，光绪十九年（1893年）九月初九日落成。由于刘多生与厚安交往密切，厚安对刘多生重修此寺的善举非常高兴，就在本寺的手本契纸上加“送”字赠给了他，这样，刘多生就成了宏恩观第一代开山主持。<sup>⑨</sup>1936年第一次寺庙总登记时，宏恩观为“太监道士庙，属私建。不动产土地六亩六分，房屋八十三间；附属土地六亩四分，房屋一百零四间。管理及使用状况为供神、自住、出租。”<sup>⑩</sup>民国时期，宏恩观“有碑四：一为《三皇翠云仙院碑》，陆宝忠书；一为《宏恩观碑》，高明峒撰，张百熙书；一为素云道人所撰之《宏恩观碑记》；一为潘祖荫撰之《宏恩观碑》。”<sup>⑪</sup>1958年8月北京市文物古迹调查登记时，宏恩观尚存影壁、山门（天王殿）、垂花大门、东西配殿、帝君殿、东西配殿、东西配房、大雄宝殿、东西耳房、东西配殿；东一跨院存山门、北屋、前殿、垂花大门、正殿、东西配殿、东西耳房、东西配房；东二跨院存山门及大式硬山箍头脊筒瓦房18间；西跨院存山门和正殿。帝君殿前左存潘祖荫撰《宏恩观碑》，帝君殿前右存刘诚印撰《宏恩观碑记》；大雄宝殿前右存高明峒撰《宏恩观碑》。（图5）此时宏恩观归宗教局道教组保管，北京地毯合作社占用。<sup>⑫</sup>宏恩观今被鼓楼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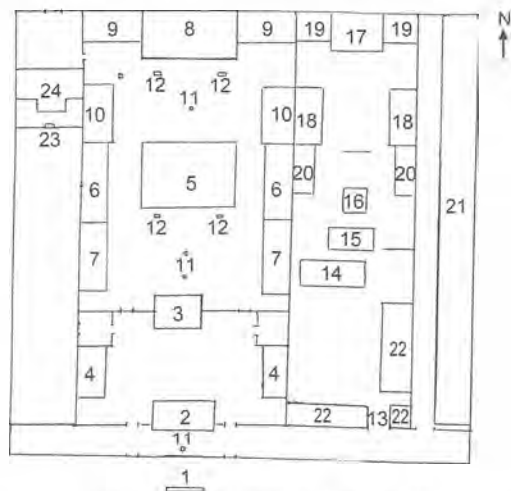


图5 1958年宏恩观建筑示意图

1. 影壁 2. 山门 3. 垂花大门 4. 东西配殿 5. 帝君殿 6. 东西配殿 7. 东西配房 8. 大雄宝殿 9. 东西耳房 10. 东西配殿 11. 炉亭 12. 碑亭 13. 山门 14. 北屋 15. 前殿 16. 垂花大门 17. 正殿 18. 东西配殿 19. 东西耳房 20. 东西配房 21. 十八间房 22. 新建房屋 23. 山门 24. 正殿



市场、超市、外商、居民等占用。

光绪年间，刘多生还和李芝云一起重修了位于宏恩观南、西草厂的三皇翠云仙院，他们共捐巨款，“鸠工庀材，购买地址，添建神祠，炉鼎法器俱备，内外焕然一新”。<sup>③</sup>

立马关帝庙也是刘多生在清光绪年间重修的较重要寺观。立马关帝庙位于今海淀区蓝靛厂东南角。庙内祀奉关羽，因山门内左侧有泥塑枣红色立马一匹，故名。<sup>④</sup>立马关帝庙建于明嘉靖年间，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道士李明道募化重修立马关帝庙五圣殿宇，清雍正四年（1726年）道士王本阳购置此庙，传与门徒黄义通接办焚修，后来又依次传与道士李礼清等5人、王嘉鹤等、刘祥德等7人、王宗岳。王宗岳未收门徒，因已年老恐无人接办焚修，经京都西安门内养蜂夹道清凉兴国寺主持贾德祥、同顺堂刘宝德说合，王宗岳于光绪六年（1880年）情愿将本庙首本字具、帐目、家具等送与众善人等，由众善人等接办焚修。清光绪七年（1881年）刘多生等28人发愿重修此庙。<sup>⑤</sup>1936年第一次寺庙总登记时，立马关帝庙为太监道士庙，属私建；有不动产房基地三亩七分多，房屋39间；管理及使用状况为供神、办理学校，自住外出租。<sup>⑥</sup>1958年3月北京市文物古迹调查登记时，立马关帝庙尚存山门三间、前殿三间及前殿配殿、后殿及后殿东西耳房各一间。前殿内有石碑三通（光绪碑一，民国碑二）。据说，后殿北面长房两行及蓝靛厂大街南面大殿一层、西面文

化站也是立马关帝庙庙址。当时，立马关帝庙是北京市第十九中保管，后长房归北京市精神病院二所保管，大街南面八十一号为北京蓝靛厂中心小学保管。<sup>⑦</sup>（图6）今立马关帝庙已成为杂乱居民院。

旧时人们去妙峰山的进香之路，最著名的有4条：中道，大觉寺；中北道，北安窠；南道，三家店；北道，聂各庄。<sup>⑧</sup>光绪十八年（1892年）刘多生修建了妙峰山中北道，将其砌成石阶。金勋编纂《妙峰山志·序》载：“至光绪十八年，太监刘诚印者，号素云道人，俗称‘印刘’，捐资修中北道。由北安河往上至涧沟，道宽七尺，砌成层磴。”<sup>⑨</sup>《妙峰山琐记》载：“北坞村金山寺普兴万缘净道会，略云：‘中道系甲子年起，中北道系壬辰年素云道人修。’按：同治三年甲子，太监安得海修大觉寺中道；光绪十八年壬辰，太监刘诚印修北安窠中北道。刘即素云道人。安以不令终，故启帖止具刘名。”<sup>⑩</sup>

### 三、归葬金山

刘多生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六月十一日无疾而终。<sup>⑪</sup>七月初二日归葬于金山宝藏寺。<sup>⑫</sup>1958年4月北京市文物古迹调查登记时，刘多生墓在海淀区青龙桥镇老府村九号东，东北为金山，西为宝藏寺，南为董四墓村。东临汪诚庆真人墓，西临高诚义真人墓。墓地建筑坐北朝南，布局玲珑。墓地为长方形，墓门为石栅栏门，两边为砖砌十字花墙，东西北三面为虎皮石围墙，东西宽约15米，南北长约80米，墓葬3座，刘多生墓（主墓）顶为砖砌八角攒尖重檐亭，仿木结构，一斗二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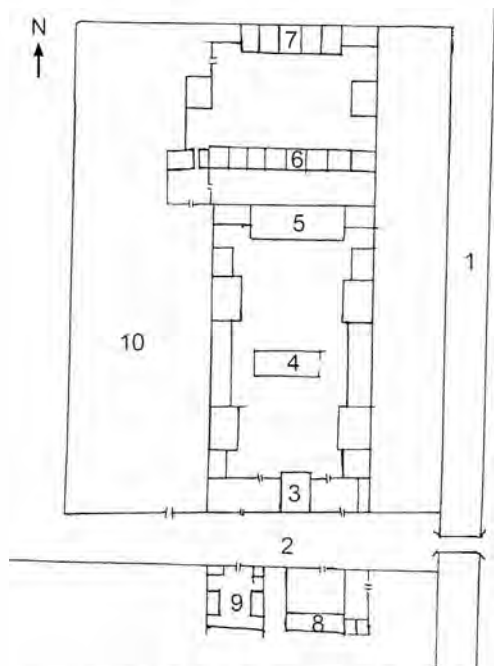


图6 1958年立马关帝建筑示意图

1. 长河 2. 蓝靛厂大街 3. 山门 4. 前殿 5. 后殿 6. 前长房 7. 后长房  
8. 蓝靛厂大街八十一号的大殿 9. 文化站 10. 精神病院男同志宿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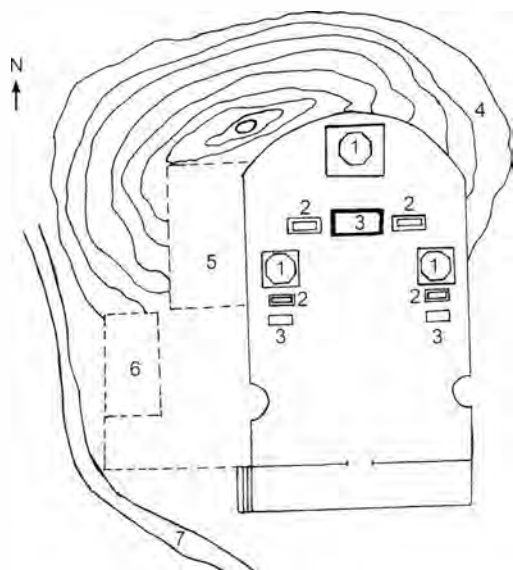


图7 刘多生墓平面位置示意图

1. 八角碑墓 2. 碑 3. 石桌 4. 山门 5. 高真人墓  
6. 老府村民居 9号 7. 到宝藏寺山道

高约7米，直径2.4米。另外两墓顶为砖砌八角攒尖亭，仿木结构，高4.5米，直径2米。刘多生墓前有石供桌一个，高0.95米，长2米，宽0.95米；石五供一套，长1.7米，高0.9米，宽0.38米。石碑两通，碑高2.55米，宽0.65米，厚0.2米，一为素云刘先师碑记，光绪二十一年孟秋立；一为刘真人道行碑。（图7）墓地当时由王刘氏保管（住老府村九号）。<sup>⑤</sup>宝藏寺今为军事单位占用。

①李养正编著《新编北京白云观志》，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234页。

②《素云刘先师碑记》载：“师讳诚印，道号符合子，其先世山东即墨人，明季迁直隶东光县。……庚戌年以故游京师，遂家焉。嗣以才识见知于怡亲王，因得名达天庭，诏入内侍，赐名增禄，又字德印。……己丑年始授总管六官事务之职嗣，即屡邀旷典，如园亭骑马乘舟回寓，疾时加赐黄金药品皆异数也。甲午恭遇万寿庆典，恩赏三品顶戴，三代以师贵，师益矢寅畏敬慎，将事终始不渝。”见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87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第129页。

③④⑤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87册，第129页。

④④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87册，第128页。

⑤李养正编著《新编北京白云观志》，第504页。

⑥李养正编著《新编北京白云观志》，第233页。

⑦该碑今在白云观东路真武殿东“怡淡守一真人塔”北。

⑧小柳司气太著《白云观志·白云观记事》，株式会社开明堂东京支店昭和九年（1934年）三月二十五日印刷，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发行，第37页。

⑨《素云刘先师碑记》，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87册，第129页；《刘素云道行碑》，见小柳司气太著《白云观志》，第158页；李养正编著《新编北京白云观志》，第236页。

⑩《重勒诸碑记》，小柳司气太著《白云观志》，第166、167页。

⑪小柳司气太著《白云观志》，第130～142、161、162、166～170页。

⑫《白云观拓修云集山房小引》，小柳司气太著《白云观志》，第174、175页。

⑬《刘素云道行碑》，小柳司气太著《白云观志》，第158、159页。

⑭李养正编著《新编北京白云观志》，第506页。

⑮⑯余荣昌著《故都变迁记略》卷十，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5月第2版，第132页。

⑰见今石景山区青龙山狮子窝佛宇岭摩崖石刻。

⑱张文大撰《青龙山狮子窝》，载刘燕主编《石景山文物》，北京市石景山区文化委员会，第94页。

⑳㉑《重修翠微山双泉寺记》，该碑在今石景山区双泉寺二进门前东。

㉒余荣昌著《故都变迁记略·附录》，第159页。

㉓张文大撰《青龙山狮子窝》，载刘燕主编《石景山文物》，第97页。

㉔（清）于敏中等编纂《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一百四·郊垌》。

㉕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寺庙历史资料》，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11月，第270页。

㉖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藏“文物古迹调查登记表”，庙563。

㉗《双泉桥重修记》，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藏“文物古迹调查登记表”，石1141。

㉘“万善桥”拓片，李新乐撰《通往慈善寺的南香道》，政协北京市石景山区委员会编《石景山文史第十集·天泰山专辑》，第105页；《重修万善桥碑记》，见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藏“文物古迹调查登记表”，石1142。

㉙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藏“文物古迹调查登记表”，古建44。

㉚《宏恩观碑》、《宏恩观碑记》、《宏恩观碑》，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87册，第73～76页；《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五十四·城市》。

㉛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寺庙历史资料》，第583页。

㉜吴廷燮等纂《北京市志稿·宗教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6月第1版，第282页。

㉝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藏“文物古迹调查登记表”，庙743。

㉞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片汇编》，第86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第184页。

㉟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编《北京名胜古迹辞典》，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9月北京第1版，第275页。

㊱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拓片，索书号：北京6113、6115。

㊲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寺庙历史资料》，第590页。

㊳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藏“文物古迹调查登记表”，庙68。

㊴奉宽著《妙峰山琐记》，国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出版，北京书局印刷，民国十八年（1929年）十二月初版，第21页。

㊵金勋编纂、李新乐点校整理《妙峰山志·序》，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第97、98页。

㊶奉宽著《妙峰山琐记》，第133、134页。

㊷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藏“文物古迹调查登记表”，墓247。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副研究员）

# 天坛祈谷坛坛墙青石吐水嘴修复实例

## ——浅议环氧树脂是否应该在石质文物保护中应用

张涛  
李卫伟

### 一、历史背景及现存状况

祈谷坛位于天坛的内坛北部，建于明朝永乐十八年（1420），是举行孟春祈谷大典的场所，它建在一个与丹陛桥同高的砖砌台子上，台子东西宽约165米，南北长约191米，台顶边沿建有一道高2米的矮墙围成庭院。其主要建筑有祈年殿、祈年门、皇乾殿、神厨、宰牲亭、长廊及内坛墙上东南西北的天门和西外坛墙的祈谷坛门。坛墙上共有青石吐水嘴30座。从目前现场勘察结果看，青石吐水嘴有8座损坏严重，影响了观瞻效果。为此有必要对天坛祈谷坛坛墙的青石吐水嘴顶进行保护修复，以减轻缺失的状况，并使其恢复原本的外观。

### 二、保护修复方法

1. 清理碎块断面：将断裂面上老化的酥粉清除，以保证接缝的准确。用棕刷和清水将断裂表面及缝隙中的尘土污迹清洗干净。

2. 石质配块：根据周围完好的青石吐水嘴，用相同的石材，制成缺失部分。

3. 胶结面处理：把原件和新配构件上的胶结面，用小锤子凿出小坑，再将10%的Paraloid B-72涂于各断裂面表面。目的是增加断面的粗糙程度，提高胶结剂的附着力，涂B-72是用来加固断裂面存在的结构脆弱部分，使接头的内聚力增大，保证粘接强度。

4. 金属加固：因所加修补的石构件，质量较重，为保证修补质量，在原件和新配的构件上，用水钻各钻两个小孔，并用不锈钢金属棍（直径为2cm，长度为40cm）连接，为了加强粘接力，在不锈钢金属棍表面车几道斜纹，以增加粘接面积。

5. 粘接可逆性处理：将15%的Paraloid B-72涂于各断裂面表面，包括钻孔内部，目的是依照可逆性原则形成环氧树脂与石材之间的隔离层，以便再次修复时可以无损拆解。Paraloid B-72可以用香蕉水或者丙酮来溶解，通常加固时使用挥发性较小的香蕉水作为溶剂，做隔离



青石吐水嘴修复前

层时选用挥发快的丙酮作为溶剂，故本次采用了丙酮溶剂。

6. 拼对粘接：使用环氧树脂粘接剂与固化剂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合，加入适量石英粉调匀，成粘稠状。将混合粘接剂放入钻孔内并插入不锈钢棍，粘接剂均匀涂刷断裂面（注意：在粘接时，两个粘接面一定要干净，涂粘接剂时，边缘部分需留出一点空余处，以免压挤出的粘接剂将构件表面染上污迹），然后将原件和新配的构件沿断裂面进行合拢，约 24 小时后完成固化。

7. 勾缝补全：使用极细的氧化钙（白灰）粉末和青石粉（颜色调至和修补部分相似），混合均匀后加去离子水调至膏状，在用环氧树脂粘接的地方，勾上一层，达到覆盖接缝的目的，也使原件和新配的构件之间达到自然的过渡。

上面这种修复方法，在表面上采用传统的白灰勾缝，粘接修补的方法，贯彻了文物整旧如旧原则，做到了远看近似，近看有别。而内部则采用金属支护，环氧树脂粘接相结合的现代修复手段，提高了原件和新配的构件之间的连接强度，有效的防止了新配构件脱落的危险，保护了游客们的安全。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证明此方法是非常简便可行的，并避免了传统方法粘接力不强、环氧树脂外露易被氧化变黄等缺点，充分利用了传统方法及现代方法的优点，使传统及现代方法达到了很好结合。

### 三、环氧树脂粘合剂及其固化剂

环氧树脂粘合剂是由环氧树脂与适当的固化剂按比例调配而成，环氧树脂本身是线形结构的热塑性高分子，每个分子结构内含有二个或二个以上的环氧基团，当与固化剂如多元胺、多元酸酐或聚酰胺发生反应时，环氧基团的环状结构被打开，发生一系列的聚合反应，线形分子交联成长链网状分子，成为不溶、不熔的热固性树脂。为了改善环氧树脂固化物的韧性、抗磨性、耐热性、硬度及工艺性，还可加入适当的增塑剂、填料或稀释剂。

有代表性的环氧树脂是由双酚 A 与环氧氯丙烷反应制造的双酚 A 型二缩水甘油醚 (DGEBA)，简称为双酚 A 型环氧树脂，占环氧树脂总产量的 90%。在分子结构中含有羟基和醚键，固化过程进一步生成新的  $-OH$  和  $-O-$ ，使固化物具有很高的内聚力和粘附力。因此可以对金属、陶瓷、石材、木材、水泥和塑料进行粘接。双酚 A 型环氧树脂属无毒树脂。按分子量的不同，环氧树脂又可分为低分子量、中分子量和高分子量三种，文物修复较多使用的是低分子环氧树脂，例如，型号为 618，6101 的环氧树脂，其分子量约为 300—500，软化点低，环氧值高。环氧树脂粘合剂多选择在室温下即可固化的胺类固化剂，如三乙烯四胺、乙二胺、二乙烯三胺等胺类固化剂。而其它



青石吐水嘴修复后

的固化剂如酸酐则必须在高温下才能固化，显然不能适用于文物保护。固化剂的用量对环氧树脂的交联程度有很大的影响，为了获得固化良好的树脂，固化剂的种类和用量是十分关键的。

#### 四、环氧树脂粘合剂用于文物保护的优缺点

##### 1. 环氧树脂粘合剂在文物保护中的应用

20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工业生产以来，由于其较强的粘合力，抗化学品、柔韧、绝缘、坚牢耐磨等优异性能，环氧树脂得以迅速发展并被广泛地应用于国防军工和国民经济各领域。而在文物保护领域内，环氧树脂粘合剂也凭借其良好的粘接力，在文物修复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如陶瓷器、玻璃器等文物的粘结和配补，石制文物的表面封护、加固或者作为粘合剂及灌浆材料用于石窟或石木结构古建筑的维修，效果显著，是目前文物保护领域内使用较多的高分子化合物之一。

环氧树脂粘合剂在文物保护领域内的应用是与二战后新兴高分子材料的大规模工业生产密切相关的。50年代，飞机制造工业的发展，对粘结技术提出了新的要求，环氧树脂粘合剂的应用和研究便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了一个飞跃，随后新型环氧树脂和固化剂层出不穷。新材料进步取得的新成果很快就被吸收到文物保护中去。而在此之前，文物修复的粘合剂一直沿用着动物胶、天然蜡或淀粉胶等传统粘合剂，就粘结强度和粘结寿命而言，都无法与环氧树脂等现代高分子材料相提并论，因而很快被取代。尤其应强调的是，在石质文物修复中，正是在近代引入了新兴的化学材料，修复水平才得以有如此大幅度的提高。环氧树脂已经是主要采用的粘合剂，其实际的应用方法也比较多样，既可直接用于石质文物的粘结又可加入酒精稀释后加固脆弱的部分；若加入填料如滑石粉、钦白粉又可充当配补材料，常用的稀释剂则有丙酮、乙醇等。

##### 2. 环氧树脂粘合剂的优缺点

环氧树脂在很多方面满足了文物保护的需要，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项优点：

(1) 使用之前为液体，具有一定的渗透性，流动性好。易与各种固化剂及添加剂、稀释剂混合，适合粘结、浇注等工艺的顺利进行；也可以通过添加填料增加稠度，以防垂直面上流胶，所以在施工工艺上颇具灵活性和多样性。

(2) 环氧树脂的固化是典型的体内聚合，固化

时一般无须高温，固化时也不产生较多热量或其它副产品。

(3) 粘接性能优异，环氧树脂固化体系中活性极大的环氧基、羟基以及醚键、胺键、酯键等极性集团赋予环氧固化物以极高的粘接强度。再加上它有很高的内聚强度等力学性能，因此它的粘接性能特别强，可用作结构胶。

(4) 环氧树脂的固化物机械强度（抗拉强度、抗弯强度、抗剪强度、抗冲强度）高，固化后收缩率也很小，一般为1%~2%。是热固性树脂中固化收缩率最小的品种之一（酚醛树脂为8%~10%；不饱和聚酯树脂为4%~6%；有机硅树脂为4%~8%）。线胀系数也很小，一般为 $6 \times 10^{-5}/^{\circ}\text{C}$ 。所以其产品尺寸稳定，内应力小，不易开裂。

(5) 具备较为稳定的物化性能，比如耐酸碱或较耐热。抗风化能力强，防水、防霉、防生物腐蚀。

另一方面，环氧树脂尚不能满足文物修复的所有特殊需求，其局限性也比较显著：

(1) 固化后的环氧树脂为三向交联结构的难溶、不熔的热固性树脂，不具可逆性。

(2) 由于使用了胺类固化剂，在胶黏剂固结后，常常因搅拌不均匀，而游离出部分胺类，经过一段时间后，胺类固化剂游离分子渗到石材粘合口的周围，有时还渗透到石材显现在表面上，经过空气氧化和在日光下的照射，会逐步产生黄斑、黄痕，对修复后的文物外观造成破坏。实验和修复实践都表明：环氧树脂如果直接暴露在自然环境中，尤其是经过阳光照射，几个月内就会从半透明全部变为浊黄色，致使修复的痕迹再次显现。

前文已经讨论过，环氧树脂粘合剂是导致变色的主要原因，因此在实际修复中，尽量避免用环氧树脂粘合剂也是改善变黄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但有些出于安全考虑，暂时没有其它适合的粘合剂可以取代，必须使用环氧树脂粘合剂的情况下，也要避免环氧树脂层与周围的原件有大面积的交迭，从而减少其暴露在外的范围。因此目前最为可行，且最简便的方法就是针对暴露在外的环氧树脂外层使用传统材料加以覆盖，有利于隔断外界光辐射对内层环氧树脂的影响，可有效延缓其变黄。另外在使用环氧树脂前要将15%的Paraloid B-72涂于黏结处，形成环氧树脂与石材之间的隔离层。这样，就避免了环氧树脂不可逆性和老化变黄的缺点，也充分发挥了环氧树脂的优点。

（作者为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助理工程师、助理馆员）

## 北京市文物局 2008 年二季度文博事业

# 大事记

4月4日 《徐悲鸿在南洋》展览在新加坡美术馆开幕。徐悲鸿纪念馆提供了包括国画《愚公移山》在内的29件藏品参展。展览于7月13日结束。

4月5日 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夫妇一行3人参观首都博物馆。

4月8日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带领国家文物局机关和直属单位的近百名工作人员到门头沟区爨底下村参加植树活动。植树活动结束后，参加植树的领导和工作人员集体参观了爨底下村。孔繁峙局长和区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4月10日 组织召开文物经营管理工作立法调研座谈会。国家文物局、市政府法制办、市工商局重要商品市场管理分局、市文化行政执法总队、朝阳区文委、宣武区文委、北京古玩城有限公司等相关单位的领导和代表出席了座谈会。会议建议尽早启动北京市文物流通相关规章或规范性文件编制工作。

4月13日 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刚到大觉寺参观视察。

4月14日 智利共和国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与中国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副局长董保华在首都博物馆分别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智利共和国政府关于防止盗窃、盗掘和非法进出境文物的协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智利共和国政府关于开展文化遗产领域交流合作的协议》。

由智利外交部、智利国家文化艺术委员会、智利驻华使馆和智利前哥伦布时期艺术博物馆、首都博物馆联合举办的《马普切：智利的起源》大型展览在首博开幕。智利共和国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中国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智利共和国外交部部长阿尔维特·班·克拉维仁、智利共和国文化部部长保利娜·乌鲁蒂娅、北京市副市

长蔡赴朝出席了开幕仪式。展览于6月20日结束。

法国伊尔儒丹钟铃博物馆及欧洲钟铃协会一行到北京大钟寺古钟博物馆进行交流互访，双方签订了有关协议，并参观了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

4月15日 与市工商局重要商品市场管理分局联合在北京古玩城召开全市文物商店经营者会议，部署文物商店迎奥运工作。

4月17日 由北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主办的北京奥运会倒计时100天主题歌《北京欢迎你》首发仪式在首都博物馆举行。该歌曲由我局与奥组委、中国移动合作推出。歌曲MV以故宫、八达岭长城、北海、景山、钟鼓楼、正阳门、孔庙、国子监、白塔寺、普度寺等20余处文物保护单位为背景，展现了近年来人文奥运文物保护修缮成果，展示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魅力和风采。歌曲推出后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欢迎，已作为北京迎接奥运的主题歌曲之一，同时也是2008年文化遗产日主题歌曲。

4月18日 “北京市文物局青年学术论坛”首次活动在国子监敬一亭举办，局属各单位青年业务人员40余人参加。

4月19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严隽琪参观大觉寺，孔繁峙局长陪同。

4月21日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在市文物局舒小峰副局长陪同下考察了首都博物馆的文物库房、信息化建设和文物保护修复中心，并与在京的部分文物保护科技工作者进行了座谈，对首都文物保护科技工作又好又快发展提出了方向性的意见。

4月23日 在孔庙和国子监管理处组织举办应对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联合演练。孔庙和国子监管理处全体职工，东城区消防支队、安定门街道办事处、安定门派出所、鼓楼中医院等派出工作人员参加了演练。国家文物局、市委宣传部、首

都综治办、东城公安分局、东城区文委等有关领导到现场观摩指导。局属单位主管安全工作的领导及保卫干部也到现场参观学习。

4月25日 东城区玉河地区东不压桥遗址保护工程开工。该工程为我市文物修缮中长期规划2008年度补助项目，补助经费50万元。

4月28日 2008年北京地区博物馆工作会议在首都博物馆召开。孔繁峙局长、舒小峰副局长、北京博物馆学会张大祯理事长出席了会议。来自全市百余家博物馆、各区县文委、十三陵及八达岭特区的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对北京地区各博物馆为迎接北京奥运会所做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并部署了下一阶段的工作，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

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启刚带领工作组对首都博物馆、北京艺术博物馆进行安全检查，了解了我局开展“平安奥运行动”工作进展情况，传达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副市长蔡赴朝对“故宫博物院发现不明来源汽油桶事件”的批示，对局系统文物安全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4月29日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带领行政执法专项督查小组检查历代帝王庙、白塔寺、北京艺术博物馆等单位的文物安全工作，了解了北京市落实国家文物局有关文物安全和执法督查工作的汇报并提出了要求。市文物局孔繁峙局长、舒小峰副局长陪同。

4月30日 配合北京奥组委在太庙举办北京奥运会倒计时100天庆祝活动暨第四届北京2008奥运会歌曲评选活动颁奖晚会。

4月份 大兴采育墓葬考古发掘工作结束，发掘清理了一批明清墓葬，出土文物100余件。

4月份 中关村创新园考古勘探工作结束，勘探面积72万平方米，发现古窑址1座，古墓葬228座。

4月份 举办局系统“消防监控人员业务培训班”和“安防监控人员业务培训班”，局属单位120余名工作人员参加了岗位业务培训。

4月份 4月23日故宫博物院发现不明来源汽油桶事件发生后，我局派出突击行动小组到部分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放置模拟危险品，重点检查这些单位的防范措施和应急反应能力，进一步增强各单位防破坏、防爆炸的意识和能力。

5月2日 《悲鸿走天下——徐悲鸿经典作品山东特展》在山东省博物馆展出。山东省和济南市各大新闻媒体予以报道。

5月8日 历时一个月的《2008年北京地区

博物馆通票》退票工作圆满结束。

北京市文博系统火灾隐患整治攻坚战动员大会在首都博物馆召开，各区县文委、国保单位、局属单位主管安全工作的领导参加。会议传达了国务院办公厅和北京市防火委员会有关火灾隐患排查工作的文件精神。孔繁峙局长就全市文博系统开展火灾隐患整治排查攻坚战工作进行了动员和部署。

5月9日—11日 由北京市文物局主办，北京市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承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首都博物馆等单位协办的“汉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海淀区裕龙大酒店举办。来自全国十多个省市以及日本、韩国有关科研机构的121名代表参加了研讨会。

5月18日 “国家一级博物馆授牌仪式暨北京地区5·18国际博物馆日活动开幕仪式”在首都博物馆举行。文化部部长蔡武，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程东红，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副市长蔡赴朝，中国博物馆学会理事长张文彬，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刘志及市文物局孔繁峙局长出席了授牌仪式。北京地区有11家博物馆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

故宫、八达岭景区内的无障碍设施正式启用。

5月19日 下午14时28分，局系统全体干部职工与全国人民一起为汶川地震遇难同胞默哀。

5月20日—22日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董保华带领检查组对大钟寺、颐和园、白云观、圆明园、德胜门、正阳门等国保单位的文物安全工作进行检查。市文物局崔国民副局长陪同。

5月22日 由希腊文化部主办、首都博物馆和香港CSG公司承办的“2004年雅典奥运会开幕仪式道具服装展”在首都博物馆开幕。展览于7月6日结束。

5月28日 根据市政府办公厅要求，组织东城区人民政府、市财政局、市发改委、市规委、市市政管委、市建委、市消防局召开开辟智化寺西北侧防火隔离带协调会。

5月30日 由48家社会单位及个人捐款铸成的中华戒烟钟入藏大钟寺古钟博物馆。

5月份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局系统广大干部职工踊跃向灾区人民捐款，共捐款人民币292857元。

5月份 北京市文物公司联合翰海拍卖公司、彦博文化公司向四川地震灾区捐款45万元人民币用于希望小学的建设。

6月4日 市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和提案委员会委员视察明十三陵保护和整治工作。崔国民副局长陪同。委员们对北京市的文物保护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6月9日—14日 为迎接我国第三个“文化遗产日”，我局举办了“文化遗产日”宣传周活动。活动设立了开放日、鉴宝日、体验日、校园日、专业日、社区日等6个专题日，通过专家、北京文化遗产荣誉推广人与市民互动，普及文物保护知识，营造全民参与保护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

6月11日 绵阳市文物局、绵阳博物馆4位同志克服困难，将一件1.98米高的国宝级文物“东汉铜摇钱树”护送到首都博物馆。该文物是世博奥运期间大型展览《中国记忆——5000年文明瑰宝展》的重要展品之一。

6月14日 由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北京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08文化遗产日——奥运北京系列活动”开幕式在首都博物馆隆重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至立、文化部部长蔡武、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国家宗教局副局长齐晓飞、国家文物局副局长董保华等领导出席了开幕式并为活动剪彩。

市文物局与相关单位在孔庙、国子监举办“文化遗产日”主题纪念活动，内容包括国子监街开街仪式、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开馆仪式、文物保护先进集体和个人名单揭晓、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中英文说明牌授牌仪式、卡卡文化旅游掌上地图发布、授予王刚荣誉推广人、文物修缮保护利用中长期规划启动。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启刚，市政府副秘书长刘志，奥组委文化活动部部长赵东鸣，文物专家罗哲文、谢辰生，市文物局于平副局长、崔国民副局长出席了开幕仪式。各区县也纷纷开展丰富多彩的纪念宣传活动，参加人数60000余人。

6月16日 北京地区博物馆行业残奥知识大讲堂、多语种外语培训大讲堂在首都博物馆、中国科技馆拉开序幕。我局组织专家编制了专门的培训教材，内容包括汉语与英、俄、法、德、意、西、日、韩八种语言的对照读本。培训工作于6月底结束。

6月26日 与市文物保护协会在首都博物馆联合举办第二期学术报告会，邀请北京大学环境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于希贤先生作了题为《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报告。局机关、局属单位、区县文委、文管所、文物保护协会会员单位以及会员个人150余人参加。

6月30日 北京段长城资源野外调查工作结束，资料整理工作启动。

6月份 历时三个月，国子监街牌楼抢险修缮工程竣工。工程严格按照设计方案施工，按照原形制、采用原材料实施，质量监督部门对施工各阶段的工程质量进行了核验。本工程决算14.9万元，由肇事单位支付。

6月份 组织质量监督站进驻山海关古城墙保护工程现场开展全程质量监督。该工程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总长度6000余米，国家总投资约2亿元。为确保工程质量和奥运会前完工，河北省文物局邀请我局协助对工程进行全程质量监督。

6月份 《北京段考古发掘报告集》（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文物保护项目第1号）出版。该报告介绍了位于房山区10处发掘地点的发掘成果。

6月份 大兴新城北区第16号地遗址古墓葬群发掘工作结束，发现唐代至明清时期墓葬37座。

6月份 朝阳区十八里店乡发现明代德清公主及驸马合葬墓。

6月份 位于房山区青龙湖镇大苑村西的西六环K3+500标段考古发掘工作结束。发掘面积5000余平方米，发现古庙遗址1处、汉代墓葬1座、明清墓葬35座。

6月份 在国家文物局的部署下，北京市文物系统在最短时间内组建了文物保护工作队实施援助计划。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和清华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先期随国家文物局前往灾区进行评估，并着手开展相关文物保护工程设计工作。

6月份 北京市文物公司向北京奥组委奥运村（残奥村）村长院展厅提供粉彩百鹿尊等4件文物用于奥运期间外事展陈。展期为2008年7月1日至9月30日。

2季度 2008年中长期修缮项目西什库教堂（北堂）修缮工程、广福观修复工程、法源寺二期三批修缮工程、慕田峪长城西段修缮工程、太庙外围墙及大门修缮工程、正觉寺一期修缮工程后续项目、密云大公主府正殿、寝宫院修缮工程、东城区玉河地区东不压桥遗址保护工程等进行了公开招投标，进入施工阶段。

2季度 北京市市级配套普查专项补助经费、普查设备全部发放到位，实现了“机构、人员、资金、设备、培训”五到位。各区县已开展了普查培训，全市参加普查培训人员达980人次。据不完全统计，各普查队已经对全市623处文物进行了登记，其中复查482处，新发现141处。



**2 季度** 组织完成了 1290 余处四合院的现场调查分类工作,配合市建委等部门开始实施旧城修缮改造工作。为更好地指导各区按照房屋分类情况进行修缮,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傅熹年、北京市古迹委员会专家组成员谢辰生、罗哲文、徐莘芳,文物专家付清远、张克贵等多次对东城区、崇文区、西城区、宣武区等相关院落进行现场抽查核验。

**2 季度** 审批注册了北京韩美林艺术博物馆。

**2 季度** 与北京博物馆学会联合对北京地区博物馆的环境、双语标识、馆容馆貌、接待服务、人员培训等工作进行达标验收。

**2 季度** 继续开展北京地区“5·18 国际博物馆日”宣传活动。今年首次举办了博物馆“讲座月”、“流动的 5.18”博物馆探宝等活动。同时,为悼念在四川汶川大地震中遇难的同胞,支援灾区人民,在宣传活动中特别加入了悼念和赈灾的内容,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群众的参与热情。北京地区各博物馆也纷纷举办了各具特色的宣传活动。

**2 季度** 我局申报的《考古发掘项目质量管理规范》、《考古现场纺织类文物提取与应急保护技术要求》2 项行业标准修订建议项目列入国家文物局编制的《2008 年度行业标准研究制定项目计划》。同时,根据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要求,开始编制本局“2008—2012 年标准发展规划”。

**2 季度** 向市科委申报科研课题,其中首都博物馆的“中国古代丝织品保护研究”课题获批立项,市科委拨付配套经费 200 万元。向市社科规划办申报 2008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代园寝志”和“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之文物鉴定、修复和文物修缮类人才培养工作调研”获批立项。

**2 季度** 按照市财政局采购办公室要求,在局属各预算单位开展政府采购自查工作,并接受市联合检查小组对 2007 年琉璃河商周遗址防盗掘安全技术防工程和国子监三期修缮工程两个政府采购项目的专项检查。

**2 季度** 制定《北京市文物局国有资产处置暂行规定》,完善《北京市文物局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

**2 季度** 制定首都博物馆行业定额,经市政府审核通过,纳入全市博物馆行业定额预算指标。

**2 季度** 组织区县文化委员会对上半年各区县文物安全和文物执法工作情况进行交叉检查考评。开展二季度局属单位安全工作交叉检查考评工作。

**2 季度** 对 45 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巡视检查,对 37 家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进行抽查。接待公、检、法等有关部门涉案文物鉴定 14 次,鉴定涉案文物 130 余件。

2008 年第二季度市文物局属博物馆参观人数统计表

名 称	入馆总人数	购票人数	免票人数	学 生	老 人
首都博物馆	192439	22532	169907	19363	24808
大觉寺	57654	48350	9304	491	3240
正阳门	15793	13750	2043	288	939
徐悲鸿纪念馆	19670	0	19670	340	
智化寺	8870	5451	3419	1116	1347
辽金馆	5199	0	5199	270	1816
西周馆	16972	0	16972	8344	1406
艺博	54221	51219	3002	339	1160
团城	4568	0	4568	208	735
大葆台	8811	0	8811		
大钟寺	73844	60356	13488	2025	2945
古建馆	24358	5510	18848	1925	1019
白塔寺	49563	40917	8646	391	2836
老舍纪念馆	5023	0	5023	1033	1554
德胜门	37893	35208	2685	724	1961
石刻馆	16700	14327	2373	495	2373
孔庙国子监	81044	57813	23231	13516	21736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文博. 2008.3/张展主编.—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8.9

ISBN 978-7-5402-2044-0

I.北… II.张… III.文物工作—北京市—丛刊 IV.G269.27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41964号

北京文博 (2008 \*3)

---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 399 邮箱)

中国印刷总公司

---

889×1194 毫米 16 开本 6.5 印张 193 千字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2000 册 定价: 15 元

# 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北京部分介绍（六）

## 金陵

- 年代：金
- 说明：金陵位于房山区车厂村，初建于金海陵王时期(1149~1161年)。金陵陵区面积约60平方公里，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皇陵，也是北京地区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帝王陵。现已发掘睿陵(葬金太祖完颜阿骨打)。金陵是北京重要的古代帝王陵寝之一，对研究金代历史发展、金代建筑艺术、营建工程等具有重大价值。
- 地址：北京市房山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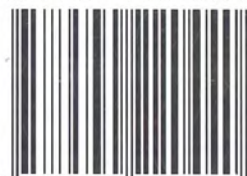


## 利玛窦和外国传教士墓地

- 年代：明至清
- 说明：利玛窦是意大利传教士，也是一位数学家。明万历十年(1582年)来中国传教，并向中国介绍西方的天文、历法、地理和数学等科学知识。1610年，利玛窦在京病逝，明万历帝赐“腾公栅栏”为其墓地，1611年入葬。从此，此地即成为京城传教士墓地，时人称“栅栏墓地”。清初，顺治帝赐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墓地于栅栏墓地西侧。以后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等中外教士80余人葬于此。1900年墓地被毁，同年重修。20世纪60年代，墓地再毁。1979年，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墓园得以重修。1984年，扩建新墓园，竖残存各国教士碑60尊。1993年，清代石门移至墓园南端，形成现今墓地格局。
-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



ISBN 978-7-5402-2044-0



9 787540 220440 >

定价：15.00元